



3 1761 08420081 5


七十年來家國

一個老香港的回憶

加
港

關士光著

香港傳記叢書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0 with funding from
Multicultural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七十年來家國

一個老香港的回憶

七十年來家國

一個老香港的回憶

關士光著



香港傳記叢書

多大・約大 聯合亞太研究所
多倫多 1999

Hong Kong Life Stories

The Arches of the Years, by Brian Yu

My Home and My Country: Memoirs of an Old Hongkongan, by Stanley Kwan

加港研究計劃

Canada and Hong Kong Research Project

University of Toronto - 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York Lanes, Suite 270

York University

4700 Keel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3J 1P3

Copyright © 1999

by the Governing Council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York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1-895296-36-6

Printed in Canada at the Coach House Printing Company.

Co-Directors, Canada and Hong Kong Project:

Diana Lary and Bernard Luk

Copy Editor: Janet A. Rubinoff

Calligraphy for cover design by Jerome Ch'en, York University

《香港傳記叢書》編者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半個世紀，香港從華南沿海的殖民地式通商口岸蛻變成爲世界經濟的一個重鎮，並且發展出獨特的大都會文化。香港毫無疑問是個華人社會；也同時是多元化的公民社會。香港的社會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並駕齊驅，但卻較少記載於學術著作或普及讀物之中。

香港社會的成長，是無數香港男男女女努力的結果。其中有人名成利就，事蹟見諸史籍碑銘。大多數人則默默工作，在艱苦的處境中掙扎求生，維持自尊和養育下一代。我們透過這些前輩男女的生命歷程，可以對香港社會的演進，獲得更深入、更全面的認識。

《香港傳記叢書》將會包羅不同觀點角度撰寫的自傳、傳記、口述歷史和作品集等。《叢書》的宗旨，就是我們「加港研究計劃」一貫的宗旨：瞭解香港的演變、促進加拿大社會各界對香港的認識。每位作者自負文責。書中意見，不代表「加港研究計劃」全寅或《叢書》主編。

《七十年來家國》的作者關士光先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日軍突襲香港時輟學，旋即前往中國西南參加抗戰，任中、美聯軍的翻譯官。和平後返港，曾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從事翻譯工作。其後投身恒生銀行，主持該行的資料研究部凡二十二年。任職期間曾負責「恒生指數」和「恒生消費物價指數」的編製，並被香港政府委任爲統計諮詢委員會委員。退休移居加拿大後，在積極參與多倫多社區生活的同時，他不忘讀書寫作。關先生的回憶錄是一位摯誠明理的人對香港政治經濟演變的剖析與反思。

加港研究計劃主任 戴安娜 陸鴻基 謹序

一九九九年正月於多倫多

目錄

| | |
|------------------------------|-----|
| 《香港傳記叢書》編者序..... | 5 |
| 《七十年來家國》作者自序..... | 9 |
| | |
| 第一章：我的出身與思想啟蒙..... | 11 |
| 第一節：我的家世..... | 11 |
| 第二節：先父的際遇與香港金融業滄桑..... | 15 |
| 第三節：望子成龍與殖民地教育..... | 18 |
| 第四節：殖民地教育的特產——買辦..... | 22 |
| 第五節：從讀中文到讀番書..... | 26 |
| 第六節：學生時代見聞..... | 29 |
| | |
| 第二章：第二次世界大戰投筆從戎..... | 34 |
| 第一節：香港保衛戰..... | 34 |
| 第二節：「大東亞共榮圈」..... | 39 |
| 第三節：「自由中國」..... | 42 |
| 第四節：洋人來華助戰..... | 45 |
| 第五節：戰時繙譯官..... | 49 |
| 第六節：反攻緬甸..... | 55 |
| 第七節：日本投降，中國慘勝..... | 60 |
| 第八節：中國陸軍與美國空軍給我的印象..... | 63 |
| | |
| 第三章：戰後十多年的見聞和工作體驗..... | 68 |
| 第一節：香港重光..... | 68 |
| 第二節：中共與「民主人士」在香港活動..... | 72 |
| 第三節：港英政府與香港華人對中共解放大陸的反應..... | 75 |
| 第四節：我們兄弟的家國情懷..... | 78 |
| 第五節：韓戰與禁運..... | 81 |
| 第六節：全世界最大的領事館..... | 84 |
| 第七節：難民與移民..... | 87 |
| 第八節：美國陸、海、空三軍聯絡處..... | 90 |
| | |
| 第四章：傳奇的銀行從業員生涯..... | 97 |
| 第一節：恒生銀號到銀行..... | 97 |
| 第二節：銀行業務取向..... | 106 |
| 第三節：銀行風潮，恒生因禍得福..... | 111 |

| | |
|---|-----|
| 第四節：恒生長者的教誨，銀行寓宣傳於教育..... | 117 |
| 第五節：銀行信貸與資料研究..... | 123 |
| 第六節：恒生指數，恒生消費物價指數與統計諮詢委員會..... | 133 |
| 第七節：經濟研究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 | 146 |
| 第八節：辦公室政治及名譽與地位..... | 152 |
| 第九節：香港資本家與權勢，恒生銀行改弦易轍..... | 156 |
| 第十節：「看不見的手」與家長式企業的式微..... | 162 |
| 第五章：吾愛吾國愛何國..... | 166 |
| 第一節：國籍的煩惱..... | 166 |
| 第二節：親人回祖國參加革命..... | 168 |
| 第三節：難忘的祖國之旅..... | 174 |
| 第四節：啊，加拿大！..... | 187 |
| 第五節：加拿大華僑抑或華裔加拿大人？..... | 192 |
| 第六節：香港回歸祖國，移民回流與回港探親..... | 199 |
| 第七節：另一次難忘的祖國之旅..... | 203 |
| 第八節：理想國的追尋..... | 214 |
| 《七十年來家國》讀後——蘇紹興..... | 218 |
| 《七十年來家國》讀後——溫偉耀..... | 219 |
| 附錄..... | 220 |
| 《七十年來家國》英文摘要..... | 235 |
| English Synopsis of <i>MY HOME AND MY COUNTRY</i> | |

作者自序

我於一九二五年在香港出生，一九三一年六歲時入中文學校讀小學，一九三六年十二歲時入英文書院讀中學，一九四一年快將十六歲時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輟學，從此展開我的打工生涯。我在社會做事的時間長達四十年，轉換了幾次職業，依次為：替二次大戰駐華美軍服務了三年，在香港英商天祥汽車行工作了八年，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工作了七年，在香港恆生銀行服務了二十二年。換言之，在我的四十年打工生涯中，有差不多一半時間是為美國及英國人做事的。在中、西文化夾縫之間生活，是典型香港人的出路。由於生於斯、長於斯，我算是一個老香港。到如今，這個老香港已年逾七旬。至此，我不禁想起孔子曾經講過的自述話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每人都有些心願，上了年紀的人尤其有些心願急於在有生之年內完成。我於一九八四年從恆生銀行退休後告別香港移民加拿大。至一九九零年，我已足六十五歲，晉身加國耆老之列。很感謝造物主的恩賜，做了耆老之後，我的身心仍健康，有良好記憶力，還有精神與興趣去讀書和寫作。於是我有這麼樣的一個心願：將過去數十年的見聞和感想扼要地和有系統地記錄下來，寫成一本書，看看我的人生過得有無意義，並以此作為我所經歷的時代的一個見證。這件事，少年和中年的時候不能做，沒有條件做，因為種種限制不可做。到了古稀之年還精神矍鑠，是我可以「從心所欲、不踰矩」地做這件事的時候了。

這本書的內容，涉及多個有歷史、文化、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和宗教信仰意義的故事。這些故事發生於中國大陸、香港和加拿大。中國是我的祖國。我的大半生以香港為家。退休後我在加拿大已居住了十多年。在上述的故事之中，有幾個我曾身歷其境。每個故事都蘊含著我的家國情，使我畢生難忘。愛妻陳永堅，姪兒關卓中，四弟關子光，外甥女、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文思慧博士，英皇書院舊同學、恆生銀行舊上司文國鑒先生，多倫多聖公會諸聖堂教友、資深新聞工作者姚漢樑先生，多倫多華人作家協會會長蘇紹興博士，專欄作家蘇廣哲博士及李蘭菊女士，安省神學院教授兼專欄作家溫偉耀博士，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陸鴻基博士等均曾經協助我出版此書。我向他們致衷心的謝意。

關士光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多倫多

謹以本書
獻給
愛妻陳永堅

並紀念
先父關濟東
先母鄧肇瓊
先岳父陳孺直
先岳母潘瑞賢

第一章：我的出身與思想啟蒙

第一節：我的家世

我生長於一個傳統的中國人家庭。傳統的中國人家庭多備有一本族譜，以記載家族繁衍的經過，和歷代祖先的名字、稱號、生平的重要事蹟。爲了使後代子孫不致忘記先人創業的艱辛，和對家族的源遠流長有磨績不斷的感覺，每過一、兩代，族譜就要修訂一次。到了我家族的第二十代，即我父親這一代，先人遺下的族譜因戰亂而遺失。本着「考世系知始終」之意，父親「爰拾先人之記載」，彙成一篇概略的族譜，名曰《世系錄》。

父親臨終時沒有留下什麼財物。由他親手撰寫的《世系錄》是他給了孫的最寶貴遺產。他對《世系錄》非常重視，從《世系錄》的序言可以見之：

嘗思木本水源之義。蓋木有所本故枝葉盛，水有所源故派流長，則本源之重可知矣。矧人爲萬物之靈，其系統之大，生殖之繁，往往有不知其宗族自何而來，祖考自何而始。無他，此乃先人既無遺錄之傳，後人更乏考究之法，遂至日久漸忘，良可慨也。爰拾先人之記載，彙成一篇，名曰《世系錄》，本考世系知始終之意，非敢善也。不過略述大概，庶幾百代衣冠如澹焉，千年子孫可識焉。

根據《世系錄》，我家族的淵源，可追溯至距今七百餘年前的南宋時代。始祖姓關、諱致政、字匯源，號潮江，後人稱他爲潮江公。他於南宋度宗咸淳九年癸酉歲（公元1273年）落籍廣東省、南海縣、九江鄉。《世系錄》沒有記載始祖於何時何地出生，只道出他來自廣東省、南雄縣、珠璣巷，和他從珠璣巷移居九江時的歷史背景：

按度宗之世，頻年兵革，庫空如洗，百姓失業，民鮮蓋藏。迨度宗七年，天下大飢，淮、浙、湘、贛尤重。命官賑荒，亦不過一紙虛文，禁民間糴強糴，不抑米價，勸分有方而已。非大倉廩以施惠於民。其時，湘、贛飢民輾轉求食，結隊南來，強乞強糴之事在所難免，甚至成爲流寇。南雄爲入粵之要區，寇、盜充斥，實迫於此，寇至蓋去諸。此我始祖徙居之理由一也。其次爲兵禍。咸淳間，蒙古復大舉南侵。忽必烈自將圖鄂，又遣其大將兀良哈台由交趾陷靜江（廣西臨桂縣），北繞粵邊，出入湘贛，進圍潭州（湖南長沙），中外震動，粵邊形勢日緊。迨咸淳九年癸酉，正月樊城陷，二月呂文煥以襄陽降，於是臨安危，舉朝震動，上下騷然，王室遂有航海之謀，人民逼作避地之計。此我始祖亟於遷徙之理由二也。……按始祖之來也，棄木筏浮江，至本鄉因牌破而登陸，是初無目的地，大有放乎中流，任其所之之勢。可見當時事以急迫，出亡之方尚無定地，顯然因避世亂，以至流離失所，可無疑矣。然則避難之主因何？曰飢荒與兵禍也。

九江古曰良鄉，後改九江堡儒林鄉，再後改九江鎮，屬廣東省南海縣，位於珠江三角洲之腹地。珠江的概念與黃河、長江不同，它由東江、北江、西江三大水系組成，無所謂主河道。故此三角洲地域甚為遼廣。中國的主要江河都向東，只有珠江奔正南而去，經虎門而注入海洋。虎門是清朝林則徐焚燒鴉片之處，有着歷史性象徵意義。因林則徐禁煙而引發的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第一次面臨以侵略戰爭形式表現的「西方的挑戰」。而《世系錄》所說「始祖之來也，乘木筏浮江」的「江」，可能就是北江。

九江居民素以養魚、種桑、養蠶、繅絲為主要生計。魚塘、桑田滿佈九江鄉間。九江鎮內的工商業活動不大，只有一些小型手工業和批發、零售商店。魚與生絲為九江最大宗的物產。在九江釀製的雙蒸米酒也遠近馳名。九江煎堆和九江叉燒的製作獨具風格，美味可口，兩者都是我童年愛吃的東西。清末、民初，九江鄉和南海縣有兩個九江與南海人引以為榮的名人——朱九江和康有為。朱九江是一位學者，為鄉人所敬佩；康有為與新會的梁啟超，同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代宗師。當代知識分子無人不知道康、梁倡議的「維新運動」，但鮮知朱曾是康的老師。

始祖定居九江後，子孫繁殖，一代一代相傳下去，輪到我這一代，已經是第二十一代了。十九世祖是我的祖父，諱栻宗，字晉亨，號翼坡，生於咸豐九年（公元 1859 年），終於光緒三十年（公元 1905 年），享壽四十六歲。關翼坡少年時好讀書，甚得老師器重。清代讀書人揚名聲顯父母之道為考取功名，做朝廷命官，從而「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可惜十九世祖懷才不遇，考不到功名。

參加科舉考試是考取功名的途徑。滿洲人為了要鞏固其對中國的統治，除以武力鎮壓漢人外，還懸利祿以收買漢人。收買的方法是通過科舉考試挑選漢人做官，以收「以漢治漢」之效。科舉制度又名「八股取士」制度。清廷對應試者最大的要求不是他們的才幹和學識，而是要他們寫華而不實、對朝廷歌功頌德的文章，文體的字數有規定，文字必須堆砌在八個對偶的段落之內，即所謂「八股」。

根據郭廷以著的《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科舉考試的內容和制度對中國政治、社會的影響有如下述：

八股取士制度之目的，主要是一面懸利祿以收買漢人，使悉入彀中，一面百般折磨，必令俯首貼耳，志氣喪盡。考試分為三級，第一級為童試，三年舉行兩次，須經過縣考、院（省）考，方能成為生員（秀才），全國每次錄取約二萬五千名。第二級為鄉試，分省舉行，三年一次，分為三場，如試卷污沾，文字違例，不得再入下場。考中者第一名為解元，餘為舉人，全國每次錄取約一千四百名。會試為第三級，在京師禮部舉行，亦三年一次，第一名為會元，餘為貢生，中試的考卷如發現文體不正，字句可疑，即予除名。繼為殿試或廷試，一場而畢，得失升降，決於一日，所試為策論，所重為書法。中試的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分授翰林院修

撰、編修。二甲爲進士出身，三甲爲同進士出身，共約二百名上下。再經朝考，優等者入翰林院爲庶吉士，餘分爲六部主事、內閣中書或各省知縣。庶吉士在館三年，經散館考試，然後授官。憑文取士，原已難得真才，進士復以字爲重，不通事務，毫無常識者不乏其人。他們是每三年在數萬人之中，所選拔出的高級知識分子，亦爲左右政治社會的權勢人物。

……漢人之熱中利祿者，但知講習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觸時諱，不敢談民生利弊、論時政得失，惟有致力於考據之舉，以求遠嫌免禍，學術上流於破碎支離，不見其大者遠者，民族的朝氣墜喪，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隔，大臣圖葺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社會上「清議聞，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論之事，漠然無與其身。」

關於十九世祖考不到功名之事，和後來他的言、行，在他的墓誌銘中有如下述。墓誌銘是翼坡先生的一個學生所作，全文刊於《世系錄》之內。摘要如下：

……按先生姓關，諱棣宗，庠名逢吉，字晉亨，號翼坡，潮江公十九世孫也。……體碩，貌赤，性伉爽，好學問。……然屢困於童子試。……先生以名不成，無以博高堂歡也。復寄藉桂省。光緒丙辰授知於學使馮金鑑公。補武宣縣博士弟子員。而廢科舉之命遽下。遂絕意進士，杜門講學，英材樂育，善誘循循。嘗曰師者階也。引而升之，趨則蹶矣。又曰富不由儉，奢則必貧，識者歎爲不刊之論。……

滿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是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夭折與一九零零年義和團排外失敗以後之事。鑑於國家陷於毀滅，幾爲列強所瓜分，清廷於一九零一年再度變法，以求自保。實行新教育制度，廢科舉，設學堂，是這次變法的部分內容。不過，這次變法只是換湯不換藥的強顏變法。它挽救不了滿清的滅亡。祖父考功名不成後，從事教育工作，爲家鄉培養人才。他的言行對後代有深遠影響。父親和我及各兄弟均有讀書人的性格，我們都有道德良知和正義感。我們的身體裏面，似乎都充滿了關翼坡的遺傳因子。

明、清兩代的名門望族及詩禮人家，家主人多喜歡爲他們的家取一個稱號，是爲堂名，例如翼坡先生，就稱他的家爲關忠孝堂。堂名爲一家之標幟，其意多取吉祥，或寓勸勉子孫之意。據父親說，祖父之家取「忠孝」之名，與關羽這個傳奇性的歷史人物不無關係。東漢後期三國時代的關羽，字雲長，有膽識，有武功，爲人忠心，有義氣，宋代及明清皆有封諡，世人稱他爲關公，把他奉作神明。翼坡先生姓關，以作爲關公的後裔而自豪。在我童年家居大門兩側的牆壁上，懸掛着一副對聯。右邊是「儒林傳世澤」，左邊是「忠義振家聲」。儒林指九江鄉，因爲九江鄉又稱儒林鄉。忠義與忠孝則有相輔相成的意義。據父親說，這

副對聯是祖父遺留下來的家訓。顯然，祖父翼坡先生希望他的後人不會忘本，以忠孝、忠義為做人之道。

我的祖父關翼坡配室梁氏，生子女七人。排行第七和年紀最幼的名維徐，字濟東、號季然。排行第一和年紀最長的名維揚、字淮洲、號伯然。關濟東是我的父親。關淮洲是我的大伯父。關翼坡早年去世，當時我的父親只有幾歲。祖父去世後，大伯父負起照顧他的母親及弟妹之責，成為關忠孝堂的主人。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工業革命漸次完成，機器化的生產大量增加，市場因待開發，原料亦須爭取。由於國力日增，軍備日強，英國人不安於現狀，以發展國際貿易為名，不斷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在亞洲，英國首先領佔了印度，繼而佔領馬來亞、新加坡等地，控制了東入太平洋的海道要衝。到了這個時候，英國要打開地大物博的中國的門戶。無論中國願意與否，英國要與中國通商，中國不願意時，英國就以砲艦政策來迫中國就範。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向中國推銷鴉片。鑑於鴉片流毒甚廣，中國實行禁止鴉片進口。英國以保護商人的利益為藉口，派軍隊與中國開戰。歷史上有名的鴉片戰爭於是爆發。英國軍隊先後在一八四零年及一八五六年的兩次鴉片戰爭中擊敗中國。一八四一年，英國軍隊已登陸香港島，宣布香港島為英國殖民地。一八四二年，英國迫中國清朝政府簽訂《南京條約》，正式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一八六零年，英國又迫清朝政府簽訂《北京條約》，讓英國佔領香港島對岸的九龍半島及半島西面的昂船洲小島。一八九八年，英國進一步強迫清朝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讓英國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的一片土地，以及附近的二百多個大小島嶼，即所謂新界。新界的租借期為九十九年，由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根據上述三條條約而被英國佔領及租借的地區，形成了日後的英國皇家殖民地香港（The Crown Colony of Hong Kong），簡稱香港。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再受到列強侵略，滿清政府腐敗無能有加，把國家弄到政治混亂，經濟破產，民不聊生。於是大陸沿海地區人民相繼逃離老家到海外謀生，廣東省、南海縣、九江鄉的鄉民也沒有例外。另一迫使九江人離鄉別井的是天災。九江地瀕西江，西江不時氾濫。一九一六年的特大洪水奪去了許多九江人的生命和財產，僥倖生還的人急急逃生。關淮洲就在此情形之下乘機避開中國大陸的人禍與天災，攜同母親、妻妾和弟妹從九江來到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安身立命。

關濟東在香港成家立室，與他跟從長兄關淮洲從事金融業有關。早期香港謀生的九江人，以經營銀號見稱。銀號是傳統中國模式的金融機構，又稱為錢莊。由香港開埠初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九四零年代末期，銀號在香港金融市場中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以後將一再闡述。

九江人在香港開設的銀號，以瑞吉銀號歷史最為悠久。大伯父到港初期在瑞吉銀號做工，後來自闢天下，開辦永德銀號，數年後又創立永大銀號。另一歷史悠久的銀號為鴻裕銀號。在鴻裕銀號職員之中，有一名九江人名叫鄧志昂，

他為人老實，得老闆讚賞，不久他離開鴻裕銀號，自己開辦一間銀號，名為天福銀號。永德與天福是差不多同期創業的銀號。

中國人重視親情，做生意的往往利用親戚關係互相發展業務。七十多年前，永德銀號東主關淮洲有一個未婚弟弟關濟東，天福銀號東主鄧志昂有一個待字閨中女兒鄧肇瓊。基於上述原因，關濟東與鄧肇瓊結為夫婦，關、鄧兩家成為親家，乃係很自然的事。關濟東是我的父親，鄧肇瓊是我的母親，關淮洲是我的大伯父，鄧志昂是我的外祖父。

關濟東與鄧肇瓊結婚後，生了六個男孩，其中排行第一和排行第五的天折，故實際上生存的只有四個。最長的是排第二的文光，又名堯光，是我的二哥，於一九二一年出生。其次是我，我排第三，名上光，於一九二五年出生。再次是排行第四的子光，我稱他為「四弟」，於一九二六年出生。年紀最幼的是排第六的元光，於一九三一年出生，我稱他為「六弟」。我們兄弟四人都在香港出世。我在香港渡過了大半生。

第二節：先父的際遇與香港金融業滄桑

大伯父關淮洲創辦的永德和永大銀號，是我父親關濟東進身社會之階。父親先跟大伯父學做生意，後來又和大伯父合作做生意。可惜時運不濟，永德、永大和後來開辦的肇源銀號相繼倒閉，父親的銀號事業以失敗告終。童年時，我和我的兄弟常常聆聽父親講述香港銀號業的滄桑史，以及他事業失敗的經過。

香港開埠初期，政府根據英國殖民地模式和忠於自由貿易的精神，對香港的金融活動不加管理。因為香港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對外貿易，早期在香港開業的銀行的主要業務是融通貿易商的資金。融資的最普遍方式為匯兌與押匯，故這些銀行被稱為匯兌銀行或外匯銀行。這些銀行大多數由外國人經營，以他們的祖家為基地，在香港的辦事處通常是分行。

香港居民絕大部分為華人。香港開埠初期較少華人懂英文和有充實的現代經濟金融知識。由於中、西文化不同，中國人與西方人的理財觀念與方式也有異。加以外國人經營的銀行以資助貿易商為主，而不是以廣大民眾為對像的零售銀行，匯兌銀行所提供的服務很難滿足華人的獨特財務需要。

在香港和中國內地，尤其是外國人經營的銀行無法展開業務的地區，有一種中國模式的金融機構為華人服務。這種金融機構稱為銀號或錢莊。銀號在香港和中國部分地區之間經營貨幣兌換、匯款、存款、按揭貸款、黃金、白銀買賣等業務，客戶差不多全是華人。

大多數銀號是未按公司條例註冊的合夥或獨資商業組織，它們不是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負完全責任。由於業內競爭劇烈，利潤微薄，且常常因封建宗族關係而各自為政，一遇經濟不景，資本較少和管理不善的銀號很容易因虧損和欠債過度而倒閉，股東也因受到牽連而破產。

在一八六五年成立，由英國人經營與管理，並以香港為基地的匯豐銀行，不僅經營匯兌以資助貿易，更把業務範圍擴及其他方面。它資助了香港和中國

的許多財經活動與工商建設。除保險、運輸、港口、碼頭、倉庫等與對外貿易有關的項目外，一九五零年以後，更有製造業和建築業。十九世紀後期，匯豐銀行不但在中國沿海地區吸收商人的存款，連滿清政府和海關也成為它的客戶。第一筆中國政府向外國借的貸款，是於一八七四年由匯豐幫助籌集的。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戰爭後，清廷向匯豐借款，以關稅作為抵押。

香港政府曾立法授權匯豐和另外兩間銀行（渣打和有利）在香港發行鈔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港鈔由匯豐發行。香港政府的港幣存款也大部分由匯豐保管。匯豐在香港的金融市場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一般銀行多在匯豐開立往來賬戶。一九二零至三零年代，我伯父經營銀號的時候，華人多數存錢於「同聲同氣」的銀號。但不少銀號的存款要流入匯豐，原因是銀號為了安全與利息收益，將貸不出去的部分客戶存款轉存於匯豐。由此可見，匯豐不但是貿易商、政府和一般銀行的銀行，也是銀號的銀行。一九二零年代至三零年代，香港經濟遭受兩次嚴重打擊，金融業不景，銀號所受損失尤大。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的大罷工，令到工商業無生意可做，市民失業。工商界為了應付日常開支或把資金調往外地以求出路，市民為了要離開香港回鄉另謀生計，紛紛向銀行及銀號提回存款。有提無存，資本不充裕的銀號週轉不靈，倒閉者日有所聞。一九二九至三零年，美國經濟衰退，紐約股市狂瀉，銀行被擠提，工商業破產，影響所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各國均出現經濟危機。在這危機衝擊下，香港外資大減，工商業不振，金融業的運作受到拖累，慣作投機性黃金、外匯買賣的銀號莫不損失慘重。大伯父經營的永德和永大銀號曾在黃金、外匯買賣方面賺了許多錢，馳名當時的金融界，但結果得不償失，以破產告終。父親也因此失業。

永德和永大倒閉後，大伯父不甘失敗，仍謀東山再起。當時是三十年代初期，外祖父剛去世。鄧志昂遺下許多財產，大部份分給他的兒子，小部份分給他的妻妾和未有出嫁的次女鄧肇真，但没有分給我的母親鄧肇瓊，因為根據南海九江人的慣例，外嫁女是分不到父親的身家的。鄧肇瓊的生母為鄧志昂第三妾侍。她最得寵，所分得的鄧志昂遺產是眾妻妾中最多的。她同情她的女婿的遭遇，因為她很愛她的女兒，也很愛她的外孫。我們幾兄弟稱呼她為「三婆婆」，有時只稱「婆婆」。「婆婆」出錢資助我的父親做生意謀生。關淮洲知道這件事，乘機請求他的弟弟合作，共同組織另一間銀號，名為肇源銀號。關濟東把他岳母給他的錢作為新銀號的主要股本，關淮洲及其他親友參股的銀碼不大，但關淮洲堅持要在肇源有話事權，理由是他的銀號經驗豐富。關淮洲不能當肇源銀號的司理，因為永德、永大倒閉時他宣告破產。於是關濟東做銀號司理兼銀號牌照的持牌人。在大哥堅持下，他讓大哥主持業務，自己則有名份而無實權。

在關淮洲主持下，肇源銀號又像永德、永大般從事投機，結果老本輪光，負債纍纍。今次宣告破產的不是關淮洲而是關濟東。肇源不是有限公司，股東對債權人負完全責任。關濟東是最大股東，因而也是最大輸家。正如關淮洲一樣，關濟東宣告破產後不能再用的名義來做生意。與此同時，他也再沒有本錢做生意，只好為他人做工，做個打工仔。肇源倒閉後，父親曾做過保險經紀，又在

一間運輸公司做辦事員，奔走於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當時中國的抗日戰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中國國民政府亟需自香港輸入物資。日軍封鎖中、港邊界後，運輸公司停業。至一九四零年，父親改行在一間餐廳做收銀員。該餐廳是鄧志昂的第二兒子開設的。隨着我的二哥文光也離開學校，到餐廳幫助父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政府徵用了餐廳，將之改為臨時糧食供應所。日軍佔領香港之後，父親積勞成疾，患上了肺病。我家的家運陷入低潮。

外祖父經商的作風與大伯父的作風大相逕庭。天福銀號很少像永德、永大銀號一般作黃金、外匯投機，主要做房地產按揭。香港大罷工時，許多將房地產按給天福的商號和個人没法償還他們的按揭貸款，外祖父以低價把這些房地產物業收購過來，成為大業主。罷工風潮和世界經濟不景過去後，香港經濟回復安定，回鄉的人陸續返港，工商業好轉，更多人從中國及世界各地來到香港做生意和定居。在此情形下，香港房地產價格高漲，外祖父的資產大為增加，他成為當時有數的富商。

鄧志昂於三十年代初期去世後，他的四個兒子因意見不同和各有志趣，沒有齊心合力繼續發展天福銀號的業務。大兒子葆真無心做生意，只拿着鄧志昂分給他的豐厚家產優悠過活。二兒子肇堅雖得他父親信任，負責繼續處理天福業務，但因在社會的應酬太多而力有所不逮。三兒子次乾與四兒肇垣耽溺於聲、色、犬、馬，不務正業，從天福出來做自己的生意亦一敗塗地，很快便把鄧志昂分給他們的家產散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香港的經濟環境起了大變化，像天福般抱殘守缺的銀號在金融市場上的地位也日趨式微。結果天福於五十年代後期宣告停業，其他銀號為新時代所淘汰者亦甚多。幸而部份銀號能當機立斷，接受新思想，力爭上游。經過一番改革、創新，它們蛻變為現代化的金融機構。從銀號到銀行，是香港華人金融界的一篇奮鬥史。

父親雖然在金融事業方面不得志，但他希望兒子中有人能夠做他的接班人，以了卻他心頭之願。他無計中選擇了我去走這一條道路。一九四零年七月至九月，父親着我趁放暑假到外祖父的天福銀號學做生意。當時外祖父已去世，主持天福業務的是二舅父鄧肇堅。父親懇請二舅父提攜後輩，結果我在天福做了兩個月「後生」。

天福銀號是舊式家族生意，鄧志昂一家是該銀號的東主。在天福做司理和司庫等要職的都是鄧家的人。其餘工作人員也多數與鄧家有親戚關係。他們之中，有人做「先生」，有人做「後生」。「先生」主要是腦力勞動的職員，「後生」主要是體力勞動的職工，前者的工作條件和薪酬較高。初入行的「後生」往往沒有薪酬。年青人到銀號工作，先要捱一輪做「後生」的滋味。「後生」的職務包括搬運黃金和白銀條，以及金幣和銀幣，由街外搬入店舖內地窖的金銀庫，或由金銀庫搬出街外；做送信差；替銀行老闆及「先生」們做雜役；打掃銀號店舖內、外。銀舖為職員及職工提供膳食，做「後生」有時要幫「伙頭」燒飯菜。「伙頭」即所謂廚師，他在銀舖內的地位不輕。職工們要吃得好好往往要拍他馬屁。年青人做了一個時期「後生」之後，如老闆發現他為人勤力、精乖、品性善良、肯聽上級教

誨，他就有晉升機會。老闆和上級認為他「孺子可教」，提拔他，讓他學做生意。有了基本的銀號知識之後，這位年青人可升為「先生」，正式成為銀號的從業員。銀號的「先生」可分「掌柜先生」和「行街先生」兩類。前者主要做內部工作，包括坐在銀號店舖大堂櫃後後面應付客人前來存款、提款，和應付銀號同業的職員前來交收票據；處理客戶及同業的往來賬項；處理銀號內部會計工作；銀號對外文牘工作等。後者主要做對外工作，包括在金融市場打聽消息、行情；拜訪客戶、同業；調查客戶、同業資信；與客戶、同業應酬、交際，以招攬生意等。做「掌柜」的要有內才，做「行街」的要有外才。由於與人接觸較多，社會關係較廣，做「行街」的有更多發展和晉升機會，因而有「生行街」、「死掌柜」之稱。父親做過銀號的「掌柜先生」和「行街先生」。我只在天福銀號做了一個「後生」。我不過是見習「後生」，沒有工資，一般銀號職員、職工都在店舖內享受免費膳食。因此我在天福的待遇是有食無工（資）。我做「後生」的時間太短，說不上受到什麼銀號業訓練，不過在店舖內的見聞不少，耳濡目染，總算獲得一點有關銀號的知識。這是我的第一個商場經驗，至今記憶猶新。我在天福做「後生」時，只有十四歲。離開天福之後，由於戰爭及其他原因，相隔了二十多年，我才再與香港的金融業發生工作上的關係。一九六二年，我到了恒生銀行服務，一幹便幹了二十二年，直至一九八四年為止，是時我已屆五十九歲。恒生銀行是一間從銀號發展成為商業銀行的金融機構。

第三節：望子成龍與殖民地教育

傳統中國人的家庭，普遍有「望子成龍」的心態，闢家也沒有例外。一般來說，父母親對子女的期望有三。其一是父母親曾經苦難，缺乏安全感，希望下一代能建立好的經濟基礎，過穩定的生活；其二是父母親為了彌補心中的挫折和個人的才幹不足，期望子女能在做人做事方面有所成就，以挽回父母的失落；最後是父母希望子女能夠光宗耀祖，使父母有所炫耀。父母親對我們四兄弟的期望，以上三種兼而有之，但以第一種和第二兩種更為受到他們重視。有感於「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和「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兩句中國人的話語，父母親不辭勞苦，讓我們四兄弟有機會入學校讀書，他們節衣縮食，不惜硬着頭皮向親友借貸，為我們籌措學費。

說到讀書就不能不談論一下香港的教育。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是一個國際貿易、金融中心，是一個功利的商業社會。英國人從香港得取很多利益。為了維持他們的既得利益，英國人要在香港培養大批為政府、工商業、金融業服務的人才。這些人才的先決條件為熟識英文和對英國有好感，英文書院是培養此類人才的主要地方，是殖民地教育的主體。

英文書院的法定語文為英文，主要課程如英文、數學、地理、歷史、物理、化學等的講授、問答、寫作、考試，均以英文進行。課本用英文課本，上課時，老師和學生都要講英語。為了要在潛移默化之中使學生親近英國和忘記英國對中國的侵略史實，在所有課程中，凡涉及英帝國對外擴張和中英兩國交往的事

情，總是隱惡揚善或輕描淡寫。英文書院也設有中文課程，但授課時間很少，課程內容提倡復古，與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脫節，甚或背道而馳。英文書院主要由政府創辦，由教會創辦的也不少。前者是官立，後者基本上是私立，但受政府津貼。官立英文書院，以皇仁書院及英皇書院為首，以下有育才書社、灣仔書院、油麻地書院和庇理羅士女書院。教會辦英文書院之中，屬基督教者有拔萃男書院和女書院，聖保羅男書院和男女書院，聖士提反男書院和女書院等。屬天主教者有華仁書院、聖若瑟書院、喇沙書院、聖心女書院、聖保祿女書院等。

書院課程分八個學年，最低的班級是第八班，以後每年升一級，倒數至第一班。第八班和第七班是高小程度，第六班至第四班是初中教育，第三班至第二班是高中程度，第一班是大學預料。讀完第二班便算中學畢業。讀完第一班可參加香港大學入學試。中學畢業生可參加英國普通教育文憑試（General Education Certificate Examination——簡稱 GEC Exam），合格者可申請入英國大學就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書院的班級編制有所更改。書院的正式名稱改為中學，故沒有高小程度的班級。改制後，英文中學課程分為六個學年。最低的是中一（Form 1），程度相當於以前的第六班；最高的是中六（Form 6），程度相當於以前的第一班。由中一至中三是初級中學，由中四至中五是高級中學，中六是大學預料。有一個時期大學預科要讀兩年，即中六之後再有中七（Form 7）。

辛亥革命以前，皇仁書院是香港的最高學府，學生讀完第一班後，須出洋留學，才有機會讀大學。後來為了要培養更高級人才以應社會及經濟發展所需，政府與本地紳商合組香港大學。皇仁書院俗稱「大書館」，香港大學俗稱「大學堂」。於一九一四年成立的香港大學取代了皇仁書院為香港的最高學府。香港大學分文、理、工、醫等科，課程與英國大學的頗為接近，而教學和學術水平則以醫科為最高。大學成立前，香港一間醫院已設有西醫學院。香港大學成立後，西醫學院併入大學的醫科學院。香港大學是培養香港精英的地方，授課語文當然是英文。但隨着鄧志昂中文學院的成立，一九二五年以後，香港大學的學生也有機會兼修中文。讀大學的費用相當大，故學生以富家子弟居多。一些教會辦的英文中學收費也昂，與香港大學同入貴族學校之列，不過這些學府多有免費學額或助學金之設，為家境清貧及天資聰穎的學生提供求學機會。

儘管英國人把香港變為英國殖民地後，便大力提倡英文，但早期香港華人家庭仍重視中文，大多數家長不願讓子弟前往英文書院求學。從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香港的中文教育主要通過學塾來進行。學塾多以人名命館，教學老師多數是前清考過秀才、舉人等功名的讀書人。由陳子褒創辦的子褒學塾和由盧湘父創辦的湘父學塾為最有名的學塾。陳子褒和盧湘父均曾拜康有為為師，與梁啟超為同學。一八九八年他們參加戊戌維新運動，運動失敗後逃往日本。陳子褒於一八九九年由日本到澳門創蒙學書塾，一九一八年遷港改為子褒學塾。陳老師於一九二二年病逝，學塾隨即結束。盧湘父於一九零零年由日本到澳門設館授徒，一九零五年來港創辦湘父學塾。盧老師辦學頗有成績，

學生不斷增加。爲了適應潮流和學生家長的需求，湘父學塾於一九三四年改爲湘父中學，爲中文中學體制，依照當時中國內地中學的標準，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畢業後可投考國內大學。我對湘父學塾有深刻印象，因爲盧湘父的大兒子盧國雄曾在我就讀的英文書院做中文教師，而盧國雄的弟弟盧國華則與我同校，比我高一年級。另一對我有深刻印象的學塾爲王子恕館，我的舅父鄧肇堅等都曾經是王子恕的學生。王子恕大約在三十年代末期去世，去世後，王子恕館也宣告結束。盧湘父很長壽，生於一八六八年，卒於一九七零年，享年一百零二歲。

中國人辦的教育不論舊時的學塾或現時的學校，總會對學生灌輸愛國家、愛民族的思想。統治香港的英國人對此頗有戒心，因爲他們要香港學生愛英國多於愛祖國。香港政府很難公開宣稱中國人在香港應該愛英國多於愛中國。但是他們處心積慮地想盡辦法來控制香港學生的愛國思想。早在一九一三年，香港政府通過了《一九一三年教育條例》，規定所有學校都要向教育司署註冊，學校僱用教師、學生人數、校舍面積、衛生與防火設備，亦一律依照條例規定辦理。表面看來，該條例無特殊政治意義。但教育司署常常透過警務處的政治部，暗中調查或監視學校的政治活動，矛頭每每指向中文學校。如發現不妥的事情，教育司往往以有關學校沒有十足履行教育條例爲理由，命令學校停課或把學校封閉。更嚴重的是引用《港督認爲不受歡迎人物條例》，將有政治色彩的校長及教職員驅逐出境。至於何謂「沒有十足履行教育條例」則惟有香港政府才知道了。更令人費解的是根據教育條例，私立中文學校的校長不被稱爲「校長」，教育司署視私立中文學校爲牟利性的組織，與商店無異。誠然，在衆多私立中文學校之間，良莠不齊自所難免，但認真爲教育而開辦的學校爲數實在不少。香港教育當局不能抹煞這一個事實。爲了爭取合理地位和聲譽，較有規模的私立中文學校多向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立案。中國政府稱在國外居留的中國人爲華僑，因此這些學校又有「僑校」之稱。僑校的班級編制和課程務求與國內學校銜接，以便畢業生可回國升學或轉學。一九四零年以前，中國內地專上學院及大學的教學與學術水平比香港大學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不同者是較注重中文而已。香港華人對祖國有深厚感情，僑校畢業生回國升學者甚多，英文書院畢業生轉讀中國國內大學者亦有其人。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若干國內著名學府，尤其是廣州的教會辦大學和中學，有備無患，在香港開設分校。嶺南大學開設附屬中學和小學，培正中學開設附屬小學。其他有名學府步嶺南與培正後塵者不少。嶺南和培正學生的數、理、化程度甚佳，英文程度也不錯。就讀於嶺南、培正分校，學費相當昂貴，故學生多來自中上等家庭。廣州淪陷後，嶺南大學遷到香港，借用香港大學的地方上課；培正中學則遷往澳門。其他著名廣州學府遷港者亦不少。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以後，由中國遷港的學校與中國的關係暫時斷絕，轉而設法在香港落地生根。爲了爭取中國人對香港的歸屬感，教育司署不再強調英文學校與中文學校的分野。到一九五零年代及以後，香港的所有學校

都重新分類。第一類是官立學校，經費由教育司署全部負責；第二類是津貼學校，多由教會主辦，每年收支不足部份由政府津貼；第三類是補助學校，屬於一般私立學校，經費困難由政府一次過補貼若干，收支各校自行解決；第四類是私立學校，經費完全自理，政府不管其收支。表面看來，政府對以英文授課和以中文授課的學校一視同仁。但實際上，被編入第一類和第二類的，多數是英文學校。因為這緣故，加以英文在香港比中文更派用場，辦學的人不得不較注重英文。結果是英文學校和學生愈來愈多，中文學校和學生愈來愈少。

進入一九六零年代，隨著香港經濟的迅速發展，香港大學培養出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已不足應付政府和工商業的需求。於是香港中文大學之設。中文大學原則上以中文為授課語言，但許多與理科、工科、醫科有關的課程還是要用英文來授課，因為一些教授是外國人，教科書及參考書也以英文本居多。以後陸續成立的專上學院亦有同樣情形發生。重視英文與輕視中文，原是香港教育的宿病。在香港居住的中國人都引以為憾。想不到時局的發展與環境的變遷，卻使在香港從事教育的華人，不自覺地甚或自動地，「重英輕中」起來。

殖民地教育除潛移默化地使華人「重英輕中」之外，又利用嚴峻的考試制度來限制學生身心的全面發展。一般教育家所標榜的德、智、體、群四育，在香港只有智育受到重視。學生過了學科成績考試這一關便算達到了接受教育的目的。要達到此目的就要拚命讀書以備應試。他很難騰出時間去關心、研究或做功課以外和學校以外的事情。在他心目中，受教育純粹是一種用以達致經濟與職業目標的途徑。求學的過程要經過一連串的考試。讀完小學六年級、初中三年級（舊制第四班，新制中三），高中二年級（舊制第二班，新制中五），大學預科（舊制第一班，新制中六）的學生先在校內考畢業試，再參加全港中、小學會考，預科生則參加大學入學試。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後來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學以及其他大學是香港教育金字塔最尖的部份。大學畢業生是香港人口流沙中淘出來的黃金。

香港殖民地教育的考試制度，在精神上與清朝的科舉考試制度相似——挑選大批為了名與利而死心塌地替統治者及當時的社會制度服務的人才。至於這個想法能否實現，則是另外一回事了。基此，每當學校放暑假或年假前夕，報紙均以大篇幅刊登各級考試的放榜消息，學生和家長奔走相告，以既羨慕又妒忌的心情，互相查問誰家子女考取「摩登狀元」。擁有優異考試成績，或持有學士、碩士、博士、院士銜頭的人，往往是政府機關及各大學術及私人企業求才的對象。這些人可以做行政官（executive officer）、政務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或更高級的政府官員，可以做大學或專上學院教授或講師，可以在工、商企業做高級行政人員。有律師、醫師、工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資格者又可以自己出來執業，自由發展。為人達到如此成功境地，可以說不負家長「望子成龍」的期望。

成龍並不容易，過程很長，方式也不簡單。人有智、愚、勤、惰，貧窮的家庭多於富有的家庭。雖然家長們都望子女成龍，但他們應有自知之明。他們要體

察本身的經濟能力，也要了解子女的質素，對子女的要求有時不能過高。因此一般中、下家庭的子女，除非特別天資聰穎，中學畢業後便要入社會做事，以求自立或幫助家計。憑中學資格求職，初步只可做文員。文員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抄錄、英文打字、整理文件檔案等，即所謂「搬字過紙」。英文程度較佳者可學速記，學會後做速記員或初級秘書。有更多經驗和工作表現良好時可升為高級文員或行政秘書。

對數字有興趣者可做簿記員，如能邊做邊學，可升為會計員。中、英文兼佳者可做繙譯，包括口譯和筆譯。在警署，法庭及律師事務所的繙譯要有較高深學問與英文程度。在政府及商業機構做會計員的可邊做邊學，自行進修，考取會計師資格。在律師事務所做繙譯的也有考取律師資格的機會，因為他們接近律師，可以得到許多法律知識，經自修後，可以參加律師考試。身體強健，個性向外的中學畢業生可以在警察、海關、衛生局、消防局等紀律部隊中做督察。在任職之前當然要受嚴格的體能和專業知識與技能訓練。古老香港人稱督察為「幫辦」，稱在法庭和律師事務所做繙譯的為「師爺」。一般小市民對「幫辦」及「師爺」的印象往往是負面的。有些資質較差、出身於貧窮家庭的學生甚至不能完成中學教育。他們要提早輟學在商店內做「後生」或在工廠做勞工。較幸運的轉讀初級職業學校，學得一技之長，做個技術工人。

出身低微的人，不一定無可能成龍。他們可以從在社會做事中汲取專業知識和做人的經驗。他們讀書雖少，但可有隨機應變的頭腦和耐勞刻苦的精神。他們進入「社會大學」深造。論做生意的精明，與看市場走勢的眼光，「社會大學」畢業生比諸正規大學畢業生有過之而無不及。正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香港的首富多數是「社會大學」畢業生。

第四節：殖民地教育的特產——買辦

鴉片戰爭後，「南京條約」和以後一連串對華的不平等條約，擴大了英國殖民者在中國的活動範圍。英國人在華有許多特權，可以肆無忌憚地大做生意。但是由於東、西方文化不同，英國人不輕易懂得中國人的語言、習俗和經商手法，以致在與中國人交易時遭遇種種技術上的困難。為了補救這不足之處，英國人僱備許多懂得中、英兩國語言文字，和了解東、西方文化的中間人來協助他們進行對華貿易。英國商人稱這些中間人為「康白度」(compradore)，即所謂買辦。

買辦是殖民地教育的特產。買辦多為得西方風氣之先的中國人。這種中國人以在香港居住和受殖民地教育的中國人為主。他們早在香港政府或教會辦的英文書院讀書，接受西方文化洗禮，對西方政治、經濟、科技有所認識。替香港政府或駐港的英商洋行服務是他們畢業後的最佳出路。華、洋雜處的香港有不少歐、亞混血人，他們的雙重文化背景也有助於他們做買辦。這些混血人通常有一個英文名和一個中文名，以便他們週旋於英國人及中國人之間。

買辦的職務簡單而言是替僱主在香港及中國推銷僱主運來的貨物，包括

鴉片和西方工業產品，以及替僱主在香港及中國採購當地產品運返英國，或運往其他地方出售。為了順利執行他的任務和令到僱主賺錢，買辦要做許多額外的細緻工作。他要擔任僱主與中國客戶之間、英國官員與中國官員之間的翻譯；他要替僱主調查、研究中國的市場情況和政治、經濟形勢；他要替僱主調查、研究中國客戶的資信；他要代表或跟隨僱主與華人官、商交際應酬，以發展業務；他要替僱主發掘新客戶；他要向僱主保證華人客戶的承諾。

精通中、英文、有商業知識、頭腦靈活、善於奉迎、交遊廣闊，為做買辦的先決條件。有大學和專業資格，可以增加做買辦的本錢，但非必要。成功的買辦不但可以從僱主（外商洋行、銀行）方面得到可觀的薪酬和佣金，還可以在替僱主進行一買一賣中自肥。在替僱主採購中國物產時，因為對中國的商情比較僱主為靈通，他可以利用中國農民、商人急於用錢的弱點，預先壓價收購物產，然後按較高價轉售與洋行，從中賺取差額。在替僱主推銷僱主運來的貨物時，買辦可以利用職權，有條件地選擇華人代理商或分銷商，要求他們暗中給與回佣，或賺錢後將若干百分比的利潤分給他作為報酬。不少買辦在未到退休年齡已成為大富翁。他們可提前退休，憑着豐富商場經驗和廣大的社交網，自己做生意。由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中葉，香港社會上最有錢有勢的人，多數是買辦出身。

因為對殖民主義者有貢獻，買辦們往往是香港政府太平紳士、市政局議員、立法局議員和行政局議員的欽定候選人。他們有許多機會獲英國皇室頒贈的獎章、勳銜。早期的買辦職位是世襲的。買辦退休或死亡後，其職位由他的後人承繼。入大銀行或大企業做買辦，往往要有人擔保。擔保人以金錢或名譽保證該買辦身家清白，為人可靠。儘管許多香港人羨慕買辦的財富、名譽、地位，認為買辦是求之不得的職業，有國家、民族自尊感的中國人則視買辦為負面人物。一提起買辦，他們便聯想到那些替殖民主義者推銷鴉片以毒害中國老百姓和替資本主義強國推銷工業產品以摧殘中國民族資本工業與農村手工業的壞人。中國人稱引狼入室，為虎作倀的人為「漢奸」、「賣國賊」、「帝國主義走狗」。清末民初的時候，買辦也屬於這一類人。

我童年的時候，屢聞父親及其他長輩談及買辦之事。父親、大伯父、外祖父等都是不懂英文的商人。他們在香港做生意少不免與英國人打交道。此時他們就要借助買辦。在芸芸買辦之中，陳廉伯和何東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陳廉伯以做漢奸下場。更令我想不到他竟與我有親戚關係。何東是早年香港富翁的典型。當時香港人一提到「有錢佬」，何東的名字自然琅琅上口。

陳廉伯是個設多於譽的買辦，他的生平劣蹟在中國近代史也有記載，我亦略有所聞。我對他的認識主要從我的岳丈陳孺直及我的妻子陳永堅口中得來。陳廉伯稱陳孺直為九叔。陳永堅是陳廉伯的堂妹。舊式中國人的大家庭，家主的妻、妾、子、女眾多，最年長的子女通常與最年幼的子女在年齡上有很大距離。大哥結婚生子後，小弟、妹尚未出世。故常有「老姪、嫩叔」的現象發生。陳廉伯年紀比陳孺直長。他可以做陳永堅的父親有餘，即使他所生的子女，年紀也比陳永堅為長。

陳廉伯曾任香港匯豐銀行買辦，並兼任廣州匯豐銀行買辦。當時中國各地軍閥割據，內戰不已，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在廣州建立革命根據地，準備揮軍北伐，以統一全國。他的計劃在廣州受到重重阻力。首先是盤踞廣州的軍閥不聽命令，擁兵自重。他們是來自雲南及廣西的軍閥。其次是原來害怕滇、桂軍作亂而組織自衛武裝的商人更害怕廣州實行共產主義，因而轉向敵視國民黨。廣州商人的自衛武裝因而稱為商團，由陳廉伯任團長。第三重阻力來自英國及香港政府。為了保衛英國商人在廣州的既得利益，香港政府縱容以匯豐銀行為首的香港英商以軍火接濟商團。一九二四年，購運商團的一批槍械被廣州國民黨政府扣留。商團成立聯防總部，實行罷市，強求發還被扣留的槍械。廣州政府不同意，準備以武力制止。此時駐廣州英國領事館發出警告，聲言如商團受到攻擊，英國即出動海軍前來廣州干涉。孫中山急欲北伐，初時多方遷就，商團更為強硬。最後孫中山不得不斷然處理，發動國民黨軍、黃埔軍校學生及其他親國民黨的武裝力量，將商團擊潰。陳廉伯於是逃返香港。

搞商團失敗後，陳廉伯不久辭去匯豐銀行買辦職務。自此他的政治傾向，漸由親英轉為親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攻佔香港，翌年二月，日本宣佈香港為日本佔領地，成立「佔領地總督部」，隨即組織「華人代表會」，邀請或指令當時的紳士名流加入為會員。陳廉伯為會員之一。他與日本人的關係搞得很好。日本人給他一個發財的機會，讓他取得全港食油進口及製煉與販賣的專利權。陳廉伯開設一間煉油廠，名為復興煉油廠。食油與民生有關，是戰時受管制物資之一。憑專利權，陳廉伯的復興煉油廠賺了大錢。是時我大伯父關雋洲無生意可做，乃請求陳廉伯讓他取得復興產品的一個分銷權，開設一個名為「明安」的食油批發兼零售店。香港淪陷初期，我父親關濟東和我二哥文光都失業。他們投靠大伯父，在明安油莊工作了一段時間。大伯父經營永德、永大銀號時與陳廉伯有生意關係；因為當時陳廉伯是匯豐銀行買辦，與關雋洲頗有交情。

陳廉伯做買辦多年，不但發了財，風流韻事也甚多。他一共有一妻八妾，即有九個女人來侍奉他。他的長女陳淑媛是正室所生，嫁給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的買辦郭贊為妻。郭贊的買辦職位是承襲自他的父親郭少鏞的。郭少鏞與陳廉伯是同一時期的買辦階級。郭、陳兩家成為姻親，可謂門當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快將結束之際，陳廉伯恐日本投降後，香港人檢舉他的漢奸行為。於是他偕同他的第六、七、八等三個愛妾自香港乘日本輪船白銀丸逃亡澳門。白銀丸在往澳途中被盟軍飛機炸沉，陳廉伯和他的妾侍葬身海底。

郭贊任買辦時肯出力為社會服務，曾被香港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及立法局議員，獲贈 OBE 勳章。一九六零年他辭去法國東方匯理銀行買辦職務加入恒生銀行工作，被聘任為副董事長。兩年後，我也加入恒生銀行工作，與郭贊及其夫人陳淑媛有許多見面機會。他們比我年長二十多歲，但反而稱呼我為「姑丈」。古老中國人的大家庭，後一輩比前一輩年紀還大的事例何其多。郭贊畢業於英文書院，曾在香港大學肄業，是個地道的英國殖民地子民。

何東原名何啓東，字曉生，一八六二年出生，一九五六年去世。何東有白種

人血統。據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報紙副刊上記載，何東的生母姓施，是廣東省寶安縣人。寶安縣的轄地，包括香港地區和現在的深圳市。施氏與香港的一名英國人同居，生了何東。該英國人回祖家後，施氏又與一名法國人同居，生了何福。法國人像英國人一樣，與施氏同居一個短時期又返回祖家。施氏後來帶着兩個混血兒嫁給一名姓何的華人，又生了何甘棠。這三位何姓兄弟的面貌，只有何甘棠像中國人，其他兩位都是「紅鬚綠眼」像「鬼佬」。

何東的英文名字為 Robert Ho Tung。香港開埠初期，政府機關及駐港的英國人商行需要許多文員和翻譯員來支持日常運作。為了訓練這些人才，政府設立了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中央書院後來改名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何東在皇仁書院求學。畢業後他先後在怡和洋行及匯豐銀行工作，升任為該兩大英商機構的買辦。做買辦功成身退之後，他又自己做生意，獲利後廣置物業，積聚到很多財富，成為香港最有錢的富翁之一。

發財之後，何東沒有忘記回饋社會。雖然有英國人血統，他自認為中國人，為中國的多災多難而憂傷，一心想為中國做點好事。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偕家人逃來香港，以避清廷的追緝。當時何東同情康有為的處境，接待康有為及其家人在何府暫住。一八九八年，何東出任東華醫院主席。他響應東華醫院及華商總會的呼籲，大力捐輸，以救濟香港貧苦人家及在中國內地受天災人禍影響的難民。除捐款給東華醫院外，他又捐款給保良局、博愛醫院，和雅麗氏何妙齡拿打素醫院（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拿打素醫院是香港最古老醫院之一。孫中山曾在該醫院附設的西醫書院學醫。一九一一年香港大學成立後，西醫書院成為香港大學醫學院。學醫前，孫中山也曾曾在皇仁書院肄業。）何東又捐了許多錢給香港大學，協助大學成立工學院、醫學院及文學院。一九二零年，他獲香港大學頒贈榮譽法律博士學位。

一九二五至二九年，何東數度到中國內地訪問。他擔心國家分裂，請孫中山及多個當時的軍閥聯合組織圓桌會議，共商國是。不幸由於種種原因，這個會議胎死腹中。聞者為之可惜。何東的理想雖未能實現，但輿論對他的建議給予好評。一九三六年，中國抗日戰爭快將爆發。香港華人紛紛發起救亡運動，反對日本侵略中國。華商總會建議趁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十月生日的時候，捐獻軍機為他祝壽，以表示香港僑胞的愛國心。何東因此而慨捐國幣十萬元。當時國幣的幣值比港幣高，十萬圓國幣可購買一架戰機有餘。

何東既富有又愛國愛民，為中、英兩國政府所敬重。香港市民視他為德高望重、慈善為懷的長者。一九五五年，英國女皇冊封他為爵士，以「英帝國騎士」勳章賜給他（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中國國民政府也給與他幾個勳章。何東去世後，香港出現了多個爵士，但他們的名聲始終不及何東。

踏入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形勢有飛躍發展。一般香港居民的教育程度與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懂得英文和現代商業知識充沛的華人愈來愈多。中國人開設的店鋪、工廠與外商做生意不一定要通過買辦。許多外商

銀行、洋行的買辦都形同虛設。因傳統意識而保留買辦的洋行也將買辦部改為華人業務部，買辦改稱華經理。踏入八、九十年代，買辦已成為一個歷史性的名詞。

第五節：從讀中文書到讀番書

我在香港島西區長大。西區地勢背山面海，南部靠山，北部瀕維多利亞港。西區俗稱西環，又名堅尼地城（Kennedy Town）。我家居西環青蓮台。青蓮台是一條短街，有十四幢三層高的樓宇，十號和十一號是大伯父做生意發達時購置的。他有妻妾共六人，生了十四個子女，但只養大了八個，三個是女的，五個是男的。因為家庭人口較多，大伯父家佔住了十號三層樓和十一號兩層樓。他把十一號三樓讓給我父親一家六口居住。永德、永大銀號倒閉後，大伯父將十一號三樓出租。我家六口遷出，租住十二號地下。青蓮台十四號以東有廟宇，名為魯班先師廟。該廟由香港木匠和泥水匠商會興建，用以紀念他們的祖師魯班。魯班為春秋時代人，是個著名工匠。十四號和魯班廟門前，有一段寬闊和平坦的路面，適合兒童遊玩。

青蓮台附近有一條小街，名為寶龍台。該處有一間私立中文學校，名為西環中學。這間學校其實是一所小學，學生絕大部份為小學一年級至六年級的學生，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只有幾個。小學六年級畢業後，學生多轉往較有規模的中學就讀。西環中學校舍細小，設備簡陋，學生沒有操場玩耍。青蓮台十四號及魯班廟前空地常為學生僱用作為操場。十四號屋主人和魯班廟管理人討厭學生喧嘩，不時出來干涉，把學生趕走。魯班廟管理人滿面鬚鬚，特別凶惡，學童見到這個鬚鬚佬有如老鼠遇着貓。但他們頑皮性情不改，鬚鬚佬一走，他們便重返空地玩球。

西環中學離我家不遠，學費廉宜，故我們兄弟四人開始讀書都到該校就讀。二哥文光、我和四弟子光先後在西環中學完成小學教育。六弟元光在西環中學念了四年小學便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輟學。日本投降後，他在另外一間小學讀五年級和六年級。我們兄弟四人都曾經與鬚鬚佬鬥氣，屢被他趕走又屢走回頭。學童與鬚鬚佬鬥氣之事到五十年代初期已告停息，因為是時鬚鬚佬已死，西環中學亦已停辦。到五十年代中期關淮洲去世後，青蓮台的景象又起變化。大伯父遺下的青蓮台十號和十一號物業被一班辦教育的人收購，改建為一座樓高六層的現代化中學校舍。校舍的天台面積頗為寬闊，在四週裝上鐵欄杆和安全鐵絲網後，可作為學生的體操場。在地少人多的香港，學校建築物天台用作體操場的現象甚為普遍。大伯父過身時，他的長女及長男均已成家立室，其餘的六個較年輕子女，四男二女，則仍在求學時期。他們六人先後就讀於在青蓮台興建的中學。該中學名為漢華中學。大伯父的長女和長男是第三妾所生，六個年輕的子女是第六妾所生。眾妻妾中，只有她們兩人送大伯父的終，其餘比大伯父先去世。

我於一九三零年間開始入學讀書。西環中學的課程與當時中國的小學六

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新學制銜接。我入學時讀小學一年級。當時我父親的頭腦仍半新不舊。他要求學校爲我舉行一個與古老學塾相似的開學儀式。我開學的那一天早上，學校課室的一角懸掛至聖先師孔子像，前置香案。父親攜帶香燭生果送我到學校，把生果陳列於香案上面和燃點香燭之後，父親着我先向聖人像跪拜，然後向站在聖像旁邊的老師叩頭。之後，老師拿出一本《三字經》，教我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以及「幼而學，壯而行」等字句。教兩三遍後，他把住我拿着毛筆的手，在方格紙上寫「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等字。寫畢，父親向老師致謝，並送他一份放在紅色利是封內的開筆金。我的開學儀式告成。父親向老師道謝後，我開始入學讀書的第一天。開學儀式是在上午八時左右舉行的。九時正，上課鐘聲響起來，老師在課室內爲各一年級新生編座位。我和幾十個新同學一齊上課。比我早兩年入西環中學讀書的二哥文光，也經歷了上述開學儀式。到四弟子光和六弟元光開學時，這一習俗已沒有人沿用。

我讀小學的時候，中國與日本的全面戰爭已在醞釀中。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佔領中國東北的瀋陽市。造成「九一八」事件，導致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淪陷。一九三二年二月，在日本軍國主義者扶持下，「滿洲國」傀儡政權成立，使東北徹底殖民地化。東北淪陷後，正規中國軍隊奉命對日軍不加抵抗。但由人民組織的義勇軍則風起雲湧地奮戰日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人民愛國者激昂，成立救國會抵制日貨，全國各地響應。於是日本政府以保護上海日僑爲藉口，派軍進攻上海，遭中國的第十九路軍英勇抵抗，是爲「一二八」事件。日本侵佔東北後，得隴望蜀，又要在華北成立類似「滿洲國」的偽政權。中國政府百般忍讓。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在北平附近的蘆溝橋進行演習，繼而向中國駐華北的軍隊攻擊，造成「七七」事件，引發了中、日兩國的全面戰爭。東北義勇軍、上海的第十九路軍，和「七七」事件後抵抗日軍的中國軍隊的英勇愛國行爲，獲得全中國人民及香港與海外華人的敬佩。

我出世的一九二五年，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被譽爲「中華民國國父」的孫中山，於是年三月十二日在北平病逝。爲了紀念孫中山，國民政府於同年九月制訂「總理紀念週條例」。自此以後，中華民國的黨、政、軍機關與單位，以及在教育部立案的學校，均依例舉行「總理紀念週」，以鼓勵士氣和激發人民的愛國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紀念週」的意義更爲重大。西環中學是立案僑校之一，每逢星期一清早上課前，全體師生也舉行「紀念週」。我們首先唱國歌：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臻大同；咨爾多士，爲民前鋒；宿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其次是默靜三分鐘，以悼念孫總理、各革命先烈和抗戰犧牲的軍民。第三是唸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我對國歌的歌詞與總理遺囑的文句耳熟能詳。但由於當時年紀太輕，對事物的認識感性成份多於理性成份，故對歌詞及文句的內涵只是一知半解、人云亦云。不過，無論如何，我對孫中山的仰慕和國家民族的熱愛是衷心的。此一心態，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始終沒有改變。

二哥文光在西環中學讀完小學六年級課程後，再在廣州培正中學香港分校讀小學六年級，然後往廣州培正中學升讀中學。培正是基督教浸信會辦的中文學校，校風良好，學生的數、理、化及英文程度很高，畢業後升國內、外大學沒有問題。培正是私立學校，學費昂貴。父親的經濟能力差，實在不能送文光到貴族化學校讀書。幸蒙外祖母三婆婆的資助，二哥乃順利入學。有幾個原因促使文光進培正就讀。其一是中國人家庭長子嫡孫應得較佳照顧以繼香燈的觀念。文光是我父親的長子，較得雙親寵愛，故受教育也有優先權。三婆婆很疼愛她的孫輩，內孫與外孫沒有大分別。文光是她的第一個外孫，故她樂意培養文光成才。其二是父親深受中國文化傳統的熏陶，雖然許多香港學生小學畢業後便轉往英文書院繼續求學，父親不希望他的兒子忘本，對長子的期望尤高。其三是世俗人的功利主義思想作祟。培正學生多是富家子弟，他們的家長有錢有勢。父親認為文光在培正畢業後，可憑同學、校友關係，在社會找份好差事。一九三八年日軍攻佔廣州，培正中學遷澳門，二哥隨校到澳門繼續學業，於一九四零年完成高中教育。一九四零年秋季，他進入當時已由廣州遷往香港的嶺南大學讀經濟系一年級。嶺南大學也是教會辦的學府，英文程度很高，遷港後暫借香港大學的部份校舍上課。嶺大與港大有時互調學生。大學的上課時間不多，二哥可半工半讀，幫助父親維持家計。一九四一年年底，日本攻佔香港，嶺南大學遷中國內地，二哥滯留香港，棄學從商。

父親對於我們四兄弟的教育問題，要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作抉擇。二哥得外祖母的幫助到一間好學校讀書是個理想，但我和兩個弟弟的教育費仍由父親負擔則是個現實。爲了投資少，收效快，我和四弟子光在西環中學附小畢業後，父親就送我們到學費較廉，而且畢業後較容易找事做的官立英文書院就讀。顯然，父親對我和四弟的成龍期望不若對二哥的高。他認為我和子光在英文書院畢業後，找一份文員工作於願已足。至於年紀最幼的六弟元光，父親對他的學業前途，暫時未有認真考慮。

香港學生在中文小學畢業後，轉讀英文，通常由最低的第八班讀起。但爲了急於使我在英文書院早些畢業出來做事，父親設法縮短我讀英文的時間。一俟我小學畢業，他便請了一位老師替我補習英文，以便我一開始讀英文時即由

第七班讀起。香港有五間官立英文學校。皇仁書院與英皇書院的課程包括初中及高中，即由第八班至第一班。育才書社、灣仔書院及油蔴地書院的課程只開到初中，即由第八班至第四班。讀完第四班再讀高中就要轉校。替我補習的英文老師是育才書社教師，通過他的指導，我順利入育才書社讀七班。後來為了使學業有較多連貫性，讀完第七班後，我即轉讀離我家較近，設備與師資較佳的英皇書院，以便由第六班讀至高中畢業。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當讀至第二班上學期時，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日軍所攻佔，我只得輟學。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天朝」，所有外國都是「朝貢國」。出於自高自大的「天朝心態」，中國人鄙視西方人，稱他們為「洋鬼子」。南方的中國人則稱「洋鬼子」為「番鬼佬」，簡稱「鬼佬」。鴉片戰爭以後，英國佔領了香港，還把一連串不平等條約加諸中國身上。出於「民族主義心態」，香港華人憎恨英國人，更熱衷地稱英國人為「番鬼佬」。於是英文成為「番文」，讀英文等於讀「番書」，英文書院的學生成為「番書仔」或「番書女」。曾在育才書社和英皇書院讀書的我，無疑是「番書仔」。儘管如此，我沒有數典忘祖，因為在我身體內流動着的是中華民族的血。

第六節：學生時代見聞

香港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為華人。他們一直有愛祖國、愛家鄉的觀念。他們是黃帝子孫、龍的傳人。我童年的時候，父親和其他長輩不斷對我和我的同輩談及國內天災人禍，和香港同胞捐錢回國救濟難民之事。「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變後，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均已認識到國家已陷入生死存亡之際，紛紛發起救亡運動。我在英文書院讀書的時候，香港華人的救亡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英皇書院學生也不甘後人，他們節省每天的午膳和零用錢，一點一滴地集腋成裘，支持香港人對祖國的捐獻。香港人的種種出錢、出力的愛國活動，如捐款購買救濟品和戰略物資運送內地、購買救國公債、組織醫療服務隊前往大陸直接參與抗戰等，都有英皇書院學生的參與。在進行救亡運動的過程中，有不少戲劇性的表現：抵制日本貨和到銷售日貨的商店門前示威，並打破商店的櫥窗；當眾焚燒買來的救國公債，以示救國無條件；發起獻機運動，呼籲港人捐錢購買軍機為當時中國領袖蔣介石祝壽；以及許多其他令人振奮的行動，均在我童年的腦海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香港的官立英文書院不設音樂課程。但為了讓學生課餘有些文娛活動，英皇書院每年舉行一次音樂會。音樂會在校內大禮堂舉行，學生、教職員、校長和學生家長都前來參加。音樂會的演唱、演奏，主要由學生擔任。但有時學校當局會邀請校外人士前來表演助慶。初時的演唱、演奏節目主要是粵曲、民謠和較為通俗的西洋古典音樂。「七七」事變後，救亡歌曲在香港大為流行，於是一些救亡歌曲也被列入音樂會的秩序表內。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零年間，馳名中國的武漢合唱團數度來港演出，引起香港同胞的熱烈反

應。英皇書院校長雖然是英國人，但他同情中國抗戰，除在學校開音樂會時准許學生唱救亡歌、愛國歌外，他還讓武漢合唱團蒞校演出一次。該團團員唱出的「義勇軍進行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歌八百壯士」、「黃河大合唱」、「滿江紅」等歌曲響徹雲霄，引起了一千多個英皇書院學生的共鳴。三十年代，許多香港電影院放映抗日救國為背景的电影片。放映之前，它們播出「義勇軍進行曲」，作為電影的序曲。想不到頭一句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義勇軍進行曲」後來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歌國。

三十年代，在香港英文書院求學的學生，多數穿一套中西合璧兼不男不女的服裝。上身為中國式女裝大襟衫，下身為西式長褲，即所謂「大襟衫，臘腸褲」。這樣的服式充滿半封建、半殖民地意識。但當時一般學生都因潮流所趨而無可奈何。不過英皇書院到底是一間英文學校，有一套正式校服。校服上身為西式反領開胸短外套(jacket)，以深藍色絨布(blazer)為料。下身為灰色長褲。外套左胸袋前繡有校徽。穿在外套底下的為白色棉布襯衣，即香港人所謂「恤衫」(shirt)。恤衫的領結上一條紅色的領帶(rie)。縫製這一套完整的校服較縫製一套「大襟衫，臘腸褲」為昂貴。當時只有出身富有家庭的學生才穿正式校服。偏偏有一部份學生，既不穿「大襟衫，臘腸褲」，又不穿當時認為貴族化的正式校服。他們穿着當時中國內地軍人、公務員和學生的流行服式—中山裝。中山裝以西式裁剪，但上衣不反領開胸，除左、右胸前有兩個口袋外，腰以下的左、右兩邊還各有一個比胸前口袋較大的口袋，下身是西式長褲。

穿中山裝的同學多數是愛國和思想較為前進的。他們被稱為「新青年」。這批志同道合的「新青年」組織了一個社，名為「醒吾社」。大部份社員是我的同級學友。我們這一級將於一九四二年夏季完成中學課程。我們是定於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間參加全港英文中學第二班會考的。該會考稱為「離校證書試」(School Leaving Certificate Examination)，及格者獲取證書，證明他是中學畢業。但是事與願違，因為日本攻佔香港，一九四二年的會考沒有如期舉行。

「醒吾」兩字的意思，是要警醒自己不要被殖民地教育和日本人侵略我們的祖國所影響，甘心情願做洋奴和亡國奴。醒吾社有社友數十人，每星期聚會一次，每次聚會都有一定節目，如純屬友誼性質的飲茶、聚餐、座談會討論時事、遠足旅行、家庭探訪等。在座談會中，因為感到自己較幸運，能夠在有名的學府接受教育，而念及瑟縮街邊樓梯底下沒有機會讀書的貧苦兒童，醒吾社社友齊心合力開辦了一間小型的義學。社友在晚間課餘之暇，為二十多名貧苦兒童做臨時教師，教他們讀書識字。義學開辦了兩載有餘，於一九四一年底停課。在座談會中，社友又感到在國家危急之際，有責任與義務喚起英皇書院學生的愛國心。他們互相勉勵投稿於英皇書院校刊內，以文字來表達他們的心意。香港淪陷後，許多社友回到中國繼續讀書或做事。國內生活困難，留港或遠走外國而且經濟較豐裕的社友不時匯款返內地接濟舊同學。自四十年代起，香港、中國及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起了巨大變化。醒吾社社友各奔前程。有人比較幸運，也有人比較坎坷，但是他們在可能範圍內仍努力聯繫。到八十年代

後期，他們均已屆退休之齡，在香港，還有十餘位社友不忘每星期共進午餐，互訴心曲。

英皇書院有一份校刊，該刊物除報導學校消息外，還讓學生的文藝創作有一個園地。學生的文稿反映了他們的思想傾向與意識形態的發展。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出版的《英皇中學校刊》第七卷第一期，是一個例證。校刊分英文和中文兩部份。英文部份較多刊載學校消息。學生撰寫的文章內容保守，屬純學術性質者多，涉及時事者少。中文部份則不然，學生的投稿比較敢言，充份反映了他們當時憂國憂民之心思意念。該期校刊中文部份的「編者的話」說：「神聖的抗戰指示出新文藝應走的路線，它再不是文人雅士的消遣品，它負着重大的使命，是抗戰的武器，是建國的基石。」編者又說：「譚廷光君在《略談文藝》一文中，發揮透澈，同學們不妨多讀。」譚廷光是我的同班同學，思想前進，是醒吾社社員之一。譚君的文章有以下的說話：「自從民族解放鬥爭爆發後，中國文藝不但顯現着是抗戰的支柱，而且文藝界也往往的站在前面，盡了最大的責任；無論在後方，在戰線上，在自由的大地上或是在淪陷區裏，他們都用了他們底尖銳筆鋒，穿進人們的心裡，改變了人們的麻木的精神，醫治了人們的陷於病態的心理。的確他們用行動來保衛祖國領土的完整，他們用行動來號召戰鬥，作為他們的基本任務。……」譚君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年紀不過十五、六歲。如要一位在九十年代年紀十六歲的學生寫出上述的文句，簡直不可思議！校刊有四位顧問，英文部顧問為 Miss McGuffog 與 Miss Grey；中文部顧問為容宜燕老師和黃姚鈴老師。容老師是英皇書院第一位提倡新文藝和語體文的中文老師，他是學生新思潮的啟蒙者。

有感於中國積弱，為船堅砲利的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所侵略，我讀書時便渴望中國有一天強大起來，以自製的武器打退敵人，保衛國土。這一思想引起了我對戰艦、飛機、坦克的興趣。我常常走到學校圖書館和街外書店閱讀或瀏覽有關軍事與武器的書籍及畫報，以增加知識。英文書院圖書館收藏的《珍氏海軍年鑑》（*Jane's Fighting Ships*）給我的印象最深。它是一本權威性的軍事刊物，內容豐富、準確、及時，每年修訂版本一次，售價昂貴，非一般學生可以購買。事有湊巧，我的一位同學與我有共同興趣。他姓朱，名克強，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我與他非常投契。朱君有繪畫天才，有空便在紙上畫出各種各類軍艦、飛機、坦克的形像，維肖維妙。我不期然也養成畫戰艦、飛機、坦克的嗜好，因為我受他影響頗大。時至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對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著名軍艦、戰機、坦克的外形和有關資料，記憶猶新。英國主力艦「喬治五世號」（King George V），和「威爾斯親王號」（Prince of Wales）、德國主力艦「俾斯麥號」（Bismarck）、英國的「噴火式」（Spitfire）戰鬥機、日本的「零式」（Zero）戰鬥機、美國的「B-17 空堡壘」、英國的「百夫長」（Centurion）坦克等都是我繪畫的對象。又鑑於中國貧窮、落後，我不時思考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能否實現。每天做完功課後，我常常拿起中國地圖凝視，看看孫中山設想的北方、南方大港應在何處建設，在中國遼闊領土內的鐵路線應如

何分佈，埋藏在祖國大地上的豐富礦產應如何開發。不過少年的我對祖國的認識，感性成份多於理性成份，往往沒有想到國家的民主、法治、人權問題。當時不少長輩說我太多幻想，嘲笑我「紙上談兵」，但我不以爲忤。

中、日戰爭初期，英國爲了對中國表示同情，在香港放鬆了一向對華人政治活動管制。於是香港華人的愛國救亡運動風起雲湧。第二次大戰在歐洲爆發後不久，英、法聯軍在歐洲戰場大敗，英國本土岌岌可危。由於兵力有限，英國很難兼顧遠東殖民地的安全。爲了要保持它在香港及中國的既得利益，英國一廂情願地討好日本，對日本在亞洲的軍事擴張採取姑息、讓步政策。英政府宣佈香港爲中、日兩國戰爭的中立地帶。香港政府取締一切懷疑爲煽動抗日的組織及集會。在香港出版的報刊不得印出侮辱日本的文字。與此同時，香港政府又封閉了香港與中國邊界的通道，以防戰略物資由香港運進中國內地。愛祖國的香港華人，對英國及香港政府的反動行爲極爲憤慨。因爲這緣故，英皇書院學生把他們的胸中憤怒，發洩於一件趣事上。

英國對德國宣戰後，英國新聞處拍攝了許多戰爭紀錄片，向本國及世界各國人民宣傳英國的抗戰如何英勇、激烈。香港政府收到這些紀錄片之後分發給各電影院放映，以教育香港居民和提高香港軍警的士氣。教育司署也與戲院相約，放映特別場，免費招待學生。在一次英國抗戰電影的欣賞會中，英皇書院學生在看到英國皇家空軍大敗德國空軍之餘，又看到納粹德國的軍隊如何凶殘和在陸地戰場上耀武揚威。就在這時刻，電影院內出現一件出人意表的事。不知道學生們是惡作劇還是借題發揮，當德國獨裁者希特勒出現銀幕時，戲院內傳來掌聲。及至電影放映完畢，銀幕出現英皇肖像，戲台的擴音器播出「天佑我皇」的時候，學生們不但沒有肅立致敬，反而急不及待地魚貫出場，離開戲院返家。這一件「曲未終而人已散」的趣事，令到殖民地教育當局異常尷尬。

因爲中國抗戰、廣州淪陷而遷至香港繼續上課的國內著名學府，不但帶來了一批國內學生，也吸引了不少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學生。在此以前，英皇書院畢業生如要再求深造，他們多數進入香港大學，但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他們有多一個選擇。他們可考進自廣州遷港的嶺南大學。一些不願繼續在英文書院讀中學的學生，也可以轉往自廣州遷港、澳的培英、培正、真光、培道等有名國內中學就讀。與此同時，不少培正、培英、培道、真光學生也會轉往英文書院就讀。這一趨勢大大加強了香港學生與國內學生的學術與思想交流。我對這種交流感覺到特別親切。我的二哥文光和我的堂兄世光都是廣州培正中學學生。因爲兄弟和堂兄弟的關係，文光、世光和我有很多機會接觸。文光和世光年紀比我長，讀書比我多，我常常向他們學習。他們向我灌輸國家、民族思想，介紹我更多認識中國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情況。

堂兄世光，原是大伯父關淮洲的排行第六的兒子。由於比世光較早出生的兒子均夭折，世光成爲大伯父的長子。他是大伯父的第三妾侍所生。世光自幼愛讀書和寫作，在培正求學的時候，他經常爲學校的刊物撰寫文章。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前數年，不少思想前進的中國文化人來到香港辦報紙和雜誌。他們

包括鄧綽奮、金仲華、茅盾、夏衍、喬冠華、胡繩、千家駒等。他們的來到香港，使這塊素有文化沙漠之稱的英國殖民地增添了許多文化氣息。在培正讀書之餘，世光曾以「稀星」為筆名，投稿於上述文化人辦的報刊。當時世光在澳門培正寄宿，每逢週末或公眾假日，他設法來香港參加文化人的聚會，與他們交流寫作經驗。他可以說是關忠孝堂子孫中，接受新思潮洗禮的第一人。我少年至青年時代的思想發展，深受堂兄世光影響。

培正學生的學術水平高，也很有音樂修養。二哥文光對西洋古典音樂特別有興趣。每逢放假從廣州返港，他總會攜帶幾張向學校借來或自己節省零用錢買來的音樂唱片回家與各弟兄一同欣賞。經二哥的誘導，我不但成為一個西洋古典音樂愛好者，而且初步對基督教發生興趣。主要原因是音樂大師如巴赫（Bach, 1685 - 1750）、貝多芬（Beethoven, 1770 - 1827）、韓德爾（Handel, 1685 - 1759）、海頓（Haydn, 1732 - 1809）、孟德爾頌（Mendelssohn, 1809 - 1847）、莫扎特（Mozart, 1756 - 1791）等的作品不少有宗教色彩，旋律優雅，演奏出世人向上遷善的心聲。這些音樂不但帶給我心靈上的慰藉和喜樂，而且帶給我做人應該有信心和有盼望的訊息。

西洋歷史也對我的信仰有影響。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我在英皇書院唸第三班下學期。當時的第三班等於新制的中四，即還有一年便中學畢業。胡興德先生是第三班的歷史教師。授課講到十五、十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時，他贈給我班同學每人一本《新約聖經》，作為我們研究歷史與宗教信仰的參考。胡老師是一個虔誠基督徒。為了幫助同學進一步認識基督教和建立一個基督教人生觀，他開辦了一個研經班，每逢星期六下午學校不上課時舉行。在世界各地戰火連天，人類自相殘殺的時候，他宣揚耶穌基督的愛和公義是頗合時宜的。研經班因此吸引了不少同學參加，我是其中之一。可惜研經班只舉行了一個短時期便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佔香港而結束。

我入學校讀書後，父親和老師便孜孜不倦地教誨我說：中國人不能數典忘祖，應為數千年連綿不絕的中華文化而感到自豪。近百餘年，中國政治動盪、經濟落後，屢受到列強欺侮，人民受盡人禍天災之苦。近代和當代有良知的中國人都要發奮圖強，以雪國恥，並建立一個有公義和使人民能安居樂業的新中國。在思想上，他們不但為傳統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所影響，也為西方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所影響。本章和本節提及的人物多數屬於這類人。他們的言行啟發了我少年時期的思想。

第二章：第二次世界大戰投筆從戎

第一節：香港保衛戰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後期，中、英兩國展開鴉片戰爭。一八四一年一月，英國軍隊登陸香港島，舉行佔領儀式，宣佈香港為殖民地，是大英帝國的屬土。這是香港開埠之始。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以後，被迫簽署的三條不平等條約，追認了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和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的疆界。香港開埠的頭一個一百年內，鄰近香港的中國大陸和遠離香港的歐洲，都不斷發生戰爭和動亂。這些戰爭和動亂都未能危害香港的生存，反而使香港日趨繁榮。香港政府很滿意這一百年香港的發展，準備於一九四一年舉行香港開埠一百週年紀念，以示慶祝。政府在港島中區的植物公園樹立了一個英皇喬治六世的銅像。銅像的基石上面刻有「香港開埠一百週年紀念」字樣，以誌不忘。植物公園俗稱「兵頭花園」，是我童年時喜歡去玩耍的地方之一。遊客來到香港，往往到植物公園遊覽，並在銅像附近拍照留念。為了吸引更多遊客，植物公園後來添設了雀籠和獸籠，馴養了一些珍奇的鳥、獸給遊客欣賞，於是改名為動植物公園。

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香港開埠後頭一個一百年的繁榮安定接近尾聲，因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升級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已威脅到香港的安全。香港是東、西方各國與東南亞各地的交通要衝，又是太平洋西南岸的一個重要港口。它既是英國在遠東的經濟、貿易中心，也是英國在遠東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一九三零年代末期，日本已佔領了一大片中國領土和沿岸的大城市。當時英國尚未與日本開戰。香港是中立地帶，也是唯一可以將軍用及民用物資運入中國內地的海港。基於戰略需要，日本早有覬覦香港之心，因為佔有香港可以與台灣和海南島形成對中國大陸的包圍，從海陸兩方面互相呼應，對中國嚴密加以封鎖，並切斷從香港對大陸的一切海上供應。由於天然資源缺乏，日本需要不斷從外地輸入物資，以維持民生及作戰能力。東南亞盛產石油、橡膠、米糧，日本對這些物資垂涎欲滴。佔領香港，就可以作為日軍南進的中轉站，從日本本土經沖繩、台灣到香港，再從香港延伸到菲律賓、新加坡、印尼，以至南太平洋群島、澳大利亞，把這些地區連成一片，保證兵源、物資供應源源不斷。

一九三八年日軍在距離香港不遠的大亞灣登陸，攻佔華南沿海地區，廣州、深圳相繼淪陷。這時日軍已在香港的門口虎視眈眈，但香港當局對日本還存有幻想，以為英國在中、日戰爭中保持中立，香港就不會受日軍進侵。此外，香港的英國人還抱有傳統「大英帝國不可侵犯」的麻痺思想，對香港的防衛力量表示樂觀。於是香港照常過着花天酒地、歌舞昇平的日子，沒有感到戰爭將要臨頭的氣氛。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先在歐洲爆發，英法聯軍被德軍擊敗，而德、意、日三國又構成軸心，到處擴張他們的軍事勢力。至此，英國和香港當局才感到局勢嚴重，不得不作保衛香港的準備。香港政府和駐守香港的英國海、陸、空三軍不斷舉行軍事、防空、防暴演習，在山邊挖掘防空洞，在險要地區建築禦防

工事，晚間實行燈火管制，控制米糧、燃料及其他重要民生、戰略物資的供應。與此同時，政府又動員居民參加各種輔助部隊，以協同正規軍和警察抵禦敵人的進攻及維持香港內部的治安。

協同正規軍隊和警察保衛香港的輔助部隊包括：義勇軍（The Volunteers）、後備警察隊（Auxiliary Police Force）、聖約翰救傷隊（St. John's Ambulance Brigade）、防空救護隊（Air Raid Precaution Service - 簡稱 ARP）、醫療輔助隊（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 簡稱 AMS）、後備消防隊（Auxiliary Fire Service - 簡稱 AFS）、後備運輸隊（Auxiliary Transport Service - 簡稱 ATS）、糧食管制隊（Food Control）等。

義勇軍的歷史可追溯至香港開埠初期。當時陸上和海上盜賊猖獗，賴以維持治安的英國軍隊又因鴉片戰爭尚未結束而不時要調離香港。為了保護生命和財產的安全，英國商人自動組織武裝部隊。銀行與洋行的大班（總經理或行政總裁）及大寫（秘書長或高級職員）親自出馬志願參加武裝部隊。這是義勇軍的由來，義勇軍的成員都是英國人，中國人沒有份。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些英國人大部份被徵調回祖國服役，義勇軍無形中解散。及至一九三八年日軍佔領廣州、深圳，跟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為了預備不虞，香港政府乃重新招募義勇軍。這時義勇軍的成員，除英資銀行與洋行的英國職員和入了英籍的葡萄牙職員外，在香港出生的中國人也可以參加。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進攻香港，義勇軍曾與正規軍隊並肩作戰，傷亡頗重，潰不成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香港重光，政府再度組織義勇軍，以協助香港的防務，改名為皇家香港軍團 Royal Hong Kong Regiment（The Volunteers），成員仍以香港出生的兼職志願人士為主。軍團的主要任務是保障香港的安全，擔任偵察工作，參與防止非法入境行動，並在發生天災或社會騷動時協助政府其他部門工作。

後備警察隊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成立。當時政府招募的後備警察以香港出生並在政府機關工作者為限。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備警察隊隨即解散，直至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重組。所有後備警察都是兼職的志願人員。日軍佔領香港時期，後備警察隊解散。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又重新組織起來，改名為香港輔助警察隊（Hong Kong Auxiliary Police Force），任務是輔助正規警察執行日常職務，以及遇有天災或騷動時與正規警察及其他政府部門合作維持治安和救護市民的生命財產。

聖約翰救傷隊（St. John's Ambulance Brigade）在香港有長久的歷史和優良的服務傳統。隊員來自社會各階層，全是兼職志願人士。救傷隊在香港各區設有救傷站，備有多輛救護車隨時應召救急。救護員除在救傷站內當值外，遇有大規模節日社區活動和體育活動亦會到現場駐守。香港保衛戰中，救傷隊曾發揮很大的救死扶傷作用。聖約翰救傷隊是一個永久性的社會服務組織，不少英聯邦國家與地區都有類似香港聖約翰救傷隊的組織。

防空救護隊、醫療輔助隊、後備消防隊、後備運輸隊和糧食管制隊都是一

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成立，編制及功能參考當時英國戰時輔助部隊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防空救護隊、醫療輔助隊和後備運輸隊合併成為民衆安全服務隊（Civil Aid Services），簡稱民安隊（CAS）。民安隊是一支輔助隊伍，主要負責在發生緊急事故時支援其他正規部隊。隊員均為志願人員，須穿制服和受紀律約束。至於後備消防隊，則在戰後繼續獨立存在。糧食管制隊在戰後初期還繼續其管制糧食的任務，經過一段時間才告解散。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我在英皇書院讀第三班下學期。這時香港政府的備戰工作已進行得如火如荼，軍、警不斷舉行演習，很多參加義勇軍、後備警察及各種輔助部隊的政府公務員、洋行職員、學生都穿上制服上班、上課，以備隨時應召出動工作。英皇書院的高中同學參與這些服務的大不乏人。當時我已足十六歲，又是在香港出生，於是學校當局也鼓勵我參加戰時服務，以盡市民之責。我雖然是英籍，但對英國無好感。不過我終於在好奇心驅使和同學與家人慫恿下，報名參加做防空救護員。坦白而言，參加的動機是不大純正的。當時我有這樣想法：在戰爭時期，只要不用拿槍上前線，穿制服的人比不穿制服的人較為安全，因為前者有訓練，有裝備，懂得如何逃避炮火的攻擊。父親更認為我做防空救護員消息比較靈通，可以及早為家人作應變準備，如儲存糧食、尋找逃生之路等。在出勤的時候，我有薪酬津貼，又有糧食配給。

我們一家人，除我之外，哥哥文光也有參加戰時服務。一九四一年他在由廣州遷到香港的嶺南大學讀書，晚上在三舅父鄧次乾開辦的溫莎餐室（Cafe Windsor）做收銀員。溫莎餐室是當時有名的高級餐廳，設於中區皇后大道娛樂戲院大廈之內。香港戰事爆發後，政府徵用大型餐室作為戰時服務人員的食堂兼糧食貯藏所，溫莎亦包括在內。這些餐室都交由戰時糧食管制隊管理，文光於是成為糧食管制隊的一員。趁着工作利便，他有辦法領取較多、較好的糧食接濟家人。弟弟子光和元光因年紀輕沒有參加服務。不過弟弟子光年紀較元光大幾歲，身體較健碩，每當我出勤的時候，他總設法跟隨我，和我作伴，為我打氣。

我成為防空救護員之後，每星期有三、四個晚上到防空救護隊總部受訓。防空救護員的職責相當廣泛。空襲警報發出後，要指導居民進入防空洞或防空壕；在消防隊未到前對受轟炸破壞的建築物的現場進行監視，並維持災場秩序；在救傷隊及救車來到現場時，對受傷者進行初級救護。此外我們又要接受禦防毒氣和撲滅燃燒彈的訓練。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施放過毒氣之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以後的戰爭，以至最近的中東海灣之戰，毒氣的威脅雖然存在，但畢竟未有施放過，可算是人類的幸運。但以燃燒彈和氣油彈進行的火海戰爭，還是不斷地在不同戰場上出現。

防空救護隊是最基層的戰時民衆安全服務組織。每一個地區，每一個街坊都有防空救護站之設。每一個救護站都有十餘名救護員駐守。在戰爭時期他們是二十四小時輪流服務的。我家居香港島西區、西環、青蓮台。我駐守的救護站就設於這條短短不到二十間屋的青蓮台街口。我的同僚多數是西環街坊居民，

不少是在參加救護隊前已互相認識的。我們的家庭和社會背景雖不盡相同，但仍以懷着好奇與找尋刺激的心情來參加服役者居多。因此，每次入營受訓和演習，我們都視為「戰爭遊戲」，有時更埋怨遊戲不夠逼真。

視演習為「戰爭遊戲」的不限於防空救護員，義勇軍和其他輔助部隊的隊員中有此感覺者也大不乏人。義勇軍和後備警察雖然是「帶槍的人」，但由於他們多數來自中、上家庭，過慣舒適生活，與正規軍人與警察比較，他們是屬於「文質彬彬」之類。尤其是那支由鬼佬（英國人）大班、西洋（葡萄牙裔）大寫和唐人太子爺組成的義勇軍，更有中看不中用的「老爺兵」和「少爺兵」之譏。至於那些武裝的輔助部隊隊員，在一般居民眼中也不見得很威武。他們入營、步操、訓練和演習活動，對青年和少年的居民來說，有點像「高級童子軍」的活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一，上午八時，我離開青蓮台的家，沿薄扶林道往般舍道英皇書院上課。在途中突然聽聞淒厲的空襲警報聲。正在奇怪防空救護隊上司沒有預先通知我要出勤演習的時候，幾聲隆隆巨響從遠方傳來，跟着上空嗡嗡的飛機馬達聲也歷歷可聞。莫非防空當局要考驗一下救護員的應變能力？抵校門後，我才恍然大悟。今次不再是演習，而是真正的空襲。學校已停課，校長宣佈香港進入戰爭狀態，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同時攻擊美國夏威夷群島的珍珠港，以及包括香港在內的英、美、荷蘭等西方國家在亞洲的殖民地。日軍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日空襲珍珠港。當時即是香港時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一。校長接着勸喻學生回返家中作種種禦防措施，並指令有參加戰時輔助部隊的同學馬上向所屬總部報到，候命分配工作。至此，我正式開始為保衛香港而服務，一年來的訓練和演習弄假成真。

楊慕琦爵士（Sir Mark Young）於一九四一年來到香港任總督兼三軍總司令。防守香港的陸軍兵力有兩個旅或萬餘人，包括：英軍、印度軍、加拿大軍各兩營，高射炮隊、野戰炮隊、工程兵隊，還有由一千多名本地華人、葡萄牙人及華人組成的義勇軍，由一名陸軍少將任總指揮。帶領加拿大兵來港參戰的是一名陸軍准將。海軍方面有驅逐艦一艘，魚雷快艇四艘和武裝巡邏艇多艘，由一名海軍准將指揮。駐港空軍僅有三架魚雷轟炸機和兩架水陸兩用戰鬥機，組成一個空軍中隊，由一名空軍上校指揮。

英國是一個島國，靠海軍稱霸世界。這個概念使英國人重視海防。自佔領香港以來，英國人即在香港島沿岸險要地帶建築炮台，設有多門長程火炮以防禦敵人從海路進攻。這些炮台多建於港島東部的鯉魚門，南部的赤柱及西部的摩星嶺一帶。日軍從港島以北的中國大陸進攻，空軍、陸軍並進，令到炮台不能發揮原定作用。

香港的防衛部隊是一支由幾個不同民族組成的雜牌軍。他們懷着不同心情在香港與日軍交戰。英兵當然有保衛帝國屬土的責任。但離開英倫三島一萬幾千公里的香港到底不是他們的祖家。為了香港而與日軍決一死戰是否值得，他們心中有數。印度當時是英國殖民地，印度人是英國殖民主義者統治和壓迫的對象。印度兵不甘心為英國人賣命，可以斷言。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才匆匆忙

忙派調到香港的加拿大兵都是新入伍的。他們缺少嚴格訓練，又無作戰經驗，對香港的形勢不了解，不知為何而戰。參加義勇軍及各種輔助部隊的華人是否都懷着同仇敵愾的心情與其他部隊一同對抗敵人，則頗有疑問。原因之一爲除了少數高等華人，大部分華人對英帝國沒有好感。為何要冒生命危險替英國人打仗？原因之二爲貪生怕死乃人之常情，過慣安逸生活的港人尤然。因而不幸參加義勇軍或其他紀律部隊的華人外面穿制服，制服之內穿民裝，以便打輸仗時掉下制服逃生。

日軍進攻香港的計劃十分週詳。無論在戰略、情報、戰術、兵力、裝備、士氣和作戰經驗各方面，日軍都比香港守軍優勝。戰事一啓，英軍的飛機與艦艇都被取得制空權的日本空軍炸毀炸沉。不少裝置在炮台上的火炮也被炸到失去作戰能力。守軍雖曾負隅頑抗，但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節節敗退。兇猛の日軍接二連三地攻陷了守軍在新界、九龍半島及香港島的陣地。

守軍雖然一敗塗地，但事後一般人認爲義勇軍及加拿大兵團的表現不差。前者在港島東區及後者在港島黃泥埔峽的戰役中都出乎意料地打得出色。可惜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這兩支最缺乏作戰經驗的部隊均傷亡慘重，加拿大軍指揮官更在彈盡援絕時壯烈犧牲。英軍與印度軍的表現令人失望，戰敗後大部份成爲俘虜，因勇戰而陣亡者爲數甚少。駐九龍印度軍不戰而潰散，爲香港戰史寫下可恥的一頁。由十二月八日上午空襲九龍啓德機場開始，至十三日，新界及九龍半島已先後落入日軍手中。接着日軍以長程大炮轟擊港島北岸英軍設施及其他戰略性建築物如油庫、貨倉等，又出動飛機轟炸島上英軍炮台，並散發招降傳單。

日軍的空襲和炮轟，給我家所在地的西環青蓮台及附近街道帶來破壞、恐慌與人命傷亡。青蓮台及以西的紫蘭台的房屋建立在摩星嶺東部的山麓。從我家舉頭向西望可見嶺上的炮台。日本空軍連番轟炸這炮台，在香港淪陷前數天，一枚原來以炮台爲目標的炸彈誤落紫蘭台，隆隆一聲炸毀了兩幢房屋，導致兩死數傷。紫蘭台在我所屬防空救護隊巡邏地區範圍內，落彈地點離我家不到二百公尺。這是我們救死扶傷的時候。在頽垣斷壁中看到血跡斑斑的死傷者，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此一戰爭洗禮至今未能忘懷。另一驚險發現於青蓮台以東的魯班先師廟前空地。此乃我做學生時常常來踢球之處。日軍從九龍以長程大炮轟擊摩星嶺炮台，炮彈在青蓮台上空飛過。其中一彈跌落魯班廟前未有爆炸。這枚直徑達八英寸的巨彈嚇到附近居民魂飛魄散，直至數日後，英軍工程兵前來將之抬走才驚魂稍定。巨彈沒有爆炸，有人認爲是魯班先師顯靈所致。

戰事失利消息不斷傳出之後，香港人心惶惶，社會秩序日趨混亂。無可奈何之餘，我也像一般市民一樣，幻想中國會派軍隊來解救香港之危。於是謠言滿天飛，說有三萬華軍由廣東內地向深圳推進，配合英軍作戰，自日軍背後打入香港。但事實上中國軍隊始終沒有在我們眼前出現。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上午九龍啓德機場遭受空襲開始，至十二月十八日敵軍登陸港島成功，以至

廿四日耶穌誕前夕，香港守軍已打到筋疲力竭。二十五日下午，港督楊慕琦不得不持着白旗渡海到九龍，前往設於半島酒店內的日軍指揮部，向日軍司令酒井中將投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香港歷史上的「黑色聖誕日」，許多西化家庭沒有火雞吃，即使有得吃也難於下嚥。日本軍部曾高估香港守軍的戰鬥力，準備以六個月時間攻佔香港，沒有想到香港的英軍虛弱到不堪一擊，僅僅用了十八天就結束了攻佔香港的戰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攻佔香港的日軍舉行入城式。在騎着高頭大馬的指揮官領導之下，陸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士兵步武堂堂地在各主要街道列隊遊行。與此同時，天空出現列隊飛行的戰機在散放傳單。類似下列日式中文的告示和傳單四處可見：「我大日本帝國皇軍，高舉聖戰的旗幟，出於攻略香港之舉，是為推翻白色人種侵略者的勢力，通過有色人種的大團結，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尤其是我們日本人和中國人有着幾千年的友好關係，現在正要停止兄弟鬩牆的愚蠢舉動，必須緊緊地攜起手來，建設東亞新秩序。」

這個時候，香港已不是白種人高高在上的世界。白種人已差不多匿迹銷聲。英國和加拿大軍隊已棄甲曳兵成了戰俘。英、美、法、加、荷等西方國家在香港的官員和僑民也被拘禁於集中營內。曾當義勇軍、防空救護員及其他輔助部隊的英籍華人已紛紛拋棄制服和裝備。他們已換上平民服裝，與一般居民等候命運的安排。

結束這一節文章之前，順便告訴讀者一個有關香港淪陷的趣談。兩人下棋一贏一輸，操粵語的香港人稱輸棋為「冇棋」。港督的中文名字為楊慕琦。他姓「楊」，名「慕琦」。「慕琦」兩字的粵語諧音與「冇棋」兩字相似。這位港督以「慕琦」為名，無怪他打輸仗！

第二節：「大東亞共榮圈」

自從葡萄牙人發現了新航路，經大西洋繞道好望角至印度，五百年來世界都由白種人控制。而源於古希臘的歐洲文化，便成了世界文化和文明的主流。白種人是征服者，有色人種是被征服者，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事。於是船堅炮利的歐美國家，不斷以通商及拯救人類為名，瘋狂地掠奪亞洲、非洲有色人種國家的資源和財富，並勞役當地人民。十九世紀，日本、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就是在歐美炮艦政策威脅下，被迫開放門戶的。百多年來，大部份亞洲國家政治不安，經濟落後，淪為白種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受白種人統治和剝削，印度和中國是最佳例證。日本是唯一能夠保持獨立自主，並在經濟和政治建設方面趕上歐美的亞洲國家。白種人不敢看低日本人。日本打敗了英、美等西方國家，不啻替有色人種吐氣揚眉。

基於上述原因，香港淪陷後，有一個時期，我曾下意識地被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宣傳所迷惑，把多年日本侵華的罪行，和十八天香港保衛戰的慘痛經驗，暫時置諸腦後。相信當時許多人有同樣感覺，尤其是那些對香港淪陷前的生活現實不滿的人。

日軍佔領香港後，在成立軍政府的同時，也成立了興亞機關。「興亞」含興盛亞洲，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之意。該機關有點像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部」，主要任務是爭取亞洲倒向日本這一邊，為趕走白種人和建設大東亞共榮圈而努力。爭取的對象，包括知名人士和有特殊知識和技能的專門人才，精通日文的當然被包括在內。這個時候，曾在日本留學的香港居民紛紛到「興亞機關」登記。留日同學會活動頻繁，留英、留美、留加同學會偃旗息鼓。懂日文和做中、日翻譯的意氣風發，懂英文和做中、英翻譯的無用武之地。怡和、太古洋行的地位已被三井、三菱洋行取代。為了較容易找工作，不少人把從前為學英文的熱忱用於學日文。主要街道及建築物的名字也由英國化變為日本化。

香港淪陷初期，日本人的「大東亞共榮圈」宣傳頗收一時之效。這可能與中國人的文化背景有關。數千年來，中國人累積了無數改朝換代的經驗。中國人受盡洋人的欺侮、侵略。中國老百姓有「誰來給誰納糧」的習慣。「識時務者為俊傑」是一般士大夫的口頭禪。「除笨有精」為勢利商人的術語。一般香港華人對政局轉變的態度，可以用上述又文雅又通俗的成語來形容。由滿清到民國如此；由英國人統治到日本人統治也如此。由此看來，倘若日本人佔領香港後，真真正正地為香港利益和亞洲人利益着想，真真正正地與香港及其他亞洲人共存共榮，則香港和亞洲的歷史要改寫了。

畢竟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諾言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佔領香港不久，日本人便處處倒行逆施。結果諾言變謊言，人心盡失。在軍隊鎮壓之下，手無寸鐵的香港人當然無力反抗，敢怒而不敢言。在此情形之下，他們見有兩個選擇：其一是一繼續留在香港苟延殘喘；其二是一走了之另創前途。

日軍初入香港的時候，在街道製造恐怖氣氛，時而叱喝開槍，時而拘捕路人毒打。更甚的是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無所不用其極。日軍在主要街頭設立盤查崗哨，由手持上了刺刀的長槍的兵士把守。來往行人經過崗哨的時候要學日本人那樣深深地彎腰向日軍鞠躬，然後任由日軍在全身摸來摸去徹底搜查，認為沒有問題才能平安無事地通過。為了不願向那些作威作福、擺着戰勝者臭架子的日本兵鞠躬，和不願意接受搜身的屈辱，不少人從遠處看到崗哨便繞道而行，寧願多走一段路程才達目的地。

香港淪陷後，所有公、私倉庫即被日軍封閉。倉庫內有戰略價值的物資大部份被裝船運返日本。香港市面百物奇缺，糧食的供應尤為緊張。日軍沒收了存在倉庫內的食米，黑市食米供應量日漸減少，價格飛漲。市民要靠日軍配給口糧。他們要到指定的食米銷售站排隊輪購價錢比黑市米廉宜的公價米，每人每天的配給量是六兩四錢。由於魚、肉、菜蔬等副食品的供應也相當少，單是靠六兩四食米是難以充飢的。香港居民都要受吃不飽和營養不良之苦。

日軍佔領香港後，軍政府即宣佈「軍用手票」成為合法貨幣，與港幣同時在市面流通。軍票是日本侵略軍經濟金融掠奪的一種手段。日軍每佔領一個地方即強行以軍票購買物資，迫佔領區內居民使用，以達以戰養戰、就地取材之目的。港幣兌軍票的比率，初時是二比一，至一九四二年十月，改為四比一，又至

一九四三年六月宣佈禁用港幣，限居民於一定期間將所有存在銀行的港幣向台灣銀行照四比一的定率兌換軍票。於是香港居民手上和存在銀行的港幣，從逐步減值到最後剩下一堆軍用票廢紙。

香港鄰近的葡屬澳門，在第二次大戰中没有受到戰火的蹂躪，原因是葡萄牙一直保持中立。日軍佔領香港的時候，澳門是香港人避難地區之一，港幣與澳幣同時流通，當香港百業幾乎停頓之際，澳門的商業反而蓬勃起來，澳門成為貨物集散站。為刮取更多港幣以在澳門購買戰略物資，在一九四二年宣布港幣兌軍票為四比一的同時，日軍還強迫被囚於集中營的匯豐銀行大班簽發所有存放在貨倉內的大面額的港鈔。日本人以軍票換取港幣的陰謀雖然厲害，一些香港人對貨幣的看法也十分精明。他們不信任軍票，靜靜地窖藏港幣，此舉使他們在日本投降之後，平添了一筆財產。香港光復初期，迫簽的大面額港鈔一度禁止流通，未幾即解禁。因此，窖藏家又多了一個發財機會。

日本人在香港的暴政，隨著戰爭的發展而變本加厲。為加強防務，日軍拆毀許多民居及歷史遺跡，以擴建九龍啓德機場。為提高侵略軍的士氣，日本人在港島灣仔區建立幾百個「慰安所」，讓日軍嫖妓作樂，數千戶香港居民也因此而被迫遷出他們在灣仔的住所和店舖。為減輕香港人口對於生活供應的負擔，日本人用盡種種方法疏散人口，包括欺騙大批青年赴海南島做苦工和強迫居民出境，不顧他們死活。受不了日本人欺侮和迫害或受不了淪陷區生活煎熬而自動離開香港的，當然也大有其人。這些人包括：港英政府的官員，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香港的活躍份子，與中國內地有業務關係的商家，在廣東或廣東鄰近省份如廣西、福建等有家鄉的人，回國繼續升學的學生，在中國內地各大城市有親戚、朋友的人。他們大都是政治難民或經濟難民，或政治兼經濟難民。他們不用日軍強迫離港，而是自己設法離開這塊日本人的佔領地。英國官員和中國國民黨及共產黨在香港的活躍份子，是日本人要追捕的，他們不得不逃走。英國官員都被囚禁於集中營內，只有極少數數人在幾經艱苦之後才逃出生天。在香港有不少國民和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他們各有辦法在日軍來到之前，或來到後不久，協助出名的國民黨及共產黨活躍份子偷渡出境。

香港淪陷後，我家的生活日壞一日，「六兩四」食米配給制度使我們幾無隔宿之糧。我們手上持有的港幣儲蓄不斷被軍票制度所侵蝕。我們沒有多餘錢來購買日用必需品和較有營養的副食品。要維持較合理的生活水平便要典當首飾及變賣傢具及其他值錢的衣物。父親不喜歡伯父為人，但為了生活不得不硬着頭皮在伯父的油莊受職。哥哥文光也追隨父親投靠伯父。他們只有微薄的薪金，還要不時受伯父責罵，但亦無可奈何。我無事可做，唯有去讀日文，希望學會講幾句日本話以便較容易找到工作。但由於百業蕭條，人浮於事，沒有社會經驗，只懂一點點日文的我始終沒有僱主垂青。隨着香港經濟環境日差，父親擔心以後一家的生活將會很難過。與其全家人一起聚在香港，不如個別離開另謀出路。父親和母親當然要互相廝守。文光因要幫助父親養家，不便離去。元光年幼無知，還是留在雙親身邊為佳。我和子光年紀已不小，身體健康，能吃苦，

也懂得照顧自己。於是父母親主張我們兩人先行離港，回到中國內地找尋機會。

日軍佔領廣州前，姨母的丈夫梁杞儕在廣州與人合夥經營汽車零件批發零售生意，開設公利行，總店在廣州，分行在香港，在廣西柳州也有一聯號，名為福利行。姨丈經常與姨母來往廣州、香港、柳州三地。廣州淪陷後，公利行總行關閉，姨丈和姨母南來香港，繼續在香港公利行做生意。未幾香港公利行又因日軍攻佔香港而停業。失去了廣州和香港這兩個地盤後，姨丈唯有寄望在廣西柳州繼續做生意。他是香港淪陷後最早撤離香港的商人之一。與他同時離開香港前往柳州的有姨母、她的兒子梁乃熙，以及我的弟弟子光。子光不是梁家的兒子，姨丈本來沒有什麼責任要照顧子光的。子光跟隨姨丈，是因為姨母和我母親有深厚的姊妹情。

我們四兄弟年輕時，母親忙於料理家務。姨母比我母親年輕及活躍，經濟環境較好。因為同情我家的困境，她常常帶領我們四兄弟出外玩耍。文光在廣州培正中學念書時常得姨母照顧。「七七」事變後，廣州形勢緊張，在未撤出廣州前，姨母已送她的兒子乃熙來香港英皇書院讀書，與我同校，又在我家居住。當姨母要離開香港前往柳州的時候，父親和母親懇求姨母帶我和子光到柳州福利行做工。她答允先帶子光去，安頓下來後再讓我前往。一九四二年初，子光離開香港。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我也向家人告別，懷着又興奮、又茫然的心情，由皇軍統治下的香港，走向只在書報中認識但從來未到過的祖國。

第三節：「自由中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突襲珍珠港月餘以來，日軍所向披靡，連佔關島、香港、馬尼拉，橫掃南洋，直達緬甸。這時，中國的全民對日抗戰已進入第五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的時候，日本揚言三個月內可使中國屈膝。但中國的「持久戰」與「消耗戰」戰略，以空間換時間，使日本的「速戰速決」戰略不得逞。日本侵擾的地區北起察哈爾、綏遠、南至廣東，東至上海，西抵武漢，包括長城內外，東南各省及長江下游，俱屬中國精華地區。但它所能控制的，僅限於城鎮及水陸交通線，而不及於鄉村。中國政府仍統有廣大而完整的西北、西南。及華中、華南的大部份。

為制止日本、德國和義大利這三個法西斯國家奴役世界，美國、英國、蘇聯、中國等二十六個同盟國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發表《聯合國宣言》，全力對日、德、義軸心國作戰。是時中國的國際聲望頗高，因為盟國均對中國單獨抗日達五年之久表示欽佩，對中國人民不願受奴役、爭取自由的精神表示景仰。中國被列為四強之一。盟國每提及中國時每冠以「自由」二字。於是「自由中國」或「Free China」之名不脛而走。

香港淪陷後，「自由中國」是許多香港居民嚮往的地方。他們回到「自由中國」之目的地，最近的莫如他們的家鄉，因為他們的家鄉多位於廣東省南部珠江三角洲一帶，離香港不遠。但這地區大部份已被日軍佔領，他們惟有向北方

遠走一點。廣州淪陷後，粵北的曲江成為廣東省臨時省會，是當時廣東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吸引了不少逃難的香港人前來聚居。香港人在「自由中國」的另兩個聚居點是廣西省的桂林和柳州。它們都是中國抗戰時期的重要城市和交通要衝。香港人在曲江、桂林、柳州這三個地方聚居的時間雖然甚為短暫，僅兩三年，但這三個地方原來樸實的民風頗受香港人帶來的奢華風氣所感染。說到這裏，不禁想起五十多年後，香港人移居加拿大、美國和澳洲的情景。中國的國情當然與加拿大、美國及澳洲的國情大不相同。奇怪的是無論去到那一個地方，香港人就把他們的習慣和作風帶到當地。這些習慣和作風往往與當地的格格不入，令到當地人為之側目。在中國內地如此，在外國亦如此。究竟這是香港人的驕傲，還是香港人的悲哀？

我投奔「自由中國」的路程是由香港乘船向西行至廣州灣，再由廣州灣沿陸路向西北至柳州。廣州灣即現時的湛江，是粵西的一個主要海港。一八九八年英國向中國租借香港以北的新界後，法國亦於一八九九年向中國租借廣州灣，租借同是九十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繼續統治香港及新界，法國則放棄廣州灣。一九四零年，法國在歐洲戰敗，日本乘機控制了法國在亞洲的殖民地，包括安南和廣州灣。這個時候，廣州灣已差不多是日軍的佔領區，是廣東省西部中國與日本勢力的緩衝地帶，也是香港人進入中國廣西的主要門戶。我離開香港時拿日本軍政府發的「回鄉證」，經廣州灣入中國境時憑「回鄉證」換取「歸僑證」。

離港前，親友提示我多帶衣物和日用品，除自用外，多餘的可隨時隨地變賣，以便有錢使用，原因是內地物資奇缺，什麼東西都值錢。因此除旅費外，我還要籌一筆較大的治裝費，用以多買東西帶回中國。父親經濟環境不好，只可負擔我的旅費。至於治裝費則要硬着頭皮向伯父借，答應在內地把所帶的多餘東西變賣後，把賺到的錢匯返香港還債。伯父相信我的諾言，因為當時香港人入內地賣東西賺錢是一件很公開的事。結果我很幸運，到柳州不久便把帶來的多餘衣物及日用品賣清，於是無債一身輕。由香港逃難到中國內地的人，許多都有我一般在街邊擺地攤販賣故衣的經驗。有錢及有商業頭腦的更乘機大做舊衣物買賣生意。做這種生意的商店稱為拍賣行。曲江、桂林、柳州拍賣行林立，成為「自由中國」經濟生活中一個重要環節。

賣完故衣之後，我與弟弟子光一起在福利行當學徒。學徒是沒有薪水的，但食宿均由福利行供應。福利行僱有廚師為店舖的職工做飯。店舖晚間停業的時候，有家室的員工返家，沒有家室的留在店舖內住宿。我和子光及一兩個年青的學徒晚間就張開帆布床來睡，白天則把帆布床摺疊起來。姨丈關照我們，叫我們用心做工，每月給我們一些零用錢。我們的生活暫時得以解決。

我在福利行學到不少有關汽車零件和汽車運輸的知識。抗戰時期中國政府財政困難，在西南大後方建築鐵路和購買列車要很大的投資，汽車公路運輸實在比火車鐵路運輸經濟，而且靈活。中國工業落後，不能自製汽車及大部份汽車用的零件。政府、軍隊及民間所用的汽車及零件差不多全要從外國進口。

我到柳州的時候，中國大陸沿岸的港口已被日軍佔領，汽車及汽車零件的進口幾乎絕跡。中國西南大後方的汽車愈來愈殘舊，汽車零件存貨枯竭。政府及軍隊所用的汽車及汽車零件靠盟軍供應，初時從連接雲南與緬甸的滇緬公路運來。緬甸被日軍佔領後則由飛機運載，盟軍的運輸機由印度東北部飛越喜馬拉亞山降落雲南昆明。由於飛機的運載量有限，而且除運載汽車及汽車零件外，還要運載許多其他種類的戰略物資，民用汽車及汽車零件的添置，只能循走私的途徑運來。汽車零件商人冒險到香港及澳門，將兩地商民窖藏的舊汽車及汽車零件拆散，化整為零，秘密走過日軍的封鎖線，輾轉進入中國內地的主要城市如柳州、桂林、曲江、貴陽、昆明等地。由於供不應求，和難得可貴，汽車零件成為可居的奇貨，許多汽車零件商因此而發達，福利行也沒有例外。但零件商的美夢不能持久，因為戰爭日漸迫近，走私貨源減少，他們不是要逃難便是改做其他生意。福利行改業的時候我已離開，但弟子光仍跟隨姨丈。

抗戰時期，中國的石油開採及提煉工業均未萌芽，因此汽車及飛機所用的汽油非從外國進口不可。沒有汽油，汽車開不動、飛機飛不起，中國的抗日軍事活動受牽制。於是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號，以提高軍民的警惕。幸而窮慣了的中國人有適應環境的機智，汽車用「土燃料」來代替「洋燃料」。汽車修理工人將汽車的發動機加以改裝，使引擎的化油器可以吸收酒精或木炭燃燒後發出的氣體。由於木炭較酒精廉宜，民用的汽車以木炭作燃料者較多，但汽車要裝上一個笨重的木炭爐。以酒精作燃料則沒有這個麻煩，把原來裝汽油的油箱盛載酒精便可。「土燃料」雖比「洋燃料」便宜，但所能發出的馬力遠比汽油為少。中國西南地勢多山，公路要經過很多山路。木炭汽車和酒精汽車爬斜坡時汽車司機會命令助手下車，手持一條三角形的木楔隨車步行，一遇汽車因馬力不足而不能前進，即以木楔放在汽車的兩個後輪後面，以防汽車倒退。這是中國戰時的一個奇特景象。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不久便成為一個經濟、軍事強國。清末積弱和民國初期的軍閥內戰使中國淪為次殖民地。日、中兩國交戰，前者佔盡優勢，自不待言。在陸上，中國軍隊人數眾多，還可以與日軍周旋。但在空中和海上，中國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架之力。日軍佔領了中國大陸沿海地區後，中、日兩國已無海上作戰的機會。為了配合地面部隊作戰和打擊中國軍隊的後方，日本空軍大派用場。當陸上戰爭呈膠着狀態時，日軍每以空襲代替陸上進攻，狂炸濫燒，以動搖中國戰意，破壞經濟建設，擾亂後方秩序。於是逃避空襲成為柳州、桂林、曲江、重慶、昆明等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中國久戰之後，元氣已傷。首先是國家經濟遭受破壞，財力物力日艱。抗戰初期的積存貨物已消耗殆盡，國外進口的貨物遭日軍封鎖，物資供不應求，物價急劇上升。為應付開支的不斷增加，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鈔票，用大量貨幣來購買少量物資，造成通貨膨脹。於是商店囤積貨物，工廠囤積原料，不但可以保值，而且可以穩獲厚利。在此情形下，商品不能流通，生產陷於停滯，「工不如商，商不如囤。」我所熟悉的汽車零件行，主要是靠囤積居奇發財的。除汽車零

件行外，無數其他工商行業也是靠這非正常經營手法致富。更令人震驚的是一些國家金融機構如中央、中國、交通、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郵政儲金匯業局等一樣以囤積為事，不但直接投資於商業組織，並且自設商號、公司，掌握政治、財政、經濟的高級官員亦各有私人企業。通貨膨脹令富者更富，貧者更貧。靠薪水吃飯的政府公務員、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及工商企業僱員莫不叫苦連天。官、商暴發戶窮奢極侈、大吃大喝。「前方吃緊，後方緊吃」這一句抗戰時期流行語，於是出現於柳州、桂林、曲江、重慶、昆明等地。

中國西南地勢多山，國民政府除以人工開闢防空洞和隧道之外，復利用山邊的岩洞作為市民的空襲避難所。桂林的七星岩是旅遊勝地，戰時變為天然防空洞。桂林、柳州有不少類似七星岩的岩洞。進入岩洞避難的人，既有厚厚的天然岩石保護又可欣賞岩洞內的鐘乳石奇景。這是當時走避空襲的人津津樂道之事。不過提到防空洞，人們又想起一些不愉快的事。從香港回到內地的人沒有忘記香港防空總監的貪污醜聞。香港市民對偷工減料建成的防空洞實在沒有信心。國內人民更不能忘記一九四一年六月重慶大隧道窒息事件所引起兩萬人死亡的慘劇。

香港被日軍進攻的時候，空襲警報一響，敵機已飛臨頭上。中國內地情況不同，人民走避空襲有較充裕的時間。原因是中國土地遼闊，日本空軍起飛後要航行一段時間才到目的地。「自由中國」的防空警報系統也值得一提。在敵人後方的廣大淪陷區正潛伏了不少愛國份子和國軍的諜報人員。他們監視日本空軍的動態，一發現日機升空和觀察到日機的飛行方向，他們立刻以無線電報或電話通知有關城市的防空指揮部，俾能及早發出空襲警報。

柳州、桂林、重慶等城市四週多山，一些較容易被市民看見的山頂上多豎起長杆，用以懸掛空襲警號，有如香港天文台的懸掛颱風訊號。從遠處看望，白天是圓形的黑球，晚上則是點着了的燈籠。一個黑球或燈籠表示敵機已升空朝向市區飛來。兩個黑球或燈籠表示敵機已迫近市區。稍後，空襲警報即大鳴。敵機離開市區，防空指揮部即發出「解除空襲」的警報。山頂上的黑球或燈籠也按着敵機離開市區的距離由兩個變為一個，再而完全除下。柳州有兩座著名的山峰，一名「馬鞍山」，一名「立魚峰」，均以外形像馬鞍與企立的魚而得名。這兩座山峰是遊客拍照留念的對象。峰頂則是豎立長杆以懸掛空襲警號的理想地方。

第四節：洋人來華助戰

對日抗戰與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有關。為了激起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的心情和鼓勵士氣，國民政府的宣傳機構訂製了許多口號和標語，最普遍的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全民皆兵，焦土抗戰」、「服從最高領袖」、「蔣委員長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國萬歲」。上述標語在抗戰初期最為流行。到抗戰後期則出現了另一新標語。這個標語不是像其他標語般張貼或油漆在牆上和旗幟上，而是貼在人的背後。以下是該標語的由來：抗戰後期美國志願空軍來華助戰。他們的飛機被敵

人擊中後要跳降落傘逃生，著陸後有待中國軍民拯救。因為中國人與美國人言語不通，中、美軍方乃想出一個辦法，在飛行員的飛行茄克(jacket)背後繡上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又在旗的下端繡上「來華助戰洋人、軍民一體救護」字樣。在空軍基地和基地附近的市、鎮、鄉、村的街道上，不時可以看見背着這一獨特標語來來往往的美國志願空軍飛行員。正規美國空軍進駐中國助戰後，「來華助戰洋人，軍民一體救護」的標語和口號更被廣泛使用。

洋人來華助戰可追溯至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時期。為了繼續保有滿清政府給予他們的利益和希望自清朝取得更多讓與，英、美、法三國派兵協助清軍戰勝太平軍。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奉行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蘇聯派遣顧問來華協助國民黨建軍和北伐。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反共，不用蘇聯顧問，轉向德國物色。一九三零年代第一支現代化中國軍隊的建成，得力於德國顧問。一九三三年國民政府發展空軍，成立「航空委員會」，聘請義大利空軍人員為顧問。一九三六年，國民黨與共產黨和解，共同抗日，得到蘇聯空軍志願隊前來助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蘇聯空軍志願隊撤退，德、義國派來的軍事顧問也相繼回國。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美國以「民主國家兵工廠」自居，大量出售武器給反對德、義、日法西斯侵略的國家，尤其是與美國同文同種的英國。鑑於英國軍費浩繁，財源日漸枯竭，一九四一年三月，美國國會制訂「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以解決英國的困難。根據此一法案，總統如認為某國的國防對美國的安全甚為重要，他可要求政府貸款與該國，用以向美國購買武器、戰略物資和各種與戰爭有關的服務。攤還貸款的條件由總統決定。英國是「租借法案」的第一個和最大受惠者。一九四一年四月和九月，中國與蘇聯亦先後被列為「租借法案」的受惠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得到「租借法案」援助的國家一共有三十八個之多。

中國成為「租借法案」受惠國後，即要求美國供應武器，其中最急需的是飛機。有了飛機之後，中國還要靠美國機師來駕駛，因為當時中國空軍的戰機不但全毀，飛行員亦已傷亡殆盡。一九四一年九月，美國仍未與日本正式開戰。為了幫助中國，美國總統羅斯福特別頒發一個行政命令，容許美國平民替外國當僱傭軍。他又命一些陸軍與海軍航空隊的飛行員退伍，以平民身份前往中國參加由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指揮的「美國志願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簡稱AVG)。陳納德是一位退伍空軍軍官。「志願隊」有一百架P-40型戰鬥機和一百名機師。

「志願隊」飛行員的月薪為美金七百五十元，每擊落日軍飛機一架獲獎金美金五百元。以當時幣值和物價計算，「志願隊」飛行員的待遇頗具吸引力。「志願隊」的飛機，在機身前端漆有虎鯨張開血盆大口的圖案，以壯軍威。故「志願隊」又稱「飛虎隊」。「飛虎隊」來到中國的首要任務是攔截侵入中國西南領空的日本空軍。

於一九三七年興建，一九三九年完成通車的滇緬公路是「租借法案」援華

物資的主要渠道。滇緬公路的起點是雲南省會昆明。由昆明開始，公路向西行至滇中的大理，再向西行跨越瀾滄江和怒江至滇西的畹町，止於臘戍。臘戍有鐵路連接緬甸中北部的主要城市滿德勒和緬甸南部近海的仰光。仰光是緬甸首都，有海港設備。「租借法案」的援華物資用船運抵仰光後即可接駁鐵路和滇緬公路運抵中國西南大後方。

一九三零年代末期，中國大陸沿岸海港均已被日軍佔領，賴以輸入武器和戰略物資以支持中國繼續抗戰的通道有兩條：一是滇緬公路，一是滇越鐵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不久，英、法盟軍不敵德軍，英國由歐洲大陸退回英倫三島，法軍向德軍投降。趁着這個機會，日本在亞洲對英、法兩國在亞洲的殖民地政府施加壓力。日軍要求英國封閉香港與中國的邊境和停止滇緬公路的運輸。與此同時日軍在法屬越南建立軍事基地，並禁止物資經滇越鐵道運往中國。滇緬公路由一九四零年七月十八日起封閉，經過了三個月後，因受到美國的壓力，到十月十八日重開。滇越鐵路則一直在封閉中。爲了要完全封鎖中國，日本一定要切斷滇緬公路才甘心。

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節節勝利，進軍緬甸，威脅滇緬公路和印度之際，美國總統羅斯福任命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爲「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Commanding General of U. S. Armed Forces in the China - Burma - India Theater），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參謀長（Chief of Staff to the Supreme Commander China Theater），和租借法案管理人（Supervisor of Lend - Lease）。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是蔣介石，史迪威的任命有以下功能和目的：（一）維持滇緬公路交通；（二）指揮中國授權他指揮的軍隊；（三）改善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四）使美國給予中國政府的援助發揮對日作戰的作用。

史迪威在一九零四年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West Point Military Academy），被委任爲少尉（Second Lieutenant）。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二三年中國軍閥混戰時期，他是美國駐華陸軍的語言教官。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國民黨北伐的時候，他是美國駐華陸軍第十五步兵師的一個營長，官階是少校（Major）。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中日戰爭全面展開的時候，他在美國擔任第七師的師長，官階爲少將（Major General）。一九四二年重回中國服務的時候，他被提升爲中將（Lieutenant General）。他的豐富中國經驗是他重回中國服務的主要原因。

一九四二年初，史迪威被任命爲「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當時他的部屬只包括一批參謀與技術人員，和以印度爲基地的第十航空隊（Tenth Air Force）。陳納德指揮的「飛虎隊」雖有參加滇緬邊境的戰鬥，初時還是獨立的，直至七月被編入美國空軍，成爲第十航空隊的「中國空軍派遣隊」（China Air Task Force）之後才歸史迪威統領。是時陳納德被提升爲准將（Brigadier General），向第十航空隊司令和「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負責。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國空軍派遣隊」脫離第十航空隊，改編爲第十四航空隊（Fourteenth Air Force），以中國爲基地。陳納德再被提升爲少將（Major General）。他只有一個

頂頭上司—史迪威。

由於人力分配及種種戰略問題，美國地面作戰部隊絕少在「中—緬—印」戰區出現。一九四四年盟軍反攻緬甸時，史迪威曾要求陸軍部派遣三千名突擊隊前來助戰。但突擊隊的參戰只是一項臨時措施，因為美國政府認為在「中—緬—印」戰區，尤其是在中國戰區，利用中國的龐大人力資源來牽制與打擊日軍，還是比較動用美國地面武裝部隊為化算。於是提高中國軍隊的戰鬥力，成為史迪威的首要任務。

為了執行他的上述任務，史迪威制訂了一個重新編整、訓練、裝備中國軍隊，然後率領中國軍隊向日軍反攻，收復失地的計劃。該計劃名為 XYZ 計劃。計劃的重點為組織三支新軍。第一支的代號名為 X 軍(X Force)；第二支名為 Y 軍(Y Force)；第三支名為 Z 軍(Z Force)。

X 軍由一九四二年六月從緬甸撤退至印度的中國遠征軍第二十二師及第三十八師的殘餘部隊約八千人，以及後來從中國空運至印度的三萬多補充兵員組成。X 軍在印度最大城市加爾各答 (Calcutta) 以西的藍加 (Ramgarh) 集訓。軍官接受戰術和作戰技術訓練。一般士兵接受使用新式步槍、機槍、迫擊砲、火箭砲、反坦克砲及其他軍用武器、裝備的訓練。砲兵隊伍的官兵接受使用、裝配、搬運各種火砲的訓練。X 軍使用的火砲，主要是用騾馬馱運的輕型榴彈砲和用汽車拖運的中型榴彈砲。非戰鬥部隊的官兵則接受戰地衛生、醫療、獸醫、通訊等訓練。X 軍經編整、訓練、裝備完畢後即由印度進入緬甸，向東進攻，與由雲南向西出擊的 Y 軍會師，以重開被日軍封閉了差不多兩年的滇緬公路。

Y 軍由中國內地的部隊組成，目標是三十個師。Y 軍的幹部集中在雲南昆明及鄰近地區設立的「軍事委員會幹部訓練班」受訓。「幹訓班」有好幾個訓練中心。最大的是步兵訓練中心 (Infantry Training Center)。其次為野戰砲兵訓練中心 (F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此外還有通訊兵、工程兵、化學兵，汽車輜重兵、軍醫、獸醫等特種部隊的訓練中心。所謂「幹部」主要為尉官及校官級的軍人。上校級及以上的幹部要飛往印度藍加接受為期六個星期的參謀與指揮訓練。「幹訓班」於一九四三年四月開課。一九四四年四月，Y 軍成為中國遠征軍，由綽號「百勝將軍」的衛立煌率領，自雲南向緬甸推進。

Z 軍的建軍目標也是三十個師。Z 軍的幹部在廣西桂林的「幹訓班」受訓。桂林「幹訓班」的組織與課程與雲南「幹訓班」的組織及課程大同小異。根據史迪威的計劃，X 軍和 Y 軍收復緬甸，重開滇緬公路後，便相繼調回中國，以配合 Z 軍一同向盤據華中、華南、華東的日軍反攻。

為了維持美國駐華空軍的戰鬥力和訓練、裝備中國軍隊，使之能在緬甸及中國大陸向日軍反攻，美國要把大量租借物資運到中國。一九四二年日軍佔領緬甸。滇緬公路封閉後，美國援華物資需要經過一段遙遠和非常曲折與艱險的路程才能到達中國。物資先由美國海運至印度的加爾各答，再由加爾各答陸路至印度東北部的阿什 (Assam)，最後由阿什空運抵中國的雲南昆明。這一「印

一中」航空線經過海拔一萬五千英尺的喜馬拉雅山脈上空。地理學家稱喜馬拉雅山為「世界屋脊」，美國空軍飛行員稱之為「駝峰」(Hump)。飛機飛越「駝峰」時飛行高度在一萬七千英尺至二萬英尺之間。這一段空中走廊氣流洶湧，可以折碎飛機的機身和機翼，空氣稀薄，機員要戴氧氣口罩才能呼吸。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這一條航空線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航空線。航線開闢後三年內，墜毀的運輸機共四百多架。

在開闢阿什至昆明的印—中航空線的同時，盟軍又在「中—緬—印」戰區進行兩項鉅大工程。其一是從印度東北部的雷多(Ledo)開闢一條新滇緬公路，用以代替中斷了的舊滇緬公路。新路由雷多入緬北，向東南伸展，經密芝那(Myitkyina)再南下，駁接通達中國邊境的舊滇緬公路。新路原名雷多公路(Ledo Road)，後來改名史迪威路(Stilwell Road)，以紀念史迪威在「中—緬—印」戰區的功績。其二是敷設一條由加爾各答開始向東北伸展至印、緬邊境，橫過緬甸北部，再向東伸展至雲南昆明的輸油管。這條油管長達一千八百英里，有戰略和經濟作用。美國駐華空軍需用很多汽油，供應不繼，飛機即不能起飛迎擊敵機或轟炸敵人。飛越「駝峰」的運輸機耗油量也極大，每空運一噸貨物到中國，運輸機要消耗一噸汽油。輸油管的敷設解決了以上的戰略問題和經濟問題。建築公路和敷設油管都在非常艱苦的情況下進行的。工程隊要冒着槍林彈雨跟隨反攻緬北的軍隊前進。軍隊從敵人手中奪回一段土地，工程隊就在這段土地上築路和敷設油管，工程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進行。

一九四二年日軍佔領緬甸時，美國空軍運輸指揮部(Air Transport Command)只撥出二十五架運輸機給史迪威用以運送物資接濟中國。為了加強援助中國，羅斯福總統下令從一九四三年開始，空軍運輸指揮部以一百架運輸機來空運援華物資，初步目標為每月五千噸。由於各方面的努力，空運量陸續增加。至七月，是月的空運量已達五千五百噸。一年後，一九四三年七月份的空運量升至二萬五千噸。至一九四五年正月，空運量達到四萬六千噸的最高紀錄。空運量由一九四四年下半年開始激增，主要原因是盟軍收復緬甸北部，運輸機不用再飛越險惡的「駝峰」，飛機的損失減少，往返中、印兩地比以前安全、快捷和頻密。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五年正月通車的史迪威路，其運輸量竟不及印—中航空線的運輸量。因為這原故，當時與史迪威意見相左的人譏笑史迪威的堅持以陸軍反攻緬甸，重開滇緬公路以接濟中國，是得不償失和多此一舉的愚蠢行為。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印—中航空線運輸量的大增，是史迪威指揮的地面部隊收復緬北使航空線南移的結果。史迪威路與印—中油管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為歷史陳蹟。但印—中空運的成功則創了日後大規模空運的先例。

第五節：戰時繙譯官

因為文化、語言、習慣與中國人不同，來華助戰的美國官兵在與中國政府、軍方及民眾共同抵抗日軍的時候，需要繙譯人員的幫忙，才可發揮最大力

量。史迪威被任命為中國戰區參謀長之前，只有陳納德指揮的美國空軍志願隊在華作戰。當時國民政府成立了戰地服務團（War Area Service Corps，簡稱WASC），在各空軍基地附近開設招待所，為志願空軍人員解決食宿問題，並招募了一批繙譯員在空軍基地及招待所替美軍服務。戰地服務團的繙譯員是第一批戰時繙譯官。服務團的團長為黃仁霖，他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親信。宋美齡是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的主任，負有發展中國空軍的任務。

史迪威的XYZ計劃展開後，來華助戰的美國官兵，不限於空軍人員，還有許多陸軍及其他兵種的人員，包括聯絡、參謀、工程、技術、醫療、行政人員。到了這個時候，戰地服務團培養出來的繙譯人員無論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都不足應付形勢的需要。中國政府有見及此，乃敦促軍事委員會外事局（Foreign Affairs Bureau）統籌辦繙譯員的徵募、訓練、委任、調派工作。外事局首先將原來的戰地服務團譯員接收過來，編入外事局的人事建制中。之後，外事局又向外界徵募大批新的譯員。外事局在雲南昆明開辦譯員訓練班，新舊譯員都要在訓練班接受訓練或重訓練。軍委會外事局主任原是商震，後來是何浩若，兩人都是中華民國陸軍的中將級軍官。商震更最後升至上將。

三十年代中期，中國的高等教育界感覺到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無可避免，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武漢、廣州等地的大學相繼向華中、華西及西南大後方遷徙。一九三五年，北平的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遷長沙；天津的南開大學、南京的中央大學搬到重慶。一九三七年，清華、南開與北京三校再遷昆明，成立了西南聯合大學；北方其他大學合組的西北臨時大學設於漢中，後分為西北大學、西北工學院；浙江大學遷貴州遵義；武漢大學遷四川嘉定；廣州的中山大學遷粵北；上海各大學多遷四川。以上的逃難大學生和原來設於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各大學的學生之中，專修外文或有較高英語水平者大不乏人。他們是戰時繙譯官的主要來源。

戰時繙譯官另一個主要來源是一九四一年從香港來到中國內地避難的英文書院和香港大學學生，以及在政府機關、洋行、銀行工作的職員。他們有頗高的英語水準，因為他們大多數受到英式殖民地教育。內地中國人謔稱他們為「番書仔」或「皇家仔」。番書仔與大學生做繙譯官的原因不同。前者主要是為了生活，應戰地服務團及外事局的繙譯員招考廣告而參加譯員訓練班；後者主要是被政府徵調服役的。前者是自動的，後者是被動的。不過在戰時新聞報導中，凡是參加做繙譯官的，都被形容為愛國的青年知識分子。英皇書院「醒吾社」社友之中也有好幾個人參加了繙譯官的行列。

在柳州福利行當學徒只是為了暫時得以棲身。我的理想是繼續讀書，升大學，因為我還差半年才中學畢業。我很羨慕那些能回國升學的英皇書院同學。「醒吾社」的社友是最熱衷升學的一群。由於家庭經濟能力有限，在福利行當學徒又沒法賺到足夠金錢交學費，我升大學的理想沒有實現。更令我沮喪和悲傷的，是一九四三年七月母親來信說父親於七月十三日病故。至此我打消了升學的念頭，一心一意出來社會做事，爭取較多人息，以求自力更生。事有湊巧，正

當我謀求出路之際，報紙刊登了軍事委員會外事局譯員訓練班招生的廣告。在弟弟子光和一些年青朋友鼓勵和慫恿下，我報名參加招生試，結果被取錄了。在柳州投考譯訓班的人大部份是從香港來的「番書仔」。當時姨母和姨丈不太贊同我做繙譯，因為在軍中當繙譯會隨軍到前方打仗。老一輩的中國人常有「好仔不當兵」的成見。但鑑於我已成年，也應有自主權，他們不能阻止我前往昆明譯員訓練班受訓。我不升學而在軍隊裏做事，乍看起來有點像「投筆從戎」。但我自視並沒有那樣高。我做譯員的心情，其實與做防空救護員時的心情，並沒有很大分別，都是主要為了生活。不過當譯員到底為中國與盟國的對日抗戰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儘管我的貢獻是微不足道。更值得我反思的，是為期兩年多的繙譯官生涯奠定了以後數十年我在社會工作的基礎，因為我所擔當過的職務常常要中英文並用，且不時與繙譯有關。

在柳州考取譯員訓練班的，連我在內有十餘人。我們乘湘桂鐵路火車往桂林，會同在桂林被取錄的譯訓班學員十餘人一齊由桂林乘飛機前往雲南昆明受訓。由桂林至昆明的空中旅程給我一個深刻印象，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乘坐飛機。我們三十人乘坐的是美國空軍C-47型運輸機。C-47型機由道格拉斯（Douglas）廠出產的DC-3型客機改裝而成。原來的沙發座位改為可以隨時收摺的帆布座位，以留出更多空間來裝載貨物。C-47型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投入服務最多的運輸機，廣泛地為美軍、英軍及其他盟軍使用。英國人稱它為「特高達」（Dakota）型機。稍後投入服務的還有C-46型運輸機。C-47及C-46都是雙引擎螺旋槳推動的飛機。C-46型機的機身較闊，但投入服務的架數遠不及C-47。第二次大戰末期，雙引擎的運輸機漸漸為載重較多的四引擎運輸機所代替，但C-47型機始終是最被廣泛使用的運輸機。運載物資飛越喜馬拉雅山「駝峰」接濟中國的運輸機，多數是C-47型機。五十多年前出廠的C-47型機與現代噴射客機相比，有如小巫見大巫。不論在飛行速度、高度、穩定性和載重量各方面，前者無法與後者比較。C-47型機的機艙沒有抗氣壓裝置。我們從桂林起飛後，要飛越海拔三千多英尺的廣西、貴州、雲南高原才降落昆明。在高空遇到洶湧氣流時，機身搖擺不定，上下顛簸，令乘客十分不舒服。我和同機的都感到頭目暈眩，有不少人嘔吐。儘管如此，我們的心情十分暢快和興奮，因為從機艙窗口外望，下瞰，我們可以看到祖國的壯麗山河。抵達昆明機場後，我們即乘坐美軍卡車往譯訓班辦事處報到，入住譯訓班訓練營宿舍。訓練營設於昆明西郊，環境優美。除宿舍外，訓練營還有膳堂、禮堂、課室和操場。與我們一行三十人同時入營的還有五十餘名應徵做譯員的大學生，他們來自國內各大學，其中以來自西南聯大者為最多。

外事局譯員訓練班的課程頗為廣泛，包括：軍隊步操、步兵、炮兵、工兵、輜重兵及其他兵種的基本知識，各種武器、彈藥、軍事器材的構造和性能，中、美兩國軍隊編制，以及軍事名詞和術語的繙譯。我在香港時已對戰艦、飛機及與軍事有關的東西感到興趣，又做防空救護員，故能很快地吸收譯訓班給我的知識。大致而言，各項課程我都應付得來，唯獨對軍隊的紀律性和克苦生活則頗

難受落。受訓譯員都要按着教官的命令做事，不得有違。教官的口令和訓練營的喇叭聲，規定了我們每天的生活程序，由起床、跑步、步操、上課、下課、用膳，以至睡眠，我們的行動都要準時和一致。這樣的機械式生活很容易使人麻木。更令我感到不自然，甚至認為怪誕的，是無論在什麼集體場合，例如在操場、課室、禮堂，或飯堂，一聽見教官說：「最高領袖」、「蔣委員長」、「蔣總裁」和「國父孫中山」的時候，我們就要全體肅立致敬。中國人崇拜領袖、權威和崇拜偶像的意識特別濃厚，不知道是否與數千年的專制、封建統治有關。

在譯訓班接受繙譯訓練的時候，各學員的語言能力問題及由此而引發到關乎中國人團結的問題，使我感到十分不安。中國土地遼闊，交通不便，地域與地域之間的人民在語言上常有隔膜。廣東省的方言與其他省份的方言的不同之處更多。由於中國首都設在北京的時間最長，中國的官方語言一向以北京話為標準。老年人稱北京話為「官話」；國民政府稱北京話為「國語」；中共統治大陸之後，人民政府稱「國語」為「普通話」。廣東省有許多方言，但因為廣州是廣東省的省會，一般人都稱廣州話為「廣東話」，香港居民多來自廣州及廣州附近的地區，故香港人多以廣州話為通用語言。廣州話的發音與普通話的發音有很大差別。因此以廣州話為母語的人很難說純正的國語。無怪中國內地的人有「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講官話」的說法。為來華助戰美軍做繙譯，英文好是不夠的，他還要講流利的國語，因為中國官兵以講國語及接近國語的內地方言為最多。來自香港及廣州的譯訓班學員多數以廣州話為母語，要好好練習聽、講國語才能對畢業後的工作應付裕如。抗戰初期，我出於愛國熱情，在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開辦的國語班學習國語。這是學以致用的時候了。

歷來中國人異口同聲講團結，但講宗派似乎較為真實。在芸芸譯訓班學員中，國語說得最不好的廣東籍學員首先自組小集團、喋喋不休地在公眾場合講廣州話，使在場的非廣東籍學員為之愕然。廣東籍學員多數是來自香港的「番書仔」。香港人慣性稱非廣東人為「外省人」，其實在雲南昆明，他們才是外省人。恃着自己英文程度好和多與現代西方文化接觸，「番書仔」常常嘲笑「外省人」英文蹩腳，是「土頭土腦」的「大鄉里」，趕不上潮流。為了不甘示弱，非廣東籍學員也反唇相稽，稱香港人為「帝國主義走狗」，譏諷廣州話為南蠻的語言。

江蘇及浙江籍學員不少來自基督教或天主教辦的大學，尤其是上海聖約翰大學。他們的英文水準也很好，在思想意識上的洋化程度不下於來自香港的英文書院學生，相聚一起時常以上海話交談，形成另一個小集團。「上海仔」和「香港仔」的驕傲、輕浮、自大作風引起許多其他省籍學員的反感。雖然是一個來自香港的英文書院學生，我對「香港仔」和「上海仔」的作風不敢苟同。

戰地服務團譯員的身份是平民僱員。軍事委員會外事局接管譯員事務後，前戰地服務團譯員和在外事局譯訓班畢業的譯員同是軍人，被軍委會委任為「繙譯官」（Interpreting Officer），以別於屬平民身份的「繙譯員」（Interpreter）。繙譯官的官階是少校（Major）。後來由於繙譯官人數愈來愈多，新被委任的官階為上尉（Captain），即比少校低一級。姑勿論是少校或上尉，繙

譯官大都是曾受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是中華民族的精英。他們有責任維護國家的利益、體面和尊嚴。政府對他們亦有愛護與關懷的責任。

我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脫掉防空救護員的制服。想不到相隔不足兩年，我又穿上另一種制服。穿著什麼服裝本來不應該是一件大事。但我在軍隊當繙譯的時候，服裝問題卻使我有很大感觸。抗戰時期，中國經濟困難，軍人服裝不備、裝備窳劣是意料中事。我在譯訓班所穿的是當時國民政府軍隊的制服，包括軍帽、中山裝式上衣、長褲、裹腿和布製軍鞋。冬季制服灰藍色，上衣和長褲用雙層棉布縫製，兩層布之間夾有棉花。夏季制服草青色，用單層棉布縫製。制服用的棉布，質料異常粗糙，但不結實，容易破爛。由於粗製濫造，我們所穿的制服多數衣不稱身，冬季制服尤其臃腫難看。畢業後我們被委任為軍官，為了在來華助戰美軍之前不致失禮和有辱國體，我們自己掏腰包縫製質料較佳和更為稱身的制服。我們不穿布鞋，另外出錢購買皮靴。戰時中國軍人的薪餉增幅遠遠追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因此要好好裝備外表就要付出代價：我們要多在軍營吃米粗、菜少和營養不良的膳食，少到飯店和茶樓吃飯或品茗，少花錢購買日用品，少到娛樂場所。許多繙譯官忍痛付出代價，因為他們要維持本身的尊嚴和國家的體面。中國人是一個特別愛面子的民族。

我是軍事委員會外事局昆明譯員訓練班第一期畢業生。第一期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初開課，訓練時間為期六星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譯訓班一共開辦了十期。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譯訓班主任公佈一百三十餘名第一期畢業生的工作分配名單。分配去向大體上以英語水平和專業知識為依據。大部份畢業生向昆明美軍總部報到，再轉派往軍委員會幹部訓練班屬下的步兵、炮兵及其他兵種訓練中心，或滇西各美軍聯絡組工作。其餘結業學員，有人去印度，在中國遠征軍的訓練中心及美軍聯絡組工作；有人去航委會美軍聯絡組工作；有人去戰地服務團的美軍招待所工作。我則被派往軍委會與美軍合辦的汽車學校工作。與我一同前往的另有三名「香港仔」，和十多名國內大學機械工程系三、四年級學生。我在柳州福利汽車零件行做工時學到的一些汽車機械及零件名詞和術語有助我在汽車學校的工作。

開課初期，汽車學校的物質條件甚差。學校擁有二、三十部殘舊的福特（Ford）牌兩噸半卡車，只有三分之二可以行駛，用以供學員練習駕駛。其餘三份之一卡車則被肢解，拆下來的引擎、車架、車輪、車軸、傳動齒輪箱、離合器、化油器，以及其他機件，部份用作示範教材，部份用以填補行走卡車損壞部份，使卡車不致行動不得。這個可悲情況到一九四四年首季即有所改變。美國軍援中國的物資源源由印度空運抵昆明後，汽車學校分配到數十部大、中、小型新式軍用卡車，修理這些車輛的零件有大量供應。初期用以教學的福特牌卡車以酒精作燃料，新式軍車則用汽油。供學員練習駕駛的軍車包括通用汽車廠的GMC型兩噸半及五噸卡車、道奇（Dodge）廠的半噸輕型卡車，和佳士拿（Chrysler）廠的四份一噸吉甫（Jeep）車。GMC卡車六輪傳動，半噸和四份一噸軍車都是四輪傳動。所有軍車都有高度的越野性能。吉甫車尤其是輕巧靈

活，可作指揮車，又可作偵察車。

汽車學校位於雲南省的曲靖。曲靖是個縣城，是雲南省會昆明與貴州省省會貴陽公路線之間的重鎮。校址原是個大兵營，有一個很大的操場，操場四週是一排一排的長方形兩層建築物，用作士兵宿舍、飯堂、兵營辦公室、汽車修理廠、幹訓班學員教室、教官和繙譯官宿舍。學校正門面側石柱上，刻有一副對聯，右邊寫著「抗戰建國，建國必先建軍，建軍即自此始。」左邊寫著：「殺賊立功，立功尤貴立德，立德所向無前。」這副對聯意義深長，是當時中國軍隊訓練中心的暮鼓晨鐘。

中國陸軍採取「三、三」編制，以師為單位，每師有三個團，每團有三個營，每營有三個連，每連有三個排，每排有三個班。師長的官階為少將、團長的官階為上校，特種團的團長可能是少將，營長的官階為中校或少校，連長的官階為上尉，排長的官階為少尉。少尉是最低的官階。少尉以下為士兵，班長由上士擔任。中國軍隊以步兵為主，所用武器俱屬輕型的，包括手槍、步槍、機槍、迫擊炮等。有時增添輕型火箭炮和反坦克炮。火力強大的炮兵、機動裝甲坦克兵、化學兵，和專業性的非戰鬥兵種如通訊兵、工程兵、輜重兵、醫療隊等在舊式的中國軍隊中是少有的。舊式中國軍隊更缺乏良好和有效率的情報及後勤制度。通過繙譯官，美國教官將各種輕、重武器的使用和保養知識，各專業或特殊軍用器材的使用和保養知識，傳授給中國軍隊的幹部，再由幹部傳授給他們的下屬。通過繙譯官的幫忙，美軍教官向受訓幹部講解步兵、炮兵及其他兵種如何配合作戰，以及現代戰術概念。在印度、雲南、廣西的中國新軍訓練中心駐有許多教官和繙譯官。

新軍受訓完畢即等候命令隨時赴前方作戰。各訓練中心的教官和繙譯官也大部份被派駐新軍各單位，只有少數留在訓練中心繼續原有工作。派駐新軍的教官稱聯絡官(Liaison Officer)。他們駐在新軍的各個師部、團部以及營部，為師長、團長、營長做顧問和參謀。因為新軍的武器、彈藥及重要軍需品差不多全由美國供應，聯絡官有責任監管這些武器、彈藥、軍需品的領取和消耗，以免浪費。為了順利執行以上任務，每名聯絡官有一名繙譯官從旁協助。派駐師部的聯絡官通常是上校級，駐團部的是中校或少校。營部的聯絡官多數是尉級軍官，但駐炮兵營或特別兵種營部的則可能是校級軍官。

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成立了「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簡稱 OSS)，以統籌國防情報。戰略情報局有多項任務，其中之一為派人潛入敵國搞地下活動，包括刺探敵人虛實、破壞敵人的軍事、交通、工業設備，和替向敵人進攻的盟軍通風報信。在中國戰區的美軍也有戰略情報局人員進駐。他們從眾多繙譯官中挑選一些體格強健的出來接受跳降落傘、無線電通訊、爆破及各種特別技能訓練。訓練完畢後偕同情報局特工乘飛機到華中、華東、華南上空跳傘降落日軍後方，執行上述各種特務工作。應選的繙譯官為數不多，他們需要有極大勇氣去從事這種危險和艱巨的工作。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戰略情報局」隨即解散。但到一九四七年，鑑於東、西方冷戰發生，美國政

府又成立了一個部份以戰略情報局為藍本的超級情報機構，名為「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簡稱 CIA)。

由於中國政府不爭氣，要靠外國的援助來抵抗敵人，要向外國借錢來購買軍火及戰略物資，要請外國人來訓練軍隊，來華助戰的美軍，不但看不起一般中國官兵，對大學生出身的繙譯官也不尊敬。繙譯官們要維持中國體面的努力因此而大打折扣。對美國軍人來說，穿上整齊軍服、配上「少校」或「上尉」領章的繙譯官極其量只是個繙譯工作者，官階沒有作用。一個美軍下士與一個美軍上校同樣可以利用中國少校繙譯官的服務。他們不會因為我們是軍官而對我們特別客氣。

自尊心受到損害之餘，繙譯官又為生活問題而煩惱。戰時中國內地物價高漲，通貨膨脹侵蝕了薪水的購買力。對薪酬待遇最不滿的是一群在昆明軍委會幹部訓練中心工作的繙譯官。有一次他們為了要求加薪而舉行罷工，但罷工很快便被訓練中心行政長官的強硬手段所平息。他派了一排武裝軍警包圍繙譯官宿舍，將繙譯官們押到他的辦公室。在辦公室內，行政長官拿着手槍指嚇繙譯官，命令他們在一份預先寫好的聲明書上簽名，聲明對當時所收到的薪水表示滿意。繙譯官們敢怒而不敢言，但最後還是簽字算數。他們若不服從命令，唯一的選擇是開小差做個逃兵。但開小差很難逃過軍警的監視，被抓回來要受軍法處分，輕則坐牢，重則被槍決。抗戰時期是非常時期，軍令如山。

一九四四年，由美軍訓練和裝備的中國新軍發動反攻緬甸之戰。以印度為基地的 X 軍向東攻擊，以雲南為基地的 Y 軍向西推進，以夾擊盤據緬甸的日軍。與此同時，由美國空軍志願隊改編為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的美國援華空軍又大增實力，以協助 X 軍與 Y 軍作戰。從此時起，繙譯官的待遇才有所改善。他們的薪金得以調整，他們不再要掏腰包購買質料和剪裁較好的軍服。他們穿的、吃的、用的全由駐華美國軍方供應。一般美軍士兵的衣着、伙食日用品都是由政府發給的。「政府發給」的英文是「Government Issue」，簡稱「G. I.」。這是美國人稱士兵為「G. I.」的由來。以此看來，繙譯官則有可能被人稱為「G. I.」。到了這個地步，繙譯官們已不再計較少校或上尉官階的尊嚴。他們比較關心的是薪金會否增加，衣着鞋襪是否耐用美觀和冬暖夏涼，伙食是否可口和更富營養。由此看來，國內大學生和香港「番書仔」的「投筆從戎」顯得更庸俗。孰令致之？

第六節：反攻緬甸

反攻緬甸之戰是一場極富爭論性的戰爭。中、美、英三個同盟國的領袖對戰爭的看法不一樣，各為本國的理想和利益打算。英國對中國的輕蔑與妒忌，首先播下三國合作不愉快的種子。一九四二年初日軍進攻緬甸的時候，駐緬英軍為了保存實力以防衛印度，對日軍毫無戰意。附屬英軍的印度部隊，更因為印度醞釀獨立而軍心渙散，士氣低落。史迪威指揮的中國遠征軍除與日軍作戰外還要解救被圍的英、印軍。因為英、印軍的拖累，中國軍隊蒙受額外損失。史

迪威及追隨他在中國遠征軍服務的美國官兵，對英軍的懦怯表現和高傲態度非常反感。美國官兵與英國官兵互相以俚語謔稱對方。英國人被稱為「Limey」，美國人被稱為「Yank」，正如中國人稱西方人為「洋鬼子」或「鬼佬」，都是貶詞。由於美國國力雄厚，英國要靠租借法案物資接濟，美國軍人看不起英國軍人，和英、美軍人互相詆毀的事件迭有所聞。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國領袖—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in 埃及首都開羅舉行會議，商討如何制止與懲罰日本的侵略。當提到反攻緬甸時，蔣介石極力主張陸、海軍聯合行動。羅斯福保證行動於來年春季開始。開羅會議閉幕後，羅斯福、邱吉爾二人又與蘇聯領袖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會議。斯大林力爭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待擊敗德國後，蘇聯即對日本作戰。邱吉爾乘機勸羅斯福收回對蔣介石的諾言。羅斯福以為如獲蘇聯合作，不但可以早日結束戰爭，戰後一切計劃亦可順利實現，中國地位無足輕重。於是他電致蔣介石謂英海軍須先用於歐洲戰場，不克調到亞洲支援反攻緬甸。

儘管英海軍不能出動，基於戰略需要，史迪威仍認為反攻緬甸不可拖延。收復緬甸，重開滇緬公路不但可以給予中國更多接濟以抵抗日軍的進攻，而且可能是中、美軍隊在中國大陸沿岸會師，夾擊日軍的前奏。此外，他更想向世人證明，只要有適當的訓練、裝備和領導，中國軍隊的戰鬥力不下於任何國家的軍隊。他對中國士兵的耐勞刻苦、服從命令及樂觀精神十分欣賞。雖然面臨中、美、英三國領袖的意見分歧，史迪威一於實行他的計劃。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他指揮在印度受訓的中國軍隊從印度東北阿什省的雷多出發，進入緬北，然後向東南推進，目標為密芝那。密芝那是日本在緬北的最大陸軍和空軍基地。從密芝那南下的公路可接駁通往中、緬邊境的滇緬公路。

中國印度遠征軍，即史迪威計劃的 X 軍，開始反攻有兵力三萬餘人，包括第二十二師、第三十師和第三十八師。跟隨着這些戰鬥部隊後面的還有為數達八萬人的建築雷多公路工程隊伍，其中有美國陸軍工兵五萬人和中、印民工三萬人。至一九四四年初，美國空軍運輸機又將兩個師和一個獨立團的中國軍隊送到阿什，稍經訓練和裝備後即往北緬前線加入戰鬥。這些新來的軍備包括第十四師、第五十師和獨立步兵第一團。獨立步兵第一團原來是軍政部學兵總隊轄下的兩個化學兵團之一。至此，史迪威指揮的軍隊實力大增，包括由第三十師和第三十八師組成的新一軍，由第十四、第二十二和第五十師組成的新六軍，由獨立步兵第一團與兩個美國陸軍兵團組成的中、美混合旅。新一軍軍長為孫立人，新六軍軍長為廖耀湘，獨立步兵第一團團長為林冠雄，中、美混合旅旅長名魏雷（Wingate）。此外，還有一支約有三千人的美國陸軍突擊隊也參加了戰鬥行列。該突擊隊的司令員名 Frank Merrill。在緬甸北部作戰的中國和美國軍隊不但遇到日軍的頑強抵抗，而且要與大自然鬥爭。緬北戰場到處是崇山峻嶺，叢林密佈，雨季時地面泥濘不堪，寸步難行。日軍的炮火固然有很大殺傷力，山林瘴氣和瘧疾也令到許多士兵病倒或喪生。

爲了響應駐印遠征軍的由西向東進攻，雲南遠征軍，即史迪威計劃的 Y

軍，也於一九四四年初由東向西進攻。雲南遠征軍的總司令爲衛立煌上將，他有兩名參謀長，分別爲中國陸軍的蕭毅肅中將和美國陸軍的實恩（Frank Dorn）准將。遠征軍的主力有宋希濂率領的第十一集團軍和霍揆彰率領的第二十集團軍。前者由第八、第五十四及第七十一軍組成，後者由第二和第五十三軍組成。這支爲數達二十多萬，經過不同程度的美軍訓練和裝備的遠征軍，作戰時有美國空軍的掩護及空投支援。

一九四二年日軍攻佔緬甸，切斷滇緬公路時，怒江以西的雲南省西部地區也陷落日軍手中。中國軍隊從滇西撤退時，將橫跨怒江的橋樑炸毀，以免日軍再向東進攻。雲南遠征軍反攻時要強渡怒江，過江後要收復龍陵和騰衝這兩個滇西重鎮。第十一集團軍負責收復龍陵。收復龍陵後再前進收復畹町。過了畹町是滇緬公路緬甸段起點芒市（Muse）。攻佔芒市後，第十一集團軍便可以與進攻緬東重鎮八莫（Bhamo）的駐印遠征軍會師。第二十集團軍負責收復騰衝。收復騰衝後，第二十集團軍便可以與進攻緬北重鎮密支那的駐印遠征軍會師。

一九四三年後期，日軍在太平洋海戰中開始節節失利，海、空軍受到巨大損失，強大的美國海軍已威脅到日本本土。在此情形之下，日本已無力支援遙遠的緬甸佔領軍。漸漸孤立無援的二萬多名留據滇西的日軍只能憑着滇西凶險的地勢負隅頑抗。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雲南遠征軍的部隊利用當晚的惡劣天氣作掩護，乘日軍不備，在惠通橋舊址以北強渡怒江成功。由十一日至十二日，三萬二千多名作戰官兵，數千匹馱載彈藥、武器及各種軍需品的軍騾，數千名背着各種軍需品的挑夫，從怒江東岸走過先頭渡江部隊工程兵築成的浮橋，達到怒江西岸。先頭部隊是以橡皮艇及竹筏，經過滾滾波濤渡江的。渡江成功後將這些橡皮艇和竹筏栓扎起來，結成浮橋。

據守騰衝和龍陵松山一帶的日軍防禦工事建築得十分堅固。日軍的堡壘設在山坡上，居高臨下，中國遠征軍要朝着山坡向上爬才能接近敵人陣地。五月開始是雨季，天氣惡劣，前來攻擊日軍的美國空軍戰鬥轟炸機和到中國軍隊陣地上空空投物資的運輸機出動次數減少。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受到影響。第十一集團軍和第二十集團軍的部隊傷亡重大，要經過四、五個月的拉鋸苦戰才收復龍陵和騰衝，到年底才清除盤據滇西的所有日軍。

反攻緬甸戰鬥正式展開後，曲靖汽車學校的美籍教官和華籍繙譯被調往遠征軍後勤部服務。後勤部在雲南省滇緬公路中段的下關設有汽車運輸指揮部、汽車修理廠、汽車零件庫及汽油庫。這些地方均駐有美軍聯絡官，其中不少是前汽車學校的教官。協助聯絡官工作的繙譯官之中，當然有不少來自剛告結束的汽車學校。聯絡官和繙譯官爲遠征軍後勤部及各輜重汽車兵團提供顧問性質及技術性質的服務，還監管汽車零件與燃油的配合，以免流於浪費。

後勤部美軍聯絡官偕同他們的繙譯官除在指揮部及修理廠工作外，還不時駕吉甫車在來往下關與滇西前線之間的公路上巡邏，視察輜重兵汽車運輸隊的運作情形。輜重兵以團爲單位，每團有三個營，每營有三個連。團部及營部

均駐有美軍聯絡官、機械士和外事局繙譯官。

駐守下關的後勤部人員都住在帳幕內。他們的辦公室、修理廠、零件庫等都以帆布帳幕為上蓋。在下關城牆之外的公路兩旁有大小帳幕一百餘個，形成一個帳幕城（Tent City）。下關是雲南省會昆明與滇西重鎮龍陵之間的公路中途站，沒有什麼工商業，只是行旅過路休息歇腳留宿的地方。鄰近下關有一個小市鎮名曰上關。下關以北為雲南西北部的大理。大理是一個縣城，地瀕洱海的東南岸。洱海是一個大湖，湖以北為點蒼山，點蒼山山頂終年積雪，雲石為點蒼山的特產。在點蒼山採掘出來的雲石又名大理石。下關、上關、大理一帶風景優美，是彝族聚居的地方。彝族少女以美麗動人見稱。古時文人雅士到這一帶旅遊時，曾有「上關風、下關花、蒼山雪、洱海月」的佳話。「上關風、下關花」沒有什麼考據或值得回憶的地方，但蒼山頂上的積雪，和晚上月亮在洱海水面的倒影，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下關至龍陵這一段滇西地區還有不少三國時代諸葛孔明征伐南蠻、七擒孟獲的傳說、古蹟。我在下關做繙譯官時不禁發出思古之幽情。

反攻滇西戰役進行之際，我曾偕聯絡官數度駕車來回下關至怒江東岸的公路，以體察輜重汽車兵團接濟前方戰鬥部隊的情況。雲南是個高原，省內河流由北向南流，流過高原的山谷。河流的水面比高原上面公路的路面低下許多。汽車駛近怒江時要沿着「之」字形的陡峭山路盤旋而下。在山腰公路上雖然老早望見怒江，但汽車要行走個多小時才能達到江邊。從怒江東岸以望遠鏡向西望，可見到已被破壞的滇緬公路遺跡。公路遺痕也成「之」字形蜿蜒向山上爬。

怒江起源於西藏，向東流入西康、再由西康直瀉而南，通過怒山山脈與高黎貢山山脈，縱貫雲南省西境，至龍陵入上緬甸。入緬北後，怒江稱為薩爾溫（Salween）江。薩爾溫江自上緬甸流入泰國西北境，再入下緬甸，流至孟加拉灣，注入印度洋。怒江水流湍湧，有很多漩渦，不宜航行。橫渡怒江非常危險，稍一不慎，船隻被急流冲向下游，甚而傾覆沉沒河底。三國時代諸葛孔明作的「前出師表」和「後出師表」均有「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句。他所說的瀘水即今之怒江。有機會親臨這條河流憑弔古戰場，欣賞四週壯麗景色，和參與意義重大的中國抗日戰爭，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

後勤部繙譯官、聯絡官和輜重汽車兵團官兵雖然沒有衝鋒陷陣，但在汽車隊駛到前線我軍陣地下卸彈藥，糧食及軍需品時也驚險重重。接近前線時我們不時受敵人長程大炮轟擊，炮彈在我們頭頂飛過時嘶嘶作聲。滇西一帶的公路及橋樑因戰爭而破爛不堪，加以公路路線地勢險峻，經過高山深谷，車隊失事頻頻，車毀人亡之事日有所聞。在跟隨戰鬥部隊進入攻克的敵人陣地時，車隊又要冒另一風險，那就是一時清除不了的敵人埋下的地雷。在敵人放棄的陣地內，滿目瘡痍。敵人的禦防工事如鐵絲網、戰壕、碉堡等被炮彈擊中後在冒煙燃燒中。四週是日軍遺下的武器、屍骸。死屍面貌恐怖，屍體腐爛後發出惡臭，令人作嘔。

八月中旬，我偕聯絡官駕車駛過浮橋，前往龍陵視察。龍陵是我參加遠征軍反攻緬甸所到過的最遠地區。我在龍陵檢獲一面日軍留下的軍旗和一把東洋軍刀作為紀念品，一直攜在身旁，直至戰後復員返回香港老家。可惜我的紀念品軍刀最後還是要割愛。因為香港政府不准市民藏有武器，我只好把軍刀繳交警察局。我的滇西經歷，還有另一個難忘印象。不論在前線或後方，中國士兵和老百姓對繙譯官和聯絡官都非常友善。我們在相遇的時候，往往互相豎起左手或右手的大姆指，高呼「頂好！」這一個非官式的中、美軍人見面禮，與歐洲戰場盟軍相遇時的以手指作「V」字形的非官式見面禮相映成趣。

反攻緬甸之役到一九四四年九月宣告結束，據守緬甸北部及東部的日軍已被中、美、英盟軍擊潰，雷多公路築到密芝那，援華物資的陸上供應線指日可通。但是盟軍在緬甸戰場上的勝利，不足以抵消中國軍隊在華中、華南戰場上的失敗。因為此時日軍已打通了直貫中國大陸南北的交通線，攻佔了長沙、衡陽、梧州、桂林、柳州、南寧等重要城市，摧毀了多個美國駐華空軍基地，威脅中國西南大後方。

日軍在中國大陸戰場的最後一擊勢如破竹，中國軍民在湖南、廣西狼狽撤退，損失生命、財產、資源無數。當日軍從廣西北上，打到貴州省的獨山時，重慶國民政府驚惶失措。幾乎要遷都印度。及至日軍撤出獨山後，局勢始稍趨安定。由於湘、桂大撤退，史迪威的「Z」軍訓練計劃不能完成，駐桂林軍委會幹訓班各個訓練中心的美軍教官和華籍繙譯官被調到雲南，部份在昆明繼續訓練中國新軍，部份參加雲南遠征軍。

看到國民政府的軍隊如此不濟，美國政府建議由史迪威任中國戰區前線總司令，有調度所有中國軍隊的全權，蔣介石不得過問。史迪威要求駐陝西的胡宗南部隊放棄監視中共，南下參加抵禦日軍的攻擊，並打算裝備中共軍隊，使之與國民黨軍隊並肩作戰，一同抗日。他任命巴雷德(David B. Barrett)上校率領一個軍事觀察團訪問延安。史迪威的如意算盤打不響，因為蔣介石不相信史迪威，而美國政府亦不欲損害蔣介石身為一國領袖的尊嚴。美國不能失去中國，否則戰爭勢必延長，美國須派百萬軍隊來亞洲犧牲。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羅斯福總統決定召回史迪威。「中、緬、印」戰區一分為二，以魏德邁(A. C. Wedemeyer)為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兼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以索爾登(D. Z. Sulton)為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兼統率該戰區的中國軍隊。魏德邁不能直接指揮中國軍隊，他一定要在蔣介石領導下才可調動中國軍隊。

魏德邁向蔣介石提出整軍計劃，編組三十六個攻擊師和九個防禦師，分別在雲南、貴州、廣西、湘西訓練，美國負責裝備給養，美軍官擔任教練。這個計劃其實是史迪威訓練Z軍計劃的繼續，不過略加修改。要順利執行這個計劃，當然少不了繙譯官。

為了訓練新軍，國民政府徵調了許多大學生入伍當繙譯官。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徵調大學生從軍的計劃進一步落實，教育部引用國家總動員法徵調大學四年級男生參軍，凡參軍的可抵三十個學分，不去不發給大學畢業文憑。據一

九四四年十二月的統計，入伍的知識青年達十二萬人，「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流行一時。

史迪威回國後，索爾登指揮的 X 軍與衛立煌率領的 Y 軍繼續作戰。一九四五年一月，兩軍會師於密芝那以南和龍陵以西的八莫(Bhamo)，雷多公路與滇緬公路接駁成功。一月二十五日，公路通車，二月四日，第一隊自印度雷多開出的車隊抵達雲南昆明。昆明市的軍民大舉慶祝，高舉蔣介石、羅斯福和史迪威的肖像來歡迎由雷多公路建築工程隊總司令 Lewis Pick 少將率領的車隊入城。蔣介石素來對史迪威沒有好感，但他竟宣佈命名這條新路為「史迪威」路，以紀念史迪威的功績。這真是一個歷史的諷刺。

隨著緬甸戰爭結束，兩支遠征軍部隊返回國土進行整編，以備調派到中國大陸的其他戰場向日軍反攻。設在下關的遠征軍後勤部亦告解散。各輜重汽車兵團也回到昆明等候新出勤命令。於是我和其他遠征軍繙譯官向外事局報到，準備接受新任命，踏上另一征途。

第七節：日本投降，中國慘勝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由滇西返回昆明，向軍委會外事局報到，準備接受新任務。這回我不再做汽車運輸部隊的繙譯官而做炮兵部隊的繙譯官。我被調到昆明郊外的軍委會幹訓班野戰炮兵訓練中心工作，協助美軍教官訓練中國陸軍第十八師的炮兵營。第十八師屬第十八軍。第十八軍屬第二十四集團軍。第二十四集團軍是湖南省西部中國軍隊的主力，由王耀武上將率領。第二十四集團軍由第十八軍、第七十三軍和第七十四軍組成。中國陸軍以步兵為主，只擁有少量炮兵。步兵師的武器主要是步槍機關槍和迫擊炮。為了加強中國軍隊的火力，經美軍訓練的中國步兵師都配備一個炮兵營。

野戰炮分為兩類，其一為加農炮(cannon)，其二為榴彈炮(howitzer)。加農炮的特徵是炮管較長，發射出來的炮彈射程較遠，彈道弧形(trajjectory)較低。榴彈炮的特徵是炮管較短、發射出來的炮彈射程較近，彈道弧形較高。加農炮適宜在平原作戰。榴彈炮適宜在山地作戰。中國及緬甸戰區地勢多山，因此美國供應中國軍隊的野戰炮多數是榴彈炮。美國榴彈炮有五種，以炮管口徑分類。八英吋(8-inch)榴彈炮射程為一萬八千餘碼，二百四十毫米(240mm)榴彈炮射程為二萬三千餘碼，都屬重型榴彈炮。一百五十五毫米(155mm)及一百零五毫米(105mm)榴彈炮的射程分別為一萬六千餘碼及一萬二千餘碼，都屬中型榴彈炮。七十五毫米口徑(75mm)榴彈炮的射程為九千餘碼，是輕型榴彈炮。七十五毫米榴彈炮通常可以拆散由騾馬馱運。其他類型榴彈炮多數以汽車拖運。二次大戰後期，為了增加炮兵的機動力，美軍把七十五毫米、一零五毫米、一五五毫米及八英吋口徑的榴彈炮裝在特製的運載車上，成為自動行走(self-propelled)的大炮。

第十八師炮兵營的野戰炮是七十五毫米(75mm)榴彈炮。炮兵營有三個連，每連配有野戰炮四門。連是炮兵的基本作戰單位。炮兵連的英文名稱是

「battery」；步兵連的英文名稱是「company」。第十八師的炮兵營一共擁有七十五毫米（75mm）榴彈炮十二門。有些步兵師配有一百零五毫米（105mm）或一百五十五毫米（155mm）榴彈炮；但配有二百四十毫米（240mm）或八英吋（8-inch）榴彈炮的步兵師則絕無僅有。

負責訓練第十八師炮兵營的人員包括三個美軍軍官，三個美軍軍士和我。最高級的軍官為中校，以下是一名上尉和一名中尉。中尉是華裔美國人，略懂中文。三個軍士之中有一人為日裔美國人，他精通日語，我是他們六人與炮兵營官兵之間的英譯中、中譯英繙譯。炮兵的教育程度普遍比步兵的為高，部份派來受訓的幹部也懂一點英文。他們頗能吸收教官與繙譯官的講解。由於炮兵的作戰常常涉及測量與計算問題，我反要在工餘重溫在學校時的數學，尤其是三角學和幾何學。

一九四五年六月，第十八師炮兵幹部受訓完畢，從訓練中心返回第十八師兵營。美軍教官和我一行七人也同時成為炮兵營的美軍聯絡隊。同年七月，第十八師奉命由雲南基地開赴湘西前線。我們乘坐卡車由昆明經滇東，橫過貴州省至湖南省西部的芷江部署。第十八師的任務為支援其他在湘西的中國部隊向日軍反攻。第十八師炮兵營的任務則是加強第十八師的火力和掩護步兵的前進。七、八月間，我們不斷舉行實彈演習，但始終沒有正式投入戰鬥。原因是踏入一九四五年，日軍在太平洋連續慘敗，美軍越島進攻，一步一步迫近日本本土和中國大陸，為了防範美軍在中國大陸沿岸登陸，駐湘西日軍大部份調往華東，因而湘西無戰事。至八月，局勢急轉直下。八月六日及八日，美國空軍以原子彈轟炸廣島與長崎。八月九日，蘇聯對日本宣戰。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向美、英、中、蘇四同盟國政府表示，只要天皇制度得保存，日本願意向盟國投降。八月十一日，盟國同意日本的要求，八月十四日，天皇敕令日本軍隊停止作戰。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參謀總長梅津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同盟國投降。受降儀式在駛入東京灣海面的美國海軍主力艦密蘇里（USS Missouri）號的甲板上舉行。代表同盟國接受日本投降的是太平洋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元帥。參加受降儀式的還有多名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法國、澳洲及荷蘭的高級軍官。他們都是上將級或中將級的陸、海、空軍軍官。九月九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在湖南省芷江接受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投降。中國的八年對日抗戰宣告結束。

日本投降後，中國國民政府的迫切問題為派兵到淪陷區接收日本人遺留下來的爛攤子。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美國政府任命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協助各戰區的中國軍隊司令官接受當地日軍的投降。第十八師炮兵營的美軍中校聯絡官得到魏德邁的命令，協助第九戰區司令官薛岳接受湖南、江西地區日軍的投降。他選我當他的中文繙譯，又選曾為他下屬的日裔美軍士做他的日文繙譯。一架美國空軍的 C-47 型運輸機把我們三人由芷江送至第九戰區司令部所在地南昌。謁見戰區司令薛岳之後，我們即與第九戰區司令部的人員巡視戰區內各地的日軍兵營、倉庫，安排日軍入戰俘集中營，點收日軍遺下

的文件、武器、彈藥及其他軍需品。在與日本人接觸的時候，日裔美軍上士大派用場。薛岳爲廣東人，第九戰區司令部的官佐也大部份爲粵籍。替他們做繙譯的時候，我不須擔心我的國語發音，因爲我們之間可以用廣州話交談。

江西省的省會南昌與商業重鎮九江都給我深刻的印象。在南昌的時候，我想起唐代文人王勃「滕王閣序」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絕句。滕王閣座落長江支流贛江與撫河的匯合處，背城臨江，是中外商旅到南昌定必一遊的名勝。可惜我到南昌時只看到滕王閣遺址。該幢美麗的古典建築物已毀於戰火之中。年幼時，我只知道有一個地方名爲九江，那就是我的故鄉。到江西後，我才發現有另一個九江。江西的九江市，地當長江中游鄱陽湖之濱，是江西省的門戶和通商口岸。九江附近有廬山。廬山風景幽美，是中國有名的避暑勝地，可惜路過九江時因工作太忙沒有上山參觀。

在南昌與九江的任務完畢後，我返昆明到外事局及美軍總部辦理退伍手續，獲外事局主任何浩若及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魏德邁簽發的繙譯官離職證明書。我和我的繙譯官同僚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復員，再穿上平民的衣服。以後何去何從，是我們要面對問題。

我們的出路有以下幾條：第一是中國政府保送我們公費出國留學。爲此，外事局組織了一個出國留學考試。原則上，凡持離職證書者均可參加。但實際上能出國者爲數甚少。若非達官貴人的子弟，你休想因考試成績優異而得出國機會。第二是繼續讀書。大學未畢業便應徵做繙譯官的，可回到原校或入其他大學求深造。第三是進入美國政府的駐華機構或聯合國的駐華機構做事。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和駐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領事館優先錄用精通英文及與美國政府有淵源的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habilitation and Relief Administration，簡稱 UNRRA）的駐華分署也樂意聘任退伍繙譯官。第四是設法進入國內那些需要較多用外文的政府及工商機構做事。國民政府外交部、海關、外貿公司、銀行等都是理想的僱主。從香港回到國內做繙譯的「番書仔」如不走上上述的幾條道路，多數先返回香港再作打算，我也沒有例外。

還有一條路是再度替美軍做繙譯。一九四六年一月，美國介入中國的內戰。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來到中國與國民黨及共產黨合組「軍事協調執行部」，以促進國共雙方合作，停止戰爭。由於雙方均以自我爲主，談判陷入僵局，「軍調處」迫得解散。爲了要收復在共軍控制下的中國東北地區，國民黨要求美國協助運送駐華南的國軍北上與共軍作戰。因爲視國民黨爲中國的正統統治者，美國答允國民黨的要求。當時還駐在中國的美軍在廣州成立「運軍組」（Troop Movement Group）以執行運送國民黨軍的任務。以上兩個臨時軍事組織聘請了不少前外事局譯員。由於參與中國內戰，這些譯員離職時均感內疚。

結束了繙譯官生涯後，我懷着無限感慨的心情回到老家。大戰告終時，中國在國際社會裏有崇高的地位，與美國、蘇聯、英國同是聯合國的創辦者，被稱爲「四強」。可惜事實上中國並非一個強國。中國政治動盪、經濟破產、民不聊

生，所謂抗戰勝利，實在是一場慘勝。因為抗戰勝利之日正是內戰開始之時。我在復員回家途中曾在廣州短住一個時期。當時廣州市民有「拍錯手掌，燒錯炮仗」的怨言。恃着國力雄厚，各國都需要她救濟，美國以世界盟主和世界警察自居，把她的意志強加於人，甚而干涉別國的內政。美國雖號稱是中國的盟友，但看不起中國人，更不信任腐敗的國民政府。蘇聯也說是中國的盟友。但是在大戰末期趁火打劫，強迫中國讓外蒙古獨立，使外蒙成為共產帝國的傀儡，又在中國東北大肆搶掠。接近黃昏的大英帝國雖然已無力欺侮中國，但仍然抓緊顆皇冠上的寶石—香港，使中國人繼續忍受鴉片戰爭失敗、割地求和的恥辱。以上一連串事情的發生，令我感覺到：一個統一、民主、自由中國的建立，與一個和平公義世界的出現，顯得十分渺茫。

第八節：中國陸軍與美國空軍給我的印象

由於有訓練和裝備中國軍隊，以及陪同中國軍隊到前方作戰的任務，美軍教官和聯絡官不時要偕繙譯官到各中國軍隊單位視察、訪問，對中國士兵的生活、作戰能力及士氣加以調查、研究。因為這緣故，我發現中國軍隊的質素確有問題。以下幾個事例，使愛國的中國人和同情中國抗戰的外國人感慨不已。

大部份士兵是貧農出身，沒有機會受教育，知識水準低下，很難接受現代化軍事訓練。他們的裝備窳劣不堪。身穿的制服布料粗糙，既容易破爛，又不足以禦寒。行軍時鮮有現代化交通工具代步。他們多數穿草鞋走路，沒有鋼盔保護頭顱。他們的野戰口糧是一袋炒米，裝在一個長筒形的布袋內，布袋掛在項背之間。每個士兵發給一枝連刺刀的步槍，少量子彈和兩個手榴彈。中國部隊的武器沒有標準，是「百鳥歸巢式」，有中國、德國、蘇聯、日本、英國、法國、美國製造的槍械和彈藥。

軍隊的薪餉是由軍政部按每一單位的編制人數一次總付給單位司令官，然後再由司令官分發下級官佐和士兵。由於單位的實際人數往往少於編制人數，司令官有機會以「吃空額」辦法剋扣軍餉以自肥。例如每個師的編制為一萬人，但前來領取薪餉的只有六千人。在此情形之下，師長可以把其餘四千人的薪餉中飽私囊。因為「吃空額」的原故，每逢上級前來視察或檢閱，師長便設法濫竽充數。第一個辦法是在互惠情況之下向其他部隊借兵。視察員來到甲部隊時，甲部隊向乙部隊借兵；到乙部隊時，乙部隊則向甲部隊借兵。第二個辦法是強拉駐守地區內的貧民入營，給他們穿上軍服冒充士兵，檢閱完畢即脫下他們的軍服，把他們趕走。有時這些被拉的貧民會留下來，在部隊裏當苦力。

戰時中國資源短缺，物價飛漲，中、下級軍官薪餉微薄，不足養廉。他們不得不營私舞弊，以增加收入。負責採購軍需品的官員最多作弊機會，因此軍隊中有「窮參謀，富軍需」之說。其實做參謀的也不一定窮，只是貪污機會較少而已。做軍需發了財也要懂得「做人」，把部份作弊得來的金錢孝敬上級，或與上級串同作弊。國家窮困和做官的上下交征利，使士兵過着悲慘生活。他們不得溫飽，常受長官虐待，幾乎沒有個人自由。由於長官剋扣薪餉和伙食，士兵營養

不良，軍營衛生環境惡劣，醫藥缺乏，醫療器械殘舊，每年死於疾病或受傷者不計其數。在後方如此，在前方的情況更差。無怪中國老百姓常說：「好男不當兵。」

國民政府軍隊未必全部是像以上各段所描述般差勁。精銳之師還是有的。問題是這些精銳之師有沒有好好地利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保衛大上海的戰爭爆發。迎戰日軍的是當時被認為裝備優良，由德國軍事顧問訓練出來的軍隊。在香港電影院放映的新聞片中，我常常看到頭戴德式鋼盔的國軍在炮火連天之下據守戰壕或衝鋒陷陣。同樣的照片亦在報紙和畫報出現。國軍英勇抵抗有陸、海、空優勢的日軍，堅守上海三個多月，大大出乎歐美軍事觀察家意料之外。上海之役戰況激烈，國軍贏得國際讚譽和同情，但本身傷亡慘重，得不償失，有違長期抗戰，避免無謂犧牲的宗旨。但過度強調避免無謂犧牲帶來反作用。各軍區司令會因此而保存實力，不熱衷於對日軍作戰，甚或擁兵自重，不服從中央命令，成為軍閥。至於國民政府，則以防共為藉口，不把精銳部隊用於抵抗日軍而用以監視共產黨。胡宗南率領的四十萬裝備優良的中央軍長期駐紮於陝北，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一九四二年中國派第五軍和第六軍入緬甸對日軍作戰。由杜聿明率領的第五軍是當時最精銳的中國軍隊之一，屬下有摩托化的第二百師和坦克及重型野戰炮部隊。因為要保存實力，第五軍的坦克和野戰炮遲遲未有開赴戰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宣言，對日抗戰決不作城下之盟。本日起，移駐重慶，「以最龐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對於將近三個月的上海戰爭，備致嘉許：「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朝夕至，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如金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是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當時在香港的愛國同胞看到這個戰報，無不熱血沸騰，對祖國抗戰的最後勝利寄予厚望。但「持久戰」展開後，國軍以空間換取時間，不與敵人在沿海、沿江地帶打硬仗，全國各地戰事漸呈膠着狀態。此後國民政府很少發出像以上宣言般措詞強烈、振奮人心的戰報。「敵人泥足深陷」和「游擊隊敵後活躍」成為戰報主調。後來戰報的語氣再度調低，改為「我軍完成任務，轉移有利陣地。」類似這樣的戰報愈來愈多，令到讀者為之麻木。間中軍方也發出「誘敵深入，殲滅日軍有生力量」的「大捷」新聞公報。但「大捷」不久，國軍即「勝利轉進」，「完成任務，轉移有利陣地」的戰報又再次出現。至於主張「建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的共產黨，則常以「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住我擾，敵疲我打，化整為零，化零為整，旋磨打圈，脫離敵人，猛追猛打，飄忽無常」等字句來形容他們的對日戰爭。一再細讀國軍與共軍的戰報，我總覺得兩者語氣都是模稜兩可，有時更前後矛盾，很難斷定何方是勝利，何方是失敗。真相究竟如何，只有讓歷史來作證了。

西方軍事專家素有「進攻是最佳防守」的概念。美國軍事家尤然。一九四三至四四年，美軍基本上完成了訓練與裝備中國新軍的任務。此時史迪威及其同僚莫不希望中國軍方不再以「保存實力」為藉口，來拖延對日軍的反攻。年青的

繙譯官救國心切，對史迪威等的意見多表贊同。回顧中國八年抗戰的歷史，在無數的大小戰役中，國軍多取守勢，除發動人民在敵後進行游擊戰外，正規軍隊甚少主動進攻。一九三七年共軍與日軍在晉北平型關之戰、一九三八年國軍與日軍在魯南台兒莊之戰、一九三九年九月國軍與日軍在湖南長沙之戰、一九四零年八月共軍與日軍在河北與山西之間的「百團大戰」，以及一九四一年九月國軍與日軍在湖南長沙的第二次戰鬥，都可以說是抗戰期間的軍事勝利。但是這些勝利主要還是由於被動迎戰日軍而導致。真正由於主動進攻，擊破敵人頑強抵抗而取得的勝利，只有一九四三年尾至四五年年初的反攻緬甸之戰。在這個戰役中，中國遠征軍從印度及雲南兩面夾攻日軍。派駐中國遠征軍各部隊的美軍聯絡官及技術人員，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的飛行和地勤人員，以及為這些美國人服務的繙譯官，在反攻緬甸之戰中出了很多力，為中國軍隊的勝利作出重大貢獻。

在緬甸和湘桂戰役中，美國空軍曾扮演重要角色。不過應該指出，在前一戰役，空軍助戰的作用是積極的，而在後一戰役的是消極的。以中國為基地的第十四航空隊和以印度為基地的第十航空隊互相呼應，配合盟國地面部隊在緬甸戰場反攻。美空軍戰鬥機在空戰中壓倒日軍戰鬥機。由於戰鬥機掩護失效，日空軍轟炸機輕易地被擊落。美空軍轟炸機和戰鬥機繼而輪流轟炸和以機槍掃射敵陣及後方，摧毀敵人禦防工事，殺傷敵人士兵，切斷敵人補給。此外，美空軍運輸指揮部的飛機，又自盟軍後方運載軍需品，以空投方式，迅速地、及時地接濟前進中的盟軍，以補輜重兵團汽車運輸隊的不足。以上各種空中支援，大大加速了盟軍反攻緬甸的勝利。湘桂戰場的空軍助戰情況則有所不同。第十四航空隊雖然努力作戰，不斷攻擊前進中的日軍和轟炸敵人的海、陸補給線，但只能延遲日軍的前進而不能阻擋日軍的凌厲攻勢。更諷刺的是連自己的基地也難保。湘桂戰役失敗的經驗，證實史迪威的預言：中國軍隊戰鬥力不提高，即使有美空軍助戰也無補於事。

飛機性能優越，是美空軍壓倒日空軍的一個重要因素。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日本的「零式」(Zero) 戰機所向無敵。但美國製造的 P-40「戰鷹」(War Hawk)、P-38「閃電」(Lightning) 和 P-51「野馬」(Mustang) 型戰機後來居上。日本戰鬥機為了速度和靈活性而犧牲了安全設備。美國注重人命安全，故製造出來的戰鬥機機身堅固，在速度、續航距離及火力方面也有平均發展。美國的 B-25 型「米切爾」(Mitchell) 雙引擎中型轟炸機性能超卓，可作多種不同的用途。一九四三年四月，日本本土第一次受到空襲。執行這個任務的，是從太平洋海軍航空母艦起飛的 B-25 型機。日本空軍缺少四引擎重型轟炸機，但美國則因戰略問題而大量製造。B-17 型「空中堡壘」(Flying Fortress) 和 B-24「解放者」(Liberator) 都是極佳的重型轟炸機，續航距離遠，載重量大，還有充足的自衛武裝，用以迎擊來犯的敵人戰鬥機。B-17 和 B-24 型機對納粹德國進行戰略性轟炸，摧毀德國的國防工業。B-25 和 B-24 型機在中國和緬甸戰場上空也大演身手，重創日軍陣地，攻擊中國大陸沿海的日軍補給線，空襲

日軍佔領下的中國城市及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新型和最大的轟炸機，是四引擎的 B-29 型「超級空中堡壘」(Super Fortress)。一九四四年八月，美國空軍第二十轟炸機隊 (20th Bomber Command) 的 B-29 型機自中國四川省的成都機場起飛，空襲日本。這是 B-29 型機的第一次出動作戰。以後美國在攻佔的太平洋島嶼建築多個機場，作為 B-29 型機大規模空襲日本的基地。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八月八日，從太平洋基地起飛的 B-29 型機以原子彈轟炸日本的廣島市和長崎市，掀起了日本向盟國投降的序幕。

飛行技術優越，是美國空軍戰勝日本空軍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駕駛飛機技術的優劣，決定戰鬥機在空中纏鬥的勝負。飛機與飛機在空中纏鬥千鈞一髮，瞬息萬變。飛行員要有非常靈活的頭腦、快捷和準確的判斷力。戰鬥機的機關槍或機關炮是固定在機頭或機翼上。要擊中敵機，戰鬥機機師就要設法使他的飛機尾隨敵機，使敵機陷入自己飛機的機槍射擊範圍之內。同樣道理，他駕駛的飛機，也要設法飛離敵機機槍的射擊範圍。美國人大多數有開荒者的精神，好冒險，重視個人英雄主義，愛好自由，這些都是優秀戰鬥飛行員所需要具有的條件。日本人忠君愛國，不怕死，強調紀律和對上級服從。日本人可訓練成為勇敢的飛行員，但不一定是頭腦靈活的飛行員。美國人把空戰形容得戲劇化。空軍人員稱飛機在空中纏鬥為「狗鬥」，即英文字所謂「dog fight」，又稱個人擊落敵機五架或以上的戰鬥機機師為「皇牌」即英文所謂「Ace」。

日本人把戰爭形容得神化。他們有空英雄，沒有空中「皇牌」，因為他們認為戰爭是神聖的。他們稱駕駛飛機冒死撞向敵人軍艦的飛機隊為「神風特攻隊」。「神風特攻隊」的飛行員最緊要有勇氣，有智謀還在其次。美國空軍飛行員有勇有謀。以致許多「神風特攻隊」的飛機未撞中美國軍艦之前被美國空軍的「皇牌」或美國海軍的炮火所擊落。

在不作戰或日常工作下班的時候，駐華美軍的生活有時頗為放浪形骸，令人側目，衛道者更為之震驚並加以譴責。打仗時性命沒有保障，故一般美國官兵多有「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愁明日當」的心態。此外，他們還極力體驗孔子所說「食色性也」的生活。在這方面，空軍飛行員的表現尤為顯著，因為一升空便隨時會死。他們之中，有「上帝是我的副機師」(God is my co-pilot) 的說法，把生命交給上帝。在此情形之下，昆明、重慶、桂林、衡陽等地，到處有專門做美軍生意的酒吧妓院。黃昏時，下了班的美軍官兵多在這些地方流連忘返，有勞憲兵大哥催請返回招待所或基地。因醉酒或爭風吃醋，美國大兵和吧女、妓女不時打作一團。載着印有 MP (Military Police) 字樣臂章的憲兵匆忙趕到現場調停和維持秩序，經一番擾攘後才鳴金收兵。

在招待所或基地宿舍內，牆壁上標貼的不是愛國口號，而是性感女郎的照片。長官對士兵此舉毫不介意，有人更認為「標貼女郎」(pin-up girl) 可提高士氣。美軍有隨軍牧師和神父為官兵做宗教崇拜，為患病、受傷和死亡者祈禱。美國政府不時派人從國內到各戰場慰勞軍隊。電影明星、歌星、著名的職業運動員是勞軍的主要成員。電影諧星卜合 (Bob Hope) 和歌星冰哥羅士比 (Bing

Crosby) 等曾到過昆明、桂林、衡陽等重要美軍基地表演。我有幸幾次在場欣賞。美國軍隊尊重士兵的人性，不像中國軍隊般朝夕向士兵灌輸政治思想。

陳納德與史迪威兩人在空軍與陸軍孰重方面鬧意見不在話下。在第十四航空隊基地內更傳出一段令人噴飯的笑話。據說有一次爲了替他下屬打氣，陳納德暗中派遣一架載着醫官的飛機到印度，挑選了十多名經檢驗後證實沒有性病的妓女，然後送她們到中國慰勞美國空軍官兵。史迪威是個虔誠基督教徒。他知道此事後大發雷霆，認爲以軍用飛機來運送妓女供官兵洩慾是非常不道德的行爲，影響美國軍人的聲譽。他以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的名義，下令關閉陳納德的「空軍慰安所」。

第一節：香港重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國統治了一百年的殖民地香港被日軍攻佔，從那天開始，日本取代英國統治了香港凡三年零八個月。日本統治香港的時期是香港歷史的黑暗時期。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向以美、蘇、英、中四國為首的同盟國投降。這正是中華民國政府廢除滿清政府與外國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和收回香港主權的好機會。中華民國政府完全有權派軍隊到香港接受日軍的投降，並同時收回香港的主權。可惜在盟國勝利在望之際，國民政府按着「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方針，把戰後如何消滅共產黨放在首位，而對戰後香港主權問題則漠然視之。由於沒有一套準備接收和管理香港的計劃，日本宣告投降後，派往接收香港的軍隊行動緩慢，被英軍捷足先登。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夏慤海軍少將(Rear Admiral Cecil Harcourt)率領海軍及海軍陸戰隊登陸香港。當時準備接收香港的中國軍隊尚在來港途中。九月一日，夏慤在香港成立軍政府。當時英軍已控制香港各戰略據點和各地區，大局已定。九月十六日，夏慤以香港軍政府總督身份，代表英國政府及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接受日軍投降。遲來的中國軍隊只能派代表參加受降儀式。由廣州開進九龍的新一軍及第十三軍部隊在九龍塘空置的民房駐紮。他們無事可做，在九龍及新界亮相了一個短時期便離開香港。於是香港繼續成為英國殖民地。有人對此感到失望，有人則認為這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香港淪陷時期，我的家人四散分飛。我和四弟子光首先離開香港前往廣西。繼而我們兩人分手，我遠走雲南，西迄滇緬邊境，然後重向東行，經貴州至湖南及江西。四弟來往廣西南北，又往返湖南廣西。父親去世後，姨母接六弟元光和母親往廣西居住，二哥文光則留在香港。日本投降後，戰時離港入中國內地的家人紛紛返回香港。我、子光、元光、母親、文光重叙天倫。令人惆悵的是家中少了父親一人。

香港重光時期，滿目瘡痍，百廢待舉。由於物資極度缺乏，市民的衣、食、住、行等問題非常嚴重。嗷嗷待哺、無家可歸者為數甚多。二哥在香港淪陷時期僥倖能做點小生意維持生計，並保住家園，使我們回港時有棲身之所。三年零八個月的戰爭時期，姨母與二哥對我家的幫助至大。前者給予我、四弟、六弟和母親一條生路。後者使我們在戰後有家可歸。

日軍進攻香港前夕，香港人口有一百六十餘萬人。戰爭期間人口大減，至日軍投降時僅剩下六十萬人。重光後，香港人口迅速回增，至一九四五年底，增至一百萬人。戰爭期間，香港的房屋被炮火及炸彈摧毀不計其數。人口增加使房屋的供應遠遠趕不上需求。因為許多遭破壞的舊樓來不及修理，戰後上市的新樓數目甚少，不論新舊樓宇都是可居的奇貨。擁有物業的人固然發財。舊樓的原來租住人也可以因做二房東或把租住權出讓而獲益。穿插於業主、二房東、租客之間的是房屋經紀。「鞋金」與「頂手費」成為當時房地產市場的流行話

語。「鞋金」指經紀佣金。「頂手費」指舊樓原租客收取的租住權轉讓費。由重光之日開始，樓宇供不應求的現象一直存在於香港。這一現象，為香港製造了許多靠經營房地產而起家的百萬、千萬、億萬富翁。他們發了地產財之後，又將生意多元化，從事金融、製造、貿易、航運、旅遊、通訊、娛樂等事業，間接、直接地促使香港經濟發展。香港社會的財富愈來愈多，但財富的分配，則愈來愈不公平。

美國空軍的「超級空中堡壘」在日本上空投下兩枚原子彈，戲劇性地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得以重光。原子彈是劃時代的科學產品。香港人對原子彈的威力有深刻印象，但多數人對「原子」這一名詞一知半解。他們生性好奇，於是對戰後在市面流行的新貨品都加以「原子」兩字來形容。最先出現的是「原子筆」。「原子筆」其實是一種很簡單和製造成本非常廉宜的書寫工具。它沒有一般鋼筆的鋼筆尖，筆身內有一條油墨管，稱為「筆心」，書寫的時候油墨沿着接觸紙面可以旋轉的金屬球形筆尖流出。「原子筆」的正式名稱應該是「球形筆尖筆」，即英文所謂「ball point pen」。但喜歡把物件名稱簡化及通俗化的香港人，不理會這讀出來不順口的名詞，順口稱「原子筆」便算。隨着電磁學、半導體學、物理化學、有機化學的研究與發展，以半導體、人造塑料、人造纖維做元體或原料的商品愈來愈多。這些商品精巧、實用、價廉。香港人喜愛這些商品，於是「原子粒收音機」、「原子錶」、「原子鐘」、「原子襪」、「原子皮帶」、「原子……」等名詞不脛而走。四十年代香港人的「原子熱」是四十年代以後香港人走向現代化的先聲。

重光初期，香港不但有「原子熱」，也有「美國熱」。被英國統治了一百年的香港，本來一切以英國馬首是瞻。二次大戰後英國國力大不如前，而美國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美國幫助英國打勝仗，又協助英國戰後經濟復甦。英軍收復香港的時候，美國及聯合國善後救濟總處運來大批美國救濟品及美軍剩餘物資，以緩和當時香港物資缺乏的情況。美軍穿着的衣服鞋襪，罐頭食物、牛奶、咖啡、香煙、醫藥等在市面流通。正常商業和航運恢復後，美國的工、農業及科技產品成為最先和最大批的進口貨。美國汽車、機器、家庭電器、科學儀器、化工原料、穀物、肉食、日用消費品幾乎佔了整個進口貨市場。捱了三年零八個月飢餓與窮困的香港人，對物質豐富的美國羨慕不已。

看電影是香港人的一項重要娛樂。戰前他們已對「荷里活」(Hollywood)電影十分熟悉。不少香港青少年在思想上和行為上都受到宣傳美國「牛仔」(cowboy)生活與紐約都市豪華生活的電影所影響。戰後運來香港放映的美國電影更多，有好的也有壞的。我對以下幾部電影有深刻印象。第一部是由 Vivian Leigh 和 Clark Gable 主演的《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該部電影改編自以南北戰爭為背景的文藝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第二部是由 Ingrid Bergman 與 Humphrey Bogart 主演的《北非諜影》(Casablanca)。該部電影描述盟軍在北非向德軍反攻前的間諜鬥智情況。第三部是漫畫家和路迪士尼 (Walt Disney) 製作的卡通片《幻想曲》(Fantasia)。該部電影以卡通

形式來表達多首著名的古典音樂。第四部是由 Esther Williams 主演的《出水芙蓉》(Bathing Beauty)。這是一部以游泳為背景的歌舞片。首映時一連滿座多天，創下戰後初期電影院的票房最高紀錄。荷里活電影把美國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介紹給香港人，使許多香港人由崇英轉為崇美，競相仿倣美國生活方式。香港漸漸成為美國文化的殖民地。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英國的國力日走下坡，但它賴以立國的民主制度及法治精神仍為世界各國所稱譽與效法。英國的法律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議員所訂製的。每個成年的英國人都有權去投票選舉議員或做候選議員。殖民地沒有民主的立法機構。殖民地的法律以宗主國的法律為依歸。香港的法律當然沒有例外。香港沒有民主，但在香港生活的人則受到英國式法律的保障。英式法律制度與英式法治精神是香港政府維繫民心的皇牌。香港重光後，這張皇牌更為重要。從以下一個事例，可見英式法律在香港如何深入人心：香港中、下階層市民喜歡看粵語電影，許多涉及香港社會的電影，劇中的正派人物常以「香港是法治之區」這句話來警惕劇中的壞人，勸他們不要為非作歹。香港政府能夠有效地執行法律，使居民的安全和自由得以保障。香港的法律尤其為有錢人所接受。因為香港法律為有錢做生意和投資的人提供了一套既具體而又簡單、靈活的市場遊戲規則。正當商人固然可因此而得益，投機家更可以因此而「走法律罅」發達。

受盡數千年封建專制統治的影響，中國人多有「誰來統治向誰納糧」的心理。他們慣於接受帝皇式及家長式統治。他們希望出現「賢君」和「父母官」。英國殖民主義者懂得這個中國人心理，刻意在香港華人面前製造以下形像：「英皇就是香港人心目中的賢君」。「香港高官就是香港人心目中的父母官」。二次大戰後，英帝國的威望大不如前，香港市民不再承認伊利莎伯二世是一個賢君。政府的華籍公務員稱她為「事頭婆」。儘管如此，香港政府的高官仍力圖保持「父母官」的形像。他們「俯順民情」和「入鄉隨俗」。基此，自香港開埠以來一直用來處理華人事務的《大清律例》，在香港重光後還繼續實行了一個長時期。《大清律例》容許華人納妾、畜婢，是一套不合時宜和不尊重人權的法例，早應廢除。美其名曰「尊重華人習俗與信仰自由」，本來信奉耶穌基督、不拜偶像的英籍高官，不介意參加華人廟宇的膜拜儀式。他們與紳商父老一齊在神像前燒香點燭，打躬作揖，有時更三跪九叩。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地民智大開，科學發展一日千里。一個真正為人民着想的政府即使不破除迷信，也應該不再鼓勵迷信。香港政府的做法，實有鼓勵華人迷信之嫌。迷信可能使人愚昧。愚昧的人不會造反。這是香港政府的如意算盤。

英國恢復對香港的殖民統治，令到很多愛國家民族的華人失望。但隨着香港重光而來的中國內部形勢發展，更使他們不安。我於一九四五年底由內地經廣州返港。歸途中所見的是一幅傷心的圖畫：道路交通破壞不堪，農田荒廢，鄉村、城市到處是斷瓦頹垣，人民面有菜色，軍政大員貪污腐化，軍警風紀蕩然無存，醞釀已久的國共鬥爭戰火重燃。不知道我是否與戰爭還有未了緣，退伍回

港改換平民服裝不久又再次穿上軍裝。一九四六年初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內戰失敗，國民政府要求美國協助運送在華南的軍隊前往東北，以加強國軍在東北的實力。於是美國政府命令當時還留在中國的美軍在廣州成立「運軍組」，動用海軍艦隻運載中國軍隊前往東北打共產黨。香港是中國軍隊登艦的地點。動用運輸艦的同時，「運軍組」又招請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外事局繙譯官協助工作。當時香港工商業尚未恢復正常，失業人眾，我家的經濟環境也不佳。爲了暫時解決生活問題，我再做繙譯官。我被派到一艘「坦克登陸艦」(landing ship tank, 簡稱 LST) 上工作，負責艦上官兵與乘艦的中國軍隊之間的聯絡。「坦克登陸艦」排水量約三千噸，是美國海軍最大型的登陸艦，可以在大海航行，又可以駛近海灘。抵達灘頭時艦首的兩隻大門打開，讓乘艦的坦克、大炮、卡車及隨從兵員登陸。一九四六年二月至五月，我數次來回香港與秦皇島之間。秦皇島是河北省最靠近山海關的一個港口。中國軍隊在秦皇島上岸後，即直出山海關進入東北遼寧省境內，隨時準備與中共將領林彪指揮的「東北民主聯軍」作戰。

由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我先後參加了三次不同性質的戰爭：香港保衛戰、中國抗日戰爭、中國內戰。這三次戰爭都是我不願意見到的。參加第三次戰爭尤其使我非常後悔。坦白地說，我並沒有懷着愛香港和愛祖國的心情去入伍。做防空救護員和做繙譯官不過是爲了生活。至於有意無意地參加這些戰時工作，對香港和對中國有無貢獻，則見仁見智了。回首當年，真是感慨萬千。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運軍組」解散，我又要另找工作。第一份找到的工作是在香港政府布政司署(Colonial Secretariat)當臨時初級文員，由一九四六年六月做到一九四七年二月。鑒於父親曾着我到外祖父的天福銀號學做生意，和我曾爲美軍服務，離開布政司署後我寫信往美國經營的萬國寶通銀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求職。萬國寶通銀行又名花旗銀行，它的英文名字現已改爲CitiBank N. A.。出乎意料之外，銀行給我的回信不是有職位給我，而是介紹我到天祥汽車行(Dodwell Motors Ltd.)做事。天祥汽車行是天祥洋行(Dodwell & Company Ltd.)的附屬機構，代理英國Nuffield廠的Morris汽車及美國Chrysler廠的Dodge汽車，總經理Cooper先生是美國人。天祥洋行是一間規模龐大、歷史悠久的英國商行，與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 Ltd.)、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 & Co.)等齊名。我在天祥汽車行一做就做了八個年頭。這是香港重光後我的第一份正式職業。以後我兩次轉業，亦與美國及銀行發生關係，何其巧合？

我在天祥汽車行當文員，二哥做生意，四弟回到姨丈的公利行做工，六弟在九龍喇沙書院(La Salle Collage)讀書，母親主持家務，是香港重光初期我家的生活方式。當時香港經濟未臻繁榮，中國局勢尚未明朗。我們只能見一步，行一步，安份守己，於願已足。但是不久，中國局勢急轉直下，香港大受影響，我們一家的平淡生活不能維持。到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零年，我們一家人又再次各處一方。

第二節：中共與「民主人士」在香港活動

二十世紀初葉，由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革了滿清皇朝的命，建立了中華民國。孫中山體會了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法治精神，參考了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的「民有、民治、民享」概念，創作了以「民族、民權、民生」為基礎的《三民主義》。他認為這是救國、救民之道。自命為孫中山忠實信徒的蔣介石領導軍民對日抗戰。他著作了《中國之命運》。他認為這是與《三民主義》一脈相承的救國、救民良方。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但隨之而來的軍閥割據與日本侵華，《三民主義》未能實現。經過八年抗戰，中國勝利了，但這勝利只是「慘勝」。中國政經不修，民窮財盡，內戰爆發。到了這個地步，中國人民不禁懷疑《三民主義》與《中國之命運》是否救國救民的良方。抗戰期間，共產黨發表了「抗日救國綱領」，建議「建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後中共主席毛澤東又發表了一系列他認為足以救國、救民的文章。他著作的《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吸引了不少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他們漸漸離棄國民黨，親近共產黨。在此情形之下，原來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形中變為「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線」。知識份子向國民黨要求民主不得要領。共產黨說新中國成立後，他們將有民主。共產黨稱他們為「民主人士」，邀請他們參加「統一戰線」。

「民主人士」多數是知識份子，包括大學教授、文學家、藝術家、音樂家、科學家、專業人士、新聞工作者、教師、大學生等。他們之中，有些人組織政黨，有些人還是無黨無派。一些對黨內當權派不滿的國民黨黨員，和一些深明大義的資本家也加入「民主人士」的陣營。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收效甚大，爭取到很多「民主人士」的支持。國民黨對中共及投共的「民主人士」深惡痛絕，必欲去之而後快。為了逃避國民黨的迫害，不少共產黨人與「民主人士」南來香港。他們以香港為基地，為爭取中國的和平、解放而積極活動。他們對香港人曉以大義，成功地製造了許多香港的「民主人士」與中共的同路人。

中共與「民主人士」在香港的活動，最容易看得見的是出版報刊和開辦學校。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不久，由「民主人士」鄧文釗創辦的《華商報》風行一時。它的言論傾向中共，與一般的報紙成強烈對比，頗為香港政府的關注。日治時期，《華商報》停刊。香港重光後，該報即恢復出版，直至一九四九年底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若干原來無黨無派、言論公正的報紙也走《華商報》的道路。《大公報》與《文匯報》為其中之表表者。自此以後，香港新聞界出現了分化：一方面是親國民黨或由國民黨作後台的報紙，俗稱「右派」報紙；一方面是親共產黨或由共產黨作後台的報紙，俗稱「左派」報紙；另一方面是沒有參加任何黨派的「中立」報紙。「左」報以「公元一九XX年」為年號；「右」報以「中華民國XX年」為年號；「中立」報以「一九XX年」年號；中間偏右的報紙頁首，則兼印「一九XX年」及「中華民國XX年」。中國一天未統一，報紙用不同年號的現象就一天存在下去。

因為政治立場相反，左報與右報的新聞標題，新聞內容和社論也針鋒相

對。左報說內戰是解放戰爭，右報說內戰是戡亂戰爭。左報認為擁護共產黨，接受共產黨領導，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才算進步，才算革命，才算愛國。於是「進步」、「革命」、「愛國」幾乎成為同義的形容詞。二次大戰期間，西方民主國家同情中國抗日，稱中國為自由世界的一部份，於是有「自由中國」這個名詞。右報認為國民黨反對共產黨，是反對共產黨奴役中國人民，從而使中國人民得到自由。因此，凡是親近國民黨的人物及組織，均冠以「自由」兩字來形容。例如：「自由人士」、「自由工會」、「自由商會」、「自由學校」。民主與自由照理是互相關係、不可分割的。奇怪的是：「民主人士」沒有向中共爭取自由；而標榜自由的國民黨政府，卻不容許人民有民主。中共常常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左報與右報互相攻擊，各自宣傳之下，香港市民為之頭暈目眩，他們的眼睛一時很難「雪亮」起來。

為了響應中共的革命，在香港的共產黨人與「民主人士」共同創辦了達德學院，以培訓建設新中國的人才。該學院於一九四六年開課，校董會主席為李濟深。不少著名學者如蔣伯贊、侯外廬、鄧初民、千家駒、胡繩、沈志遠、黃崇眠等都曾在該學院任教。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前夕，達德即告解散，大部份師生回到內地為人民政府及有關方面服務。繼達德之後，留港「民主人士」又開辦了幾間類似達德，但規模較小的專業學院，如南方學院、中業學院等。這些學院設有文藝、經濟、會計、統計、俄文等學系。南方由林煥平當院長，還聘請了香港大學的馬鑑教授和陳君葆教授為校董。他們兩人偶爾在學院講課，許多人慕名前來聽講。馬鑑的兒子馬臨，在七十年代後期曾為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由於經費短缺，南方與中業都沒有自置校舍，要借用或租用正規學校的地方來上課。開課不到兩年，教育司署以它們設備不足為理由，取消它們的註冊。不少南方與中業的師生，步達德師生的後塵。

為了使「愛國」教育落地生根，「民主人士」終於開辦了幾間全日制的正規學校，包括香島、培僑、漢華三間中學和由親中共的香港工會辦理的勞工子弟學校。這些「愛國學校」有較充足的經濟來源，可以自置校舍，在教育司署註冊為私立學校。它們的課程與一般香港學校的課程差不多，但校長和老師不時向學生灌輸愛國思想，並向學生報導及分析國家大勢。香島、培僑、漢華畢業生不少回國升大學，留在香港的多數在與大陸有關係的文化、工商、金融機構做事。勞工子弟學校的畢業生部份升「愛國中學」，部份到工廠做工。「愛國學校」又稱「左派學校」，它們的課程與活動，受到教育司署密切注意。愛國學校的負責人不少是英文書院畢業生。他們深明殖民地奴化教育對香港青年的毒害，因而對祖國特別熱愛。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是我熟悉的愛國教育工作者之一。他是我英皇書院校友。一九三九年讀完英文中學後，他前往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深造。他在中國內地的所學、所見、所聞，對他的愛國思想有很大啓發作用。培僑、香島、漢華的校監或校長，後來都在香港回歸祖國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角色。

一九四零年代末期，「民主人士」對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感覺到非常失望和不滿。這一情緒，不但從他們的言論中表達出來，也可見諸他們

的文藝創作，其中以電影最能吸引香港市民。《八千里路雲和月》、《一江春水向東流》、《哀樂中年》、《我這一輩子》等幾部針貶時弊的影片，可以說是代表作。前兩部影片描述抗戰時期和戰後初期知識份子的遭遇。他們懷着一腔熱血參加抗戰，戰後生活無着，理想落空。後兩部影片描述老實人到處碰壁，一事無成。這幾部國語電影在香港放映時贏得廣大觀眾的共鳴。香港的粵語片製作者和演員之中，也有不少「民主人士」。他們以嚴肅的態度來拍片，拒絕拍攝粗製濫造的民間故事及神怪武俠電影。代之而興的，是把著名中國文藝作品搬上銀幕。魯迅的《阿Q正傳》；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日出》，均充滿反封建、反專制意識。以這些名著為題材的電影對香港人有很大的教育意義。以上列舉的幾部國語及粵語電影對我有啓蒙作用，一改我以往只歡喜看荷里活影片的崇洋觀念。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大唱「抗戰歌曲」或「救亡歌曲」。日本投降後，唱這類歌曲的熱潮減退。但在共產黨統治的地區，即所謂「解放區」，卻出現了另一種流行歌曲。我無以名之，姑稱之為「革命歌曲」。中共喜歡以「革命」兩字來形容他們的事業。「革命歌曲」之中，有不少是「抗戰歌曲」，或經過修改歌詞的「抗戰歌曲」。長期以來，中國人民貧窮落後，受盡天災人禍之苦。他們通過歌謠來表達心聲。民歌民謠充滿鄉土氣息，容易激起聽眾的民族感情。無怪中共以民歌為一種主要的宣傳工具，爭取中國人民，尤其是貧、下、中農及工人，走向中共的一邊。於是民歌也可以說是「革命歌曲」。一九四零年代後期，從大陸南下的共產黨人與「民主人士」把「革命歌曲」介紹給香港人。當時許多同情中共的工會、學校、社團紛紛組織以唱「革命歌曲」為主的歌詠團，其中以虹虹歌詠團最為活躍。南來「民主人士」之中不少著名音樂家，他們曾受正統西洋音樂訓練，但在創作的時候能夠做到「洋為中用」，編寫了許多以西洋音樂為基礎，但富有民族風格的樂曲。除繼續在香港作曲、指揮樂隊、演奏、演唱之外，他們還替香港培養音樂人才。由馬思聰、嚴良堃等主辦的中華音樂學院頗負盛名，招收了很多愛好音樂和愛國的學生。

英國是奉行資本主義的民主國家，政府容許人民有言論、出版、信仰及作種種政治活動的自由。因此儘管英國政府不歡喜共產主義，它對共產黨的活動還是予以容忍。容忍的底線是活動不能破壞社會秩序和危害國家安全。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故香港政府也按照宗主國的原則來看人民的政治活動。在這個基礎上，香港政府容許中國共產黨的新華通訊社在香港開設分社。新華社的香港分社於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社址設於九龍尖沙咀的一幢三層高住宅式樓宇內，門禁森嚴。名義上，新華社香港分社除搞新聞工作外，還出版雜誌，內容以替中國共產黨及新民主主義作宣傳為主。當時新華社出版的《群衆》雜誌和《今日中國》英文半月刊吸引了許多中、外知識青年。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首任社長為喬冠華。他在香港新聞界頗負盛名，曾在「民主人士」創辦的學院講授新聞學。《今日中國》的編輯和出版是由他和他的妻子龔澎負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們兩人均在外交部任要職。喬冠華曾經是毛澤東、周恩來所倚重

的謀臣策士，七十年代初期曾任外交部長。但是他的晚年生活，因中共內部鬥爭而過得非常坎坷。

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工作，其實並不是搞新聞這樣簡單。早在國共內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已利用香港為華南地區的一個基地。中共在香港的活動長期處於「地下」狀態。一個很重要原因是北京與倫敦有過默契，中共不在香港公開設立黨組織，以交換港英當局禁止國民黨在香港活動。基於此，中共在香港、澳門工作委員會（簡稱港澳工委）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為外殼，公開地或不公開地進行中共的宣傳、統戰、僑務工作。歷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由喬冠華、梁威林、王匡、許家屯以至周南，都有「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兼中共港澳工委書記」的雙重身份。

第三節：港英政府與香港華人對中共解放大陸的反應

英國以武力迫使中國割讓香港的原始理由，是要在中國的版圖內有一個直接由英國控制的基地，以便英國僑民來華做生意。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年鑑》有關香港歷史部份如此說：「要求中國與英國訂立貿易條約……割讓一個小島給英國，使英僑能在其國家蔭庇之下安居樂業。」英國取得香港後，它的在華利益不斷增加。以香港及在上海、漢口等地的租界為基地，英國政府及商人從對華貿易及投資兩方面賺了大錢。英國的能夠這樣做，是有「炮艦政策」作為後盾的。由十九世紀中葉以至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國內發生了多次動亂、革命和戰爭，每次都或多或少地影響到香港的安全與英國的在華利益。所謂「炮艦政策」，當然不是單憑出動海軍，應該還包括陸軍、空軍、海軍陸戰隊及其他武裝力量。換言之，英國要靠武力來保衛香港和保護英國在中國大陸的既得利益。

一九四九年，中共解放整個中國大陸，解放軍來到中、港邊境的深圳。應香港總督葛量洪的要求和以下列三個理由為藉口，當時執政的英國工黨政府調派大量軍隊增防香港，使香港駐軍增至三萬多人，比一九四一年日軍進攻香港時多出一倍。三個理由是：（一）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間，很多中國人從大陸湧到香港，首先是逃避內戰，後來是逃避共產黨。英國崇尚自由、民主，在道義上有責任庇護這些逃難的人。強大駐軍可以安定香港原居民和大陸來港難民的心。（二）香港於一九四一年為日軍所攻陷。這是英國的恥辱。英國輿論與民意不能容忍香港再度失守。（三）一九四九年適值英國舉行大選。容許中共軍進入香港大大地影響工黨的威信，選民將不會支持工黨。

攘外之後還要安內。香港英國當局很怕香港發生內亂，更要提防香港人過於親近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香港政府於是增加警察隊的人數，又把警察的權力範圍加以擴大。二次大戰後解散的後備警察隊、義勇軍、防空救護隊也紛紛組織起來。後備警察隊改稱香港輔助警察隊。義勇軍改稱香港軍團。防空救護隊及其他戰時輔助部隊合併為民衆安全服務隊。因為曾經做過防空救護員及在香港出生，我要向民安隊總部報到。又因為在一間汽車行任職，報到後，我被派到民安隊的汽車運輸組服務。天祥汽車行的經理 Paul Braga 先生是香港出生

的葡萄牙人。他被委任為汽車運輸組的主管。於是我和 Braga 先生有雙重的下屬與上司關係。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間，駐港英軍、香港的正規與輔助警察隊、香港軍團，以及民安隊不時聯合舉行防暴演習。我和 Braga 先生均要向公司請假參加。一九六一年，我患上風濕關節炎，不良於行，辭去民安隊的工作。為了提高香港本地紀律部隊的士氣，和表示英國當局對它們非常重視，七零年代開始，香港政府更正警察隊、輔助警察隊和香港軍團的名稱，在它們的原有名稱前面多加「皇家」兩個字。（順便一提的是香港賽馬會也改稱為「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The Royal Hong Kong Jockey Club），以抬高賽馬會的身價。）英國和香港當局要香港人親近英國和崇拜英國的苦心，可見一斑。

為了進一步加強它的「安內」措施，香港政府立法通過了一系列損害香港居民人權和限制他們行動及集會結社自由的條例。《一九四八年度便利維護公眾秩序與治安條例》，使警察獲得很大權力。除原有職權外，再加上有權以徵用、沒收、拘捕等手段，防止和彈壓暴動。《一九四九年人口登記法》規定除海、陸、空軍和警務人員，及港督特許者，以及不滿十二歲年齡者外，其他人員一律需要到指定機關登記、編號、交相片、打指模，領回一張身份證。居民應攜帶身份證在身，以備警察隨時檢查。在實行身份證制度的同時，當局又通過《驅逐不良份子出境條例》、《社團登記條例》、《公共秩序法例》、《修訂一九二二年的緊急法》等，這些法例使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精神上增加了一種重大壓力，造成五十年代初期香港社會的不安，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以致政府的「安內」措施得不到預期效果。

中共解放大陸，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已成定局之後，在香港居住的中國人即為下列一連串問題所困擾：由共產黨統治的新中國，會否成為一個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中國人民會否有一個美好的前途？香港華人應否回內地參加祖國的革命和建設？留在香港的人可以為祖國的革命和建設做些什麼事？中共會否解放香港？香港若被解放，社會經濟與居民生活會有什麼變化？變得更壞？更好？抑或保持不變？我們對中共的救國諾言和治國能力有無信心？簡言之，共產黨是好、還是不好？不同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年齡，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經濟情況的人，對以上的問題有不同反應。

事業有成，有錢、有地位的香港世家，是香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他們要維持現狀，不願見到中共解放大陸後繼而解放香港。從大陸來到香港定居的有錢人家和國民黨高官，最怕共產黨清算，自然說中共不好。從大陸來到香港定居的高級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以及香港本地的高級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考慮多多，部份對中共有信心，部份則否。大陸解放前已在香港工作的國民政府金融、工商、航運機構人員，對中共解放大陸的反應相當複雜。有些人始終不信任共產黨；有些人因對國民黨失望而宣佈起義。起義的人部份回國服務，部份堅守在香港的崗位。不起義的人多數自動辭職，另尋出路。很多因打敗仗而未能及時隨大隊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官兵也來到香港。他們聚居於九龍半島近維多利亞海港東面入口鯉魚門的山坡上，過着艱苦的生活。該處原名吊頸嶺，後來

改稱調景嶺。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稱這些落難官兵為「忠貞之士」。這些「忠貞之士」痛恨共產黨，後來又因不能到台灣歸隊而埋怨國民黨。很多教育水平較低和理解能力較差的香港原居民頭腦簡單，容易被國民政府及香港政府的一貫反共、非共宣傳所影響。他們怕中國收回香港，因為一來到香港，中共便會實行「共產」，使香港人的身家化為烏有。與此同時中共也會實行「公妻主義」，破壞中國人的傳統道德。有錢和有地位的企業家、律師、醫生、大學教授等也未必完全反對共產黨。他們之中，不少是抱着「與人為善」的態度來看中共的表現，希望中共真正能解放中國，能遵守他們為人民服務的諾言。一些與大陸有密切生意關係的商人為了個人利益也會擁護中共。

香港既是英國殖民地，也是一個極端商業化的社會。白種英國人大資本家是香港的主宰。英國人欺負華人，資本家剝削工人乃意料中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香港華人的民族覺悟大為提高。民族覺悟的提高，首先表現於工人階級身上。香港是個航運中心，有許多輪船公司，輪船公司僱用大批海員。香港的公用事業是私營的，有專利權。這些公用事業規模龐大，也僱用很多勞工。輪船公司、中華電力公司、香港電燈公司、香港電話公司、中華煤氣公司、香港電車公司、九龍巴士公司、中華巴士公司等大機構的工人都各有組織嚴密的工會，他們早有反對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剝削中國人民的思想。這一思想令到他們傾向於自命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他們是後來成立的香港工會聯合會（簡稱工聯）的骨幹。工聯的會員佔全港工會人口的最大百分比。四十年代末期與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工人運動，如集會、遊行、罷工等引起政府的關注，若被認為有政治色彩，政府即採取鎮壓行動。不少工人領袖被監視、拘捕、驅逐出境。

一些工人不參加工聯，卻參加了港九工團聯合會。後一工會由親國民黨的工人組成，簡稱工團。工團自稱為一個信奉自由的工會，故又被人稱為「自由工會」。在言論及行動上，「自由工會」往往與工聯針鋒相對。由於人數較少，自由工會未能在香港的工人階級中發揮可觀的影響力。其實既沒有參加工聯，也沒有參加工團的工人，即所謂「沒有組織工會的工人」才是全港勞動人口（有別於工會人口）的大多數。他們是香港草根階層的代表，他們終日營營役役，為口奔馳，沒有許多餘暇去談論政治或參加政治活動。年紀較長和飽經世故的，更常懷有「天下烏鴉一樣黑」的心理。這些中、下階層的人士以「等着瞧」的心情來看共產黨與國民黨誰是誰非。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

比較年青的人多數有好奇心，有求知慾，喜愛新鮮事物，對現實不滿，富幻想。受過相當教育和對時事關心的青年人，更有「把舊的和不合的東西砸碎」的使命感。他們的性格近似共產黨人的性格。因此共產黨在大陸的勝利引起他們的共鳴。他們的愛國家、愛民族熱忱也油然而生。不少愛國青年自動自覺地，或通過先行者的推薦、介紹，參加了中共與「民主人士」在香港的種種活動。有人更返回內地直接投入革命建國工作。他們體會到香港當局的一貫反共立場，和在香港重光後制訂的一系列限制居民自由的法例的用意。但是為了理想和

民族大義，有人甘冒被政府監視、拘捕、驅逐出境的風險。他們的心態與工運領袖的心態如出一轍，有「在香港參加革命建國或回到內地參加革命建國」的心理準備。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有五顆星。一顆大星和四顆小星。大星代表共產黨，第一顆小星代表工人，第二顆小星代表農民，第三顆小星代表知識份子，第四顆小星代表民族資產階級。香港是個工商業城市，自然有資本家與工人。而工商業的運作、研究和發展，則少不了知識份子。香港的工人、資本家和知識份子想做四顆小星中的三顆小星者大不乏人。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四、五十年，愛國的工人、資本家和知識份子在革命建國的洪流中飄流，為無情的歷史巨浪所沖擊，或浮或沉。他們之中，有人為了正義和理想奮不顧身，以致犧牲了生命；有人受不住考驗半途開小差，做了逃兵；有人無辜遭殃，抱恨終生；有人身不由己，不得不硬着頭皮繼續苦幹；有人懷才不遇一事無成，悔不當初；有人在歷盡滄桑之後，心如止水，最後做個「無為」的人；但亦有人能發展所長，對國家民族作出貢獻，做有「有為」的人。至於有沒有人最後不顧一切，做個「無所不為」的惡人，則非我所能想像了。

第四節：我們兄弟的家國情懷

四十年代後期，中國內戰發展到決定性階段，中共解放大陸，國民黨敗退台灣。此時香港居民無不關心本身的安危，每天追看報紙，以了解局勢的變化。關家兄弟自入學校讀書以來即有愛國思想，對時事特別關心。香港報紙分左、中、右三派。中間派外表公正，但不時有偏左或偏右的傾向，視乎局勢的變化而定。左派與右派報紙則針鋒相對，各從自己的政治立場出發，進行宣傳，千方百計爭取讀者。隨着解放軍節節勝利與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我們發現左派報紙的新聞報導愈來愈準確，社論愈來愈有說服力。與此相反，右派報紙的新聞報導則愈來愈含糊，社論愈來愈辭窮理屈。因為這原故，我們漸漸認同中共的革命，進一步思維愛國的定義。我們的一輩在學校讀書時，適值日本大舉侵華，繼而香港淪陷。我們嘗過祖國被外人欺侮的恥辱，三年零八個月日軍的殘酷統治，和在中國內地走難與戰亂之苦。我們都渴望看到一個獨立、富強的新中國。

香港重光後，二哥文光一直是供養母親和弟弟們的主力。他要在社會做事，賺錢養家。他與一位培正中學同學陳澤堂開設天生油莊，經營食油批發零沽業務；又與另一位培正同學許家穎及兩位朋友余汝倫、余汝文兄弟開設一間經營洋貨進口的商號，名為威利公司。天生油莊舖址在中環永樂街、威利公司寫字樓設於中環德輔道中二百五十四號三樓，即我們兄弟四人與母親同居的地方。二百五十四號是一座四層樓高的舊式商業樓宇，本來不適宜作為住宅，但戰後初期香港鬧屋荒，做小生意的人家「前舖後居」乃尋常事。二百五十四號三樓前半部於是成為威利公司的舖址，後半部則是我家人居住的地方。

由於本錢短少及香港經濟欠佳，二哥的生意不如理想。他要付出很多時間和精力才能賺夠錢來維持天生與威利的開支和養家。當時我在天祥汽車行做

文員，要勤力工作，搏上司青睞，才能升職加薪，從而減輕二哥的負擔。四弟子光在姨丈的公利行打工，既要作文書、簿記工作，又要到輪船碼頭及貨倉收貨、提貨、送貨，薪水微薄，工作辛苦。六弟從內地返港後，先在廣州嶺南大學附設的香港嶺南中學讀書，初中畢業後轉往天主教辦的喇沙書院就讀。六弟的學費由二哥負責。因為家庭環境不好，二哥不能完成大學教育，我和四弟沒有完成中學教育。我們三人都引以為憾。因此我們希望六弟能學有所成。

二哥的人生經歷比他的幾個弟弟為多。他體會到商場人人唯利是圖、爾虞我詐、投機取巧、大魚吃小魚。我從內地返港不久，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獨裁，貪污、腐化、無能給我深刻的印象。我希望新中國不會出現一個以暴易暴的政權。基本上，二哥和我都是非常愛國的，但是我們的愛國思想比較理智，而我的思想更有點獨特。由於出身英文書院，做過美軍繙譯，又在洋人的機構做事，耳濡目染，我雖不致媚外，但心理有崇洋的潛意識，在所不免。因此儘管左派報紙刊印的中國內戰新聞愈來愈真實，我還是要參看英文報紙來印證。新華社的電訊不算數。中央社的報導不可靠。我相信的消息主要來自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和法新社。我工餘閱讀的刊物以英文刊物居多，包括：《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時代週刊》（Time）、《生活畫報》（Life）、《大眾科學》（Popular Science）等。

我們兄弟四人的學生生活，以四弟子光的最坎坷。他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時間最短。從英皇書院讀至第三班（即低我一班）便因日軍攻佔香港而輟學。自從跟姨母及姨丈在柳州福利行和香港公利行做事之後，他不但看到中國內地人民困苦、官商勾結大發國難財，也看到香港社會的世態炎涼。這些不合理現象激發了他嫉惡如仇的思想。他對現實非常不滿，要尋求改革，尋求進步。儘管公利行職務羈身，他仍設法抽出時間去閱讀足以啓發他的思想，和增加他對社會和國家大勢的認識的報刊和書籍。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國內戰爭形勢發生急變。子光一直是《華商報》和《正報》的忠實讀者。《華商報》由民主人士創辦。《正報》是中共廣東區委機關報，以楊奇為社長兼總編輯。此外，他又閱讀許多有關哲學思想、社會發展、共產主義、新民主主義的書籍。他不時向我講述他的閱讀書報心得，還勸我跟他一起閱讀，以了解中共的革命，和建立較正確的人生觀。自此以後，我的讀書習慣有所改變，既看我一向愛看的英文書報，也看進步的中文書報。

五十年代香港出售進步書報的書店有華商報社，新民主出版社，智源書局，由生活、讀書、新知三間出版社合組的三聯書店，和歷史悠久的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等。我不時到這些地方「打書釘」。所謂「打書釘」就是只看不買，進入書店店舖後，從書架取出來閱讀，讀完放回書架，第一天讀不完，第二天，第三天再來，只要不把書籍弄殘，書店職員不會前來干涉。經再三閱讀，認為滿意之後，我有時也把書買下來。

子光也像我一樣，因為受到文光二哥的影響而喜愛古典音樂。因此除多讀進步書報外，他又設法認識既好古典音樂又有進步思想的朋友。結果他參加了

中華音樂學院。通過音樂，潛移默化地誘導青年對中共革命認同，是中華音樂學院、虹虹歌詠團，以及其他類似的音樂、文藝團體在香港的任務。子光加入中華音樂學院後，不時與兄弟們談論中國前途及中共革命問題，認為香港的青年人應發奮向上，為新中國作出貢獻。個性天真、未經世故的六弟元光，很快被子光影響。當時他在九龍喇沙書院讀書，課餘時間很多。因而他有機會去追求他的興趣和理想所在。在子光的感召下，元光也閱讀各種親中共的書報。他喜歡讀進步作家黃秋耘主編的《青年知識》，在該雜誌的讀者通訊欄中結識了另一位讀者，通過該讀者的介紹，元光參加了虹虹歌詠團。

一九四九年廣州解放前夕，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號召愛國人士深明大義，參加革命建國。不少中華音樂學院師生和虹虹歌詠團團友，因此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或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年紀輕輕的以加入青年團為主。自從子光和元光參加了音樂院和歌詠團之後，我和二哥文已注意到子光在公利行無心工作，元光在喇沙書院無心向學。鑑於大勢所趨，人各有志，我們對兩個弟弟的思想與行動未有強加干涉。結果他們先後回到中國大陸參加革命建國去了。他們兩人離家後，母親泣不成聲，在一個長時期內每天以眼淚洗臉。二哥和我心情矛盾、沉重、無可奈何。一心想栽培子光的姨母和姨丈大感意外和失望。

比起其他香港愛國青年，子光和元光的離家返國還是順利的。他們臨行前，儘管母親十分不高興和依依不捨，我和二哥還是給他們鼓勵，並送給他們每人一隻手錶及一些現錢以購買行裝和生活必需品。我們母子、兄弟之間沒有惡感，只有深厚的親情。但是大部份子光和元光的同志，則是與家庭鬧翻後出走的。四十年代後期至五十年代初期，由於思想、意識形態、政見的分歧，甚至對立，不少夫妻因而反目，父母與子女脫離關係，兄弟姊妹疏遠，朋友絕交。這是在時代洪流沖擊下產生的社會悲劇。

大陸解放後，我雖然長期以香港為家，但無時不懷念祖國及國內親人，想為祖國及親人做些好事。四十年代後期中國大陸形勢的演變，與四弟和六弟的回國參加革命，對我是一個鼓勵，一個號召。一九五零至五一年，我到民主人士創辦的南方學院讀俄文，希望藉此尋找為新中國服務的途徑。我每天從天祥汽車行下班後前往上課，結識了不少思想前進的朋友。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南方學院停辦，部份師生回到內地工作或求學。一些南方校友到了專為培訓革命幹部的廣州南方大學進修。南方大學對我頗有吸引力。但我始終沒有入學。原因之一是我的思想還未搞通。我没有四弟和六弟般堅強意志，捨不得放棄天祥的職位。原因之二是思想進步的朋友勸我留步。他們認為我既然有良好英文根底，又有與美國人及英國人工作、交往的經驗，與其感情用事，倉猝走入內地，不如留在香港多多吸收商業知識，多多了解國際政治、經濟情況，從而為自己創造更佳的報國條件，等到祖國認真發展對外關係時才去為祖國服務還未算遲。他們言之有理，我接納了他們的建議。至於以後我如何走我的愛國道路，或有沒有走我的愛國道路，則有待事實證明了。

第五節：韓戰與禁運

一九四三年，美、英、中三國領袖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會議，商討有關擊敗日本及處理日本殖民地問題。他們聲言，在日本投降後，自一九一零年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應獲得獨立。當時蘇聯政府同意這決定。一九四五年夏季，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接近尾聲。美國向蘇聯建議，在朝鮮獨立之前，美、蘇兩國軍隊暫時佔領朝鮮半島，蘇軍佔領北部，美軍佔領南部，以北緯線三十八度為分界。蘇聯接受此建議。由於種種原因，一個獨立、統一的朝鮮國遲遲未能成立。代之而興的是兩個朝鮮國。在三八線以北的名為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實行社會主義；在三八線以南的名為大韓民國，實行資本主義。前者簡稱為北韓，後者簡稱為南韓，兩國政府各自稱為朝鮮半島的唯一合法政府。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韓與南韓開戰。六月二十七日，美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動議，由聯合國派兵援助打不過北韓的南韓。當時在安理會否決權的蘇聯正在杯葛聯合國，沒有代表出席會議，美國動議獲通過。七月七日，以美國軍隊為主力的十五個聯合國成員國部隊支援南韓對北韓作戰。十一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隊以「志願軍」形式援助北韓。朝鮮半島的戰爭發展成為一場國際化的戰爭。戰爭的主角本來是北韓與南韓，後來變為中國與美國。前者參戰的藉口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後者參戰的藉口是「維護世界和平，反對共產中國侵略大韓民國」。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聯合國大會（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通過了第 500(V) 號決議（Resolution 500 (v)），以「禁運」方式來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從而削弱中國的作戰能力。

「禁運」的由來，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方冷戰的爆發。所謂東方，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所謂西方，指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為了防止共產主義蔓延，西方民主國家成立了對共產國家出口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s to Communist Countries），簡稱COCOM。該委員會的作用是各民主國家互相關照，不以有戰略價值的物資輸往蘇聯及其附屬國。COCOM的成員包括：比利時（Belgium）、加拿大（Canada）、丹麥（Denmark）、法國（France）、希臘（Greece）、西德（W. Germany）、意大利（Italy）、日本（Japan）、盧森堡（Luxemburg）、荷蘭（the Netherlands）、挪威（Norway）、葡萄牙（Portugal）、土耳其（Turkey）、英國（United Kingdom）及美國（United States）等十五個國家。為了使對華禁運制度化，COCOM的十五個成員國於一九五二年秋季成立了中國委員會（China Committee），簡稱CHINCOM。CHINCOM的禁運物資名單與COCOM的大致相同。聯合國對華禁運之前，在一九五零年十二月，美國已單獨對中國全面禁運。CHINCOM只是禁止戰略物資輸往中國大陸。而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禁運，則所有物資均包括在內。當時中、美關係惡劣，可想而知。COCOM與CHINCOM持續了數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三次大戰始終未有爆發，但國際間的冷戰則無可避免。COCOM與CHINCOM是民主國家對付共產國家的一種重要冷戰武器。

朝鮮半島的戰爭是一場富爭論性的戰爭。美國人說，他們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方」打了一場吃力不討好的「有限度」戰爭。停火後，朝鮮人民繼續在戰爭陰影下過活。他們的國家仍然一分為二，不能統一。英、法、加、澳等國家跟美國出兵打仗，實在有點被人牽着鼻子走的感覺，在戰爭中扮演嘍囉角色，被中共譏諷為「美帝走狗」。二十世紀初葉，八國聯軍陷北京，中國人爲之痛心疾首。二十世紀中期，中國軍隊在朝鮮力撼以美國爲首的十幾個國家的聯軍，中國人不禁吐氣揚眉。一九五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伍修權出席聯合國會議時以中文發言，打破了以往中國外交家在國際會議席上以英文發言的慣例。中國人對此莫不引以爲榮。在香港的中國人雖然有不同的政治立場，但他們不能不對上述的中共軍事和外交表現表示欽佩。不過事後檢討，中共的參加朝鮮戰爭，也給中國帶來負面影響。因爲與西方國家爲敵，而「蘇聯老大哥」的「無私援助」又似是而非，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受阻礙，在外交上被孤立。許多香港人爲中國的參加韓戰而感到不值。有人形容中共此舉無異替蘇聯火中取栗。

一九四九年前後，英國加派軍隊駐守香港，以防中國人民解放軍越過邊界。因爲中、英兩國相安無事，在香港的三萬英軍沒有什麼作爲，直至韓戰爆發後才大派用場。英國政府調動駐港軍隊參加聯合國軍在朝鮮作戰。這是最後一支以香港爲基地與中國軍隊打仗的英國遠征軍。隨着國力日漸衰弱，英國無力負擔龐大國防開支，不得不逐步削減海外駐軍。韓戰停火後，從香港出發的遠征軍他調，不再留港。一九五八年，香港海軍船塢關閉，駐港英艦大部份撤退到新加坡。一九六六年，英國政府宣佈放棄「蘇彝士以東」國防政策，蘇彝士運河以東的軍事基地逐一關閉。自此以後，英國不能再靠軍事力量來威脅中國，以維持香港殖民地的地位。與此同時，爲了戰略及其他理由，中國容忍香港殖民地的「現狀」(status quo)。香港人都知道，這是一個政治現實。

不知道是早有預感，抑或是做生意時間的巧合，韓戰爆發之前，中共已在香港搜購了不少戰略物資，並把這些物資運返內地。一九五零年初，廣大華行向天祥汽車行購買五十部美國佳士拿(Chrysler)廠製造的道奇牌(Dodge)卡車是一個例子。這是天祥汽車行戰後開業以來的第一宗大生意。天祥汽車行爲道奇牌卡車的香港及華南總代理。大陸的中國人對道奇牌卡車有深刻印象，因爲抗戰時期在滇緬公路行走的汽車，多數是這個牌子的卡車。廣大華行與天祥汽車行的買賣合約是由我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因爲當時我在天祥汽車行任職。上述五十部道奇牌卡車不過是中共在香港搜購戰略物資的一部份。廣大華行也同時向在香港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和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代理商購買汽車。除了汽車代理商之外，經營汽車零件、汽油、西藥、化工原料、電訊器材的商人也和中共駐港代理人大大做生意。姨丈經營的公利行因爲賣出了許多汽車零件及汽車輪胎而賺大錢。當時子光已離開公利行，親友們都爲他可惜，因爲所有公利行的職員在年底都分到可觀的花紅。

廣大華行(China Mutual Trading Co.)外表是一間香港註冊公司，其實是當時中共外貿部部長盧緒章領導下的一個商業機構。朝鮮戰爭前後，它從外國

進口或自香港本地市場採購了大量戰略物資，以不同方式由香港運入內地。出於愛國熱情，不少原來在英資或其他外資洋行任職的香港華人捨棄高職豐薪，轉而加入廣大華行服務。我認識不少廣大華行職員，因為他們不是前英皇書院同學便是前外事局繙譯官同事。馬景洪、方日球、譚廷光是我的同班學友。楊升業及楊升漢兩兄弟是前繙譯官，方日球也是前繙譯官。五十年代後期廣大華行宣告結束。它的業務由新成立的華潤公司(China Resources Co.)取代。華潤公司是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機構，是多間中國進出口公司的香港代理。華潤接收了前廣大華行的職員，包括以上五人。馬景洪、楊升業、楊升漢在華潤集團服務至久，直至八十年代中期退休。方日球於六十年代後期離開華潤。譚廷光又名譚志遠，他的哥哥譚幹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外事老幹部。譚志遠在華潤工作不久便被派往天廚味精任要職，大力發展天廚廠香港分廠的業務。天廚原是中國民族資本家創辦的工業，天廚味精曾風行全國及東南亞各地。解放後，人民政府把天廚發展為一個規模宏大的綜合企業，除生產調味品外，還生產化工原料。香港紡織廠所用的漂染料，大部份由天廚供應。譚志遠與我和朱克強等幾位前英皇書院同學很友好。一九九二年他往印尼旅行，不幸因心臟病逝世，聞者惜之。我和朱克強則失去一個老友。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聯合國通過對華禁運的議案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國作出種種貿易管制辦法，以防止中共取得戰略物資。英國追隨美國，香港追隨倫敦。由於環境特殊，香港的貿易管制比較寬鬆。不過在執行的時候還是要考慮到倫敦與華盛頓的意願。香港政府制訂了《進出口貿易條例》(Importation and Exportation Ordinance)，由工商署(Commerc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負責執行。根據該條例，凡是被有關當局認為有戰略價值的物資，在進口時，進口商首先向工商署領取一份「必需品證明書」(Essential Supplies Certificate，簡稱ESC)證明有關貨品乃供本銷之用。憑ESC，進口商才得到工商署簽發的進口證(Import Licence)。原則上，此批進口貨只供本地留用，但有時可以再出口，輸往工商署認可的地區。中國大陸當然不是認可地區。

為了更有效地對華實施經濟制裁，西方國家不但不賣戰略物資給中共，而且不讓中共賺取外匯以發展經濟。其辦法是防止大陸貨品直接外銷西方國家，或經香港貨轉口外銷西方國家。因為這緣故，香港政府工商署設立了「產地來源證」制度。凡是由香港輸往西方國家的貨物，必先取得由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及香港中華總商會簽發的「產地來源證」(Certificate of Origin)，才可獲得工商署簽發的出口證(Export Licence)。有了來源制度之後，一些西方國家如不欲與中共貿易，來自中國大陸的產品自然不能進口。美國對香港貨物的進口，管制更為嚴格。由香港輸往美國的貨物要先取得上述工商機構簽發的「綜合產地來源證」(Comprehensive Certificate of Origin)。「產地來源證」簡稱CO。「綜合產地來源證」簡稱CCO。CO與CCO的分別是：前者只證明有關貨品是在何處出產，例如在香港或中國大陸出產。後

者不但證明有關貨品是在何處出產，而且證明有關貨品的原料是在何處出產。由此可見，一件貨物即使是在香港出產，但如果原料產自中國大陸，則該件貨物不能去銷美國。美國海關常常因此而與香港出口廠商為難。

聯合國對華禁運，使許多經營戰略性物資進出口及轉口的商行生意大減，公利行是其中之一。因為不能再賣汽車零件給中國大陸的用家，公利行改行做凍肉及雪糕生意。由於對這兩個行業都不熟悉，以前賺來的本錢很快便蝕光。天祥汽車行本錢雄厚，規模宏大，失去了華南市場後仍有一個潛力甚大的香港市場。憑 ESC，它繼續進口汽車在本地銷售。一些聰明和富冒險精神的香港商人與中共取得聯絡，先以私人名義向天祥或其他汽車行購買汽車，詐稱在香港自用，繼而設法將汽車拆卸，化整為零，偷運出境，前往大陸。除汽車外，許多其他種類的戰略物資也通過走私方式流入大陸。香港政府及美國駐港情報人員不斷監視這些走私活動。有時人贓並獲，但漏網之魚為數不少。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失敗的走私者要被罰款或坐牢。成功的走私者不但發了橫財，而且被中共視為對國家有貢獻，得到「愛國商人」的雅號。香港及美國政府知道這些人是誰，但拿不出證據來檢舉他們。在此情形下，有關當局唯有把他們列入黑名單，伺機對付他們。正如一般香港商人，成功的走私者也有發財立品的心態。他們要改邪歸正，捐錢做善事以爭取社會同情和政府的好感。他們希望港府向英廷推薦，提名為英國皇家獎章的領取人。他們不償所願，得不到 MBE、OBE、CBE 勳銜，因為港府不賣他們的賬。但是時移勢易，這些成功走私者後來不再希罕英女皇的賞賜。他們發了財後繼續與中共大做生意，明的和暗的都有，成為「愛國資本家」。對中共貢獻特大的「愛國資本家」被委任為「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中共使他們名利雙收。不歡喜他們的人則稱他們為「紅色肥貓」。

韓戰與禁運除了為香港製造了一批「紅色肥貓」，但同時造就了更多面向海外的工業家。朝鮮戰爭爆發之前，轉口貿易是香港經濟的支柱。聯合國對華貿易禁運之後，因為失去了中國大陸這一個重要轉口市場，香港商人要另謀出路。四十年代後期開始，從大陸移居香港的中國人愈來愈多。貧窮的大陸人要打工過活。富有的大陸人要繼續他們的事業。香港商人要改變他們的生意路線。在此情形之下，對整個香港社會來說，發展勞動力密集、並以產品外銷為導向的輕工業頗合時宜。最容易取得成果的輕工業是紡織業。原因之一為富有大陸移民之中不少是紡織業世家。原因之二是二次大戰以後，西方先進國家的工業界開始向高科技工業進軍，不再熱衷於發展輕工業，紡織業更被視為一種「夕陽工業」。由於大陸工人及香港工人的勤勞，大陸企業家的豐富工廠管理經驗，和香港商人的善於適應環境，香港出現了一批又一批能夠賺取外匯的工業家。在這個基礎上，香港經濟持續發展。韓戰與禁運使香港因禍得福。

第六節：全世界最大的領事館

香港位於中國大陸邊緣，從歷史、地理、文化角度來看，它是中國的一部份。但從政治現實來看，由一八四二年至一九九七年為止，它是英國殖民地，是

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環，不受中國管束。四十年代中葉至五十年代初期，日本與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相繼退出中國大陸，但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與工商界念念不忘這佔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市場。他們又感覺到，百多年來被外人侵略的中國是一個「沉睡的巨人」。「巨人」睡醒的時候，整個世界將為之震驚。他們一方面藐視中國，另一方面又重視中國。因為香港的特殊地理、政治環境，他們都利用香港來瞭望中國的動態與研究中國的國情。於是「中國觀察家」(China watchers)雲集香港。表面上，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工作主要是美國與香港之間的事務，但實際上，領事館內好些部門是為瞭望中國的動態與研究中國的國情而設。

美國的外交事務，通常由兩類官員負責。第一類為外交官員(diplomatic officer)。第二類為領事官員(consular officer)。外交官員多數派駐海外的大使館或公使館。他們的任務主要是代表美國政府與駐在國政府談判，協商兩國之間的問題；代表美國政府簽訂與駐在國政府的雙邊條約；注視、分析、研究駐在國的國情，並向美國政府彙報。派駐大國的最高級外交官為大使，他主持大使館的事務，派駐較小國家的最高級外交官為公使，他主持公使館的事務。協助大使或公使執行任務的外交官有各級秘書，例如一等秘書(first secretary)，二等秘書(second secretary)和三等秘書(third secretary)。其他政府部門也會派官員駐大使或公使館以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他們被稱為參贊(attache)，例如政治參贊、經濟參贊、文化參贊、軍事參贊。軍事參贊的另一中文譯名為武官。

領事官員派駐領事館。領事館為比大使館或公使館低一層次的外交部駐外機構。美國的外交部稱為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外交部長稱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大使館或公使館設於外國的首都，領事館設於外國的重要城市。在較大城市的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領事館的基本任務為促進本國與駐在地之間的雙邊貿易發展；處理駐在地人民前往本國的旅遊、經商、留學、移民申請，並發出有關簽證；保護本國公民在駐在地的安全和利益，並處理他們的護照及有關事宜。總領事館的領導人為總領事。領事館的領導人為領事。總領事與領事以下還有副領事。外交官員與領事官員在名義上分工，但隨着環境的變遷，外交事務與領事事務往往分不開。因此一些外交官員要兼做領事官員的工作，一些領事官員又要兼做外交官員的工作。

早期駐香港的美國外交機構為領事館，規模不大，當時設有的領事部與商務部已足夠執行領事館的基本任務。隨着中國政局的演變，美國政府愈來愈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把駐港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總領事館的規模異常龐大，除原有的領事部(Consular Section)與商務部(Commercial Section)之外，還有政治部(Political Section)，經濟部(Economic Section)，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陸、海、空軍聯絡處，難民救濟部，以及財政部和農業部的駐香港辦事處等多個專業性部門。總領事館及其附屬機構的地域活動範圍不但包括香港，也包括澳門和中國大陸。駐港總領事為公使級外交官，任滿調職時往往升格為大使。總領事館有美籍和非美籍職員數百名，

其中有外交官員，領事官員，陸、海、空軍軍官，海軍陸戰隊隊員，政治及經濟分析員，繙譯，各種技術人員，文員和職工。

領事部的工作是比較公開。美國公民在香港的合法活動，例如旅遊、經商、做事、求學等均受到領事部的照顧。領事部又是非美國公民由香港前往美國經商、做事、旅遊、求學、居留等活動的甄別機關。商務部主理美國與香港之間的雙邊貿易、投資，及其他經濟事務。

經濟部與政治部的工作地域不限於香港，澳門與中國大陸也包括在內。觀察、研究與推測中國大陸的經濟、政治發展更是工作的主要內容。在這兩個部門工作的美籍及非美籍經濟專家及政治情報分析員為數不少。經濟部的工作人員不時與香港的學者及財經界人士接觸及交換意見。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多數負有秘密任務，富神秘感，透明度極低。

美國新聞處的沿革與活動值得一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的一個為戰爭而設的新聞部（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拍攝了宣傳電影及印刷了宣傳刊物分送海外各友好國家，以宣傳美國的政策。一九五三年，國務院成立了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簡稱 USIA），一方面承接了戰時新聞部的工作，一方面在原有基礎上擴大新聞宣傳活動範圍。新聞處在國外的英文名稱為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簡稱 USIS，美國駐外國的大使館均有美國新聞處的分處。由於環境特殊，駐香港總領事館也有新聞處分處之設。

新聞處的工作種類繁多，包括：出版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廣播、電影製作和公開放映、舉辦音樂會及各種文娛活動表演會、設立圖書館及文化藝術中心等。此外還要聯絡世界各地的文藝、學術界，不時與他們開研討會，以交流經驗。新聞處向總統及國務卿彙報世界各地政府及人民對美國的觀感及意見，作為總統及國務卿釐訂外交政策的參考。

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簡稱 VOA）無線電廣播，是新聞處的一項有力宣傳工作。它以四十多種語言向世界各地播送的新聞、音樂、教育節目有無數聽眾。所有節目的內涵當然以宣揚美國文化及外交政策為重心。美國之音無遠弗屆，在中國大陸各處都可收聽。因此中共視之為「美帝」毒害中國人民思想的一個絕招，千方百計阻撓人民收聽。

附設於香港總領事館的美國新聞處甚為活躍。它出版的《今日世界》雜誌及多種刊物四處寄發贈閱。市民亦可前往新聞處圖書館閱讀或索取。香港市政局圖書館尚未出現前，新聞處已設立了幾間圖書館為市民服務。我不時到這些圖書館看書或借書。新聞處備有許多電影片與音樂錄音盒帶供大眾借用欣賞。學校、社團如有要求，電影放映隊隨時出動到學校、社團的所在地免費提供放映服務。新聞處的種種宣傳方式贏得不少學校、社團、出版界、文化界、演藝界的良好反應，潛移默化地使他們有認同美國文化和認同美國外交政策的思想。親共報章咒罵新聞處為「美國文化特務」並不偶然。

財政部駐香港辦事處有一個特殊任務。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後，美國對中

國大陸全面禁運，並凍結了中共在美國的資產。凡是與中國大陸有生意來往的人都有幫忙中國與美國為敵的嫌疑。他們被列入財政部的「指定國際人士」(designated nationals) 名單內。名單內的個人或商號不能與美國人或商號做生意。他們在美國的資產也受到凍結。財政部駐香港辦事處時時留意香港人有沒有與中共通商，一經被查出，他們就會被列入「指定國際人士」名單之內。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美兩國交惡，不少香港商人和商號成為「指定國際人士」。「指定國際人士」名單被香港人稱為「黑名單」。做生意的人都要戰戰兢兢，避免成為「指定國際人士」。

農業部駐港辦事處的工作分為兩部份。其一是檢驗從香港輸往美國的農產品的質素，看看這些農產品會否影響美國國內消費者的健康。其二是觀察和研究中國大陸的農業生產情況，一方面將搜集得來的資料進行研究，並把研究報告送回美國農業部參考；另一方面就是將搜集得來的資料直接送交農業部處理。

關於難民救濟部和陸、海、空三軍聯絡處情形，下文有較詳細報導。

第七節：難民與移民

中共解放大陸後，無數中國難民湧入香港，有貧有富，有工人和企業家，有國民黨官員和士兵，有專業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不一而足。初時這些大陸難民懷着過客心理在香港暫作逗留，一俟大陸局勢平靜便返回老家。但是事與願違。他們返回老家之日遙遙無期。五十年代香港經濟因韓戰關係陷入低潮，禁運嚴重地影響傳統的轉口貿易，導致許多人失業。剛從大陸來港的人所受的打擊更大。做生意破產和生活無着者比比皆是。為了對因害怕共產黨而逃出大陸的中國人表示同情與關懷，美國政府於五十年代中期制訂了一個「難民救濟計劃」(Refugee Relief Program, 簡稱 RRP)，讓那些想去美國過新生活的中國難民得償所願。

「難民救濟計劃」實施之前，美國政府及有關方面已有一個救濟中國難民的計劃。不過這計劃的救濟對象只限於知識分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很多在美國留學和做事的華人知識分子對新中國寄予厚望，本着愛國家愛民族的熱忱，他們捨棄美國的富裕物質生活，回到貧乏的中國大陸參加建設新中國。但是事情總有相對的一面。大陸被共產黨解放後，很多國內知識分子為了學術自由或逃避政治迫害走出國門。香港是他們出國的第一站。流亡到香港的中國知識分子部份在香港安身立命，部份希望遠走高飛。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不少德國科學家因不滿納粹主義而流亡到美國。成為美國公民後，他們為美國的國防與科技發展作出重大貢獻。有鑒及此，美國有關當局也希望逃出大陸的中國知識分子能為美國效力。於是成立了救濟大陸流亡知識分子協會，以爭取中國的精英。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替協會登記和甄別流亡知識分子，並向他們提供種種援助。對於那些欲前往美國做事和定居的，領事館給予移民簽證；對於那些不急於去美國或寧願留在香港的，領事館替他們在香港找職業。

由於「中國觀察」的任務愈來愈繁重，領事館需要更多精通中、英文及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情況有認識的人。此類人才在香港不易求得。因此滯港的中國大陸流亡知識分子多人成為領事館的「中國觀察家」。他們之中有幾個是前國民黨軍委會外事局的繙譯官。

執行「難民救濟計劃」的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難民救濟部成立後，包括流亡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大陸難民如欲從香港前往美國安身立命，他們一律要經過難民救濟部的審批。經審批後，他們以「難民」身份移民美國。救濟部的主任及調查員都是美國國務院的合約僱員，但不是外交官。他們以「難民專家」身份進駐總領事館。每名專家有一名華籍職員從旁協助工作。華籍職員的職銜為處理員(processor)，其意思是協助「難民專家」做繙譯、調查、研究工作。由於申請移民美國的中國難民為數甚眾，難民救濟部需要在香港僱用多名處理員。

到一九五五年中，在天祥汽車行服務已有八個年頭的我靜極思動。我對汽車行裏面的秘書、文牘工作感到厭倦，想轉換一下工作環境。恰巧這時我遇上一位戰時繙譯官同事。他正在美國總領事館難民救濟部任職。他問我有没有興趣做處理員。鑑於領事館職員薪水比天祥給我的薪水更多，而繙譯、調查、研究工作又是我所長，我乃辭去天祥職務到領事館工作。難民救濟部主任欣賞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美軍服務的紀錄。我於一九五五年七月到難民救濟部上班。

難民移民申請的個案處理不簡單。從難民救濟部接收申請書至申請人第一次到領事館與調查員會面，至調查員與處理員出外作多次的反覆調查、訪問，再三約見申請人問話，以至調查總結報告書的完成，整個過程需時約一個半月，快者約一個月，慢者兩個月或更長時間。申請人與調查員會面時要答覆許多問題。除在申請書上填的個人資料如姓名、年齡、出生日期和地址，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的名字及年歲，以及在香港的住址或通訊處等需要在問話時覆述無訛外，申請人還要提出三個諮詢人的姓名、地址，以便調查員前往訪問。此外，最重要的是在與調查員首次與以後數次會談中，申請人要答覆一連串敏感及尖銳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涉及申請人在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經歷和感受。例如：家鄉或在大陸居住的城市何時被共產黨解放，當時的情景若何，以後又怎樣？在「土改」、「三反」、「五反」、「大鳴大放」及其他政治運動中有無參與或受害？有没有被共產黨「洗腦」，被「洗腦」後信不信共產黨？在大陸中共統治下如何謀生？做過什麼職業？有無加入共產黨、解放軍、共青團或其他中共組織？為何要離開大陸和如何離開大陸？為什麼要來香港？到港後如何生活？在香港有何親友？為什麼選擇移民到美國？在美國有何親友？到美國後有何打算？以上各問題的答案，很難在一次與申請人會面或單獨與申請人談話中完全得到。調查員與處理員要作多次正面的和側面的調查訪問，直至認為滿意為止。所謂正面調查，指與申請人、他的家人、他提名的諮詢人談話。所謂側面調查，指在申請人不知不覺之中另外找一些調查對象談話，以進一步了解申請人的背景與意圖。

受盡專制封建統治的中國人民最怕見官。因此到領事館與調查員見面並接受問話的申請人多有誠惶誠恐心理。領事館是「官府」，調查員是「官」，擔任繙譯的我是「師爺」。會見時，調查員與申請人的談話內容主要是印證申請書上所填報的資料與申請人口供的資料是否相符。但是由於前者是「官」，後者是「民」，前者有權有勢，後者患得患失，雙方是在不平等的地位談話。很少申請人能保持鎮定。在調查員步步進迫，諸多挑剔，務求從申請人口供中找出破綻這一形勢底下，即使沒有說謊，後者仍會膽顫心驚，訥訥不出口，詞不達意，從而引起前者的不必要疑惑，窮追猛打。看見這種情景，我內心非常難過，甚至激憤。我同情那精神上受傷害的申請人，為他們的低聲下氣，求人救濟，希望將來能寄人籬下而嘆息。對於一些調查員的傲慢態度，在中國人面前頤指氣使，我自然十分反感。但是由於調查員與處理員是主、從關係，而我又是美國人的僱員，看到不平之處我亦無可奈何。調查員與申請人的對話，有點像法官審訊疑犯。這是一個難忘的印象。

在訪問諮詢人及側查對象時，調查員比較有禮貌，因為他要誘導被訪者說老實話，不要為申請人的過去及目前的情況作掩飾。諮詢人的說話總不免有多少保留。他們會多說申請人的好話，少說申請人的壞話，否則他們不會被選為諮詢人。側查對象不是申請人的代言人，沒有替後者說好話的必要。因此他們可能有意或無意地說出對申請者不利的話。這些話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我們姑妄聽之。說申請人品德不好，有不良嗜好，沒有學識與正當的謀生技能，懶惰，生活不檢點等都會是對申請人不利的話。最對他不利的話是說他曾經是共產黨員，做過解放軍，曾經幫助共產黨壓迫人民，來到香港後仍與中共保持關係。五十年代初期及中期，是美國朝野最反共的時代。調查員若聽到這個對申請員不利的消息，他將會大傷腦筋，極力求證。倘若這消息是真的，而申請人在口供中隱瞞事實，他移民美國的希望定告落空。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句話不是中共專有。申請人如果在調查員面前認錯，表示今後堅決離棄中共，他的移民申請可能獲得難民救濟部的重新考慮。美國政府歡迎變節共產黨員移民美國，尤其是那些曾居高位的變節共產黨員。

為了慎重從事和對申請人公平，除申請人和他提名的諮詢人外，我們還要和五、六位側查對象談話。我們要將所有談話扼要地記錄下來。並要憑常識、經驗與理智來判斷那些談話可靠，那些談話不可靠。把談話資料歸納起來，去蕪存菁之後，我們就有寫作調查總結報告的根據。在我們的總結中，我們提出申請人應否獲得移民簽證的建議。救濟部主管批閱總結報告書後，將之轉交領事館專責辦理移民簽證的領事部。於是申請人個案的處理便告完成。

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中國大陸難民經香港移民美國，開了後來香港居民愈來愈多移民外國的先河。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居住於這個英國殖民地的人民，就有了難民心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如是，從大陸來到香港定居的亦如是。前者看到大陸同胞的苦難，居安思危，不知道何時輪到他們做難民。後者多有做難民的經驗，想起來猶有餘悸，不知道將來會不會再做難民。隨着中國大陸

形勢的急劇變化，因為不想做難民，許多香港人都想移民外國。有錢有辦法的未雨綢繆。有人送子女到外國留學，畢業後設法取得當地的永久居留權，繼而入籍做公民，為父母親及其他親屬做移民的開路先鋒。有許多原來只做香港本地和中國大陸生意的商人，也設法把業務分散，在外國開設分店，或在外國投資房地產、股票、證券，以備一旦移民，在外國有立足之地和再度發展事業的機會。不少在美國領事館工作的華籍僱員也憑着他們與美國政府的關係爭取移居美國。有人打算在退休時移民；有人通過「難民救濟計劃」或其他途徑提早移民。

第八節：美國陸、海、空三軍聯絡處

美國政府於五十年代中期訂制的「難民救濟計劃」主要用以協助由大陸逃亡到香港的中國難民移居美國。該計劃為期三年，由駐港總領事館執行。不過總領事可在斟酌情況之後，提早完成任務。換言之，我在難民救濟部的工作只屬臨時性質。因為這原故，我一上任後即俟機請求調職。一九五六年七月，駐港總領事館的美國空軍聯絡處（U. S. Air Force Liaison Office）有一個繙譯員的空缺。在難民救濟部工作了一年零一個月的我馬上前往聯絡處求職，結果如願以償。

入美國空軍聯絡處做事後，我首先要了解這個機構的沿革。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戰爭只在陸上和海上進行。當時美國只有陸軍和海軍，沒有空軍。第一次大戰後期，隨着武器和戰術的發展，美國遠征軍開始以飛機來協助地面部隊作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的陸軍和海軍都有自己的航空隊。二次大戰後期，陸軍航空隊陣容強大，基地遍佈歐、美、亞、非、澳洲。戰爭接近尾聲時，陸軍航空隊脫離陸軍，成為另一武裝力量，與陸軍及海軍分庭抗禮。於是美國有陸軍、海軍和空軍部之設，以鞏固國防。為了減少三軍之間的工作重複和避免互相猜忌、競爭，美國政府於一九四九年成立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以統籌兼顧三軍的運作。

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簡稱DOD）乃係由好幾個不同功能的部門合組而成，包括：部長辦事處（Office of the Secretary），陸、海、空三個軍部，聯合參謀部（Joint Chiefs of Staff，簡稱JCS），以及各混合戰鬥部隊（Unified Commands）和各特種戰鬥部隊（Specified Commands）。

國防部長辦事處內有國防部長、副國防部長、助理國防部長、國防研究及工程主任、國防法律顧問等高級行政人員。他們都是平民身份。

陸軍、海軍、空軍部各有部長及參謀長。部長是平民，參謀長是軍人、參謀長為所屬軍部官兵的首領。海軍參謀長不稱參謀長（Chief of Staff），而稱海軍作戰總長（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聯合參謀部即參謀長聯席會議。會議主席由總統任命。他可能是陸軍、海或空軍的高級官員。陸軍參謀長、海軍作戰總長和空軍參謀長是會議的成員。海軍陸戰隊司令列席會議，會議討論到陸戰隊事務時，他也是會議的成員之

一。聯合參謀長會議主席在任期間，他的職位凌駕於各會議成員之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美國的最高級軍人。

混合戰鬥部隊是一個由幾個兵種組成的戰鬥部隊，例如擁有陸、海、空軍的太平洋部隊（Pacific Command）。特種戰鬥部隊只有一單一兵種，例如戰略空軍部隊（Strategic Air Command）。戰鬥部隊司令員在執行其任務時要受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指引。

美國陸軍的運作有四個功能部門。第一是人事（Personnel）；第二是情報（Intelligence）；第三是作戰及計劃（Operations and Plans）；第四是後勤（Logistics）。以上四個部門簡稱為 G-1, G-2, G-3, G-4。海軍和空軍也有類似部門之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以「世界警察」自居。了解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的重要性，美國陸、海、空三軍的情報工作規模龐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美國已有一個相當完整的武官制度，在駐外國大使館內派有武官或軍事參贊（military attache），從事在駐在國搜集情報。史迪威曾經是一名出色的武官。他是一個「中國通」。中共解放大陸後，美國駐華大使館由南京遷台北，派駐大使館的武官自然不能在大陸搜集情報。由於香港地位特殊，自五十年代初期起美國即利用香港作為一個進行「中國觀察」的重要基地。美國政府不能名正言順地派遣武官進駐香港總領事館，因為根據國際外交慣例，只有大使館才有武官處之設。於是它想出一個名堂來進行它的武官式情報活動。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內的美國陸軍聯絡處、美國海軍聯絡處和美國空軍聯絡處由此誕生。按照美國的軍事情報系統，三軍武官或聯絡官分別向陸軍部、海軍部及空軍部的情報主管負責。陸軍部的情報主管為副陸軍參謀長（Deputy Chief of Staff for Intelligence），海軍部的情報主管為海軍情報處處長（Director of Naval Intelligence），空軍部的情報主管為助理空軍參謀長（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for Intelligence）。身為美國空軍聯絡處繙譯的我則向空軍聯絡處主任負責。

在香港的美國陸、海、空軍聯絡官，當聯絡處主任的都是上校級，當助理主任或副主任的是中校或少校級。他們是有外交人員身份的情報人員。搞有外交性質的聯絡工作是手段，搞搜集、分析、傳遞情報工作是目的。協助他們執行任務的，除繙譯外，還有行政及技術人員、行政主任辦公室文員、雜工，以及聯絡官的汽車司機等。行政及技術人員、秘書等是美國人；繙譯、文員、雜工、司機等則是本地僱員。

聯絡工作大致上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禮貌上的聯絡。聯絡官們官式拜訪香港軍、政首長；出席香港軍政當局舉辦的慶典、酒會、宴會。與此同時，他們又邀請香港軍、政首長參加聯絡處舉辦的酒會、宴會。這些活動，不但可以聯絡感情，而且有加強雙方日後在公事上合作的作用。第二部份是行政事務的聯絡。美國陸、海、空軍人員、飛機、戰艦經過香港或在香港逗留需要多種服務。這些服務的安排，例如飛機在啓德機場降落、起飛；軍艦在香港海域停泊；飛機和軍艦在香港加添燃料、給養、維修；各種軍事人員因公在香港工作時所需的種

種生活上和公事上的服務等，有賴聯絡處與香港有關方面的聯絡與合作。第三部份是情報上的聯絡。按照國際外交慣例，武官可以在駐在國搜集公開的與該國有關的政治、經濟、軍事資料。空軍聯絡官所需的軍事資料當然是有關駐港皇家空軍的實力和香港的機場及其他航空設施。這些資料的大部份是英空軍當局願意提供的，因為美國與英國是盟友。一九四九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是美國和英國的假想敵。美國和英國的情報當局都想盡辦法，利用香港的特殊政治及地理環境，來搜集有關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美國空軍聯絡官和皇家空軍情報人員互相交換有關中共空軍的資料，互相取長補短。

搞好與香港社會各界的公共關係，是三軍聯絡官任務之一。三軍聯絡官除了應酬軍政界外，還要參與各種社交活動。他們申請做皇家賽馬會、哥爾夫球會、遊艇會、扶輪會、獅子會、外國記者會的會員；經常出席這些會社的宴會、酒會、午餐演講會；又不時作為東道主招待工商界、財經界、文化界。在這些活動的過程中，通過言談或其他方式的接觸，聯絡官伺機搜集有軍事價值的情報。

如何有效地進行情報工作，聯絡官和助理聯絡官均責無旁貸，他們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前者較注重對外工作，要花較多時間與精力在聯絡及公共關係方面；後者較注重內部工作，要花較多時間與精力在處理情報資料及寫作情報報告(intelligence report)方面。情報報告有定期性的和不定期性的。定期性報告類似新聞報導，要掌握時間因素；不定期報告屬深入分析、研究性質，每次一個專題。情報報告寫好後，正本送華盛頓美國空軍總部負責情報的助理空軍參謀長，副本分送大洋美軍司令部、日本及韓國美軍司令部，以及其他有關軍事部門。

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為掃視多份報紙。這些報紙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在香港出版的左派報紙如《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晶報》等。第二類是在香港出版的非共報紙如《英文南華早報》、《英文虎報》、《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工商日報》、《香港時報》等。第三類是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報紙，如全國性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以及地方性的報紙如《南方日報》，及各省市出版的日報等。五十年代初期，所有大陸出版的報紙均不准出口，當時中共與資本主義國家為敵，大陸報紙刊載的新聞和文章都被認為有國家秘密，內容不得外洩。在香港的「中國觀察家」偏偏就是想知道這些「秘密」。空軍聯絡處是「中國觀察家」之一。香港是一個什麼東西都講供求的資本主義城市。既然有人想看大陸報紙，報販們便千方百計從大陸走私報紙出境。大陸報紙成為報販們「可居」的「奇貨」。當時香港出版的報紙，每份售價不過五角。但從大陸走私出來的報紙售價奇昂，最高時每份索價百餘元。大陸報紙的供應極不規則，時斷時續，送到我書桌的時候已有明日黃花之感。儘管如此，空軍聯絡處及其他「中國觀察家」機構仍不惜工本搜購。我的上司認為，大陸報紙的部份內容極有戰略情報價值，而這些內容是香港報紙所無或只有略為刊載的。

我每天看多份報紙的作用，是從中搜集與美國空軍戰略情報有關的資料。我的上司給我一個非常廣泛的資料搜集範圍。凡是與人民解放軍空軍的現狀

和發展潛力有關，以及與美國空軍的東北亞、東南亞戰略有關的新聞報導和專題文章均要受到注意。看報的時候，我首先掃視標題，繼而選出有用的新聞報導及專題文章，再而將每段新聞報導及每篇專題文章摘要地或全部譯成英文，並將譯文交給助理聯絡官，作為他寫作情報報告的根據或參考。助理聯絡官寫好報告後，交給聯絡官審閱。兩人都要在報告上面簽署，以示負責。

與空軍現狀有關的情報，包括：空軍將領的個人資料如出身、教育及知識水準、戰績、在人民解放軍和中國共產黨內的地位，以及他們的行踪與言論；空軍部隊的編制、單位的番號和人數；飛行和地勤人員的訓練；飛機數目和類型；空軍單位的作戰和調動紀錄；空軍基地的位置與設備；飛機的供應與維修；軍械、彈藥的供應與貯存；空軍作戰演習；空軍與陸、海軍聯合作戰演習；空軍與防空部隊聯合作戰演習等等。

與空軍發展潛力有關的情報，包括：科學家在數學、物理學、天文學、氣象學、空間技術等各方面的研究；高等教育的發展與科技人才的培訓；製造飛機、火箭、導彈及各種空對空、空對地、地對空武器的研究與發展；製造核彈的研究與發展；製造人造衛星與宇宙飛船的研究與發展；電子計算工業、電訊工業、石油工業、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與國防建設計劃的釐訂與執行情況；飛機製造業的發展；新製成飛機的試飛；新製成武器和彈藥的試射、試爆。

與美國空軍的東北亞、東南亞戰略有關的情報不但包括以上兩大類，還包括以下項目：中國大陸沿海港口的位置和設施；內河港口的位置和設施；工業密集區域的位置；大型火力及水力發電站的位置；油田和礦場的位置；民用航空線的路線；鐵路、公路、內河航道的路線；各省各地區的地形；各省、各地區上空的天氣與氣象。

中共素有「帝國主義勢力還在包圍我們，我們要提高警惕」的心態。為了避免國家機密外洩，中共對公開發表的新聞及文章多數加以過濾。過濾後，有關新聞及文章的文字內容可能模稜兩可或詞不達意，使讀者思想混淆，因此我要懷着「在雞蛋中找骨頭」的心情去閱讀大陸報紙，務求從字裏行間找出真相。我的上司常常提醒我在讀報時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其意亦在此。由於立場不同，和對中共的宣傳有成心，非共報紙刊登大陸消息時有很大保留性和選擇性。我要閱讀多份親共與非共報紙的原因，就是要把它們所報導的同一則新聞作一比較，看看誰報導得較為正確。

聯絡處要找尋的情報資料範圍如此廣泛，內容如此精細，單靠報紙是不行的。因此除了訂閱多份報紙外，又要到市面搜購多種有戰略情報價值的雜誌及書籍。做完每天的讀報、譯報工作後，我便到各大書店瀏覽「打書釘」。未加入聯絡處之前我已有「打書釘」的習慣，加入聯絡處之後，這一習慣更大派用場。三聯、商務、中華等出售大陸報刊、書籍的書店經常有我的踪跡。《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各省市出版的畫報，各省市出版的地圖，各大城市的電話簿，各種普及性與專業性的科技雜誌，各大學與專上學院的科學教科書與論文集，中國科學院的各種刊物，都是我搜購的對象。初時我以私人名義但拿着聯絡處的

錢，去購買這些書籍。因為愈購愈多，和要取得折扣，後來索性以聯絡處的名義購買。三聯書店按月把新書名單寄來，並給聯絡處特別折頭，以示優待。為了進行「中國觀察」，聯絡處每年花了不知多少錢來搜購上述書籍、刊物。除了空軍聯絡處之外，陸軍聯絡處、海軍聯絡處也極力搜購各地大陸報紙和刊物。

我搜購的雜誌及書籍，有許多是專業性和與科技有關的，由於科技知識有限和書籍內文冗長，我繙譯這些印刷品的時候每有不盡不實之感。聯絡處購置了多本由大陸中國科學院及台灣中央研究院編撰的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名詞、術語的中、英對照辭典。憑這些辭典的幫助，我有時可以把一些科學書籍的內文摘要地譯成英文。但始終沒有辦法將內文全部譯出，因為我的工作時間不容許我這樣做。我的上司亦諒解我的工作困難。基此，大部份科技書籍的繙譯工作只涉及書名和內容目錄的繙譯。畫報是大眾化的讀物。刊印在畫報內的照片和圖片附有淺白的說明文字。把這些說明文字全部譯成英文沒有大問題。搜購的雜誌、書籍及其他印刷積存有相當數量之後，聯絡處就設法把它們寄運到美國空軍總部。空軍總部和有關方面的專家將會鑑定這些雜誌、書籍和印刷品有多少戰略情報價值。

陸、海、空三軍聯絡處的任務基本上相同。差異之處在於情報資料的搜集上各有各的重點。陸軍聯絡處較注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整體活動，尤其是政治性的活動。他們要更多有關中國共產黨的資料，和解放軍各高級將領以及各軍區的資料。海軍與空軍聯絡處則較注重專業性與技術性的資料，尤其是與海軍本身及與空軍本身有較直接關係的資料，彼此經常交換意見和工作經驗。我們三個譯員除做公事上的繙譯外，又要做半公、半私性質的繙譯工作。國防部高級官員不時來到香港視察、訪問。公幹之餘他們多喜歡尋求一些有東方色彩的享受。於是聯絡官們便叫我們做繙譯的陪同高官及隨行家眷四處遊覽。賣古董的嘍囉街、香港仔海鮮舫、港九各地的廟宇、新界鄉人的祠堂、接近中港邊境山頭的瞭望亭、以及港九、新界、離島的名勝古蹟，留下了不少我們的足跡。

很少香港人知道美國在香港設有陸、海、空三軍聯絡處。但很多香港人注意到美國海軍軍艦常常在香港海港內出現。五十年代以前，停泊在維多利亞海港的軍艦多數是扯「米」字旗的英國皇家海軍戰艦。五十年代之後，扯「米」字旗的英國軍艦漸漸減少，扯「星條」旗的美國海軍戰艦則愈來愈多。香港人對美國海軍的第一個深刻印象是五十年代中期美國海軍戰鬥艦新澤西號（USS New Jersey）訪港。排水量四萬多噸、備有十六吋口徑大炮九門、艦身長八百多呎，艦殼吃水深三十多呎的新澤西號，是米蘇里號（USS Missouri）戰鬥艦的姊妹艦。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美國陸軍元帥麥克阿瑟代表盟軍在米蘇里號甲板上接受日本的投降。因為食水太深，新澤西不便駛進維多利亞海港，只好停泊在鯉魚門之外。為了顯示美國海軍威力及搞好美國與香港的關係，新澤西號艦長請油麻地小輪公司派小輪自香港中區碼頭接送香港市民出鯉魚門，登艦參觀。傳媒為此大事宣傳，好奇的香港人趨之若鶩，小輪公司乘機做了一筆可觀的生意。自此以後，「不要像新澤西般食水深」的口頭禪流行了多時。廣州話所謂「食

水深」有兩個負面意義。其一是說做生意的人利潤太深，對買家不公平；其二是做經紀或做買賣的人收取佣金或回扣太多，形同中間剝削。

繼新澤西來港引起哄動之後，更多美國軍艦訪港。美國第七艦隊的航空母艦、巡洋艦、驅逐艦、潛艇、運輸艦等在台灣海峽、南中國海、和越南海域活動了一段時間後，多數來到香港作短暫逗留，一方面補充糧食、燃料，另一方面讓艦上官兵，以及從越南戰場上撤退下來的地面部隊官兵，得以在號稱「東方之珠」的香港休憩、作樂一番。我有幸在空軍聯絡處工作，並與海軍聯絡處的繙譯及聯絡官們友善。每有新型或巨型軍艦來港，我都有先睹為快的機會。此舉不但增廣知識，也使我少年時常常想參觀戰艦的夢想成真。我參觀的軍艦之中，最大的是航空母艦巡邏騎兵號（USS Ranger）。該艦比新澤西號更重，排水量達六萬多噸，載有各類型的噴射及螺旋槳推進戰機七、八十架，甲板上有兩條飛機升降的跑道，一條與艦身平行，另一條與艦身成斜角。有兩條跑道的好處是當一架飛機起飛時，另一架飛機可以同時降落。巡邏騎兵號艦身長達一千呎，比新澤西號更長。由於艦身太長，駛進維多利亞港內可能阻礙船隻的航行，該艦只能停泊在港島西區青洲以北較寬闊的海面。

第七艦隊各種軍艦裝載的官兵，以航空母艦為最多，約達五千名。其次為巡洋艦，約一千名。較小的艦隻如驅逐艦、潛艇等，每艘所載的官兵分別為二、三百名及一、二百名，來港休憩的軍艦通常結成小隊前來。最普遍的是由航空母艦一艘和驅逐艦四艘組成的縱隊（flotilla）。航空母艦是縱隊的主力，驅逐艦用以保護航空母艦不受敵人潛艇偷襲。巡洋艦、潛艇、運輸艦等也經常結隊來港。據粗略估計，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每隔一、兩個星期便有美國海軍艦隻載着數千至一萬名官兵來港休憩。他們來到香港觀光、購物、享受，給香港的酒吧、舞廳、戲院、餐廳、酒店、百貨商店帶來可觀的生意。他們是大量美國平民來到香港旅遊的先驅。

一九六一年，國防部進一步統籌三軍的運作，成立了國防情報處（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 DIA），以集中處理陸、海、空三軍情報部搜集得來的情報。以後三軍情報處的工作範圍縮窄，只着重情報搜集的技術性問題，情報內容的分析、研究、評估，以及利用都是國防情報處的事。基於上述原因，在香港的陸、海、空三個聯絡處也合而為一，改稱為國防聯絡處（Defense Liaison Office，簡稱 DLO）。國防聯絡處主任之職，由陸軍聯絡處主任兼。原來陸、海、空軍的其他聯絡官，則分別成為國防聯絡處的副主任或助理主任。他們的專業工作不變。原來三個聯絡處的繙譯員及其他職員的任務也是一樣。我們都在新聯絡主任領導下分工合作。一九六二年一月我離開國防聯絡處，結束了五年半的繙譯員生涯。加上一個難民救濟工作，我在香港為「美帝」服務的時間共有六年半之久。

我寫出的有關難民救濟部、空軍聯絡處及其他美國政府駐港機構的活動，反映了美國對新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如何敵視和重視。另一方面，我又發現站在同一民主、自由陣線的美國和英國在進行雙邊外交活動的時候仍不

免爾虞我詐，因為雙方互派的大使、領事、武官等，都負有搜集駐在國政治、經濟、軍事情報的任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十多年來，我的幾份職業都與中國和英國，以及中國和美國的熱戰和冷戰扯上關係，充滿政治色彩和爭議性。因為這緣故，我不時感到煩惱和內疚，要尋求一個解脫。由此惹起了童年時在天福銀號學做生意的回憶。結果我於一九六二年一月辭去國防聯絡處的職務，改行做銀行從業員。但是這並不等於以後我與政治絕緣。我在恒生銀行工作二十多年的經驗證明，人畢竟是政治動物。你愈要避開政治，政治偏要接近你。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外事局繙譯官
雲南昆明
1943



軍事委員會幹部訓練班
雲南曲靖汽車學校
1944



香港民衆安全服務隊
1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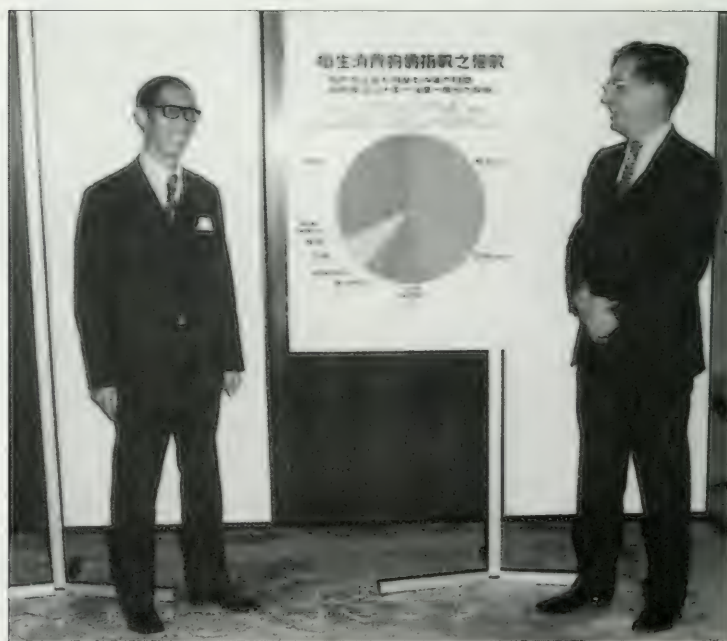


永堅在美國航空母艦甲板背景是尖沙咀

1960



與家人遊北京在八達嶺登長城
1973



恒生消費物價指數新聞發布會
與統計處處長合照

1974



恒生銀行金禧紀慶
與董事長何善衡合照
1983



在香港殖民地總督府領 MBE 勳章
1985



士嘉堡華人聯會成立五週年紀慶
1990



多倫多華人耆老家居服務協會籌款
1990



《永遠盛開的紫荊花》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997

第一節：恆生從銀號到銀行

我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入恒生銀行工作。恒生銀行的創業與發展甚富傳奇性。我與恒生銀行的關係亦然。恒生銀行的前身爲恒生銀號，恒生銀號與我伯父經營的永德銀號和永大銀號，以及我外祖父經營的天福銀號屬同一類型的舊式華人金融機構。永德、永大、天福全盛時期，恒生尚未見經傳。永德、永大和天福先後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爲日新月異的香港經濟環境所淘汰。但後進的恒生卻能順應潮流，不斷改革創新，由銀號蛻變爲銀行。

在恒生的歷史上，一九六二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恒生舉行了一個具有雙重意義的慶祝會，以誌新總行大廈揭幕及成立三十週年紀念。位於港島德輔道中七十七號的恒生銀行大廈樓高二十二層，高度達二百四十呎，爲當時全港最高的建築物，和被譽爲當時設備最先進的商業大廈。恒生銀行一九六二年年報顯示：是年銀行的總資產達港幣三億五千五百萬元，存款達二億九千六百萬元，職員超過四百人。我的職員編號爲三百六十九號，是一個容易記憶和讀起來頗爲順口的數字。

香港經濟的發展受許多內在和外因素影響。在香港做生意亦然。「商場如戰場」、「同行如敵國」是商人的口頭禪。如要在商場上立足，如要做生意賺錢，調查研究工作是不可缺少的。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生意做得愈大，調查研究工作就愈多。是以一般大商行、大銀行都僱有專人來做調查研究工作。這是我入恒生銀行做事的一個契機。

我入恒生銀行做事的另一個契機爲我與恒生的人事關係。恒生創辦人出身舊式家庭，重視由親及疏的中國倫理思想。因此在招請伙記時往往先照顧自己的親戚朋友，或親戚朋友的子弟。這樣做可能是他們認爲自己人較爲可靠的緣故。他們形容恒生是一個大家庭，老闆是家長。年青同事稱年長同事爲叔伯。年長同事稱年青同事爲子姪或世兄。但是自己人之中有時出現害群之馬，私相授受，營私舞弊在所不免。此外，事事用人唯親往往請不到真正有用的人材。爲了公私兼顧，後來恒生招請新職員的原則，是有親友關係者雖先被照顧，但入行後待遇與其他職員一視同仁。「有能者居之」是職員升遷的標準。

我在天祥汽車行與美國領事館及美國空軍聯絡處服務時，二哥文光已在與恒生有密切關係的大昌貿易行（以下簡稱大昌行）工作。他是新加坡大昌貿易行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大昌行的董事長何善衡同時是恒生銀行的董事長。大昌行的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梁錫珪同時是恒生銀行的董事。每年二哥由新加坡返港述職一兩次。梁錫珪、何善衡等設宴招待關文光時，偶爾我也叨陪末座。閒談之間他們透露恒生銀行業務發展迅速，既要興建新總行大廈，又要向外招聘各種人材。因此在辭去國防聯絡處職位之後我去信二哥，問他我有没有機會被恒生量才錄用。文光說他會與何善衡及梁錫珪商量。但他警告我不要太奢望和熱心。原因之一是我一向替外國人服務，不大了解中國老闆的脾氣。原因之二

是我做人太過耿直，不夠圓滑，太過理想，不夠實際。人情冷暖、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的商場對我不大合適。我的反應是我有肯學習新事物的幹勁和接受挑戰的勇氣。結果恒生銀行約我去面試，先見總務處主任文國鑾。他帶我去謁見總經理何添和經理利國偉。他們三人之中，利國偉與我談話最多。經過與我交談並檢驗我在軍委會外事局、駐華美軍總司令部、天祥汽車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和美國國防聯絡處服務的證書後，恒生銀行聘任我為資料研究室的負責人。我到恒生上任前，母親關心我的前程，向菩薩問卜。她到廟宇求籤，籤文是：「唐三藏取西經。」據解籤的廟祝說，我的新工作將會是非常艱難，但終有所成。我在恒生服務了二十二年，不敢說有何成就，但在工作過程中遇到很多困難、挫折和磨煉，則是肯定的。

成為恒生大家庭一員之後，以前一直在洋化環境工作的我要溶入一個中國化的工作環境。首先我要在對同事們稱呼方面做工夫。我稱呼何善衡為「善伯」，何添為「添伯」，一般比我年長的我都視他們為叔伯輩。大昌行當時與恒生銀行同在一座大廈辦公。見到梁銑琚時我稱他為「銑伯」。利國偉的年紀比我長，但他與何善衡、何添、梁銑琚等的年齡尚差很遠。我一直稱呼他為「利先生」。至於職位比較利先生為低的中年及青年同事，我稱呼他們時，在他們名字之後加一個「哥」字。當時文國鑾是副理，比經理低一級。我稱他為「國鑾哥」或簡化為「鑾哥」。經理級及以上的高層人員對下屬的稱號通常是叫名字，但偶然也會用哥字稱呼。我初上班時，上級對我稱呼時也加以「哥」字，以示客氣。恒生銀行有兩位董事與我有親戚關係。一位是副董事長郭贊，一位是鄧肇堅。郭贊年紀比我大十餘歲，但他輩份比我低。他的太太是我妻子陳永堅的姪女，因此他應該叫我為姑丈。但是在銀行內他的地位比我高得多，當眾稱我為姑丈實在有點尷尬，於是他稱我為「士光哥」。我則回敬稱呼他為「郭副董事長」。鄧肇堅是我的舅父，他稱呼我為「士光」便是了。恒生銀行與大昌行的僱主與僱員，上司與下屬，都以大家庭一份子自居。他們之間非常友善和團結。此對業務的發展甚有幫助。可惜老闆們的家長意識非常濃厚。此點對企業的現代化進程不無阻礙。

初進恒生時，我還在位於皇后大道中一六一至一六五號的舊總行大廈上班，直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才遷進新總行大廈辦公。當時資料研究室只有我一人，一張書桌，一張椅，一個小書櫃。書櫃內藏有幾本香港工商業年鑑，幾本香港政府年報，幾本中、英文字典與辭典，和幾份訂閱的中英文報紙與財經雜誌。銀行的人事部設有一個小圖書室，藏有英國和美國銀行學會的銀行學教科書和學術性期刊。這些書刊是用來訓練新行員的，也供我作參考之用。我上任的第一件工作是根據以上各種資料編寫資料研究室的資料檔案系統，並按照系統內所列各個研究項目個別設立檔案。以後凡從報紙、刊物及其他印刷品剪下或影印的資料，將會分門別類地放入這些檔案內，以備隨時抽出參考。成立資料研究室雖然是恒生銀行一貫的政策，但這是一個新的嘗試。因此銀行當局初期沒有將太多人力、物力資源投入這個部門內。資料研究室的初期規模，可以

用「因陋就簡」四個字來形容。

我的資料研究工作展開不久便要暫時停頓下來。原因是新總行大廈快將開幕，銀行要出版一本特刊以介紹大廈的興建過程與恒生發展的歷史。編寫特刊的任務交由我和銀行董事會秘書顏恩贊先生共同負責。描寫大廈的工程建設、規模、內部設備如何先進時，我們可以根據建築師、工程師等提供的資料依書直說。但是敘述恒生歷史時則需要頗多斟酌，因為世界上沒有絕對完美的事物，恒生歷史亦然。我們要避重就輕，使恒生在社會各界人士的心目中有一個較好的形像。恒生老臣子的談話和顏秘書辦公桌抽屜內的一些文件都是寫恒生歷史的資料來源。特刊要內容豐富，圖文並茂，又要有中、英文版。編寫和印刷工作頗為繁複，中、英文文稿要作多次修改才獲得何善衡、梁植偉、何添、利國偉等通過，因為他們分別是董事長、副董事長、總經理和經理——恒生的最高決策人。

恒生銀號成立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創辦人為林炳炎、何善衡、梁植偉和盛春霖。他們的相識可追溯至二十年代後期。當時林炳炎和盛春霖已在上海開設生大銀號與恒興銀號，何善衡與梁植偉也在廣州從事金銀業。在二、三十年代，香港的銀號除叙做存款、放款、匯兌生意外，也做黃金與白銀的買賣。部份銀號甚至只做金銀買賣。成立於一九一零年的香港金銀業貿易場，是金銀期貨買空賣空的交易所。黃金、白銀的買空和賣空極富投機性。貿易場的會員全是銀號。會員可自己在場內買賣，又可代客買賣，向客收取佣金。香港是一個自由商埠，資金來去無阻。香港雖然是英國屬上，但香港社會基本上是一個中國人的社會。由香港開埠以至一九四九年，不論是香港的中國人或大陸的中國人，都可以在香港與大陸之間自由來往、做生意和定居。基於上述原因，林、何、梁、盛四人在上海及廣州做生意時，也常常來到香港金銀業貿易場買賣黃金、白銀。因為志同道合，他們四人乃集資開辦以經營黃金買賣、匯兌、找換為主的恒生銀號。

恒生銀號開業初期，實際資本僅港幣十萬元，後來親友要求入股，股本增至十二萬五千元。林炳炎是恒生銀號第一任董事長。何善衡與梁植偉則分別為第一任經理與副經理。盛春霖沒有實職，只擔當董事。恒生銀號的舖址設於香港中環永樂街，離金銀貿易場不遠。初時在恒生打工的職員，連掌櫃先生、行街先生、出金市買賣的先生和後生在內，一共只有十一人。林炳炎不長駐香港，經常來往香港、廣州、上海、漢口各地。恒生的管理主要由何善衡和梁植偉負責。

一九三七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很多大陸資金流入香港。商人、富戶要把他們的錢調到較安全的地方。國民黨政府要用外匯購買軍需及各種戰略物資。他們都急於把手上的國幣兌換為港幣。於是香港與上海、漢口、廣州的匯兌活動激增。由於與中國官商有良好關係，恒生的匯兌生意大展鴻圖，奠定了日後發展的基礎。

一九四一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展開，以美、英、中、蘇為首的同盟國向德、意、日三個軸心國宣戰。香港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被日軍攻陷，但戰爭沒有波及鄰近香港的葡屬澳門，原因是葡萄牙保持中立。鑑於在香港無業可營，恒生遷往澳門以永華銀號名義繼續做生意。因為戰爭動亂時期人們喜歡貯藏黃金作保值之用，永華的業務也以買賣黃金為主。從此何善衡及其他恒生首腦與澳門的金銀業建立了友好聯繫。

香港艱苦地渡過了三年零八個月黯淡日子之後，日本向盟國投降，香港重光。一九四五年九月，恒生銀號在香港復業。兵燹之餘，香港物資缺乏。恒生在南北物資交流中發展匯兌業務，林炳炎往返香港、廣州、上海三地居中策應。

一九四六年中國內戰爆發。先是國民黨軍北上進攻中共控制的解放區和中共的陝北根據地。後來中共解放軍反擊，解放區不斷擴大，國民黨敗退台灣。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間，中國經濟崩潰，通貨膨脹加劇，國民黨發行的金元券與銀元券無補於事。大陸人民對國民黨發行的紙幣信心盡失，競相把手上的國幣兌換為美元、港元、英鎊及其他外幣。這一個中國人一窩蜂地爭取外幣的浪潮，比諸一九三七年的同樣浪潮更為汹涌。善於經營匯兌、找換的恒生銀號也因而再賺大錢。

恒生銀號的匯兌、找換業務固然賺錢，但賺錢賺得最多的還是黃金買賣。黃金買賣在香港有百多年歷史。香港開埠初期，居民可以自由買賣和持有黃金。黃金的進出口亦不受管制。自一九三九年英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即履行英鎊區成員的義務，實行外匯管制，黃金亦在管制之列。一九四九年間，由於客觀環境變化，香港黃金市場投機風氣甚盛。香港金銀業貿易場買賣及交收的黃金，一向是九九成色。戰後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成立。由於美元與黃金掛鉤，國際間中央銀行的清算可以純金作本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協議，只有中央銀行始許買賣純金。英國乃國際貨幣基金會成員，而香港當時為英國屬土，於是香港政府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頒行法例，限制純金買賣。簡要而言，居民不可以買賣或持有九五成色或以上的黃金。為此，自一九四九年七月起，在香港金銀業貿易場買賣的黃金均為九四五成色的工業金。一九七四年，由於美元脫離虛金本位，港府完全撤銷黃金進出口管制，金銀業貿易場買賣的黃金純度回復以百分之九十九為標準，即所謂九九金。

中共解放大陸後，由於政局動盪，經濟不景，金融混亂，大陸人民紛紛拋棄國幣以換取外幣，還搶購黃金。四十年代後期香港的黃金投機買賣狂潮由此而生。大陸解放後初期，移居香港的大陸人士鑒於金元券與銀元券崩潰之慘痛經驗，對紙幣失卻信心，咸以黃金為保值媒介。黃金在香港求過於供，金價於是冒升。

黃金進出口管制期間，香港市面黃金的供應源源不絕。此與澳門的黃金進出口管制有關。二次大戰後，葡萄牙並非國際貨幣基金會成員，毋須履行限制足金買賣之義務。商人在澳門進口黃金只要向政府繳納進口稅便不受限制。這一個黃金進出口漏洞引起香港金商注意。因為黃金在香港求過於供，香港金商便利用澳門作為黃金進口基地。他們在歐洲及南非購買黃金，經香港轉口運往

澳門，在澳門報關和辦理進口手續。金商在澳門將進口金磚熔掉，改鑄成九四五成色之五兩金條，然後僱請走私客以化整為零方式將黃金從澳門偷運香港應市。走私客要收取服務費。走私黃金時隨時有被海關查獲，然後被充公的風險。不過當時香港市場需求甚殷，挺而走險的走私客大有人在。一般黃金進口商向歐洲及南非購金後，頗多在香港期金市場拋補，而金商買賣黃金之自由美元，亦經由香港自由外匯市場吐納。由於與金商有良好關係，恒生的黃金及美匯買賣生意大有所獲。當時市場上買賣黃金人士咸以恒生為馬首是瞻。何善衡曾於一九四六至四九年擔任香港金銀業貿易場主席。恒生至今仍是貿易場會員，雖則它的黃金買賣業務已大為收斂。

中國的八年抗日戰爭勝利和日本投降後，恒生股東不想他們的資金完全用以經營金銀業，以符合西諺所謂「不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籃子裏」的原則。一九四六年，他們創立了大昌行經營貿易。大昌行全名是大昌貿易行有限公司。大昌行首先經營米糧雜貨進出口兼批發業務，繼而逐步在海外開設分行，包括紐約分行、東京分行、新加坡分行等。大昌行的董事長為何善衡、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為梁錫珪。我的二哥文光是在一九四八年加入大昌行的。梁錫珪是關文光的頂頭上司。為了統籌他們在恒生與大昌行的投資，何善衡等成立了恒昌企業有限公司，作為恒生與大昌的控股公司。一九四九年林炳炎去世，何善衡成為恒生、大昌、恒昌集團的最高領導人。

踏入五十年代，大陸來的資本家開始在香港開設工廠，其中以紡織廠為多，因為上海一帶是近代中國紡織業的發祥地，出現了不少棉紗大王、紡織大亨。在江蘇、浙江企業家帶動之下，香港本地商人也從事紡紗、織布、漂染、製衣等行業。紡織業是發展中國家實行工業化的第一步，香港的工業化也走這條道路。繼紡織業之後，香港又發展了其他輕工業。香港市場狹窄，容納不了日益增加的輕工業產品。香港的輕工業產品以外銷為主。這一趨勢，使因韓戰影響失去大陸市場而停滯不前的香港經濟有了轉機。本地製品出口取代傳統的轉口貿易，成為香港經濟的支柱。

工業與貿易發展需要資金融通。銀行的放款是資金融通的主要渠道。工業與貿易發展不但使企業賺錢，也為廣大市民製造就業機會。企業賺了錢，分派紅利或股息給股東之後，往往有盈餘滾存。市民收到工資，支付了生活消費之後，剩餘部份是他們的儲蓄。企業可將盈餘滾存作再度投資之用。市民可將儲蓄作為日後買居屋、汽車或其他耐用物品，以提高生活質素之用。盈餘滾存和儲蓄在未被動用之前往往是被放在銀行，作為銀行存款，以收取利息。這樣的一個經濟現象給予在香港開業的銀行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已有悠久歷史的英資銀行早著先鞭，擴大它們的業務範圍。在外地註冊的銀行紛紛前來香港開設分行。有悠久歷史的本地華資銀行也不甘後人。

五十年代以前，恒生銀號靠黃金買賣和叙做香港與大陸之間的匯兌起家。恒生銀號的發財致富與中國大陸戰亂頻繁、政治腐敗、經濟不景、金融混亂有密切關係。粗俗點來說，一九四五年以前發的是「國難財」，四十年代後半期發

的，是「內戰財」或「解放財」。在這動盪的時代裏，許多其他銀號也發過「國難財」與「內戰財」，恒生不過是其中之一。踏入五十年代，國內匯兌無業可營，期貨黃金買賣漸趨式微。爲了適應環境，發財成功的銀號都改弦易轍。它們的業務要逐步向商業銀行看齊。在這方面，恒生銀號走在銀號同業的前頭。

一九五二年，恒生銀號註冊爲私人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爲港幣一千萬元，實收股本爲五百萬元。何善衡被推舉爲董事長、梁植偉爲副董事長。恒生開業時僱用的十一名職員之一的何添則被委任爲總經理。他們三人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只念幾年私塾。但是他們深明「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道理，投身入社會後摸索到做人的智慧與做生意的方法，從做後生以至做老闆，開創他們的事業。他們謔稱自己是「社會大學畢業生」。幫助他們發展銀行業務的得力助手也沒有受過高深教育。一九五零至五二年陪同何善衡到外國考察，回港後被委任爲經理，後來更升至總經理、董事長的利國偉中學還未畢業。他在聖若瑟英文書院讀至第三班便出來做事。總務處主任文國鑾副理剛完成中學教育，一九四零年在英皇書院中學畢業。讀書時，他是我的學長；在恒生，他是我的頂頭上司。他於一九四五年加入恒生，比利國偉還早一年。一九八四年退休前他是恒生銀行董事兼副總經理。利、文兩人有共同點，也有不同的地方。他們兩人都是「番書仔」出身。論個性，利較機警、外向，文較沉靜、內向。利國偉陪同何善衡向外國銀行金融界取經後，又連同文國鑾向香港銀行金融界取經。他們兩人分別到各先進銀行同業諮詢如何處理存款、放款、匯兌、押匯等正常銀行業務，又向同業前輩請教有關訂制人事、會計、稽核等內部管理制度的問題。在他們取經過程中，匯豐銀行給予他們的幫助至大。在恒生老同事閒談中，匯豐不時被稱爲恒生的「契爺」。

做到老學到老，邊做邊學，邊學邊做，是恒生老闆對職員的基本要求。恒生的職員隊伍由三代人組成。第一代是三十年代人行從後生做起的老同事；第二代是四十年代加入恒生、大昌集團的職員，他們有較多現代商業知識和較爲廣闊的世界觀，而且多數通曉外文；第三代是五十年代開始招收的銀行練習生。投考練習生的資格是中學畢業或同等程度。換言之，職員有老、中、青三代。爲了發展現代化商業銀行業務，老一代要做到老學到老，中年一代要邊做邊學，青年一代要邊學邊做。何添是老一代的代表。利國偉是中年一代的代表。何德微是青年一代的代表，從練習生做起；他於一九五四年入行，一九九三年退休。退休前他是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隨着業務的擴展，恒生不斷招請練習生。練習生的數目，在職員總數之中的比重愈來愈大。何善衡、何添、利國偉等最歡喜招請練習生。一來他們覺得孺子可教；二來他們認爲恒生應該重視的是職員的實務知識而不是學業背景。練習生是銀行的基層骨幹，是被培養與提拔的對象。入行時，我的年齡、學歷、與社會經驗令到我在恒生職員隊伍中的地位十分尷尬。我不屬於上述老、中、青三代，而是介乎中、青兩代之間，我沒有銀行實務知識，也沒有大學或專業文憑。除非我有特殊表現，或恒生特別需要我這般的人才，我不可能是被培養和

被提拔的對象。我只有好自爲之。恒生老闆對招聘大學畢業生或專業人士做職員素來不感興趣，直至六十年代後期因爲要進一步提高職員質素以與同業競爭才急起直追。無論如何，在何善衡的教訓與領導下，恒生的職員隊伍始終是生氣勃勃的銀行弟子兵。

將勤補拙、取長補短是恒生開展銀行業務初期的戰略。匯豐、渣打、萬國寶通、大通等洋人管理的大銀行每週日上午十時開門，下午三時關門。星期六上午十時開門，正午十二時關門。美資銀行星期六休息。星期六有賽馬時，匯豐、渣打也休息。一般華資銀行的營業時間通常是週日朝九晚五，星期六是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恒生每週做足六天，每天朝九晚五。匯豐等大銀行的客戶對象是洋行、大企業和香港及外國駐港的政府機構，以及外籍人士。恒生的顧客主要是銀號時期的客戶和友好，小商人和不諳外語、過身上氣、爲外國銀行看不起的普羅大眾。此外還有新興的中、小型製造廠商。從表面來看，恒生客戶的質素似乎較差，但恒生深入華人社會，華人佔香港人口的絕大多數。第二次大戰以後，香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來自華人。隨着經濟的增長，華人的財富和他們對銀行服務的需求也相應增長。這一趨勢的形成，加以恒生不斷進取，使恒生在與同業競爭中後來居上。到五十年代末期，恒生的總資產額已趕上並超過不少老牌華資銀行。爲了正市民的視聽，由一九六零年起，恒生銀號改名爲恒生銀行。

香港政府奉行自由經濟政策，極力爲在香港做生意的本地人和外來人提供一個容易賺錢的環境，除非有必要，絕少對各行各業的活動加以干預。我加入恒生的時候，香港的銀行法例異常寬鬆。該條於一九四八年通過的《銀行法例》，只簡單地規定凡是經營銀行業務的機構必須向政府註冊，每年繳交牌照費五千元，並呈交年度資產負債表。法例對於銀行業務的定義甚爲籠統：「……接受往來賬戶或存款戶的存款，或者匯出或匯入款項，或者買賣黃金、銀元或金銀條塊。」法例沒有監管銀行運作的條文，以保障存戶及社會大眾的利益，例如沒有規定最低限度的資本額、流動資產與存款比率、放款與存款比率等。

基於上述原因，香港銀行體系的結構也十分複雜，有大、中、小型銀行，有本地人經營、外來人經營或本地人與外來人合管的銀行。有些銀行業務範圍多樣化，有些銀行的業務只局限於兩三方面，有些銀行歷史悠久，作風穩健，有些銀行爲初生之犢，作風勇進。

民族意識濃厚的香港人，喜歡把在香港做生意的銀行按其國籍分爲英資、華資、外資三大類。英資銀行指以匯豐銀行爲首，有發行鈔票權的銀行。這類銀行又稱發鈔銀行。外資銀行是指總行設在外國，分行設在香港的銀行。這類銀行主要由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及東南亞各地商人經營。華資銀行可再劃分爲中資、港資、僑資三分類。中資銀行受中國政府控制，總行設在大陸，分行設在香港。中國銀行香港分行是中資銀行的領袖。港資銀行包括早年開業與五十年代由銀號蛻變而成的銀行。前者以東亞銀行最具代表性，後者以恒生銀行最爲傑出。由於中國與香港的政治、經濟關係特殊，一些港資銀行其實是中資銀

行，也受中國政府控制。由銀號蛻變而成的實生銀行是一個例子。僑資銀行為海外華僑在香港開設的銀行。經營此類銀行者以東南亞華僑居多。遲遲未能蛻變為銀行的銀號也被併入銀行體系之內，稱為「未經註冊銀行」(unincorporated bank)。到六十年代後期，港資銀行亦因將部分甚至大部分股本讓與英資銀行及外資銀行而漸漸失去華資銀行的本色。

恒生銀號於一九五二年改營商業銀行業務，當年（直至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為止）香港仍施行外匯管制。依照外匯管制範疇，恒生被列入「非授權銀行」(non-authorized bank)類別。這名詞，對於一般香港市民，頗為費解，難怪海外銀行同業到訪，也往往以這為話題，提出質疑，因此值得在此交代一下。話說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英國政府實施外匯管制，以期增強外匯儲備，從而有更多錢來購買軍火與戰略物資。作為英鎊區 (Sterling Area) 成員的香港亦於一九三九及四零年制訂《國防（金融）條例》(Defence (Finance) Regulations of 1939 and 1940)以配合英國的外匯政策。英鎊區是一個以英鎊作為核心的貨幣體系，其特徵為各成員國的外匯儲備均須以英鎊方式存於倫敦。在非常時期，各成員國要追隨英國實施外匯管制，限制英鎊流出英鎊區，但成員國之間的資金轉移則不受限制。香港成為英鎊區成員國之遠因，是一九三五年香港進行幣制改革，以英鎊兌換制 (Sterling Exchange Standard) 取代原來的銀本位制 (Silver Standard)。香港政府成立外匯基金 (Exchange Fund)，使港元與英鎊掛鉤，匯價固定於一英鎊兌十六港元之上，並以英鎊作為港元發行的儲備。

香港的外匯管制由外匯管制處 (Exchange Control Office) 負責。外匯政策以貿易為重心。外匯管制的原則為一方面由政府管理出口貿易，將出口獲得的外匯撥進專賬；另一方面由政府管理進口貿易，一旦需用外匯以購買進口貨，所需外匯即由此專賬撥付。在香港，有關進出口外匯的管理，除特定外，須由政府指定的銀行辦理結匯。這些銀行被稱為「授權銀行」(authorized bank)，其餘的銀行則稱為「非授權銀行」(non-authorized bank)。

鑑於商品與資金暢通無阻，對香港作為一個自由商埠至為重要，在香港實施的外匯管制不能像在其他英鎊區成員國中那樣嚴格。於是有關當局採取一個折衷辦法，使香港在施行外匯管制的時候，既不違背英鎊區外匯管制的意義，又能保持資金來去自由的傳統，將外匯市場一分為二，一個是官價外匯市場 (Official Exchange Market)，一個是非官價外匯市場 (Unofficial Exchange Market)。

官價外匯市場是英鎊區成員貨幣互相兌換，及與非成員國貨幣兌換的法定市場。官價外匯市場的主要參與者為外匯管制處，「授權銀行」和外匯基金。「授權銀行」都是外匯銀行公會的會員。香港開埠初期便成立的外匯銀行公會，是經營外匯業務的銀行的最高聯合組織。公會的宗旨為調節外匯交易及有關事項。根據本地供求情況，並參考倫敦的匯率，公會每天定出在官價外匯市場買賣外匯的匯率，即所謂官價匯率。根據外匯管制處發出的通函和指示，各會員銀行執行政府的管制。這些通函和指示，經常隨着市場變化而修訂，或被新

發出的通函和指示所取代。

「授權銀行」在官價市場按官價匯率買賣外匯，有權批准用外匯支付的申請，可在英鎊區以內的任何地方開立賬戶收付往來，可接受出口商的結匯。概括而言，「授權銀行」是外匯管制處的代理人，因為業務在許多方面都涉及外匯，「授權銀行」亦稱「外匯銀行」。外匯銀行公會釐訂銀行服務的各項手續費，如代收票據、開立信用證、擔保書等之佣金。

根據一九四七年通過的《外匯管制法》(Exchange Act, 1947)，英國的外匯管制將全世界貨幣劃分為四個貨幣區。第一個是英鎊區(Sterling Area)，第二個是美元戶地區及加拿大(American Account Area and Canada)，第三個是轉賬戶地區(Transferable Account Area)，第四個是未分類地區(Unclassified Area)。至一九六零年，英國外匯管理當局將貨幣區減為兩個。其一是「表列地區」(Scheduled Area)，其二是「區外賬戶地區」(External Account Area)。「表列地區」即原來的英鎊區，成員包括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愛爾蘭共和國(Irish Republic)及多個英聯邦國家和地區。「表列地區」以外的國家和地區，都屬於「區外賬戶地區」。中國、台灣和澳門為香港的「傳統貿易地區」。香港與這三個地方的貿易用港元支付，不受外匯管制之約束。

「非授權銀行」的外匯經營局限於「表列地區」以外的貨幣，以美元為主。「非授權銀行」買賣美元時，美元的匯率不是預先決定，而是隨市場對美元的需求及其供應量而漲落。一個非官價外匯市場由此形成。非官價外匯市場又稱公開市場(open market)或自由市場(free market)。香港商人從美國進口貨物，所需外匯主要來自非官價(公開)市場。他們若透過「授權銀行」叙做入口押匯，須要將在自由市場購得之美元照官價售給「授權銀行」，等貨到時，「授權銀行」才再將美元依官價售回入口商來支付貨款。這一來，入口商的貨物成本，除了自由市場的美元買入價之外，還加上「授權銀行」的買賣差價。至於「非授權銀行」，由於毋須透過依照官價買賣美元的關係，好些精明的入口商，為了減輕成本，改為透過「非授權銀行」叙做美元入口押匯。作為一間「非授權銀行」，恒生是精明入口商的最佳拍檔。出口商將香港、中國、台灣或澳門產品運銷美國所得的美元貨款(離岸價格)，不用按官價匯率向「授權銀行」結匯。他們可以保持這筆美元，等到自由市場匯率對他們有利時賣給「非授權銀行」。

「授權銀行」在香港金融界有較高地位。財雄勢大的英資和外資銀行，有中國政府做後台的中資銀行，以及有悠久歷史的港資銀行多數是「授權銀行」。較小型的港資銀行和由銀號蛻變的銀行多入「非授權銀行」之列。由於在非官價市場買賣外匯甚為有利可圖，「非授權銀行」多數不願升格為「授權銀行」。它們寧願留級。鑑於地位崇高未必帶來任何特殊財務利益，許多「授權銀行」都想在非官價市場分一杯羹。除與「非授權銀行」安排互利的合作之外，「授權銀行」更設法成立可以經營自由外匯的聯號，或收購一些「非授權銀行」。較早時期，這些外資銀行透過它們的華經理(俗稱買辦)進行公開市場的外匯買賣。

一九七二年六月，英國政府將英鎊自由浮動，以減輕英鎊疲弱所受的壓

力。同年七月，香港政府宣佈港元不再與英鎊聯繫而以一籃子外幣為儲備，其中多數是美元。同年十二月，英國政府將「表列地區」的範圍縮小，只剩下聯合王國與北愛爾蘭。至此，香港奉行數十年的英鎊兌換制壽終正寢，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的外匯管制亦一併取消。

外匯管制取消之後，香港的外匯市場只有一個，不再有官價和非官價之分，而「授權銀行」與「非授權銀行」的意義也不復存在。一九七三年開始，所有銀行都可以成為外匯銀行公會的會員，在外匯市場自由買賣外匯。

一個自由的外匯市場，對香港經濟極為重要。由於各國貨幣均可在香港自由兌換，非居民的資金可以隨時匯入香港或自香港匯出。這是一個吸引外國人來香港做生意或投資的利好因素。正因為他們的資金可以隨時調走，他們乃樂於在香港投資。香港缺乏天然資源，民生食用所需，以及工業生產所需的原料幾乎全向外求。香港的有形貿易因此而經常出現逆差。但是多年以來，香港的國際收支都達致平衡，香港的經濟一再發展。這不能不拜自由外匯市場之賜。外國商人在香港投資和外國遊客在香港消費的錢，都與自由外匯市場發生關係。

對銀行業而言，自由外匯市場的存在甚為重要。資金來去自由，是吸引世界各地商人來香港做生意的一個要素。外資來到香港先要找一個落腳點。那就是香港的銀行體系。流入的資金成為銀行存款。存款增加是銀行業務發展的推動力。世界各地的大金融機構紛紛前來開設分行，使香港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自由外匯市場對香港經濟的影響，亦可能有其負面。國際投機家匯錢來香港炒股票及地產，賺了大錢之後，如發現在香港再無機可投，或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投機機會，他們可不顧香港死活，一夜之間把資金調走。此舉將嚴重地損壞香港銀行的存款基礎，給香港經濟帶來巨大沖擊。不過根據歷史記載，資金流入香港的機會總比流出的機會為多。

「非授權銀行」為自由外匯市場的活躍份子。它們在外匯買賣方面的利潤非常可觀。由於在自由外匯市場根深蒂固，「非授權銀行」的規模雖較授權銀行者為小，但它們在競爭性極強的香港金融市場中仍有一定的地位。

自一九五二年正式經營商業銀行業務開始，恒生就是一間「非授權銀行」。恒生在自由外匯市場的成就為許多同業所羨慕。一九六五年，匯豐銀行取得恒生銀行百分之五十一的大多數股權。恒生成為匯豐銀行集團成員之一的前因後果，對香港銀行業的發展有深遠影響。

第二節：銀行業務取向

吸收存款是銀行的最基本業務。沒有存款銀行不可能賺錢。此與銀行的資金運營有關。要了解銀行的資金運營，最簡便方法是分析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客戶存款是銀行的最大宗負債，但同時也是銀行資金的主要來源。銀行是社會認可的接受存款機構。不論個人、工商社團或銀行的同業，都可以把錢存

入銀行，成為銀行的客戶。對於可以隨時提取的存款，銀行通常不給予利息。對於定期存款和儲蓄存款，銀行則付予利息。銀行有責任保管客戶的存款，更有責任在客戶需要的時候，把存款還給客戶，因為客戶是銀行的債權人，銀行是客戶的債務人。

股本與公積金也列於資產負債表負債項下。公積金包括儲備與盈利滾存。股本加公積金構成銀行的資本賬戶。資本賬戶代表股東的資金，也是銀行運營資金來源之一，但在數量上遠比客戶存款為少。銀行資本的多寡，與銀行吸收存款的能力有關係。資本愈雄厚，客戶對銀行的信心愈強，樂於把錢存入銀行。

資產負債表資產項下，顯示銀行資金運用的情況。除持有一定數量的現金以應付客戶提取外，銀行的資金大部份用於放款、投資方面。現金是流動性最強的資產，但不會生利。放款與投資可以帶來利潤，在會計學上稱為銀行的營利性資產（earning assets）。營利性資產的流動性遠不如現金，但佔銀行總資產的最大部份。營利性資產有虧蝕的風險。放出去的款項收不回或投資虧本，都會導致營利性資產的虧蝕。

顧名思義，營利性資產是用以賺錢的。銀行要多賺錢就要增加營利性資產，要增加營利性資產就要增加客戶存款。理由很簡單：客戶存款為銀行資金的主要來源；存款不增加何來更多資金？資金不增加銀行如何能做更多放款與投資？沒有更多放款與投資，銀行如何能賺更多錢？

基於上述分析，可見銀行一定要不斷增加存款，因而銀行與銀行之間的業務競爭，主要是吸收存款的競爭。吸收存款競爭的最直接方式是提高客戶存款利息的利率，利率愈高愈能吸引客戶前來存款。五十年代後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為了競吸存款，香港各銀行展開了利率戰。此舉增加了銀行資金的成本，各蒙其害。

為了使惡性的吸收存款競爭不致危害到整個銀行體系，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香港外匯銀行公會擬定了利率協議，要求所有銀行一同遵守，使競爭能在一個較公平的環境下進行。協議規定了銀行向公眾吸收存款時，所能給予利率的最高水平。除往來存款戶口不准有利息和儲蓄存款利息率劃一之外，其餘十二個月以下的定期存款則按銀行級別訂定最高利率限制。協議把在香港開業的銀行分為外資銀行（foreign banks）及本地銀行（local banks）兩大類。外資銀行包括總行在外國的銀行，和匯豐與渣打這兩間發鈔銀行。外資銀行的存息率稱為基本利率（basic rate）。本地銀行包括總行在中國的銀行和本地華資銀行。本地銀行按規模大小細分為A1、A2、B1、B2四級。它們的存款利率按級別根據基本利率遞增，級別愈低增幅愈大：A1級的存款利率為基本利率加四分三釐，A2級加一又四分一釐，B1級加一又二分一釐，B2級加一又四分三釐。此一安排，在理論上可使大銀行與小銀行都有條件吸收客戶存款，前者主要靠給予客戶較多安全感，後者主要靠給予客戶較多利息收益。

一九六四年時利率協議並沒有令所有銀行都感覺滿意。一些外資銀行認為它們的存息率太低，對客戶沒有吸引力。一些本地銀行認為它們的存款利率

不夠高，很難與信譽超著、資本雄厚的大銀行競吸存款。由於協議沒有對為期十二個月以上的存款利率加以限制，很多銀行就走這個協議的漏洞。它們以更高利率來競吸為期一年及以上的存款。

由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香港的經濟環境起了大變化。一九六四年利率協議幾經修改。一九八零年外匯銀行公會解散，代之而興的為香港銀行公會。一個新的利率協議也隨之而出現。新協議把全港銀行分為兩級。第一級包括發鈔銀行及其附屬銀行，所有外資銀行，以及由外資機構控股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本地銀行。第二級包括由中國政府控制的銀行，即所謂中資銀行，以及受外資控股少於百分之二十五的本地銀行。

新協議規定了銀行向公眾吸納存款時所能給予利率的最高水平。除支票戶口不准有利息及儲蓄存款利息率劃一外，其餘十五個月以下的定期存款則按級別訂定最高利率限制。第一級銀行的定存息率為基本利率。第二級銀行的定存息率較基本利率高半釐。利率協議的規定不適用於下列幾種存款：（一）為期短於三個月的大額（五十萬元以上）存款；（二）為期長於十五個月的大額及小額（五十萬元以下）存款；（三）所有外幣存款；（四）政府存入銀行的款項；（五）銀行同業存款。

一九六四年利率協議實施時，恒生銀行被列為本地 A1 級銀行。一九八零年利率協議實施後，恒生被列為第一級銀行，原因是自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二日起，恒生已成為匯豐銀行的附屬銀行。恒生銀行的股權百分之五十一為匯豐所控制。

利率協議的原意是規限銀行在存款利息上惡性競爭的可能性。但時移勢易，隨着香港經濟與金融業的發展，協議的作用日漸減退，與其說有利於銀行的公平競爭，不如說有利於少數以香港為基地的大銀行的壟斷。至八十年代中期，除受益的本地大銀行外，其他銀行，包括外資銀行、中資銀行和本地中小型銀行，大多否定協議的存在需要。取消利率協議已提到銀行公會的議事日程上了。

自從由銀號蛻變為銀行以來，恒生年年賺錢，它的資本戶價值不斷增加。此點無疑使客戶對恒生有信心，樂於把錢存入恒生銀行。但這只是恒生存款激增的因素之一。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恒生在對客服務方面不遺餘力。出身於傳統華人家庭和社會的恒生銀行首腦們深知中國人耐勞克苦、尊師重道、重人情、愛面子，和凡事講方便的特性。鑑於恒生的客戶絕大多數是華人，何善衡、何添等人就根據這些中國人的特性，來展開恒生的對客服務。

恒生有一批服從命令、肯加時工作、能任勞任怨、懂人情世故、有待人接物經驗的老幹部。他們是早期為恒生銀號打工的人，包括做掌櫃的，做行街的和做後生的。何添也是其中之一。在恒生創辦人林炳炎、何善衡、梁植偉等領導下，他們為銀號和銀行的發展披荊斬棘，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在工作態度與對客態度方面，他們為後進的恒生職員樹立了良好榜樣。

恒生的對客服務，自駐在對客服務最前線的銀行大堂工作人員開始。他們

主要是：招呼客人和維持大堂秩序，俗稱「巡場」的款接員；坐在大堂當中或四角小櫃檯，替客人填寫提款或存款申請表或其他表格的代書員；以及坐在長長的櫃檯後面，面對大堂中心專替客人處理存款、提款、現金交收、票據交收的櫃員。入行時除接受基本銀行實務訓練之外，他們又要接受對客態度訓練。香港是華洋雜處的地方，他們也要學英語，最好又懂得一種以上的中國方言。為了保證他們的工作不致敷衍塞責，銀行人事處經常派高級職員到總行及各分行視察他們的表現，並給予評分，作為日後升級、加薪或調職的參考。

除了第一線工作人員外，其他銀行職員，不論職級高低，不論工作性質，都要遵守和服膺銀行最高當局有關對客服務的指示。何善衡對行員訓話時，曾經說過：他不一定要使恒生成為全港賺錢最多的銀行，但一定要使恒生成為全港服務最佳的銀行。為了使對客服務工作得以落實，何董事長創作了以下八句服務箴言：

笑容生和氣，高聲道姓名
工作須迅速，服務要忠誠，
態度常謙敬，問答簡而精，
對客皆週到，鞠躬謝盛情。

上述八句服務箴言可圈可點，既通俗又有內涵，唸起來琅琅上口，聽起來容易入耳。恒生搬入德輔道中七十七號總行大廈營業初期，在銀行大堂及各部門辦公室裝置的全行播音系統，每工作日早上九時正播出「何董事長服務箴言」，廣播時全體職員肅靜聆聽，廣播停止後才開始工作。服務箴言是新職員訓練班教材之一。每個學員結業時都要寫一篇短文，以表示對服務箴言的理解。到七十年代初期，行方忽然感覺到箴言的名稱有鼓吹個人崇拜之嫌，於是將「何董事長服務箴言」改為「恒生銀行服務箴言」，與此同時，每天早晨的箴言廣播亦告取消。儘管如此，箴言還是不斷在銀行的內部刊物中出現，作為行員的座右銘。

良好的對客服務，是恒生銀行爭取客戶存款的一個高招，在銀行同業之間起了移風易俗的作用，為銀行業務大眾化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因是之故，其他銀行亦相繼仿效恒生的作風，在對客服務方面亦步亦趨。為了保持領先地位，恒生的服務方式要不斷改善，不斷創新，由簡單、通俗化發展到更高層次的多元化。恒生的服務對象範圍也不斷擴展，從本身客戶推廣至社會大眾，從草根階層推廣至工商巨賈，從小學生推廣至大學教授和高級專業知識分子。

社會大眾把暫時用不着的錢存入銀行，有需要時才酌量提取。每一營業日，有人存款也有人提款。根據統計，在正常情況，存入的款項總比提出的款項為多，所有客戶同時前來提款的可能性甚少。基於此，銀行可將客戶存款的大部分借給需要用錢的人，從而獲取利息收益，或將之用於各種投資，從而獲取資本增值的收益。換言之，銀行將客戶存款的大部份化為營利性資產，只剩下小

部份存款來應付客戶的不時提取。

五十年代後期至六十年代初期，香港經濟逐步成長，人口不斷增加，工商業與房地產建築業的資金需求甚殷。這是銀行業發展的好時機。不論大小銀行都在存款及放款市場角逐，爭取較大的市場佔有率。資本雄厚、歷史悠久的大銀行往往在競爭中佔優勢。原因為市民對大銀行較有信心，即使所得利息較少也寧願把錢存入大銀行。另一方面，因為不用提高存款利息的利率以吸引客人，大銀行的放款成本也較低，可以用較低利率貸放，以吸引較多人前來借錢。與此同時，大銀行又可選擇信譽和實力較佳的人為放款對象，從而加強了放款的安全性。資本薄弱的新興小銀行的情形剛剛相反。為了競爭，它們不惜提高存款息率和降低放款息率，做成邊際利潤下降。同時，由於放款成本增高，它們不得不將資金運用於收益較大但風險較高的放款項目上。

五十年代後期，香港房地產市場出現求過於供的現象。但一踏進六十年代，房地產市道因投機性太明顯而回落，令到一些偏重於房地產放款的銀行受拖累，發生資金週轉問題。問題最嚴重的是廖創興銀行。該銀行以出高息爭取小存戶及致力於房地產放款及投資見稱。一九六一年六月，市面傳出廖創興銀行資金週轉不靈的消息，於是客戶紛紛前往提回他們的存款。由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約有兩萬名存戶在該行門口排隊等候提款。三天之內廖創興銀行流失了三千多萬元存款，迫得將其名下許多物業抵押給匯豐和渣打銀行，藉以借取現鈔發給擠提者。得到這兩間大銀行的支持，廖創興銀行僥幸地渡過了難關，不致倒閉。

廖創興事件驚動了銀行界，喚起了香港政府對銀行業監管的關注。一九六二年，香港政府邀請英倫銀行專家湯健士(H. J. Tomkins)來港研究銀行業面臨的問題，並作出改善監管制度的建議。他指出當時銀行業面臨的最重要問題，為銀行對地產及股市承擔貸款過度，影響銀行經營的穩健性。他的研究報告書有以下的話語：

投資於房地產及證券獲利甚豐且繼續如此誠然屬實。部份銀行之能有今日之地位，大多以其房地產業務經營順利而來。然此仍非經營銀行之良好原則，歷史可作充分例證，尤其最近之歷史，凡違反「短期借入，短期貸出」此重要原則之銀行，終將陷入困難境地。除營利原則外，銀行必須兼顧其投資之流動性靈活性，不可忘記流動資產應具之兩種特質，其一為能予以迅速變現，其二為變現而不致遭受相當損失。凡此特質均為房地產——即使謂能值賬面價值兩倍者——所未具備。一座半建成之房屋將不能應付交換或存戶提支，至於強迫出售，更非可迅速辦妥而不受損失者。倘目前之繁榮遭受阻礙，甚至演成為一種衰退時，則現狀下之危機將更形嚴重。

根據湯健士的建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起實施的《銀行條例》規定每間銀行必須按照湯健士的解釋，持有不少於存款百分之二十五的特定流動資

產。特定流動資產包括法定通貨鈔票及硬幣、金幣或金條、存於同業的結餘、國庫券、上市政府證券等。流動資產與存款的比率稱為「流動比率」(liquidity ratio)。香港銀行的法定流動比率為百分之二十五。

從銀行運作的觀點來看，流動比率的偏高或偏低不但反映了銀行賺錢機會是較多或較少，而且反映了銀行運作所冒的風險是較多或較少。流動比率較低的銀行多數是作風較為勇進的銀行。它們會多做放款或投資生意使它們的營利性資產大為增加。在此情形之下，它們的流動資產自然會相應減少，一旦客戶前來提取大量存款，它們將難以應付裕如。流動比率較高的銀行多數是作風較為保守的銀行。它們不敢釀造太多放款或投資，以致放棄了許多賺錢機會。如此一來它們的發展將會緩慢，落在其他銀行之後。由此可見，流動性與盈利性是相對的。如何維持一個理想的流動比率是銀行家的一個重要課題。

除了要求銀行維持最低百分之二十五的流動比率外，《銀行條例》還規定銀行的最低資本額；限制銀行對個別人士、商號及董事的借貸；收緊核數及賬目發表的限制；要求銀行按月及按季呈交財政報告予財政司審核。為了執行《銀行條例》，香港政府成立了銀行監理處，委任銀行監理專員，專責處理銀行發牌及監管事宜。

第三節：銀行風潮，恆生因禍得福

儘管湯健士報告書指出了銀行釀做過多房地產放款的弊端，部份銀行積重難返，仍以房地產放款為資金的主要出路。一九六四年《銀行條例》公佈後，它們的流動比率遲遲未能符合百分之二十五的最低要求。其實銀行為社會經濟提供信貸是多方面的。根據香港政府統計，一九六五年銀行給予各個主要經濟環節的貸款有如下的分佈：製造業約佔百分之三十；房地產建築業約佔百分之十八；基本建設約佔百分之三；旅遊業約佔百分之四，其他行業約佔百分之二十五。

部分銀行之所以着重地產放款是有原因的。五、六十年代間，香港金融體系的結構頗為落伍，與經濟增長不相稱。在先進國家，房地產建築發展的資金融通主要由建築合作社 (building society)、儲蓄銀行 (savings bank)、保險公司 (insurance company)、財務公司 (finance company) 等特殊金融機構負責。此等機構吸收長期存款，因而能夠給予地產發展商及私人置業者長期的資金融通。香港缺乏此等機構，房地產發展商及私人置業者唯有向銀行借貸。鑒於銀行的存款大部份為隨時可以提取的往來存款，作風穩健和業務多元化的大銀行都避免釀做過多房地產放款，一來是不想違反「短期借入，短期貸出」的原則，二來資金出路正多。本地華資銀行，尤其是從銀號蛻變出來的銀行，多數缺乏現代化的管理經驗和國際金融、經濟知識。它們的客戶以本地中、小型商行和廠家，以及普羅大眾為主。它們的海外同業聯絡網不大。此等因素限制了它們的放款範圍。因而在人棄我取和別無更佳選擇的情況下，它們承擔了「短期借入，長期貸出」的風險，把大部份資金用於房地產放款方面。

除了人口增加，工商業發展這兩個經濟因素外，還有三個技術性因素刺激香港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第一個技術性因素是政府修訂了一九五三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該條例的原意是限制戰前舊樓業主加租，以保障舊住客的權益。五十年代末期，政府修訂這條例，容許業主在給予租客相當賠償後，着租客遷出，然後將舊樓拆卸重建。重建後的物業，租金不受管制。由於新樓的層數往往比舊樓的層數為多，業主的租金收益作幾何級數的增加。利之所在，拆舊樓建新樓成爲一種風氣，房地產價格也大升。

第二個技術性因素爲樓宇分層出售與分期付款攤還買樓計劃的出現。六十年代以前，物業買賣以整幢建築物爲單位。當時只有較爲富有的人才可置業，一般小市民與此無緣。分層出售與分期付款計劃不但可以協助小市民達到他們的「居者有其屋」的願望，而且給予銀行叙更多房地產放款的機會。小業主把購入的物業向銀行做按揭，付了樓價百分之若干的首期後，其餘分期攤還。在此情形下，地產發展商建築更多較高和更多較細面積單位的樓宇應市。

第三個技術性因素頗具爭議性。爲了滿足小市民的置業慾和使資金早日回籠，地產發展商推出樓花計劃，將建築尚未完成的樓宇單位預先出售。一些發展商甚至在新樓建築未動工之前，即憑建築藍圖招攬買家。買家簽訂預售合約時給予發展商的訂金大可以支付部分建築費用，從而減少發展商向銀行借貸。尚未完成而預售的樓宇，俗稱「樓花」。

拆舊樓建新樓，新樓愈建愈高，小業主愈來愈多，人人希望做業主致富，已成爲六十年代以來香港人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部份。於是香港房地產市場的投機風氣亦因此而日漸熾熱。在不少置業者心目中，買樓自用不是最大考慮，低價購入在短期內高價賣出才是最大考慮。由於小市民、大業主、發展商和投機家積極入市，銀行少不免隨波逐流。對一些本地華資銀行來說，房地產放款帶來豐厚利潤，是一種極爲「和味」的生意。

爲了爭取放款市場的佔有率，部份銀行作出了一些不顧後果的行動。它們不自量力四處開設分行，以高息率吸收存款。此舉增加運營成本。與此同時，這些銀行又降低它們的授信標準，例如不查清楚借款人的背景，不用借款人交出抵押品或高估抵押品的市值，以求多做放款。它們的内部管理不完善，董事和高級職員利用權力動用銀行資金去做私人房地產投機。爲了追逐利潤，他們忘記了廖創興事件的教訓。

一九六五年初，香港房地產市場又有供過於求的現象，物業市值大幅下降，發展商不能出售樓宇，無力償還銀行債務，於是一些銀行發生財政困難的消息不脛而走。一九六五年一月接近農曆甲辰年歲晚。這是華人商家彼此清算舊賬的時候。前身是找換店後來着重房地產投資的明德銀號，因發出的支票不能兌現而令到存戶對它失去信心。明德銀號本錢短少，實收股本不足一百萬元，但存款負債卻達一千二百萬元，無怪一經存戶擠提立即支持不住。

一九六五年二月一日星期一，爲農曆甲辰年的大除夕，二月二日星期二爲乙巳年的年初一。農曆年初一年初二，當年政府還准許市民燒炮仗，全港市面

充滿春節氣氛。由初一至初三，銀行休息，至初四才啓市。二月六日星期五，爲乙巳年年初四。正當銀行首長互道「恭喜發財」之際，報章刊出明德銀號向高等法院申請破產的消息。翌日，以開設分行最多見稱的廣東信託商業銀行，又傳聞出現財政困難。於是該銀行的總行及分行門前出現了前來提款的人龍。廣託叙做了許多房地產放款。它的財政狀況與明德同病相憐，實收股本只略高於五百萬元，存款負債達一億五千二百萬元，流動比率低至百分之二十，結果因無法應付客戶提存而停業。

到了二月八日星期一，即農曆正月初九，不利銀行的謠言滿天飛。有人以訛傳訛，有人乘機興風作浪，令到許多間本地華資銀行都出現擠提。恒生、廣安、道亨、永隆、嘉華、遠東等銀行大堂內擠得水洩不通，門前人龍愈排愈長。港島中環銀行區的道路交通受阻，市面爲愁雲所罩。爲了應付客戶提存，銀行上、中、下級人員都忙個不了。在大堂工作的櫃員和款待員，一方面替客人辦理提款或消戶手續，一方面把一疊疊鈔票交給客人，做到手軟。主任級人員在指揮下屬應付客戶提款之餘，又要苦心婆心地勸喻客人少安毋躁，不用擔心拿不到錢。有時他們也兼做櫃員和接待員的工作，一同應付擠提人潮的壓力。高級行政人員更要爲了爭取大客戶的繼續信任，和大銀行的支持而費盡心思。由於銀行擠提可能波及整個社會的經濟，工商各界及政府有關部門莫不對事態的發展極度關注。而一般小市民更人心惶惶，唯恐他們的血汗錢一旦付之東流。在香港銀行業的歷史上，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是一個不吉祥的日子，一個「黑色的星期一」。

香港政府、外匯銀行公會和兩間發鈔銀行對這個金融危機不能坐視不理。它們作出了一系列緊急應變措施。財政司和銀行監理處處長向市民宣稱，明德與廣託所遭遇的困難，並未有危害到整個銀行體系的健全性。高等法院着手處理明德的破產申請。銀行監理處接管明德及廣託。財政司同意外匯銀行公會關於定期存款在未到期前不能提取的聲明。政府頒報緊急法令，規定每人每日在同戶口只可提取現金不多於一百元，又安排從英國空運英鎊鈔票來港，作爲香港法定流通貨幣，以解決港鈔不足的問題。匯豐銀行及渣打銀行同時宣佈對恒生、遠東、永隆、道亨、廣安等被擠提銀行作無限量支持。經過各有關方面的努力，到二月十六日，各被擠提銀行鬆一口氣，大堂程序回復正常，門前人龍逐步散去，限制提款的緊急法令至此亦告取消。

恒生銀行自一九五二年改爲商業銀行後，業務發展迅速，資產不斷增加。一九五二年，恒生銀行實收資本僅五百萬元。一九五四年，恒生存款二千一百萬元，資產總值達三千二百萬元。十年之後，按存款及資產計，恒生已超過東亞銀行而成爲全港最大的本地華資銀行。恒生的一九六四年年結顯示：實收股本已增至二千二百五十萬元，存款增至七億七百萬，資產總值增至八億一千三百萬元。年結又顯示，恒生的財政狀況相當穩健，流動資產與存款負債的比率爲百分之三十二，較《銀行條例》所規定的百分之二十五爲高。

恒生銀行服務良好，有口皆碑。這是它取得大量存款的最佳保證。恒生的

存款來自社會各階層，其中草根階層尤為重要。千千萬萬小市民前來開立儲蓄存款戶口。他們一點一滴地存入銀行的錢積少成多，不會時常提取，集腋成裘，最適宜用作叙做較長期信貸，例如地產放款的本錢。在爭取小存戶方面，恒生與廖創興同樣積極，不同的地方為前者強調對客服務，後者主要靠提高存款息率。論小存戶數目，恒生有幾十萬個，廖創興不過十多萬個。恒生在銀行零售業務(retail banking)方面的成就，為許多同業所羨慕，甚至嫉妒。

一九六五年二月，多間銀行被擠提的風潮雖告停息，但市民心有餘悸。由於工商業仍覺蕭條，地產市道一蹶不振，不利銀行的傳聞和謠言此落彼起。三月初，市面忽然傳出恒生銀行不穩的消息，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一發不可收拾，令到恒生客戶憂心如焚。其實消息是無根據的，因為恒生財政穩健、管理完善，且有匯豐無限量支持的諾言在先。但是客戶還是不放心。大客戶首先靜靜地將部份巨額存款調走，以策萬全。至於那幾十萬個小戶則為謠言所困而驚惶失措。他們懷着「不要執輸」的爭先恐後的想法，或附和盲從的羊群心理，紛紛湧到恒生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提款。因為人數眾多，排隊提款的客戶形成人龍。到總行提款的人龍由港島中區偏西的德輔道中七十七號，伸延至中區偏東的皇后像廣場，跨越了多條橫街，堪稱當年銀行擠提人龍中之最長者。小戶口眾多原是恒生之福，但到了非常時期卻變為銀行的一個負累，因為長長的擠提人龍打擊了市民對銀行的信心。因此儘管匯豐一再聲明對恒生作無限量支持，擠提人潮還是一浪高於一浪。到了這時候，一般市民已把「謠言止於智者」這句話置諸腦後。他們更不知道什麼是銀行的流動比率。即使知道，除非比率是百分之一百，他們的竭澤而漁式提款是不會罷休的。

由三月初至四月中旬，恒生成為謠言犧牲者，一共失去存款兩億元。存款流失最嚴重的一天為四月五日，當天失去存款八千萬元。一九六一年廖創興銀行被擠提時存款的流失量，與一九六五年恒生銀行被擠提時存款的流失量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為了銀行不致破產，恒生唯有求救於全港最大的銀行和若干跨國性大銀行。以當時環境來看，事實上某些大銀行已覬覦吞併恒生，一來可以壯大自己，二來可以消除一個在香港的強勁對手。與此同時，鑒於恒生與廣大市民的經濟生活有密切關係，如恒生一旦倒閉，可能危害到香港的金融體系，甚而香港經濟，政府對於恒生的遭遇也很難袖手旁觀。認識到這個形勢，為了委曲求全，經再三考慮，恒生首腦們決定以「犧牲小我，全成大我」的名義，向他們認為較為熟悉與可靠的「契爺」——匯豐銀行建議，願意讓匯豐取得恒生的大多數股權，因為只有「會印銀紙」和具「最後借貸者的靠山」(lender of last resort)功能的匯豐做恒生的後盾，市民對恒生的信心才能恢復過來。

四月八日，恒生銀行經理利國偉代表恒生董事局將建議告知匯豐，翌日又告知香港政府財政司郭伯偉。得到郭伯偉的同意及批准後，利國偉馬上與匯豐磋商讓股事宜。到了四月九日深夜，恒生與匯豐達成協議，匯豐同意購入百分之五十一的恒生大多數股權。消息傳出後，恒生客戶有了定心丸，不再擔心失去存款。於是擠提恒生的人龍一一消失，恒生總行及分行的業務回復正常。一

場幾乎動搖香港經濟根基的金融風暴至此宣告平息。四月十二日，協議正式生效，從此匯豐成為恒生的最大股東，恒生成為匯豐的附屬機構。

收購恒生的大多數股權，是匯豐在近半個世紀以來最佳的投資。股權轉讓時，恒生的資產值為一億元。換言之，匯豐只出五千一百萬元便控制了恒生的百分之五十一大多數股權。一九七二年恒生將其本身一千萬股每股十元之股票，抽出一百萬股，以每股一百元之價格公開發售，在香港證券交易所掛牌買賣，至此匯豐又有機會吸納更多恒生股票。根據匯豐銀行一九八七年度年報，是年匯豐擁有的恒生股權已增至百分之六十一點四八（61.48%）。恒生自成為匯豐附屬公司後，年年賺錢，每年派發的股息及紅股亦按持股比例流入匯豐的庫房。至八十年代，匯豐擁有多間附屬公司和聯屬公司，形成一個龐大的金融集團。集團成員中經營商業銀行業務者有五間附屬公司和四聯屬公司。該五間附屬公司（subsidiary companies）為在澳洲註冊的澳洲匯豐銀行，在加拿大註冊的加拿大匯豐銀行，在香港註冊的恒生銀行，在英國註冊的中東英格蘭銀行，和在美國註冊的美國海豐銀行。該四間聯屬公司（associated companies）為在塞浦路斯註冊的塞浦路斯大眾銀行，在埃及註冊的匯豐埃及銀行，在沙地阿拉伯註冊的沙地英國銀行，和在英國註冊的國際商業銀行。以上各附屬及聯屬公司之中，香港恒生銀行的表現最佳，賺錢最多。

匯豐收購恒生之後，當然得到了許多有形利益—恒生的股息與紅股。但是一些無形利益也十分可觀。一九七二年以前，當香港還在實行外匯管制的時候，匯豐與恒生分別在官價與非官價外匯市場中有很大的市場佔有率。恒生併入匯豐集團後，官價與非官價外匯市場的領導權無形中落在集團的手中。在香港，匯豐一直是批發銀行業務的領導者。批發銀行業務（wholesale banking）指以大企業為對象，每宗涉及大銀碼的存、放、匯款及其他金融服務。而恒生則是零售銀行業務的先驅。零售銀行業務指以小市民、小型工商業為主要對象的各種銀行服務。匯豐與恒生在上述兩種銀行業務中既是競爭者也是合作者，既大做外國人生意也大做中國人生意。兩間銀行互相取長補短。結果匯豐集團在香港金融市場中的比重愈來愈大。以存款為例，匯豐是存款最多的銀行，恒生次之。兩行的存款合計，佔了全港銀行總存款的一大半。

匯豐收購恒生大多數股權的消息公佈後，恒生舉行了一個同人大會。會上何善衡讚揚恒生各級職員在銀行受擠提時處變不驚，忠心耿耿為恒生渡過難關而竭盡全力。何善衡說他有信心帶領恒生繼續前進，並請求全體員工相信他、支持他。這些鼓勵士氣的話語均刊印在恒生的歷史文獻上。唯獨有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沒有公開。善伯曾說：「英國人是信得過的。」利國偉是挽救恒生免於倒閉的功臣。他知道華人管理的恒生與英國人管理的匯豐在文化上、思想上、觀點上有差異。為了化解員工對新大老闆的疑慮，他向員工保證，恒生在行政及管理方面維持獨立。他說：「不論銀行的股東是誰，我們都會齊心合力，為恒生銀行的成功而努力。所有的職員依然會在一個友善、有禮及互相關懷的環境中工作。這是恒生多年所致力。因此，只要恒生能繼續得以昌盛，所有職員

必能享受這成果。」

讓股協議生效後，所有恒生銀行的原有股東不論是個人或公司法人，不論持有多少股票，都要按比例將手上百分之五十一股票根據協議價格售與匯豐。恒生銀行董事會原來有幾位永遠董事。以後永遠董事的職位亦告取消。爲了尊重恒生的幾位長者，匯豐還是讓何善衡當董事長，梁植偉和何添當副董事長，以保持他們的面子。此外，匯豐又派了四位高級人員參加恒生董事會，其中一人爲第三副董事長。他們四人是恒生銀行最大股東—匯豐—的代表。他們不過問恒生內部行政事務，但會監視或參與恒生的重要決策，使之不會與匯豐的利益發生衝突。恒生委派文國鑾擔任兩行之間的業務聯絡人。文先生於一九八四年退休，繼而移民加拿大。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一年，他被加拿大匯豐銀行聘爲該行的首任華人董事。他的湛深銀行經驗，有助於加拿大匯豐的業務發展。

讓股後，恒生仍竭力維持它的「本地華資銀行」形像，但在銀行同業心目中它已經入了外資銀行範疇，一九八零年修訂的銀行公會利率協議可爲例證。社會各界對恒生讓股之事有強烈反應。有人替恒人大感不值，爲什麼把多年辛苦建立的事業大部份讓與外人？有人嘆息中國人不爭氣，要求外國人保護。有人問中國銀行爲什麼不像匯豐銀行一樣挺身而出，挽救被擠提的恒生及其他本地華資銀行？恒生的原有大股東們心情也十分矛盾。有人認爲讓股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但亦有人認爲出售股份後可乘機套現，把所得資金另起爐灶，或作其他回報率更高的投資。後果如何，則是見仁見智了。

匯豐收購恒生之後，一些國際性大銀行也相繼使多間曾被擠提或資本薄弱的本地華資銀行淪爲大銀行的附屬或聯屬公司。遠東、道亨、嘉華、永亨、廣安等將百分之五十一或以上的股權讓與外資銀行，成爲外資銀行的附屬公司。上海商業、浙江第一、香港工商、永隆等將不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權讓與外資銀行，成爲外資銀行的聯屬公司。東亞銀行是碩果僅存和有規模的本地華資銀行。相信東亞的董事和大股東們都會引以自豪。由於數目愈來愈少，本地華資銀行在香港銀行體系中已不能自成一派。本地銀行褪色後，在香港存款市場和放款市場分庭抗禮的是兩個銀行集團，一個是匯豐銀行集團，另一個是中國銀行集團。

六十年代末期，香港的地產市道有轉機，股票市場有發展。居屋和工商業樓宇的需求，因香港經濟情況改善而大爲增加。許多公司向證券交易所申請上市以籌集資金。受一九六四年《銀行條例》約束，持牌銀行所提供的資金融通服務顯然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因爲它們不能違反「短期借入，短期貸出」的原則。於是一些「非銀行」的財務機構應運而生。不少外國金融機構來港開設財務公司，發展商人銀行業務（merchant banking business），例如安排公司上市、收購、合併，及包銷上市公司股票等。同時，不少本地人士也組織財務公司，進行股票和房地產有關的貸款活動。因爲不受當時銀行利率協議的限制，財務公司可以付出高息吸引存戶，與銀行競爭存款，導致銀行體系存款大量流失。爲了保護市場佔有率，不少銀行自行成立附屬財務公司以進行對抗。

鑒於財務公司的開設愈來愈多，一九七六年香港政府通過了《接受存款公司條例》(Deposit-taking Companies Ordinance)以監管財務公司的運作。一九八一年，政府修訂了這條例，將接受存款公司分為三級，第一級為持牌銀行(Licensed banks)，第二級為持牌接受存款公司(Licensed Deposit-taking Companies)，第三級為註冊存款公司(Registered Deposit-taking Companies)。一個金融三級制(Financial Three-tier Structure)的局面由此形成。《接受存款公司條例》的修訂，是為了確保一九八零年利率協議能有效地執行。根據修訂條例，持牌接受存款公司與註冊接受存款公司的資本和存款範圍都有一定限制，從而促成銀行在存款方面的優勢。三級制實施後，缺乏銀行背景在接受存款公司數目大為減少。尚存在接受存款公司多數是銀行的附屬或聯屬機構。

隨着形勢發展，恒生銀行也設立了兩間附屬接受存款公司。恒生財務有限公司(Hang Seng Finance Limited)的主要業務為接受存款和提供商人銀行服務。恒生存款有限公司(Hang Seng Credit Limited)的主要業務為接受存款。由於一九八零年利率協議已給銀行在吸收存款方面有很大活動範圍，在擁有兩間附屬接受存款公司之後，恒生兼有「短期借入，短期貸出」與「長期借入，長期貸出」的功能。除了兩間附屬財務公司之外，恒生還成立了多間性質不同的附屬公司，為社會各階層提供金融或其他服務：恒生銀行信託有限公司(Hang Seng Bank (Trustee) Limited)提供信託服務，恒生(代理人)有限公司(Hang Seng (Nominee) Limited)提供代理人服務，恒生信用卡有限公司(Hang Seng Credit-Card Limited)提供信用卡信貸服務。此外，為了使業務多元化和國際化，恒生也成立了好幾間附屬公司從事保險、證券買賣及資金管理、投資、物業管理等業務。如此一來，恒生已成為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金融集團，在香港有堅強的根基，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地位。一九六五年把大多數股權讓與匯豐後，恒生已不是香港「最大的本地華資銀行」，但仍然是一間規模最大、服務最佳的「本地華人管理的銀行」。何善衡、何添、利國偉等可能因把大多數股權出讓而感到黯然，但是他們不愧為「除笨有精」的生意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第四節：恆生長者的教誨，銀行寓宣傳於教育

古今中外，教人如何處世和在事業上獲致成功的格言和書籍不可勝數。恒生首腦們利用這些格言和書籍來教誨後輩，幫助他們修業進德，希望他們敬業樂業，盡心盡意盡力為恒生服務，從而達到「立己立人」之目的。

在教誨青年行員的過程中，林炳炎、何善衡等更創造了自己的格言。林炳炎常常以「大量容人、小心作事、利居眾後、責在人先」和「意氣用事，甚於舞弊」來勉勵恒生的夥記。何善衡對這兩句格言推崇備至，認為是林炳炎先生成功的因素。何董事長對青年說：「大量容人，說則容易，行則實難。如果没有大志，那有器量？没有器量，那能容人？没有人材，那能成功立業？這一切都是互為因果

的。同時，世上無完人，每人都有他的優點和缺點，所以不能求全責備，只要對他的優點多賞識，對他的缺點多包涵，才能使他心悅誠服，這不獨能得其力，更可盡其才。」善伯又說：「人性有其優良的一面，便會夾雜其醜惡的一面，所以聰明多智的人會流於奸詐不誠，勇往直前的人易於脾氣暴躁，仁慈敦厚的人不免會愛小利，只要領導的人有從容大量，發揮其所長而防範其所短，甚至寬恕其所短，便達到用人唯才的目的，而其中如何去錄用，如何寬恕，仍然有一番容忍耐力的功夫，我們就叫它做器量。」他又指出：「古往今來能成大事的人皆有其過人的高度忍耐，像漢之張良，三國之孔明，都是最好的榜樣。切忌運一時之氣，或形於辭色，或見諸行爲，易爲人所乘，於事無補。」他認爲：「忍耐是人們品德、學問、思想、行爲等的最高修養表現，只要看他對人、對事、對物、對工作的容忍到什麼程度，便可知道他的修養工夫到那一階段了。」

本着學到老、做到老和自勉勉人的精神，在接替一九四九年去世的林炳炎爲恒生的最高領導人之後，何善衡即着手有系統地推行他的行員修業進德計劃。遷入新總行大廈辦公後，他與青年行員舉行一連串座談會，每次挑選二、三十人參加。我是第二批被挑選參加座談會的青年。在座談會中，善伯讓青年們分享他數十年處世做事的經驗，對他們循循善誘，並就各人所提出的問題，爲之分別解答。

座談會舉行了好幾次之後，由於銀行職員不斷增加，和他個人的事務繁多，何善衡將主持座談會的工作交由人事處負責。爲了好好地推行任務，人事處秉承何董事長的意旨編印了《青年商人的修養》一書分發給行員閱讀。書的內容分爲談話的藝術、儀態的研究、知識與爭取顧客好感，和成功的秘訣四章，其中有古今名教之言，中外經世之語，皆是發人深省，且可供從事商業的青年參考。

一九六九年，何善衡將《青年商人的修養》一書的內容及歷年與青年們談話的要點綜合起來，輯類成篇，名曰《閱世淺談》。《淺談》的內容較《修養》的內容更爲充實、廣泛，所談的課題包括：立志與立身，怎樣取法別人，擇業與就業，待客的態度及詞令，服務原則，紀律問題，領袖須知，工作的改進，成功之要訣等。《淺談》爲恒生職員、客戶及友好帶來不少啓示，再版不下十數次，可以說是何善衡活學活用中國古聖賢書語和中國歷史典故的結晶，也可以說是他事業成功後立德立言之表現。

《閱世淺談》出版後，何董事長對職員們的教誨意猶未盡。有感於社會風氣敗壞，人心不古，做生意的愈來愈不道德，他於七十年代初期特別聘請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位國學老師蘇文耀先生來恒生，爲中、上級職員講孔孟之道，企圖把儒家思想與現代商業行爲揉合起來。善伯常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數千年來讀書人處世立身之成功目標。所謂格物、致知，是修養好自己應具的學問、知識；誠意、正心，是鍛鍊本身的心性；修身很明顯是修養好自己的行爲、品格；齊家是管理好自己的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屬於爲政者言，若以商人而論，應作服務與創業解釋。」蘇文耀也將何善衡的意思加

以更深入的分析。但在這個極度功利主義的香港社會，古聖賢之道畢竟有點曲高和寡與不合時宜。由於中上級職員在參加講座時意興闌珊，蘇老師的講座草草結束。

中上級職員雖然對蘇文擢的道德經不感興趣，但對何董事長的審時度勢理論頗為受落，原因為審時度勢的理論可以引用於他們日常工作上面。何善衡在他的《閱世淺談》中指出：「容忍、忍耐、忍讓，屬於吾人律己待人處世做事的基本修養。從此一修養出發，投入客觀形勢便是審時度勢的問題。」他又指出：「雖則從來說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其實時勢乃群眾的趨向，英雄只能去適應它。所以真能扭轉乾坤的英雄終是少之又少，而順應時勢成功立業者代有其人。」善伯列舉三位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工商業開始蓬勃的貨殖傳中人物，作為恒生職員們的借鏡。他們是「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白圭，「治產積居與時逐，能擇人而任時」的陶朱公（即范蠡），和「廢居候時，轉物逐十一之利」的子貢。廢是賣出，居是吸納，一買一賣全在等候時機，而轉物逐十一之利，便是流通要快，利潤合理。

審時度勢的理論，不但可以引經據典來支持，還可以用恒生特有的術語「見景」一詞來形容。所謂「見景」即處事要隨機應變，配合當時環境之需要而作出適當的決定，即俗語所謂「執生」。「執生」是時下香港市井之徒最喜歡用的一個術語。何善衡常常說，中級職員是小領袖，在一時沒法請示上級而要親自處理一宗生意或一件公事的時候，他就要「見景」行事。小領袖要懂得「見景」之道才有希望升級，成為大領袖。

一九八三年恒生慶祝了創業五十週年紀念之後，何善衡以年邁為理由，辭退董事長一職，由當時的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利國偉繼任，他則應邀出任名譽董事長。利董事長教誨青年的話語比較低調，但仍具深長意義。他說做人要「話到口中留半句，理從是處讓三分。」他的解釋是：「後生仔出來社會工作，先學做事，再學做人。處事難，處人更難。世界上很多事並非絕對的，若非百分百清楚，不要講得太肯定，必須略作保留，這便是話到口中留半句的意思。和別人理論時，就算自己對也要留有餘地，不要令對方失面子，就算有理，還是要顧及別人的感情，給予下台機會。否則，很容易惹起對方反感。總之，做事要令人口服心服。」他又說：「現代青年人，大多很現實，以金錢衡量工作價值。不過，自古至今，人性仍有一種共同的追求——滿足感。工作上的滿足是對任何崗位和任何階層的人都很重要。就算做清道夫，如果街道能在自己手下打掃得乾乾淨淨，內心也會泛起一種喜悅。這種感覺和得到的金錢報酬的感覺不一樣。」利先生給青年們的啟示是：不看重自己工作，怨天怨地的人不會受歡迎，也不會快樂。人生下來，既然要工作，要負責任，就得面對現實。開心要做，不開心也要做。何名譽董事長的教誨多引用古聖賢的言行，利董事長的教誨多數從現實生活出發。

恒生銀行的人事處，是董事長教誨職員政策的執行者。人事處的工作，部份與學校的訓育部的工作非常類似。何善衡常言恒生是一個大家庭，也是一所大學校。人事處出版的《恒園》月刊是一份新聞性與教育性兼備的定期刊物，有

如學校的校刊，一方面報導銀行業務發展的動態，一方面刊載各種有教育性的專題文章，其宗旨是要所有職員都能體會銀行最高當局的政策，互愛互助，不斷學習，不斷改善工作，斷不負各長者的期望。《恒園》月刊後來改為雙月刊，內容更為豐富。到一九九六年一月，《恒園》已出版至第二百九十期，每期都有何善衡的題字。由此可見，善伯對恒生的影響何等深遠。何董事長格言的被長期不斷引用，可以說是後輩對他表示尊敬，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家長式統治國家、和家長式管理企業的寫照。

教育職員的修業進德，是恒生銀行成功的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為教育社會大眾，使他們對銀行有更多認識，從而更多利用銀行服務。何善衡為此想出了一個「寓宣傳於教育」的主意。一九六三年，恒生把部份培訓職員的課程公開，舉辦免費的初級銀行業務進修班，歡迎各界人士參加。進修班的講師，除人事處聘請的專人之外，也包括各處、部的高級職員，前者講學理，後者講實務。進修班不但向學員灌輸銀行、金融、經濟的基本知識，而且講解銀行存款、放款、匯兌、押匯、投資的運作情形。前來聽講的人初時多數由客戶及友好介紹。後來許多外界人士也慕名前來做學員。進修班舉辦了幾十期，每期有學員百餘人。他們之中有學生、商行職員、和政府公務員。

六十年代初期，香港只有一間大學，因為學位不多，許多中學畢業生要到海外升大學。有見及此，何董事長命資料研究室編印《留學指南》一書，免費贈予需要留學外國的青年。該書的內容包括海外各大學的課程、學分、學位制度、學費、獎學金等。各大學所在地的經濟情況及生活費用也有提及。一九六七年，人事處成立了教育輔導組。除從資料研究室接手繼續出版《留學指南》外，輔導組更任用專人為有志留學的人提供免費的個人輔導，幫助他們申請入讀各國大專學院及辦理學生簽證手續。此外，輔導組又設有一個海外大學參考圖書館，讓準備留學的人前來查閱大學資料。

為了培養更多人材為日益發展的香港社會服務，香港政府於六十年代中期計劃多設一間大學以補香港大學之不足。恒生的首腦們熱烈響應這個計劃。搬進德輔道中七十七號廿二層高的新總行大廈後，恒生特別騰出地方給香港中文大學籌備處作為辦公室之用。中文大學位於沙田的校舍落成後，恒生一直與中大保持密切關係。利國偉歷任中大校董、校董會司庫、校董會主席。一九七二年，為了酬謝他對大學的貢獻，中大頒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給他。

恒生為香港社會人士提供的教育服務沒有年齡限制。傳統中國人有「積穀防飢」和「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的觀念。善伯就利用這觀念來教育兒童，鼓勵他們養成儲蓄的好習慣，把長輩給他們的過年「利是」錢及零用錢存入銀行。恒生請過兩位出色的電台和電視節目主持人來推廣這計劃。第一位是五十年代著名的女廣播音員羅鳳筠。因為在電台主持的家庭婦女及兒童節目早已深入人心，恒生聘請羅小姐主持銀行的家庭儲蓄部。她為恒生帶來不少儲蓄存款客戶。第二位是六十年代著名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殷巧兒。她為恒生在無線電視台主持一個名為「溫故知新」的兒童節目。「小莫小於水滴，漸成大海

汪洋；細莫細於沙粒，漸成大地四方。」這幾句精簡而寓意深長的語句，配上優美的音樂旋律，曾經是恒生銀行鼓勵市民大眾儲蓄的歌曲「溫故知新」令到許多兒童及家長成為恒生儲蓄存款部的支持者，也曾經是無線電視台的一個長壽節目。

增加儲蓄存款的另一辦法是向客戶推銀贈送錢箱。古老中國人稱錢箱為「撲滿」。西方人稱錢箱為「豬仔銀行」(piggy bank)。錢箱是吸引兒童儲蓄的玩意兒。古老錢箱多以陶瓷製成，外表七彩繽紛，富民族色彩。現代銀行推出的錢箱，林林總總，多采多姿，有陶瓷製品，有金屬製品，還有以木、塑膠纖維和布料製成的。由於設計日新，形狀精美，錢箱不但為小朋友所喜愛，也為成年人所喜愛。前者覺得錢箱有玩具兼儲蓄箱的功能。後者認為錢箱有作為家居陳設品兼儲蓄箱的功能。恒生發售和贈送的錢箱，無論在數目上和款式上都是全港之冠。何董事長是錢箱計劃的始創人。總務處各項管理組經理陳蠡則是計劃的執行人。他曾到外國採購及訂製多種錢箱，以應恒生客戶之需。

收藏古董是一些有錢商人附庸風雅的表现。以經營銀號起家的何善衡，對收藏中國古代錢幣特別感興趣。在他的指示下，由五十年代開始以至六十年代後期，恒生已收藏了古錢四、五千枚，包括商代的貝殼幣，春秋戰國及秦、漢時代的鐘形銅幣，漢、隋、唐、宋代的圓形有孔銅幣，宋、元、明、清代的銅幣、金幣、銀幣與紙幣，以及民國時期的銅、銀硬幣與紙幣。根據考古學家的鑑定，這些古錢幣的發行背景，反映了中國數千年來各歷史階段的文化、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公諸同好，甚有教育意義。有見及此，何董事長又想出一個主意：舉辦一個古錢展覽會，一方面教育普羅大眾，一方面為銀行作宣傳。鑒哥不但領會善伯的意思，而且將這意思加以發揚。以下是恒生古錢展覽的經過。

三十年代後期，香港的製造業開始萌芽，於是有中華廠商會的組織。華人創辦的工廠多數是廠商會的會員。當時中國的抗日戰爭已全面展開。為了表示愛國，廠商會以「中國人用中國貨」宣傳口號來吸引市民購買會員的產品。每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即在聖誕與農曆新年假期之間，廠商會舉辦中國國貨展覽會。廠商會會員在會場內設攤位宣傳和推銷他們的產品。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國貨展覽會改稱香港工業製品展覽會，簡稱工展會。工展會的口號是「香港人用香港貨」。在香港人的年曆裏面，工展會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他們扶老攜幼到展覽會參觀，順便採購聖誕禮物及年貨。外國遊客也趁熱鬧和觀光，順便選購他們喜愛的富有東方色彩物品，以留紀念。

到六十年代初期，香港工業因得到銀行的融資而有進一步發展，然而還未有銀行參加工展會。其實銀行可在展覽會場設立攤位，一方面自我宣傳，一方面向參展廠商及遊客提供簡便的銀行服務，如貨幣找換、銀行業務諮詢等。文匯洞燭先機，得到善伯同意後，去信廠商會，表示恒生樂意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六五年正月舉行的工展會會場內設立攤位，為廠商及遊客服務。當匯豐與渣打獲悉恒生參加工展會之後，它們也在會場設立攤位。匯豐和渣打的攤位只有三幾名職員駐守，作有限度的銀行服務。攤位的裝飾和設備乏善可陳。

恒生在工展會設立的攤位，無論在面積、裝飾、設備、派駐人手等方面，都非匯豐與渣打的攤位所能比擬。恒生攤位設備完善，外形壯觀，仿中國宮殿式建築設計，與其說是一個攤位，不如說是一個展覽館。在恒生展覽館內陳設的，除了匯豐及渣打攤位已有的業務諮詢與銀錢找換櫃檯之外，還有一組又一組匯豐及渣打攤位所無的展品，包括：恒生收藏的中國古錢，總務處去信各國中央銀行及儲蓄銀行蒐集的鈔票及錢箱樣本，海外處收藏的各國紙幣、硬幣，資料研究室出版的刊物，銀行印製的各種業務簡介，以及銀行歷年出版的年報。每種展品陳列架框之旁有說明文字，向參觀者介紹有關展品的來歷。當代貨幣及錢箱按發行及製造國家分組陳列。有關國家的歷史、地理、經濟概況，亦有文字及圖表說明。此外，恒生館的四壁，又掛有解釋貨幣沿革、銀行功能、經濟運作的圖表，深入淺出，令人一目了然。前來參觀的人不但大開眼界，而且上了一堂大課。館內遊人如鯽，極一時之盛。恒生這樣高格調的宣傳，使匯豐與渣打的攤位相形見拙。

恒生館內各組展品的說明文字，有關古錢的由特聘考古專家執筆；有關現代貨幣、各國歷史、地理、經濟概況，以及銀行、經濟運作的說明文字，則主要由資料研究室提供。至於整個展覽的策劃和統籌，以及展覽館的設計、建築和佈置，則由文國鑾和陳蠡負責。恒生參加工展獲得各界好評，他們兩人居功至偉。

恒生在工展會的表現，是香港銀行界之創舉。恒生在社會的形像達到一個高峰。在此情形下，恒生雖然得到愈來愈多市民的愛戴，但亦因樹大招風而惹起銀行同業的妒忌。一九六五年流傳市面的惡毒謠言導致恒生遭受擠提。此與恒生工展會中的出位宣傳不無關係。一九六五年以後的三幾年，恒生、匯豐和渣打仍有參加工展會。最後匯豐與渣打索性不參加。

到七十年代，工展會不能繼續舉辦，原因是展覽會場佔用土地太多，而政府的土地供應又愈來愈少。廠商會向政府借用土地來開展覽會的申請，於是不得要領。工展會停辦後，恒生的古錢還繼續替恒生的「寓宣傳於教育」政策服務。遇有適當時機，恒生仍將這批珍藏公諸同好。恒生古錢展覽有時在香港舉行，有時在海外舉行。一九九二年，加拿大舉行「香港節」，恒生的古錢也被運送到多倫多展覽，為海外華人增添光彩。這是我記憶所及的最近一次海外展覽。

不少富商和大企業都有為社會培養人材的意念。這是他們道義上的責任，因為「取之社會，用之社會」是應該的。他們慣常做法為一次過捐出一筆錢或成立一個教育基金，很少像恒生般親身投入教育事業建設。基於初級銀行業務進修班和教育輔導組的成功，何善衡興起了辦學的念頭。一九六八年，恒生與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部合辦銀行管理文憑課程，由中大負責師資，恒生負責經費。有了這個經驗，恒生決定興辦一間非牟利的商業學院，讓那些有志投身商界及金融行業的青年人，未能進入大學的仍可得到專上程度的訓練。一九八零年恒生商學書院的成立，使何善衡的理想得到實現。

恒生商學書院的建校費用約為港幣五千萬元，全部由恒生銀行、何善衡慈善基金及恒生的數位董事捐贈。學院成立後，有關方面即成立了學院基金與校

董會，以保障學院的長期發展。以「博學篤行」為校訓的商學書院不收學費，有志者均可申請入學。學院舉辦兩年制的全日課程，主要科目為商業英文、中文、經濟、法律、會計及電腦。畢業生獲頒發商學文憑。開課後學院的每屆畢業生數以千計，大部份成為香港工商與金融業的從業員，小部份獲得獎學金到外國深造。深受中華文化薰陶的何善衡念念不忘青年人的品德修養。他認為商學書院的學生須融會新舊思想，畢業後不僅是優秀的商業人材，而且是奉公守法的良好公民。寓宣傳於教育，是恒生銀行一貫堅持的宣傳政策。這一政策對恒生的社會形像及業務發展有莫大影響。

第五節：銀行信貸與資料研究

五十年代，香港從轉口商埠開始向工業化轉變。六十年代，香港政府制訂法例，成立了香港工業總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等半官方機構，以支持工業發展。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香港工業生產從過去的「低檔勞動密集型」向「高檔技術密集型」逐步發展。憑着香港的優良地理環境和香港的傳統貿易經驗，香港工業產品得以遠銷世界各地，為香港賺取大量外匯，用以進口糧食、消費品、燃料、原料、機器，從而使香港經濟得以循環不息地運作，為香港人解決生活與就業問題。工業與貿易是香港的生命線。

香港經濟是資本主義信用經濟的一環。銀行在信用經濟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一向向各行各業提供信貸，搞活經濟。工業與貿易既然是香港經濟的最重要部門，所分配到的銀行信貸理應佔最大比重。但事實並非如此。根據香港布政司署經濟科的分析，在銀行業的本地貸放總額中，按行業及借款人分類，以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九年的平均數字計，佔比重最大的，依次為：建造業及物業發展業（17.6%）；批發及零售業（13.22%）；購買住宅樓宇人士（12.58%）；製造業（9.16%）；金融企業（9.07%）；進出口貿易（7.92%）。若把以上各分類調整一下，我們可以看到與房地產有關的放款所佔的比重達30.18%（17.6% + 12.58%），而與工業及貿易有關的貸款所佔比重僅17.08%（9.16% + 7.92%）。工業與貿易面臨如斯借貸比重，似乎與它們在香港經濟中的重要性不大相稱。銀行為什麼把信貸的重心放在房地產方面而不放在工業與貿易方面？在此不得不探討一下香港的土地與人口問題。

對香港來說，土地狹窄是先天性的局限。儘管政府不斷移山填海，香港土地面積的增加仍微不足道。四十年代末期，香港全境面積約為一千平方公里，到八十年代末期亦不過一千零幾十平方公里。但是同期內香港的人口卻不停地作幾何級數的增加。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香港人口僅六十萬人。一九五零年人口激增至二百三十餘萬人；一九六零年超過三百萬人；一九八零年突破五百萬大關。到九十年代，香港人口已超過六百萬。

政治比較穩定，是香港人口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政治穩定有利於經濟發展。在這大前提下，愈來愈多人嚮往香港，來香港定居、就業、經商。五十年代以

來，香港的政治地位雖然受到幾次衝擊，但終歸化險為夷，移入的人總比移出的人為多。因為經濟發達，市民生活質素得以提高，健康得以改善，出生的人數總比死亡的人數為多。移民差額和自然增長，與香港人口不斷增加有莫大關係。

基於上述原因，香港的房地產市場長期出現求過於供現象。供過於求現象的出現，屈指可數。由於香港人對土地及房屋有強烈需求，高地價、高樓價、高租金便成為香港經濟生活的一個現實，無怪與房地產有關的放款是銀行資金的最大出路。

物業發展商和購買住宅樓宇自居的人是房地產放款的主要對象。商人和用家購買物業自居或作投資時，也會成為銀行放款部的客戶。房地產放款基本上是按揭放款，借款人要將他購買的物業抵押給銀行。

銀行給予物業發展商的房地產放款多數以建築按揭放款方式進行（building mortgage loan）。銀行承擔物業建築費的全部或大部份，按物業施工的進程分期支付。與此同時，物業發展商將建築的物業抵押給銀行，並與銀行訂立分期還款計劃。

銀行給予購樓自居的房地產放款，通常是分期付款方式（instalment loan）。借款人只需付出樓價的小部份便可入住他要買的樓宇。餘下的大部份樓價由銀行墊出支付給物業發展商。借款人入住前付出的小部份樓價稱為「首期」（down payment）。「首期」的銀碼是多少，取決於銀行受理有關物業的按揭成數。例如物業值一百萬元而銀行只肯按七成，則「首期」要付給賣家三十萬元。其餘大部份樓價七十萬元則分為多期按月供款還給銀行。每個月的供款包括本金及利息。

香港銀行向廠家提供的信貸，很多以廠房作為抵押。這方面進一步解釋了為什麼房地產貸放在銀行的總貸放中佔如此高比重。

房地產放款本金銀碼大，利率高，是一種非常有利可圖的生意。做一宗房地產放款，比一連做幾宗其他類別的放款更為划算。不過做生意總是不能排除風險。不同種類的生意有不同程度的風險。

除非樓宇在建築過程中已經預售，或建築完成後即出現大量買家，建築按揭放款的風險頗大。誠然，房地產市暢旺時不少發展商售「樓花」所得的錢已足夠償還銀行的債務。不過如社會經濟突然衰退，新建成的樓宇將很難出售，此一情況的發生將會令到發展商資金週轉不靈，無力償還債務，從而使銀行蒙受損失。

以樓宇用家為對象的放款風險較少。香港人口不斷增加，「居者有其屋」是一般市民的生平願望。隨着入息增加和生活水準提高，借款人甚少不履行還款義務，除非有極不尋常的政治、經濟、社會動亂在香港發生。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延及香港，工商業萎縮，有錢的競相移民外國，物業價值下跌，銀行受到拖累。港人對此記憶猶新。

舊式生意人出身的恒生銀行首腦們，抱着「不熟不做」和「腳踏實地」的宗

旨去經營他們的信貸業務。有實質抵押品在手的房地產按揭放款是他們的首選。樓宇分期付款式的放款是恒生盈利的主要來源。由於借款人每月供款，銀行有經常性利息收益。其次，銀行貸款本金按月減少，安全性逐月增加。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恒生一直保持它在樓宇分期付款式放款市場中的領導地位。其他銀行叙做樓宇分期付款式放款時，均以恒生制訂的按揭成數及利率為馬首是瞻。多年以來，恒生不但幫助了不少地產發展商發達，也成全了許多市民做業主的心願。

對香港房地產市道的長期走勢看好，是恒生敢於大做房地產放款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此因素的形成來自這麼一個信念：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有助於中國走向現代化。香港的政治地位可能因中國要洗脫百多年來的國恥而有所改變。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將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維持下去。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仍有許多人會在香港定居和進行各種經濟活動。他們對住宅、商業、工業樓宇的需求依然殷切。

在享受房地產放款的豐碩成果之餘，何善衡、何添、利國偉等也體會到「不可把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籃子裏」的原則。他們更不能忽略了銀行受社會所託，有促進經濟全面發展的義務。六十年代開始，恒生已着手發展對進出口商及製造業的信貸業務，儘管從這方面得到的利潤遠不及房地產放款。當時較具規模的工商企業大部份與匯豐、渣打及其他大外資銀行來往。前來恒生要求信貸的多數是中、小型商戶，特別是店舖設在恒生總行附近，經營布疋、洋雜、家庭電器、海味、雜糧、進口、批發、零沽的商人。他們以華人傳統方式做生意，恒生為他們提供往來存款、物業按揭，及貨物進出口押匯服務。他們與恒生的主事人有共同語言和文化背景，恒生職員對客服務態度良好。因此他們樂於惠顧恒生。他們的口碑有助日後恒生對工商業融資業務的進一步發展。

六十年代後期恒生開始在多層工業大廈林立的九龍新蒲崗、官塘、深水埗、長沙灣，以及新興的荃灣等地區設立分行，向工業信貸市場進軍。在「大有大做、小有小做」的原則下，恒生走自己的路線。正當匯豐、渣打等外資銀行扶植大工廠之際，不少成衣業、玩具業、塑膠業、五金業、電子業的中、小型廠商成為恒生的客戶。恒生幫助他們成長。很可惜，好些中小型廠商成長之後，業務擴展，信貸需求增加，恒生由於作風保守，未能因應供給所需之信貸要求，不少恒生一手扶植的廠家另尋出路。

貸款給客戶或向客戶提供融資服務，除了考慮客戶交來的抵押品之外，還要考慮客戶的資力和信用。評估客戶的資信要看他的品性（character）、能力（capacity）和資本（capital）。品性指客戶做人和生意的道德水準；能力指客戶辦事與做生意的才幹；資本指客戶的資產和財力。這是銀行對客授信的「三C」。「三C」狀況良好，說明資信較佳，值得信賴。反之，說明客戶的資信欠佳，對他的授信必須謹慎。

調查客戶的資信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成功的調查員必須有商場經驗、機警的頭腦、良好的人際關係和鍥而不捨精神。首批為恒生銀行調查客戶「三

C]狀況的調查員多數是銀號時期的「行街」出身。所謂「行街」指專為銀號在市場聽取金融行情，打探同業及消息，和招攬生意的外勤人員。在何善衡、何添等教導下，他們是銀號的耳目，為銀號的業務發展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改營銀行後，恒生的業務範圍擴大，除傳統的黃金買賣、貨幣找換、物業按揭之外，還有進出口押匯及各種不同形式的金融服務。客戶的種類已不限於銀號時期已有來往的舊式商號。隨着形勢發展，恒生的客戶資信調查工作也要來一個制度上和人事上的改進。礙於缺乏現代經濟、工商業知識，「行街」出身的調查員在需要對事物作更深入分析時，實在力有不逮。但是銀行當局又不能一下子聘請有學識的青年來代替老幹部。第一個步驟是培訓老外勤人員，向他們灌輸現代經濟、工商業知識。第二個步驟為招聘教育水平較高，通曉中、英文和識講英語及國語的專上學院畢業生，來增加外勤隊伍的實力。第三個步驟是土、洋併舉，舊外勤人員的社會經驗與新外勤人員的現代學識結合起來，互通有無，互教互學。第四個步驟是分工合作，將外勤人員分為兩批，一批屬業務促進部，另一批屬調查部。業務促進員與調查員的工作是相輔相成的，促進員有時兼任調查員，調查員有時兼做促進員，視乎工作優先及環境需要而定。

外勤人員隊伍的編整和擴大，給予資料研究室一個發揮更多作用的機會。我們搜集及積累得來的有關香港及國際政治、經濟、金融、貿易資料正是培訓外勤人員的好教材。在外務處主任和資料研究室主任領導下，業務促進員、調查員、研究員經常舉行座談會。在座談會中，研究員向外勤人員報導最新的香港及國際經濟發展因素及背景。外勤人員從座談會中吸取的知識有助於他們執行客戶資信調查和為銀行爭取生意的任務。

客戶資信調查有兩個方式。其一是正面調查，其二為側面調查。正查包括到政府的公司及商業註冊處抄錄客戶商號的董事及股東名單；向客戶索取資產負債表帶返銀行交信用部分析；到客戶的店舖或廠房視察。側查包括與客戶的同業、供應商、顧客傾談，從中探取有關客戶資信的線索，取得線索後繼續明查、暗訪。恒生外勤人員的側查工作，與我在美國領事館難民救濟部做的側查工作頗為類似。

到客戶的店舖視察要留意「舖神」。所謂「舖神」指店舖的門面是否整潔，陳列的貨物品種多不多，款式是否新穎，員工的工作與對客態度是否認真和友善。視察工廠時更要仔細。整個生產過程、由注入原料以至製成品完工，由品質控制以至包裝付運，都要過目。視察時還要看廠房建築是否符合安全標準，機器設備是否先進，原料的儲存是否充足。在進行視察的同時更要向工廠領導人、工程師、技術人員查詢有關勞資合作、生產計劃、產品改良、市場研究等問題。除了調查員，資料研究室和信用部的人員也不時參與視察工廠。

有關客戶個人品性、能力和財力的資料，多數從側查得來。外勤調查員有點像偵探，四處找尋線索。他們經常與人交際應酬，務求從言談中取得情報。客戶的私生活是否正常，有無不良嗜好，與人交往是否誠懇，做生意的手法是太過保守，抑或勇進，有無事業成功或失敗的紀錄，本身及家族擁有多少物業及

其他資產。這些都是調查員想得到的情報。恒生首腦們社會經驗豐富，交遊廣闊，知道許多商場內幕消息，本身就是精明的調查員。外勤人員千辛萬苦，從四方八面得來的客戶資信情報，往往不及善伯、添伯等與工商名流摸着酒杯底傾談時得來的準確。不過外勤人員仍要盡力而為，因為善伯、添伯得到的情報有時需要外勤情報來印證。

恒生的對客授信制度十分嚴謹。風險較少的信貸項目由信用審查委員會批准。信用審查委員會簡稱信審會，成員包括總經理、副總經理、總務處主任、營業處主任、海外處主任、分行管理處主任、外務處主任、信用部主任、提出授信建議的有關部門主管、和資料研究室主管。風險較大的信貸項目由信用貸款委員會批准。信用貸款委員會簡稱信貸會，成員包括信審會的成員另加董事長。信用部主任是這兩個會議的主席，但在會議席上說話最有份量的則是總經理和董事長。

恒生銀行的高級職員簽署制度，是對客授信管制的另一個關鍵。有一定簽字權的職員，可簽署一定銀碼的文件，包括對客授信的文件。銀碼大小視乎該職員的職級或工作需要而定。

信用部是銀行的對客授信控制中心，負責管理所有授信客戶的檔案，編寫信審會及信貸會的議案，紀錄會議的決議，監察各營業部門的對客授信運作過程。信審會及信貸會的議案有詳細內容，包括有關營業部門提供的客戶來往紀錄，信用部提供的客戶資產負債表分析報告，外務處提供的客戶資信報告，和資料研究室提供的客戶所屬行業近況報告。信審會的決議由會議成員舉手表決，少數服從多數。信貸會的決議用不記名投珠方式表決。投珠者為董事長、總經理、五位處主任，和信用部主任。投白珠表示同意，投黑珠表示反對。每次投珠必須是清一色的珠才可通過議案。換言之，風險較大的授信要高層人士一致贊成才能落實。通過的授信額（line of credit）可能只是一次過使用，也可能是在一定期間，如一年之內，循環使用。循環使用的授信額滿期後，可以續期，銀碼可以增加或減少，視乎銀行與客戶的來往過程是否滿意而定。授信額的每次續期或增減銀碼都要提交信審會、信貸會討論通過。

關於對客授信，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對紡織業廠商的授信。輕工業是香港經濟的基礎，而紡織業則是輕工業的主幹。港產紡織品出口的總值，佔所有港產品出口總值百五十以上。香港有千百間從事紡織、製衣業的工廠。它們的運作在在需要銀行的融資。銀行對廠商的授信承擔十分可觀。銀行對這些廠商的授信，除了考慮一般性的「三C」原則，還有一個特別考慮。這個特別考慮是廠商的出口配額。配額指某一種產品每年輸往外國的數量限額，英文名稱為「quota」。

香港紡織品口限制的始作俑者為英國。二次大戰後，英國的棉紡織業衰退，香港的棉紡織業則日益蓬勃。考其原因，為香港勞動力較廉，而機械則較先進。為了保護國內紡織業，英國要求香港「自動限制」棉織品輸英。在宗主國面前，香港没法抗拒，只得簽訂「自動限制」條約。是為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的蘭

開夏協議(The Lancashire Pact)。蘭開夏是個工業城，是英國的紡織業中心。

有了先例，其他購買大量港產紡織品的國家，如美國、西歐諸國、加拿大等，也相繼與香港談判，要求香港「自動限制」紡織品出口。香港與這些國家簽訂了貌似公正，其實是不平等的雙邊協議。最近的協議稱為多邊纖維協議(Multifibre Arrangement)，簡稱MFA。MFA衍生自七十年代的長期棉織品貿易協議(Long Term Arrangement Regarding Trade in Cotton Textiles)，簡稱LTA。LTA衍生自六十年代的短期棉織品貿易協議(Short Term Arrangement Regarding Trade in Cotton Textiles)，簡稱STA。STA以蘭開夏協議為藍本。香港與美國的雙邊協議最為重要，談判過程最為艱巨，因為美國是港產紡織品的最大買家。根據這些雙邊協議，每種輸往這些國家的港產紡織品都有一個配額。配額限制了每種產品的出口數量。例如：棉布輸英的數量每年不得超過十萬平方碼；棉質男裝外衣輸美的數量每年不得超過五十萬打；毛質女裝內衣輸加拿大的數量每年不得超過二十萬打。

有關產品的配額，是根據該種產品在一個規定期間內（例如三年或五年）的出口實績而釐訂的。香港政府貿易代表與各國貿易代表的談判，主要是雙方討價還價，港方盡力爭取較多配額，對方以本國利益為依歸，盡力抑制香港的請求。香港談判代表取得配額後，政府工商處根據各廠商在同期內的出口實績，將配額按比例分給廠商。有了配額，廠商可有計劃地生產，只要有訂單，生產的貨品不愁銷不去。在此情形下，銀行對廠家的授信多一重保障，放心給予廠商更多融資便利，從而多做生意。資料研究室很注重香港紡織業與紡織品出口市場的研究。

資料研究不但在對客授信方面派用場，而且在業務促進方面起作用。董事長、總經理，以至各處、部主管在制訂業務政策和計劃時，每每需要參考資料研究提供的各種財經統計資料。營業處特別需要有關存款及貨幣供應、貸款及墊款、資本市場、股票市場、黃金市場、物業市場的資料。海外處特別需要有關本地產品出口、轉口貨物、入口貨物、留用入口貨物、港元匯市、利率的資料。分行管理處特別需有關香港人口分佈及工商業分佈的資料。外務處特別需要有關各工商行業的資料。董事長、總經理、總務處主任特別需要有關香港金融管理及香港經濟全面概況的資料。

因為在職務上和工作上逐步與銀行的正規業務掛鉤，資料研究室從一個可有可無的部門發展成為一個不可缺少的單位。

六十年代以前，香港沒有完備的經濟資料統計系統。各個政府機關以及各個工商社團都有本身一套統計。由於概念與工作方法不盡相同，它們做出來的統計難免重複或混淆不清，一時令人無所適從。當時較為完備與可靠的統計，是香港政府工商處編著的進出口貿易統計。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對外貿易是香港經濟所依。進出口統計是當時研究香港經濟的最重要數據。

我於一九六二年擔任資料研究室主管後，第一個對外聯絡任務就是往工商處取經，與該處的貿易統計人員打交道，並訂購該處出版的貿易統計月刊、

季刊及年刊。工商處的貿易統計部後來獨立，成為政府統計處，統籌兼顧全港的社會及經濟統計事務。成立以來，政府統計處與恒生銀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絡。

政府統計處出版的刊物，無疑有助資料室進行研究工作。但統計數字畢竟是靜態的資料，只反映各種經濟活動的過去表現。如要把握經濟活動的脈搏和預測經濟發展的趨向，我們不能閉門造車，必須向外界取經。銀行同業與工商團體的經濟研究人員、大專院校經濟系教授和講師、報館及雜誌社的財經版編輯和專欄作家、香港政府及外國政府駐港機構的經濟分析員等都是我們聯絡的對象。

六十年代後期升任總經理的利國偉先生開啓了我取經的路向。因為恒生與匯豐的關係，他介紹我認識匯豐的經濟顧問穆迪先生(Mr. Moody)。跟着穆迪先生又介紹另一位匯豐經濟專家饒餘慶先生(Y. C. Jao)給我認識。匯豐銀行年報的主席報告文稿主要由穆迪先生執筆。饒餘慶則替匯豐作各種經濟研究。我起草恒生董事長週年報告時，他們兩位向我提供不少意見。

七十年代後期，穆迪與饒餘慶相繼離開匯豐。穆迪返英國，饒先生到香港大學經濟系當講師。此後匯豐的經濟研究系統也有所改變。一位印度籍的 P. K. Patel 先生負責匯豐香港總行的經濟研究。匯豐集團的經濟研究部則由鄭海泉先生(Vincent Cheng)任經理。從此恒生與匯豐的研究人員來往更為頻密。我與 Patel 及鄭海泉經常互訪，交換研究心得和討論香港及世界各地的經濟問題。

經利先生的提點，我繼續發展我的銀行經濟研究員社交關係。除了匯豐的 Patel 與鄭海泉之外，萬國寶通(Citibank)的陳健民(Francis Chan)、渣打的李健(James Lee)、美國銀行的香樹輝等都曾經是我的同行朋友。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的方善桂副理是中國銀行的一位經濟專家，曾留學外國取得博士學位。在香港銀行界知名度頗高的方博士也是我取經對象之一。我曾多次向他們請教有關香港及中國的經濟問題。

通過饒餘慶博士的介紹，我參加了香港經濟學會。該會的會員主要是香港大學及其他專上學院的教授和講師。香港大學經濟系的夏冷漪教授(Professor Ronald Hsia, Ph. D.)是當時的會長。財經界、工商界及政府財經部門的官員也可被接納為學會的會員。我是其中之一。學會不時舉行研討會和午餐演講會。我很少放棄參加這些叙會的機會。學會出版的刊物是資料研究室重要參考書籍之一。參加任何學會不但使我能夠吸收知識，而且結交了不少志趣相同的朋友。

從報紙及雜誌剪下財經、工商業新聞片段和有關的專題文章，並將之放入分門別類的資料檔案內，是資料研究人員日常工作的一個重要部份。為了使檔案內容更為充實與及時，以及使研究員能對當前的經濟活動有較深認識，經常與報館及雜誌社的財經編輯與專欄作家聯絡，是我的一個重要任務。我與他們來往是互利的。我向他們打探市場消息，他們向我打探銀行消息。

七十年代以前，香港的報紙多數只着重本地社會新聞和國際的政治新聞。只有《華僑日報》、《大公報》和英文《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備有像樣的經濟版。至於以刊載財經文章為主的雜誌則僅有《經濟導報》與英文《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兩家。《大公報》和《經濟導報》被人認為是的左派的報刊，讀者不多。《華僑日報》代表傳統香港商人的心聲。《南華早報》是港英政府和英國大商家的喉舌。《遠東經濟評論》與《南華早報》則是居港外僑及洋化華人知識分子的讀物。經過詳細閱讀上述各種報刊後，我發覺它們的政治立場不大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們的立論與報導能否幫助我了解及分析當前的經濟情況。在這方面，我給予《大公報》和《經濟導報》的分數是頗高的，儘管在某些地方它們有偏見。

踏入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以前不重視財經新聞的報紙，如親共的《文匯報》，親國民黨的《工商日報》，中間偏右的《星島日、晚報》及《英文虎報》(Hong Kong Tiger Standard)也相繼增加經濟新聞的篇幅。以刊載金庸武俠小說出名的《明報》兼出版以報導財經新聞為主的《明報晚報》。《明報晚報》的編輯為林山木，又名林行止。他在明報集團任職不久便離去，自立門戶，創辦《信報》，以更富學術性的態度來報導財經消息。此時美國的《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也覬覦香港的財經傳媒市場，在香港出版《亞洲華爾街日報》(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以上各報刊的編輯和記者時有與我見面，成為我的取經對象。他們之中給我印象較深的有《華僑日報》的李剛，《大公報》的黎裘，《星島晚報》的潘朝彥，《亞洲華爾街日報》的秦家聰(Frank Ching)，《文匯報》的張雲楓，《遠東經濟評論報》的顧汝德(Leo Goodstadt)和宋凱沙(Kayser Sung)。顧汝德和宋凱沙後來相繼離開《遠東經濟評論》，前者成為自由作家及財經顧問，後者主辦《亞洲紡織月刊》，成為研究香港紡織業的專家。以上各人之中，顧汝德和我的關係最為密切，因為他是恒生銀行的特約財經顧問，對資料研究室的工作有很大幫助。

與香港政府新聞處聯絡，使我向傳媒取經達到更高層次。新聞處是香港政府與傳媒的中間人，是發放政府消息的中樞，也是傳媒活動的監管人。通過利總經理的介紹，新聞處的首席新聞主任孫元壯(Robert Sun)給我許多方便，使恒生資料室能像報館一般以第一時間取得政府的新聞公佈。其中對恒生最有用的，當然是財政司的政府財政預算案演詞，和香港總督的週年施政報告。新聞處設有一個參考圖書館，藏着許多有歷史性和參考價值的報紙新聞剪貼，以及林林種種與香港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有關的書籍和刊物。圖書館原來只供新聞處職員，其他政府部門高級職員，和認可的新聞從業員使用。與恒生稔熟後，新聞處讓我和我的同事也成為該圖書館的經常訪客。

政府統計處與恒生銀行的關係更為密切。這要拜利先生之賜。利先生不但在商場上有地位，而且受到香港政府的賞識，委任他為立法局議員。因為這緣故，他深受政府高官的敬重。他與財政司及以下掌管財經事務的官員特別有交

情。一九六八年政府統計處成立不久，他便着我進謁第一任統計處長彭德(Barnett)，請求給予方便，讓我隨時到統計處索取或閱讀貿易及其他與香港經濟有關的統計資料。自彭德開始，我繼續與第二任處長陶健(Topley)，第三任處長Whitelegge，及第四任處長Greenfield 打交道。

我與統計處長的聯繫，主要是禮貌上的來往。與他以下的三位助理處長的聯繫才是我真正得益。統計處的第一助理處長莫乃鏗(Benjamin Mok)負責總體性的統計(General Statistics)，第二助理處長吳國樑(Gordon Ng)負責經濟統計(Economic Statistics)，第三助理處長李文江(Joseph Lee)負責社會統計(Social Statistics)。香港的第一個詳細人口普查報告是由莫乃鏗負責的。第一個人口普查報告於一九七一年出版，以後每隔十年香港政府舉行一次人口普查。八十年代後期第四任統計處長任滿，莫乃鏗成為第五任統計處長。由於恒生是一個財經機構，資料室所需的統計資料多數來自吳國樑管轄下的部門。吳先生不時與我的同僚討論經濟問題，還向我們傳授統計技術。因而我與他的來往也較與其他三位助理處長的來往密切。

統計處在香港的經濟事務中扮演一個頗為重要的角色。布政司署經濟科(Economic Services Branch, Government Secretariat)寫作的經濟概況報告(Economic Background)，和財政司發表的財政預算報告，其立論在在需要統計數字來支持。更為湊巧的，是在我所熟悉的統計師當中有不少人日後成為政府的高級財經事務員。任志剛(Joseph Yam)、黃邱詠兒(Mrs. Annie Wong)、鄧廣堯等，都是先在統計處任職，然後調到經濟科工作的。他們由統計師(Statistician)變為經濟師(Economist)。任志剛升至助理金融事務司(Assistant Secretary for Monetary Affairs)。黃與鄧則升至助理經濟司(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任、黃、鄧等曾經是恒生銀行資料研究室的朋友。我不時向他們請教，並與他們討論香港財經問題，獲益良多。任志剛後來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金融管理局總裁，鄧廣堯則為特區政府經濟顧問。

香港是一個國際貿易及金融中心，中、外商人雲集。本地商人有香港總商會及中華總商會。外國商人也有他們的商會，其中以美國商會的規模最大。恒生是香港總商會及中華總商會的正式會員，又是美國商會的非正式會員。正式會員有投票權，非正式會員沒有投票權。恒生要派出高級職員往各商會，參與商會的活動。代表的工作往往由我擔當，原因是營業部門的高級職員工作繁忙，不能隨時離開崗位。各商會的執行幹事和秘書長，與我頗有交情。我們不時交換工商業及經濟情報。除了以上三個商會之外，我也與其他工商業團體聯絡，包括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等。我與廠商聯合會秘書長李澤培、工業總會總幹事陳樹安、生產及促進局總幹事陳少感等的關係亦頗密切。

參加工商團體的例行午餐或晚餐演講會，是我取經的另一途徑。在這些場合我有機會結識工商各界朋友和得到有關經濟及工商業的最近消息。香港外

國記者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和馬可孛羅會(Marco Polo Club)舉行的演講會，更常常談及敏感性的財經與政治問題。參加它們的演講會可以增加我對香港及國際財經與政治形勢的認識。

外國記者會是國際性的組織。凡是到香港採訪新聞的外國記者都自動成為該會的會員。本港新聞從業員也可申請入會。通過會員的介紹，不少本地的工商界與專業人士也成為該會的會員。政府新聞處的孫元壯先生是我入會的介紹人。因為香港是西方進行中國觀察的理想地方，來香港的外國記者對中國問題特別感興趣。馬可孛羅會的發起人為一群親中國的專業人士、文化界與商人。陳丕士大律師是其中之一。他們為了要了解中國國情、中國對外貿易、中西文化交流而聚合。記者會有會所，內有餐廳、新聞發報及收報設備、新聞資料室、參考圖書室等。會所位於中環遮打道，後遷雪廠街。馬可孛羅會是一個鬆散的會社，沒有會所，和扶輪會或獅子會相似。會員的叙會多以午宴或晚宴形式舉行，地點通常是大酒店的餐廳，每次叙會都有專題演講。以上兩個會社的演講會吸引不少關心中國的聽眾。我盡量找機會參加這些演講會，因為中國與香港的問題遲早會列入資料室的研究日程。

美國是香港產品的最大市場，香港引進許多美國資金與技術，美國官方視香港為大陸觀察站，美國商人視香港為未來進軍大陸的灘頭堡。因為曾在總領事館任職，我與總領事館商務部及經濟部的華籍高級職員稔熟。憑着舊同事關係，我從他們口中和展示給我的資料中得到好些有關美國經濟及港貿易的資料。這些資料對何善衡、梁鍊琚、何添、利國偉等很有用。原因是恒生銀行和大昌貿易行與美國的銀行及商行均有不少生意來往。

恒生銀行總行大廈頂樓有一個地方寬敞，設備齊全，裝飾華麗兼有廚房的宴會場所，好像一間大酒樓。何善衡董事長命名這場所為博愛堂。由外務處交際組管理的博愛堂有一個大宴會廳和一個貴賓廳。大宴會廳可筵開數十席。沒有大宴會時，管理人員用活動隔板將大宴會廳改為幾個小宴會廳。貴賓廳的裝修特別幽雅，廳的一幅牆壁掛着孫文手寫「博愛」兩字複製版的匾額。孫中山先生的博愛精神似乎與商人的交際、應酬、宴客不大相稱。不知善伯以「博愛」來命名這一宴客場所是基於對孫中山先生的崇敬，抑或基於商人附庸風雅心理使然。不過無論如何，在促進恒生業務及樹立恒生形象方面，博愛堂的確有其作用。

何善衡、何添、利國偉等不時在博愛堂招待香港的金融、地產、工商巨擘，一方面聯絡感情，一方面互相取經。國際財經專家，香港政府高官，各國駐港領事、副領事，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社長、副社長，以至從英倫、中國大陸來港訪問的政要也是貴賓廳的座上客。各營業部門負責人與客人談生意時，小宴會廳最派用場。我常常與我的銀行界、新聞界、商會、學會、政府部門、領事館朋友在小宴會廳舉行座談會。每年春節，恒生的首長與高級職員在博愛堂以酒會或晚宴形式招待客戶和友好。每年的十二月至翌年二月是香港人吃蛇羹補身的季節。博愛堂的蛇羹媲美太史公的烹調。據說，恒生專聘的蛇羹廚師李財曾在江太史

家打工。蛇讎是恒生公關的一個絕招。與外界交際應酬是銀行做生意的一種手法。對資料研究室來說，與外界交際應酬等於廣闊資料來源。

第六節：恒生指數，恒生消費物價指數與統計諮詢委員會

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英資財團控制的金融、貿易、公用事業、房地產、交通運輸公司在香港經濟中佔壟斷地位。通過發行股票向社會籌集資金是這些公司得以不斷發展的一個因素。新發行的股票以公開發售或包銷方式易手。投資者，包括公司原有股東和社會各界人士，可按發行說明書的價格認購股票。包銷是指商人銀行向發行公司保證以某一固定價格承擔發售所有股票的風險，包銷商則賺取固定價格與發售價格的差距，或某種協定費用。認購、包銷程序完成後，新發行的股票便可在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自由買賣。換言之，股票的發行以至上市要通過兩個市場。第一市場（primary market）由新股發行公司和包銷商組成。第一市場又稱發行市場。第二市場（secondary market）是已發行股票擁有權轉讓的地方，由證券交易商、證券經紀和證券交易所組成。第二市場又稱證券交易市場，俗稱股市。

香港的第一個證券交易市場是一八九一年成立的香港股票經紀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tockbrokers in Hong Kong）。一九一四年，協會易名為香港證券交易所（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一九二一年，第二個證券交易所成立，名為香港證券經紀協會（The Hong Kong Stockbrokers' Association）。一九四七年，這兩個機構合併，易名為香港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從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這是香港唯一的證券交易所，交易所的會員經紀大部份為外籍人士和通曉英語的高等華人。而有股票上市的公司則主要是上述的英資大企業。

從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香港股市的規模不大，上市股票不到一百隻。一九四九年中大陸政權易手，一九五零至五三年的朝鮮戰爭，一九五六年親國民黨份子的暴動，一九六五年的銀行風潮，以及一九六七年由中國文化大革命引起的騷動，均妨礙了股市的發展。一九六七年騷動平息後，因騷動而撤離香港的資金陸續回流，工商業活動漸趨正常，房地產價格回升，香港經濟開始穩步增長。在此情況下，許多公司將股票上市用以籌集發展資金。這些公司不但包括歷史悠久的老牌英資公司，也包括新成立及有潛質的華資公司。與此同時，由於看好前景，市民買賣股票作長線投資或短線投機的意欲也日益旺盛。

隨著香港經濟的發展和市民投資意欲的日益旺盛，原有的一間證券交易所——俗稱「香港會」的香港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不足以應付上市公司與投資者的要求，特別是華資公司與華人投資者的需求。於是新成立的交易所相繼參與香港股市的遊戲。俗稱「遠東會」的遠東交易所有限公司（The Far East Exchange Ltd.）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成立。俗稱「金銀會」的金銀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The Kam Ngan Stock Exchange Ltd.）於一九七一年三月成立。俗稱「九龍會」的九龍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The Kowloon Stock Exchange Ltd.）

於一九七二年一月成立。

遠東會的成立打破了香港會壟斷股市的局面。一九七零年遠東會的成交值僅稍低於香港會。至一九七一年遠東會的成交值已超過香港會，此後一直是四個交易所的大阿哥。歷史悠久的香港會固步自封。它的成交值在七一及七二年只能排行第二，至七三年更降至第三位。金銀會七三年開始一直是第二大交易所。九龍會歷史最短，規模也最小，對整個股市無足輕重。

匯豐銀行屬下的匯豐財務有限公司，是六十年代末期以來最早在香港股票第一市場經營上市公司股票包銷業務的機構之一。隨着股市愈來愈旺盛，多間本地及外商銀行亦相繼成立附屬財務公司，與匯豐財務競爭。恒生財務有限公司的成立，也使恒生在第一市場分一杯羹。不少中型公司股票的上市，交由恒生財務包銷。匯豐財務或其他財務公司接到大宗包銷生意時，也經常將部分生意分惠恒生。除了為上市公司服務之外，恒生更着重為投資者服務。

恒生銀行附屬機構之一的恒生（代理人）有限公司以代客買賣及保管股票為其主要業務。該公司與證券經紀有密切聯絡。客人要買賣股票時不須直接找經紀，恒生（代理人）有限公司可以代勞。客人買下的股票放在銀行保管庫內。有關股票的事項，如派息、拆股、派紅股、開股、供股等，客人不用操勞，一切可由代理人公司經辦。以前利用代理人公司服務的客戶多數是有錢人家。一九六八年以後股市蓬勃，稍有積蓄和對股票有興趣的人都樂於利用恒生服務。每營業日，代理人公司的辦公室櫃檯前擠滿前來買賣股票與詢問股市行情的人。為了疏導客人進出辦公室的流量及向他們提供股市行情，恒生特別在代理人公司辦公室附近開闢一個內有多排坐椅及接駁交易所大堂閉路電視機的房間。客人可在這房間內輪候辦理股票買賣手續及觀看各種股票的交投情況。不少經紀行及投資公司也設有類似的房間。這是香港股市「金魚缸」的由來。為何稱此類房間為「金魚缸」不得而知，相信與許多人聚在一個小房間內出現人頭湧湧現象，有如許多金魚在缸內游來游去有關。

香港證券交易所於每天收市後即印發一份行情紙（Daily Quotations）。行情紙報導每隻股票的交投動態，包括成交的股數和成交價，以及每天全個股市的總成交值。上市公司的消息，如合併、收購、業務發展計劃、派股息、派紅股、股票面值拆細、開股、供股等，也印在行情紙上。行情紙是經紀和細心投資者必讀的刊物。報紙、電視台、電台等傳播媒介則根據行情紙來報導股市新聞。行情紙刊載的資料無疑十分有用，但未能簡明地指出股市的動向，好讓讀者根據它來作較明智的投資決策。

要明瞭一隻股票的表現強弱，我們可以從股價的升降來衡量。但要觀察一個有數以百計股票掛牌買賣的市場的表現，我們便需有一個指數了。世界各大證券市場都有一個股市指數，例如紐約的「道瓊斯指數」、倫敦的「金融時報指數」、東京的「日經平均指數」、新加坡的「海峽時報指數」、多倫多的「三百指數」等。香港股市的有一個指數始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該指數名為「恒生指數」，是由恒生銀行資料研究室編製的。

「恒生指數」的編製有一個獨特背景。自經營銀號以來，何善衡、何添等從買賣黃金、外匯、股票中賺大錢，他們有豐富的投機和投資經驗，證券投資是銀行資金出路之一。恒生銀行每年的盈利有一可觀的部份來自證券投資。六十年代後期股市開始迅速發展，在股市中，大金融機構固然得益匪淺，跟風的小市民也有所獲。基於上述原因，何善衡、何添、利國偉等認識到為己為人恒生銀行都要研究出一項對投資者有用的服務。於是利總經理和他的同事便有編製一個指數以測度股市走勢的構思。這一構思甚得何董事長欣賞，因為股市指數不但是對銀行本身的一項服務，也是對社會的一項服務。更重要的是善伯一直有寓宣傳於服務的設想。一個以恒生為名的股市指數天天在證券交易所的行情紙、報刊、電視和電台廣播中出現，其宣傳效果之大將無可估量。這是編製恒生指數的因由。資料研究室的成立乃係為銀行做種種研究工作，編製恒生指數的任務落在我肩膀上是很自然的事。

資料研究室於一九六九年初開始編製恒生指數的時候人手不大充足。當時我手下的工作人員平均教育水平不高。除了一位大學畢業生和一位大學預科生外，其餘同事只有中學程度。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畢業的溫廷偉和拔萃書院中六畢業的鄭棣培是我早期的得力助手。七十年代中期，溫廷偉調到銀行的另一部門工作，接任的為陸觀豪。陸君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經濟學）學士，後來又取得中文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鑒於編纂、計算恒生指數工作及經濟研究工作日益重要，行方於七十年代後期加派黃健群來做我的助手。黃君畢業於英國華威大學，獲經濟學士學位，並於倫敦經濟學院取得碩士學位。恒生指數編纂工作之得以不斷改善和恒生銀行經濟研究工作的得到財經界、學術界、新聞界認同，溫、鄭、陸、黃四位同事居功至偉。

為了使指數編製工作能順利展開，利先生着我首先去拜訪香港交易所副主席莫應基和政府統計處處長 Topley，向他們說明編製股市指數的動機和意義，並請求他們在技術上給予幫忙。莫先生關照交易所的經理讓我和溫廷偉到交易所圖書室翻閱並抄錄了年來交易所出版的行情紙和月刊、年報。Topley 先生介紹我們認識助理處長吳國樑先生。吳先生是統計專家，負責經濟統計。他與我們開了多次會，研究用那一個方式去計算指數。匯豐銀行及若干友好銀行同業的研究人員也曾經與我們討論與指數有關的問題。結果我們的共識是以加權資本市值法（weighted market capitalization method）來計算恒生指數。

以加權資本市值法計算的股市指數是「拉斯貝爾式加權價格指數」（Laspeyre's Type Price Index）。所謂資本市值（market capitalization）是指全部股份按市價計算的總值，即股份發行數目乘以相應市值。所謂加權（weighted），指股票發行股數作為權數。發行股數愈多權數愈大，權數愈大，資本市值也愈大，因而影響指數水平的能力也愈高。

理論上，根據全部上市股票的資本市值來計算指數是最能反映股市的整體表現的，但實際並非如此。每隻股票的市場表現不同。有些股票的買賣非常

活躍；有些股票的交投淡靜；有些股票無人問津；有些股票因其發行公司經營不善，上市不久便被交易所除牌。若把全部股票的資本市值都包括在內，計算出來的指數會因某些股票沒有成交價或某些股票忽然停止買賣，而不能較正確地反映股市的表現。一個被歪曲的指數將會誤導投資者。因此我們以成份股辦法來解決這問題。我們從全部上市股票中選取一批有代表性的股票作為成份股（component stock）。這批股票要兼顧各個行業。它們的總資本市值及總成交值必須在全部上市股票的總資本市值及總成交值中佔絕大比重。個別成份股的發行公司必須在其所屬行業中有地位，資本雄厚，有良好業績，財政穩健，有發展前景。恒生指數有三十三隻成份股，在數目上只佔全部上市股票總數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但是多年以來，恒指成份股的總市值和總成交值均佔大市總和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如何決定指數的基日（base day）是編製股市指數的一個課題。編製恒生指數時，我們要追溯一下香港股市的發展史，由一九六九年初追溯至一九四七年，香港證券交易所成立的時候。四七至五八年，香港經濟尚未起飛，股市靜寂。一九六五至六七年，香港股市受銀行擠提、地產跌價、政治騷動影響，出現不尋常的跌勢。即使沒有經濟不安或政治動亂，股市亦會受季節性的工商業活動影響。每年春季，許多上市公司宣佈業績、派發股息或紅股。每年的冬季往往是工商業特別需要資金週轉的時候。這些商業活動都會影響股市的走勢。六八年底六九年初的時候，中、小投資者湧入股市，各類股票的造價有點不合理。經過幾許考慮，我們選擇一九六四年七月卅一日為恒生指數的基日。一九六四年是股市表現較為平穩的一年。七月卅一日甚少公司宣佈派發股息或紅股。

選擇成份股和決定基日的工作完成後，我們即開始計算恒生指數，由一九六四年七月卅一日起計，但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四日才公開發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四日以前的恒生指數僅有月底數字。由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四日起我們發表每天數字。

每隻成份股的股本結構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成份股發行公司會因業績良好而派發紅股，又會因財政或其他需要而將股份拆細或發行新股。這些行動將會改變成份股的股本結構。成份股的名單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着時間的過去，成份股發行公司的業務有起有落。在此情形之下，我們將會修改成份股的名單，表現較差的股票將會被表現較佳的股票所代替。

為了協助投資者進一步瞭解股市情況，一九八五年元月開始，恒生指數增加四個分類指數，以反映各類別股票的走勢。四個分類指數分別為（一）金融類；（二）公用事業類；（三）地產類；（四）工商業類。第一類有四隻股票，第二類有五隻股票，第三類有九隻股票，第四類有十五隻股票。四類合計共有成份股三十三隻。

恒生指數的算式雖然被許多學術界、財經界人士接受，但指數成份股名單的組成則引起一些爭議。初期有人說我們選出的三十三隻成份股不夠代表性，有人說成份股的數目應該多一點，莫衷一是。他們對恒生指數要做到十全十美

的要求可以理解，但世事是沒有絕對的。指數發表初期，最令我們啼笑皆非的是一些存有偏見或不負責任的新聞界竟以「老友記指數」來形容恒生指數。他們的意思是恒生銀行可能與某些上市公司有密切關係，於是恒生將這些公司的股票作為指數成份股。成份股往往是熱門股票，投資於此類股票是靠得住的。證券業人士稱，熱門股為「藍籌股」，持有藍籌股等於擁有貨真價實的資產。此種資產抵押給銀行，可得較高按揭成數。因為這原故，不少上市公司的主事人都試圖說服恒生，請恒生選擇他們公司的股票為指數成份股。此舉令到素來不願得失客人的何善衡、何添、利國偉等左右為難。幸而他們能站穩立場，一切以對投資者公平為原則，技巧地婉卻不合理要求。

指數成份股數目應多少，真實也沒有準則，只要指數能反映股市走勢便夠了。最有代表性的兩個美國股市指數的成份股數目相差甚遠。道瓊斯工業股（Dow Jones Industrials）指數只有三十隻成份股；標準普爾（Standard and Poor）指數有五百隻成份股。究竟那一個指數更佳，則見仁見智了。基於，在做好功課、發覺恒生指數足以反映大市之後，我們對吹毛求疵或別有用心股市評論家的話語不予置評。

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中期，資料研究室尚未有電子計算設備，我們僅能用頗為原始的工具去計算指數。每天股市將近停止買賣之前，我們派出一個三人計算隊前往交易所。他們攜帶着一部普通手提計算機和用以抄錄成份股收市的表格及文具。收市鐘聲一響，計算隊便展開工作。一人抄錄成份股收市價，一人按動計算機，一人覆核。指數算出後，他們便以第一時間用電話通知資料室的電話諮詢組，再由該組把消息發佈給銀行內部有關部門以及報館、電視台、電台。

計算指數初期，我們以香港會的收市價為準。七二年以後，由於香港會在整個股市中的比重下降，遠東會及金銀會的成交日增，加以三十三隻指數成份股均同時在四會上市，我們改以香港會、遠東會和金銀會的平均收市價作為計算指數的根據。此舉更能反映股市實況，但我們則要多用人力，分別派出三個計算隊。在計算機日新月異之際，恒生指數的計算還如此依靠人力，說起來有點可笑。更嚴重的是在「人多手腳亂」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排除計算出錯的可能性。指數計算出錯會引起傳媒批評，令到恒生尷尬。這是無可奈何的工作現實。為了減少錯誤，我們要不斷改善計算方法，採用更現代化的計算工具，並由三間交易所取得更密切的聯繫。一九八一年七月，恒生指數的計算實行電腦化。到了這個時候，指數的計算才能確保無誤。

成為股市的第一和第二大交易所後，遠東會與金銀會先後編製了自己的指數以與恒生指數抗衡。遠東指數與金銀指數的計算公式，基本上與恒生指數的計算公式相同。這兩個指數的成份股也絕大部份是恒生指數的成份股。為了表示有異於恒生指數，遠東指數與金銀指數的成份股數目較多。除了三十三隻恒生指數成股外，另加數隻只在自己交易所上市的熱門股票。遠東、金銀兩會編製自己的指數，用意是宣傳兩會在股市中的地位日形重要，因而它們的指數

更有參考價值。但是必須指出，何善衡、何添、利國偉等始終強調恒生指數是為反映整個股市表現而設。加以恒生銀行是一間有地位和歷史悠久的金融機構，且以服務社會見稱，有更多連貫性及較為中立的恒生指數無疑比其他兩個指數更被投資者接受。

由七十年代初期以至八十年代中葉，一連串本地及國際政治、經濟發展導致香港股市出現兩個被波濤起伏的循環。恒生指數為這兩個循環作見證。第一個循環起自一九七零年止於一九七四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四日恒生指數公開發表後，股市即節節上升。十一月廿四日的指數為 158 點。七零年底指數為 211 點。七一年底指數升至 341 點。七二年底指數再升至 843 點。七三年三月九日指數達到第一股市循環的 1774 點高峰。中國政局因文革結束而漸趨穩定，香港工商界看好前景，愈來愈多公司在股市集資，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打開中美建交之門，外國資金介入香港股市，香港市民投資意欲強盛，四會劇烈競爭等利好因素，促使香港股市空前暢旺。「千七點」成為香港當時的流行語。因為「千七點」帶來橫財，許多跑「金魚缸」的中、小投資者用午膳時以「魚翅撈飯」。但是好景不常，在短短一個月內指數便從 1774 點滑落至四月底的 734 點，再下挫至年底的 433 點水平。七四年開市後股票價格繼續下瀉，股市走向崩潰邊沿。至十二月十日，恒生指數跌至第一循環的最低點，點數為 150。從上述指數變化情形來看，投資者若於七三年三月購入一批股票在一個月後（七三年四月），九個月後（七三年十二月），或廿一個月後（七四年十二月）賣出，此一筆投資可能蒙受百分之五十八，百分之七十五，或百分之九十的損失。這是「千七點」給予香港股民（中小投資者）的教訓。有幾個原因使股市跌落深淵：（一）當恒指高企時，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長遠遠追不上股價的升幅，從而令人感覺到股市已升至不合理水平。（二）交易所出現假股票。（三）上市股票質素良莠不齊。（四）中東戰爭爆發，引起石油危機。（五）被喻為「過江龍」的外國金融機構在股市獲大利後即撤走資金。

第二個股市循環起自一九七五年，止於一九八三年。七三年大跌後股市喘定，石油危機過去，世界經濟復甦，中國採取經濟開放政策，香港政府不斷檢討並修訂對證券業的政策和監管等利好因素，使投資者恢復信心。於是股市再現生機。七五年底恒生指數回升至 350 點。七六至七九年股市繼續穩好，指數反覆上升。七九年底指數已高企至 879 點。踏進八十年代，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更為明顯，香港地產業異常蓬勃，上市的地產公司賺大錢，地產股漲價帶動股市上升，恒生指數拾級而上。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指數高達 1810 點，打破了七三年三月九日創下的千七點紀錄。但是八二年開始，股市由經濟導向轉為政治導向。香港政治前途問題困擾着投資者的心情。

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與北京當局洽談香港新界租約於一九九七年期滿後，英國能否繼續保持香港的治權。結果不得要領。百多年來在英國人管治下享受了不少安定繁榮的香港人如夢初醒。香港前途未卜觸發了投資者的信心危機。九月一日的恒生指數還站於 1039 點的高水平，隨

即轉輾下降。到十二月二日指數跌至 676 點低水平。八三年上半年人心回穩，指數徘徊於 800 至 1000 點之間。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展開有關香港前途的會談。會談的透明度極低。每一回合結束後只發出簡短的新聞公報。除宣佈下一回合的日期外，公報有時另加「有益及有建設性」幾個字來形容會談的情況，有時只說「有益」，有時連「有益」和「有建設性」都省卻。前景不明朗是投資者的大忌。香港金融市場的行情隨著會談公報的字眼及通訊社從北京採訪得來的消息跳舞。跳舞的節奏由港元匯價及恒生指數反映出來。

八三年七月十二日第一回合會談舉行時，港元兌美元的匯價約為七算，收市恒生指數為 1027 點。八月三日結束的第三回合會談公報不見「有益及有建設性」字樣，是日港元兌美元的匯價跌至 7.32 水平，但恒生指數則為 1059 點。九月廿三日結束的第四回合會談公報亦不見「有益及有建設性」字樣，同時更有消息傳出會談陷入僵局。結果香港再出現信心危機。九月廿四日是黑色星期六，港元兌美元匯價一度跌至十算，收市時要用港幣九元五角才可買一美元。星期六沒有股市。九月廿六日星期一股市收市時恒生指數跌至 810 點。至十月四日，指數再跌至 690 點的低水平。

對於恒生的高級職員而言，一九八三年九月廿四日（星期六）上午是一個最長的早晨。當日敏感的市民一早便到各銀行、銀號搶購美鈔。一般銀行多以無貨供應為理由，推薦市民到恒生銀行各行所購買。於是恒生之總、分行出現爭購美鈔的人龍。是時利國偉總經理適在海外公幹，香港大局由文國鑾副總經理主持。文先生體會到有限量的美鈔存貨難以滿足廣大買家之無限量需求，但亦不敢停沽，恐怕市民以訛傳訛，釀成擠提。他乃採用緩兵之計，吩咐各行所着買鈔者排隊，每人限買美鈔一百元，各職員可按章工作。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挨到下午一時正，銀行關門休息，買鈔人龍散去，恒生上下各級人員纔鬆一口氣。

搶購美鈔雖然暫告一段落，可是有等敏感的市民，有見於港元兌美元的匯價節節低落深恐港元貶值，星期六下午銀行休息，兌換外幣無門，於是將手頭現金搶購糧食及日用品。幸而香港物資尚甚豐富，未有造成恐慌局面。

為了挽救港元，香港政府取消了七十年代中期以來的浮動匯率制度。八三年十月十七日，香港實行介乎固定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的聯繫匯率制度，將港元與美元掛鉤，匯率定於一美元兌 7.80 港元。銀行同業之間的港鈔買賣以固定的 7.80 匯率進行。但外匯市場的港元匯率則可按供求定律而自由浮動。不過銀行在鈔市及匯市的競爭及套現活動，保證了匯市的港元匯價穩定於接近 7.80 固定匯率的水平。港元匯價穩定後，股市的跌勢亦告停止。十七日的恒生指數企於 771 點水平。

八三年十月二十日結束的第五回合會談公報再度出現「有益及有建設性」字樣。以後的會談公報亦如此。十月二十日的恒生指數為 790 點。至年底，指數再升至 874 點。由第五回合會談以至八四年九月六日結束的最後一次，即第二

十二回合會談，中、英雙方取得共識。八四年九月十七日中國副外長周南與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斯(Evans)草簽有關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人們相信中、英兩國都有誠意繼續維持香港的安定與繁榮。股市作出良好反應。九月二十六日恒生指數回升至接近 1000 點。八四年年底收市時指數報 1200 點。

四個交易所並存不但令到政府在監管證券業工作上遇到困難，而且令到香港股票市場情況混亂。上市公司質素參差，各會報價不劃一，三個股市指數同時出現，均令到投資者無所適從。有見及此，香港政府及四個交易所的負責人都想將四個交易所合併為一。四會的負責人，分別是香港會的莫應基和吳兆聲，遠東會的李福兆和王啓銘，金銀會的胡漢輝和屈洪疇，以及九龍會的陳普芬和鍾明輝。一九八零年七月，經過多方商議及綜合意見，四會同意組織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td.)作為將來合併的準備。同年八月，立法局通過，《證券交易所合併條例》(The Stock Exchanges Unification Ordinance)，批准聯合交易所日後取代四會的認可地位。經過五年的醞釀，四會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合併。一九八六年三月廿七日收市後，香港、遠東、金銀及九龍四會宣佈正式停業，由他們合併組成的聯合交易所隨即於四月二日正式開業，自此成為香港唯一認可的證券交易所。

由於四會合併，遠東指數與金銀指數沒有存在的必要。不過恒生指數仍然繼續存在下去，被投資者用以測度香港股市的走勢。聯合交易所開業後亦自行編算一個名為「香港指數」的股市指數。該指數以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為基日，有成份股四十多隻。八六年以來香港股市雖然仍有多過一個指數，但投資者經常參考和傳媒經常報道的始終是早已深人民心的恒生指數。恒生老闆們多年來的期望兌現了。而我和我的資料研究部同事多年來的努力也沒有白費。

我於一九八四年四月退休後，我的接班人進一步發揮了恒生指數為投資者服務的功能。這要拜銀行當局於一九八四年中成立恒指服務有限公司(HSI Services Limited)之賜。恒指服務有限公司成立的原因是銀行當局因應香港股市發展迅速，要使恒生指數的計算與發佈更為快捷、準確和專業化。服務公司衍生自銀行的經濟研究部。經濟研究部的前身是資料研究部。公司的負責人首先是陸觀豪，後來是黃健群。在陸、黃兩人領導下，公司的服務項目推陳出新。至一九九七年底，恒指服務有限公司負責編算的股市指數共有六種：「恒生指數」、「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恒生倫敦參考指數」、「恒生 50 中型股指數」、「恒生亞洲指數」及「恒生香港中資企業指數」。

消費物價指數是通貨膨脹的晴雨表，是政府維持穩定物價的參考，是僱員與僱主談判調整工資與津貼的依據。一九四七年，香港府編纂了一個零售物價指數(Retail Price Index)。這個只能粗略地量度通貨膨脹的物價指數，於一九六四年被新編的總消費物價指數(General Consumer Price Index)和修訂消費物價指數(Modified Consumer Price Index)所取代。到一九七四年，分別以一九六三至六四年間，每月開支 \$ 100 至 \$ 1999 和 \$ 100 至 \$ 599 的住戶的開支形態為對象的消費物價指數，又被一個更新的消費物價指數系列所取代。新

指數系列包括三個指數。第一及第二個指數由政府統計處編纂，名為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和乙類消費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A 和 Consumer Price Index B)。第三個指數由恒生銀行編纂，名為恒生消費物價指數 (Hang Seng Consumer Price Index)。這三個指數分別以一九七三至七四年間每月開支 \$ 400 至 \$ 1999、\$ 1500 至 \$ 2999 以及 \$ 300 至 \$ 9999 的住戶開支形態為對象。

恒生銀行是應香港政府的邀請而參與編纂新系列消費物價指數的。政府邀請恒生參與編纂消費物價指數的主因有四。第一是政府對恒生的各項社會服務有深刻印象；第二是政府希望由一個受人敬重的私人獨立機構去編纂一個為中上階層人士而設的消費物價指數；第三是鑒於一九六九年面世的恒生指數甚為投資者與財經界所接受，統計處對恒生編纂指數的能力有信心；第四是政府不願意花費資源替只佔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人士編製一個消費物價指數。在此環境之下，與我稔熟的統計處第一助理處長莫乃鏗先生成為政府與恒生洽商編纂指數的聯絡人。我介紹莫先生與利總經理認識。莫先生把政府邀請恒生合作的建議告訴利先生。這一建議得到利先生首肯後，統計處長即發出公函，正式邀請恒生銀行替香港政府編纂一個為中上階層人士而設的消費物價指數。

編纂消費物價指數工作浩繁，要耗用不少人力物力。銀行開會討論應否接受政府邀請時議論紛紛。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反對者認為編纂指數並非銀行正常業務。數年前他們對股市指數的編纂已有微言。何況現今又要多編纂一個消費物價指數？贊成者則認為多編纂一個指數有利無害，因為此舉正符合何董事長寓宣傳於服務的宗旨。經反覆辯論後，恒生終於接受政府的邀請。由於已有編纂恒生指數的經驗，資料研究部也接受了編纂恒生消費物價指數的任務。

指數的編纂分兩個階段。第一為住戶開支調查 (H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第二為價格調查 (Price Survey)。住戶開支調查的主要作用，是制訂指數的權數系統 (weighting system)。這項工作要在指數的基期內進行。基期通常長達十二個月，即把四季的消費開支包括在內。

七十年代以來，香港經濟不斷發展，市民入息相應地增加。與此同時，他們的開支形態亦不斷改變。為了使消費物價指數更能反映現實，每隔數年進行一次住戶開支調查，重新釐訂指數的基期和權數系統，有其必要。甲類指數，乙類指數和恒生指數的第一個基期為 1973 - 74 年。當時三個指數的住戶開支調查，分別以每月開支 \$ 400 - \$ 1999，\$ 1500 - \$ 2999，以及 \$ 3000 - \$ 9999 的住戶為對象。至 1989 - 90 年，甲類指數住戶的每月開支範圍增至 \$ 2500 - \$ 9999，乙類指數增至 \$ 10000 - \$ 17499，恒生指數增至 \$ 17500 - \$ 37499。以後同性質的住戶開支調查將會繼續下去。

恒生消費物價住戶開支調查的第一部份工作為挑選住戶作為調查對象。在這方面統計處給我們很大幫忙。統計處備有非常詳細的人口統計資料和多位統計專家。根據人口統計資料，我們辨認出香港各地區住戶的經濟情況。統

計專家替我們解決調查的技術問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從分佈各地區的中上階層住戶中選出調查對象。

住戶開支調查的第二部份工作為向被選為調查對象的住戶索取他們購買各種物品與服務的資料。由於開支調查的時間長達一年，如要住戶連續在三百六十五天或五十二個星期內填報他們的開支情況，他們將會感覺到十分麻煩。更壞的是他們可能因此而敷衍了事，致填報資料不盡不實。有見及此，我們以多重日記賬法（multi-diary method）來取得我們需要的資料。我們設計了一份日記賬式問卷，請求有關住戶每一位十五歲及以上的成員一次過連續兩星期將他的開支逐筆填入問卷內。因為填寫問卷的時間不長，他們會樂於合作。問卷填報人分為二十六批，每批在不同時間內填寫他們的雙週開支日記。這些日記的內容是制訂恒生消費物價指數系統的原始資料。在請求住戶填寫問卷時，我們向他們保證開支日記內容絕對保密。交回問卷後每位填報人獲贈精美紀念品一份。甲類及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住戶開支調查對象多是中下階層人士。交回問卷後每位填報人得到的不是紀念品，而是一筆五十至一百元的酬金。

填寫在雙週開支日記內的物品及服務項目包括消費性開支和非消費性開支。消費性開支項目可歸納為糧食、住屋、燃料電力、煙酒、衣履、耐用物品、雜項物品、交通、服務等九組。消費物價指數的權數由這九組物品與服務組成。非消費性開支項目如繳納入息稅、投資、儲蓄、購買保險、捐贈、賭博、繳納罰款等，均不被包括在權數系統之內。

編纂消費物價指數的第二個階段是價格調查，這階段的工作是持續的。在指數基期內做完首次調查後，以後的每個月我們都是做一些調查。由於資源所限，將住戶所購買的物品與服務的價格全部記錄下來是不可能的。同時，我們也不可能走遍所有出售這些物品與服務的地方。因此我們只能憑專業知識與經驗，以抽樣方法選擇有代表性的物品與服務項目，以及有代表性的零售機構作為調查對象。

中上階層人士與中下階層人士對於某些物品與服務的質素不大苛求。他們也不計較從何處可以買到這些物品與服務。由此可以推斷，這些物品與服務的價格不但適合甲類與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計算，也適合恒生消費物價指數的計算。有見及此，我們與統計處安排將統計處調查所得的上述物品與服務的價格情報，作為恒生消費物價指數價格調查資料的一部份。得到統計處的幫助，我們節省了不少人力。

中上與中下階層人士對於另外一些物品與服務要求是不一樣的。為了適應本身需要，中上階層人士寧願多付點錢去購買較高質素的物品與服務，特別是以下幾個組別：在家外用膳、租金、差餉、衣履、傢私、醫療服務、醫院住宿及膳食、交際、應酬宴會，往外地旅遊。因為這原故，我們不能依靠統計處供給價格情報，要親力親為去找尋我們所需資料。在這方面，我們要做以下工作：首先從住戶開支調查檔案中抽出一堆百貨商店、零售商、酒樓、茶樓、餐廳、酒店、執

業醫生與牙醫、公立及私立醫院、旅行社、各種娛樂場所的名單。第二步是去信這些機構及有關人士，說明編纂指數之目的，請他們提供所售物品與服務的價格，並向他們保證有關資料絕對保密。第三步是派調查員訪問這些零售商戶及提供專業服務的機構及人士，向他們索取價格資料。由於恒生銀行在社會上有地位，而不少價格調查對象已經是銀行的客戶，資料研究部的價格調查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藉着價格調查，資料研究部人員間接地替銀行聯絡舊客戶，甚而發掘新客戶。這是意想不到的收穫。

一九七四年十月，恒生消費物價指數正式問世。以後每月公開發表一次。每月指數的計算需約三星期，故發表間是在下一個月的第四個星期。例如十月份指數在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發表。首次發表指數時，恒生在總行大廈頂樓博愛堂舉行記者招待會。在利總經理及統計處長 D. S. Whitelegge 先生陪同下，我向出席的傳播媒介代表宣讀新聞稿，並派給他們有關指數的宣傳小冊子。以後發表指數時工作比較簡化，我們只將擬好的新聞稿送政府新聞處，再由新聞處以第一時間用直通電報 (telex) 通知各傳媒。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與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每月發表時間與恒生消費物價指數的發表時間相同。這三個指數所包括的住戶範圍分別約佔全港住戶總數的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十。由於包括住戶數目最多，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通常被認為是香港通貨膨脹率變動的反映。恒生消費物價指數包括的住戶數目雖然最少，但對於關心通貨膨脹的中上階層人士來說不無參考價值。恒生消費物價指數的編纂，給予恒生銀行一個很好的服務社會與宣傳機會。

香港經濟的整體增長，通常以本地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簡稱 GDP) 的增長來衡量。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是香港通貨膨脹的主要指標。乙類及恒生消費物價指數則是輔助指標。經濟快速增長往往帶來較高的通貨膨脹。這個現象，在香港至為明顯。七十年代以來，香港一直被喻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按一九九零年的固定價格計算，由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九五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為 7.15%，最高為一九八七年的 13.0%，最低為一九八五年的 0.4%。在同一時期內，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平均年增率為 8.87%，最高為一九八零年的 15.5%，最低為一九八六年的 2.8%。對香港來說，經濟增長迅速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通貨膨脹高企則令港人擔憂，原因是香港人的身家愈來愈不平均。整個社會的財富大部份集中於佔人口極細百分比的大資本家手中。大資本家懂得做生意，懂得利用銀行信貸。他們發財的速度快過通貨膨脹增長的速度。小商人、打工仔沒有這樣幸運。他們賺錢的速度追不上通貨膨脹增長的速度。他們的財富為通貨膨脹所蠶食。

我與統計處的來往，早期只限於查詢貿易與工商業統計資料。到編算恒生股市指數時，我向他們請教，助理統計處長吳國樑還做我的統計技術顧問兼導師。再到編算恒生消費物價指數時，我與統計處的關係更形密切。資料研究部人員與統計處人員在公事合作基礎上建立了友誼。每年聖誕節前夕，兩個機構

互相邀請對方代表參加本身舉行的慶祝會。統計處以西式美食招待我的高級助手。我們則以博愛堂蛇宴回敬統計處長、助理處長等。以上一連串事態的發展，是我加入政府統計諮詢委員會的先聲。

根據香港政府年報，諮詢委員會是香港政府體制的特色，目的在使政府向社會有關人士徵詢後蒐集到最精闢的意見，作為決策的基礎。因此，幾乎所有政府部門和半官方機構，均有設立這類諮詢組織。諮詢委員會成員有社會人士和政府人員。約有五千名社會人士獲委任在四百多個委員會服務，其中部份人士所服務的諮詢團體不止一個。社會人士獲委任，大多由於他們具有專門知識或專長，或有熱心公益的紀錄。政府在擬訂政策和施政方針時，日益重視他們的貢獻。

統計諮詢委員會是為統計處而設的諮詢機構。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政府官員和六名社會人士。三名政府官員為統計處長、經濟司或其代表、社會福利司或其代表。六名社會人士來自學術界、工商界及社會服務界。統計處長是委員會主席，助理統計處長列席會議。統計處秘書兼任委員會秘書。諮詢委員會會議每年舉行三、四次，開會前兩星期秘書將會議的議程及與討論課題有關的文件分送各委員閱讀，以便在開會時發表意見。

在各個諮詢委員會服務的社會人士，由有關部門首長物色，物色後向上級推薦，然後由總督委任。委員的任期通常是兩年，期滿後可獲再委任。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是統計處長物色七六年六月一日至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這一屆統計諮詢委員會成員的時候。七六年五月初，統計處長 Whitelegge 約我談話。他引述了前文所說有關諮詢委員會的沿革與功能，並邀請我加入統計諮詢委員會，為香港的統計事務作出貢獻。我對他的建議感興趣，但還是請他先取得利總經理同意然後我才接受邀請。其實此舉沒有必要，因為當諮詢委員與否是我個人的事。不過統計處遴選我，大抵由於我在恒生銀行經濟研究部服務的關係。我之所以請 Whitelegge 先生通知總經理，是對利先生和我所服務之機構的尊敬。做人謙虛，下級服從上級，後輩追隨前輩是恒生的傳統。

恒生銀行注重社會服務。高級職員在政府機構擔任非官守職務也是一種社會服務方式。利總經理不但是立法局議員，也是銀行業諮詢委員會和工業多元化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他常常鼓勵高級同事步他的後塵，通過社會服務更豐富自己的見聞與知識，並加強恒生的社會形像。這一來，為私為公都有好處。在此情形之下，利先生贊同 Whitelegge 先生的建議。結果我收到經濟司五月二十一日來信，告知我香港總督委任我為統計諮詢委員會委員，任期兩年，由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起生效。根據香港政府政制，經濟司是統計處長的頂頭上司，而財政司則是經濟司的頂頭上司。財政司是政府的第三位最高級官員，地位僅次於總督及布政司。

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一日這一屆諮詢委員會期滿後，我被再委任三次。換言之，我一連當了四屆諮詢委員會委員，即由七六年六月起至八四年五月止。在上述八年之內，諮詢委員會成員的名單迭有變動。在

官守委員方面，D. S. Whitelegge 於八零年退休，新統計處長 C. C. Greenfield 繼為委員會主席。在列席會議的各位助理處長之中，掌管總體經濟統計的吳國樑於八零年離職。以後經濟統計分為兩組，甲組由陸志明負責，乙組由何泳煊負責。一九八六年 Greenfield 被調往另一政府部門任職，由莫乃鐸繼任統計處長和諮詢委員會主席。一九九三年莫乃鐸退休，新任統計處長及諮詢委員會主席為何泳煊。

我於七六年六月加入統計諮詢委員會時，資歷比我深的非官守委員有顧汝德(Leo Goodstadt)、夏冷漪、林聰標、莫罕(Obi Mohan)和朱誠信。顧汝德，我早已認識。夏冷漪是香港大學經濟系教授，又是香港經濟學會的主席。林聰標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莫罕是著名印度籍商人。朱誠信是紡織業知名人士。在恒生銀行的職務及恒生指數與恒生消費物價指數的編算則是我加入委員會的背景。

七八年五月以後，統計諮詢委員會的非官守委員有人退休，亦有人接任。夏教授於七十年代末期離開香港。他在委員會的席位由新任港大經濟系教授張五常取代。中英兩國政府發表了有關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後，張教授從經濟學者觀點寫作了不少有關中國經濟及中國前途的文章，發人深省。莫罕與朱誠信亦於七十年代末期不再任諮詢委員會委員。接任為工商界代表的是胡法光和張鑑泉。胡是菱電機械工程公司的主席，熱心公益，尤喜歡贊助體育活動。張是一間歷史悠久的織布廠的東主，在各工商社團之間非常活躍。胡、張兩人也同時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另一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關高荃華也加入了諮詢委員會。她是著名的社會工作者，在基督教女青年會任總幹事之職。另外一位新進的諮詢委員為詹德隆。他是一位新聞工作者和政治經濟評論員，在中文大學出版社做社長。顧汝德、林聰標和我在委員會中的服務間最長。八四年四月，我因健康關係從恒生提早退休，並辭去諮詢委員之職。繼續代表恒生出席委員會會議的是陸觀豪。

統計諮詢委員會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四年這一段期間內，研究和通過了許多與香港經濟建設及社會服務有關的調查、統計計劃。其中較為重要的有下列：

- 一九七七年：- 新統計法例的釐訂。
 - 輸入勞務與輸出勞務的調查。
- 一九七八年：- 研究發展一套社會活動及福利指標。
 - 改善每季商業調查的方法。
 - 為一九八一年人口普查作準備。
- 一九七九年：- 七九 / 八零年住戶開支調查及消費物價指數的修訂。
 - 進、出口貨運單據檢查電腦化。
- 一九八一年：- 發展一個綜合性的航運 / 港口 / 貨物統計制度。
 - 改善每季紡織業生產調查。
 - 以七九 / 八零年為基期的新消費物價指數編纂工作完畢。

一九八二年：－ 香港人壽命調查。

- － 進出口貨物單位價格指數及質量指數基期的修訂。
- － 工資增長率統計的改善。
- － 建築業統計。

一九八三年：－ 工業生產指數編纂工作完畢。

- － 修訂港元有效匯率指數的權數系統。
- － 研究市民就業／失業／半失業(就業不足)的衡量方法。
- － 工資調查。
- － 貨物經香港轉運外地的統計。

一九八四年：－ 八四／八五年住戶開支調查。

上述各計劃的逐步如期落實，證明港英政府是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儘管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屢屢低貶殖民地政府的成就。作為統計諮詢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我也有成就感，雖然與許多知名人士相比，我的成就微不足道。為政府及社會服務使我覺得有意義又有成就感，這是恒生銀行給我的一份特別花紅。

第七節：經濟研究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

七十年代是香港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年代。從本地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計算本地生產總值、對外貿易、銀行存款的年增長率與年代末期的統計數字來看，香港經濟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香港與南韓、台灣、新加坡同時被譽為亞洲經濟四小龍。

香港經濟是一個以對外貿易為支柱的開放經濟。中國、美國、英國、日本、德國、台灣、南韓、新加坡、加拿大等國是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這些國家經濟的盛衰對香港有深遠影響。恒生銀行的業務與香港息息相關。因而銀行的老闆們需要有人為他們把着香港及其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脈搏，不時或經常地向他們報告及分析香港及國際金融、經濟、貿易要聞，使他們能作出較明智的業務決策。基此，資料研究部於一九七八年決定出版一份有更高學術水平和更多參考價值的定期刊物——《恒生經濟季報》——以回應上級的「把着香港及其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脈搏」的要求。為了公諸同好，經濟季報印有中、英文版，歡迎中外人士索閱。許多恒生職員、銀行同業的經濟研究員、專上學院經濟系及工商管理系師生、外國及中國駐港機構的經濟研究員、傳播媒介的經濟版編輯都是《季報》的長期讀者。

一九八一年七月，資料研究部改組，正名為「經濟研究部」。資料研究部的原有工作相當分散，項目繁多。經濟研究部的工作則以經濟研究為主，其他項目為輔。一九八四年，鑒於計算和發佈恒生指數的工作太過繁重，銀行另外成立一間全資附屬機構來執行這個任務。此舉不但可以減經濟研究部的工作負荷，而且可以令該部更能集中精神去做經濟研究。新成立的機構名為恒指服務有限公司(HSI Services Limited)。與此同時，鑒於香港經濟發展迅速，市民對

資訊的需求日益增加，我們將《經濟季報》改為月報。

因為從來沒有絕對準確的經濟分析和預測，《經濟季報》和《經濟月報》都註明：「內容不一定代表恒生銀行管理層之意見。」儘管如此，恒生經濟刊物的內容仍常常被傳媒所引用，足見我們的研究工作並不尋常。《經濟季報》和《月報》的版權為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所有，為了維護版權，《季報》和《月報》均印有：「各方如有轉載本季（月）報，不論全部或局部，均請註明『來源』字樣」，以正視聽。

恒生的領導人物與中國有深厚淵源。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們便盡量減少與大陸的聯繫。他們強調「在商言商，不問政治」，由五十年代初期以至七十年代後期，恒生不敢和不願與大陸做生意。不敢是不欲被人稱為「親共」，被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列入黑名單，以致失去與美國做生意的機會。美國是港貨的最大出口市場。恒生與美國多間銀行有來往，經常持有大量美元資產。不願是因為中國政治太混亂，經濟落後，缺乏法例，以致做生意風險過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決定了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中國要擴大與外國的接觸，擴大對外貿易，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經驗，並從本身的特點出發實行中國式現代化。七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和汕頭，以及在福建省的廈門設立經濟特區。這些特區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試驗場。經濟特區的意念來自出口加工區。二次大戰後不少東南亞國家設立出口加工區，目的是引進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從而促進國家的現代化。在加工區內，外國公司可以免稅帶進原料和機器，用以生產出口商品。經濟特區是出口加工區的進一步發展。經濟特區不僅是簡單的工廠所在地，而是一個功能更多、面積更大的地理區域。除了具經濟功能之外，經濟特區還具備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功能。另外一個功能是發展旅遊業，因為旅遊是獲取外匯的一個有力途徑。在鄰近香港的深圳和鄰近澳門的珠海設立經濟特區還有一個很特殊的意義。它就是要有助於香港和澳門分別於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九年回歸祖國。如果中國政府與人民能掌握港、澳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管理好深圳及珠海特區，就可以為將來管治不同制度下的香港和澳門積累經驗，同時還可以增強港澳居民對前途的信心。

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給香港銀行及工商界帶來沖擊和挑戰。四九至七八年間結束了大陸生意的銀行及商行紛紛考慮恢復它們的中國業務。以前沒有中國業務的銀行及商行也因被甚富潛力的大陸市場所吸引，而將如何發展中國業務這一課題擺上議事日程。

隨着匯豐、渣打、東亞等老牌銀行及多間外資銀行相繼恢復或開展它們的中國業務，恒生於一九八零年成立了一個中國小組以研究發展中國業務的可行性。這是一個由海外處、外務處和資料研究部人員組成臨時性工作單位。借調到中國小組的人員分工合作。海外處人員研究恒生可為到大陸投資的香港和海外廠商提供何種銀行服務。外務人員聯絡中國駐港和在大陸的金融、工商

企業以及有興趣做大陸生意的香港及海外商人，希望他們能與恒生的中國業務發生關係。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與工商法例，從而推測在大陸做生意的機會與風險，則是資料研究部人員的任務。

中國小組為恒生開拓業務的一個具體行動是前往深圳實地觀察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情況。我們在一九七九年底首次訪問深圳經濟特區。當時深圳四處正在進行「三通一平」或「五通一平」。「通」是指公路、電力、通訊、煤氣和地下水道。「平」是指平整大片土地。在深圳，「通」、「平」工作做得最早、最快、最好的地區是西端的蛇口工業區。該工業區位於一座蛇頭形的半島上，與香港新界西北部相隔一道只有數公里的后海灣。

蛇口工業區原來是香港中國招商局的一個拆船基地。一向以經營航運為主的招商局到七十年代已發展成為一個多元化企業。一九七九年香港正處於建築業繁盛時期，需要大量鋼材。招商局便趁這機會在蛇口建立一個拆船基地，將從舊船拆卸下來的鋼材售與香港建築商。招商局在蛇口拆船有幾個原因。第一是拆船基地要有很大面積。香港土地稀少、地價昂貴。在靠近香港的蛇口較容易找面積大和價錢平的土地。第二是拆船需要大量勞力，中國勞動力充足，工資低廉。第三是在蛇口拆船可以為中國賺取外匯和為中國的勞動人口提供就業機會。

一九七九年，深圳經濟特區的成立正在醞釀之中。業務已由航運擴展至船塢管理、海上機器工程、倉庫、勘測、旅遊、酒店、投資和拆船的招商局向北京建議，將已有廠址和基礎設施的蛇口拆船基地，發展為深圳經濟特區的第一個工業區，率先吸引外國公司前來建立獨資或合資企業，生產出口商品。這是中國引進外國資金和技術的好辦法。最早在蛇口興建的大型工廠是中國與丹麥合資的集裝箱製造公司。在香港，集裝箱稱為貨櫃。此外，蛇口還有兩個規模相當的外資企業。一個是生產遊艇的工廠，另一間是生產油漆的工廠。特區本來只希望吸引高科技領域的外來投資。但是為了使外商的投資快見成效，非高科技領域的投資也受歡迎。香港開達實業有限公司在蛇口工業區開設的玩具廠是一個實例。該廠大量生產成本低和製造工序簡單的洋娃娃（cabbage patch kid doll）銷路遍全球，為公司帶來很多利潤。

由一九七九至八四年，我和海外處副主任趙乾亨率領中國小組數度訪問深圳。除了蛇口工業區，我們也到過深圳中部和東部的工業區考察。參觀過好幾個外商獨資和中外合資企業，包括百事可樂飲品製造廠、汽車裝配廠、半導體收音機製造廠、電燈泡製造廠、針織廠。我們曾到深圳市中心商業區巡視，看看城市建設的新面貌，更設法了解香港銀行同業在特區開設分行或辦事處的情況。深圳近郊的旅遊勝地也被包括在旅程內。

建設經濟特區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嘗試。我們對深圳特區建設初期所得的印象十分迷惑。多數幹部缺乏現代化管理的學識、技術與經驗，領導幹部好高騖遠，政府部門辦事沒有效率。因而延誤項目，工作重複的現象頗為普遍。特區內的建設原來以發展工業為重點，但是我們發現深圳的大型工廠在數

目上遠遜於大型賓館、酒店、商業大廈。特區內有許多應建而未建的工廠，有些應早日完成的基礎設施還在施工之中。自建立經濟特區起，深圳就期望主要依靠外國資本並引進現代技術。深圳獲准建立合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以及簽訂加工合同。事實證明，這些目標的實現要比計劃者最初預期困難得多。深圳開放之初，外國投資者所關心的許多問題尚未解決。中國迫切需要外匯，在外國公司盈利中，究竟能將多少外匯匯出？外國人能否自主招聘和解僱工人？雖然直接勞務費要比東南亞其他國家便宜得多，但是中國的企業或當地政府常常向外國公司索取比當地直接勞務費高得多的勞務管理費，用來彌補基建成本或企業管理費用。外國人是否能自行決定工資額？外國經理和僱員進出中國的難易程度以及需要多少費用，還有外商要支付那些計劃外的額外費用及其數額是多少？中國方面能否恪守合同，按時交貨？如果不能按時交貨，外商可以向中方索償些什麼？直至我於八四年離開恒生時，所有上述問題仍是未知之數。我們懷着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心情與深圳政府及中國共產黨深圳市委員會的負責人坦誠地談論我們訪問特區的觀感。喜的是經過集體化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使國家與社會體制的弊端暴露無遺之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終於肯面對現實進行經濟改革。憂的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過渡到以市場為主的商品交換經濟是史無前例的，是現代世界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這是恒生發展中國業務，步步為營的主要原因。

自一九五七年開始，每年春、秋二季在廣州舉行的出口商品交易會是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一度橋樑。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場浩劫。交易會幾乎停頓。到七十年代，中國開始運用較靈活的手段去發展外貿，出口商品交易會再露生機。一九八二年的交易會規模空前龐大，許多香港和外國商人都被邀請參加。香港中華總商會與廣東省外經貿部門及廣州市工商業聯會關係良好，會員前往廣州洽談生意者大不乏人。恒生銀行是中華總商會的永久會員，但在八十年代以前從不對交易會發生興趣。不過為了研究發展中國業務，中國小組卒之代表銀行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一九八二年秋季交易會，並順便訪問佛山。

廣州市工商聯熱烈招待我們。他們認為在香港有代表性的恒生銀行眷顧祖國，是交易會的一件喜事。在座談會上，雙方就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香港與廣東經貿交流，恒生如何發展中國業務等問題交換意見。顯然，他們對恒生有很大期望，至於恒生如何回應則是以後之事了。會談後，工商聯為我們安排參觀、訪問的行程。

交易會的展覽館是七十年代中期建成的，不是原來的展覽館。舊址位於珠江北岸市中心的海珠廣場。新址在舊址以北數公里，鄰近新建的廣州火車站。在交易會展覽館對面及鄰近地區，有廣州市最新和最高的建築物，包括賓館、酒店及辦公大樓，形成了一個外貿區。中國小組交易會訪問團住在離展覽館最近的東方賓館。這是一幢古老的蘇聯式大廈，經過翻新後，設備還算不差，與新建的白天鵝賓館、中國大酒店和花園酒店比較，當然還有大距離。這三座新建

酒店是香港商人在國內投資的先聲。

我們巡視了多個出口商品陳列攤位，並從旁觀察攤位負責人與港商及外商洽談生意的情形。匯豐銀行的中國業務部在兩三年前已設有駐廣州的辦事處，在交易會場館內也設有諮詢服務攤位。「老大哥」的做法值得恒生借鏡。通過仔細觀察陳列的商品，與攤位負責人談話，和聽取港商和外商對交易會的意見，我們發現中國在推廣外貿方面下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一定成績，儘管存在的缺點不少，尚待解決的問題仍多。

離開了外貿區，我們覺得廣州的城市建設乏善可陳。大多數房屋破舊不堪，道路交通秩序零亂，電力供應不足，交易會期間市區其他地方停電的情況嚴重，食水輸水系統及地下水道急需維修，電話及其他通訊設施落後非常。當時個人有這樣觀感：深圳經濟特區與廣州市比較，前者好像一個未學行先學走的小孩，後者好像一個病後正在進補的老人。

參觀完交易會後，我們到佛山一行。佛山在廣州西南二十五公里。由廣州通往佛山的公路平坦、整潔，是廣東省最好的公路，沿途來往車輛甚多，公路兩旁的農田和樹木茂盛，給我們一個新鮮的感覺。自古已被譽為四大名鎮之一的佛山，在七十年代中期被外貿部指定為全國第一個「統一出口生產基地」，基地的工農業產品以運銷國外為主，其作用為一方面搞活當地經濟，一方面使國家獲得更多外匯。佛山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輕工業中心。佛山試驗的成功對中國的外貿改革起積極作用。我們在佛山及鄰近地區參觀了工廠、農場，還到著名的祖廟及西樵山一遊。祖廟建於唐代。西樵山山頂有一個湖，名為天湖。兩者都是遊客必到之地。

佛山不但是一個輕工業中心和出口生產基地，而且是一個行政管理中心。佛山市是佛山地區的首府，管轄着珠江三角洲的大部份縣、市。一九八五年二月，珠江三角洲各縣市聯合成為珠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該區由四個市和十二個縣組成。四個市為佛山市、江門市、中山市和東莞市。十二個縣為斗門、寶安、增城、番禺、南海、順德、高明、鶴山、新會、台山、開平、恩平等縣。珠江三角洲一直是廣東省內最富庶和離香港最近的地區。一九八五年以後，這一地區實行了特殊的稅收政策，以及旨在吸引外資和開展外貿的促進措施。到八十年代末期，多數香港廠商發現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條件比深圳更能適合他們的意願，紛紛把生產基地搬到這個經濟開發區。與深圳經濟特區相比，珠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更能與廣東省全省的經濟融為一體，尤其是佛山，實際上已成為全省及全國的重要發展模式之一。

何善衡、何添等雖以投機炒黃金、外匯起家，但恒生銀行開業之後，他們的作風轉趨穩健。對於沒有把握的業務他們總不肯快行一步。對於與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做生意，他們更具戒心。是以銀行當局只賦予中國小組調查、研究的責任。小組繼而發展為中國業務部後，其作用亦不過是幫助客戶了解國內投資及貿易情況。到了八十年代後期，鑒於愈來愈多香港廠商往大陸投資，恒生才在深圳和廈門開設辦事處，向在中國發展業務的廠商提供聯絡、諮詢和

業務洽談服務。至於在大陸展開包括存、放、匯在內的正規銀行業務，則仍有所待。

恒生銀行雖然以低姿態開展中國業務，但是利總經理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的研究卻非常積極，特別是八二年九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中國領導人向她表明中國將要收回香港主權之後。他不時召集我和鄭棟培、陸觀豪、黃健群等到他的辦公室開會，討論中國的政、經形勢和香港的前途。這個小型和不拘形式的會議開了一個短時間後，利先生決定將它擴大。他認為職位較高及職務與經濟、政治有較密切關係的同事，不應把注意力全部集中於對客服務和銀行業務方面，要知道香港、中國及世界大勢。擴大後的會議定名為「經濟座談會」，每隔一星期開一次，在星期六上午舉行。總務處、海外處、營業處、投資管理處、外務處的主任和副主任、信用部、押匯部、匯兌部、經濟研究部、中國業務部的負責人均被利先生點名出席這個座談會。利國偉是座談會主席。他因事不能開會時，文國鏗副總經理代為主席。

經濟座談會的序曲是經濟研究部的報告。我和鄭棟培、陸觀豪、黃健群等報告兩週來發生的經濟大事。我作提綱挈領的講，鄭、陸、黃三人加以補充。我們闡述大事的背景，分析大事的成因，在可能範圍內推測大事的發展會給香港及恒生帶來什麼影響。各會議成員回應我們的報告。他們會說出個人對事件的看法，也會質疑經濟研究部的報告，要求解釋。座談會的第二階段是各營業部門負責人報告他們從客戶及同業口中得來的工商業及經濟情報。以後，座談的重心漸漸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會議各成員不期談到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前途會談的進展情況，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和制度，中國領導人對香港人的承諾，一國兩制是否行得通等敏感性問題都在討論之列。時移勢易，一向以「在商言商，不談政治」為做生意座右銘的香港商人，如今要惡補政治課。這是何善衡、何添、利國偉等意料不到的。

為了使銀行的經濟研究部做得更好，使恒生出版的經濟刊物更為中外人士所接受，利先生聘請了顧汝德為經濟研究部的顧問。顧汝德是英國威爾斯人，於五九及六零年畢業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分別獲經濟學士與碩士學位，六一年在牛津大學唸農業經濟，並獲文憑。他於六二至六四年獲得英聯邦獎學金來到香港大學唸土地經濟，並稍後在港大經濟系任教。他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之一。由六六至七六年，他是英文《遠東經濟評論》的副總編輯。後來他成為自由專欄作家，經常撰寫與香港及中國有關的政、經論文。此外，他又被好幾間銀行聘任為顧問。顧先生與利國偉稔熟，又曾與我在統計諮詢委員會共事多年。因為在香港時間很久，又娶了一位華籍太太，顧汝德會說流利廣東話。顧太太楊彥慈是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的一位高級官員。

顧汝德每月到我辦公室一次，與我和我的手下開會。檢討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發展形勢和分析香港金融、經濟面臨的問題是我們談論的焦點。鄭棟培、陸觀豪、黃健群等在工作上發生的學術性或技術性問題，顧先生樂於為他們解答。他又是我們的英文顧問。經濟研究部撰寫的英文文稿會讓他過目並作

必要的修改和潤飾。顧先生不但與經濟研究部有密切業務關係，而且與我和我的同事建立了友誼關係。他是我們的良師益友。一九八四年我退休之後，陸觀豪和黃健群步步高升。他們的工作表現不但為銀行所重視，而且為香港財經界及香港政府財經當局所賞識。

鑒於香港回歸中國的日子將近，一九八九年四月，香港政府建制內多添一個智囊團式的組織，以協助總督、布政司和財政司釐訂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政策。該組織名為中央政策組（Central Policy Unit），組長為被香港外籍人士譽為「中國通」和被香港華人謔稱為「本地鬼佬」或「本地老番」的顧汝德。顧先生熟悉香港的政、經事務，對中國國情頗有研究，與許多香港親中人士及社團有交情。總督私人秘書和新聞秘書、港府政治顧問、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英國政府駐港商務專員，以及中央政策組組長都被人認為是總督的親近謀臣。一般港人對中央政策組的運作、透明度及其工作的敏感程度存好奇心。不過對香港政情有認識的人會聯想到，這個智囊團的工作重心，定必是研究一些與香港由英國殖民地過渡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問題，並向港英當局出謀獻策。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情況，中、港的政、經關係，香港如何繼續作為國際貿易、金融、交通、資訊中心，港府如何因應香港社會的需要在社會服務上投入更多資源等問題，都可能被包括在研究範圍之內。智囊團向總督、布政司及財政司所作的建議，必須保密，好讓決策者有充分自由去作出抉擇。若決策者聽取智囊團的意見，推行某項政策受到歡迎，只應歸功於抉擇正確。若決策者認為建議的意見不當，大可棄而不用。

中央政策組組長之下有四位組員。他們來自公務員隊伍或私人機構。來自私人機構的組員多數是大銀行和大商行的精英分子，既有豐富行政管理經驗，又對香港及國際的經濟情況有深切了解。不知道是否由於顧汝德的推薦，恒生銀行的陸觀豪與黃健群先後在一九八九至九二年間被借調到中央政策組服務。銀行界被中央政策組羅致的，還有匯豐銀行的鄭海泉。一九九二年十月，末代港總督彭定康委任鄭海泉和陸觀豪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九五年九月，他們任期期滿。陸觀豪不繼續參政。但鄭海泉則繼續被總督委任為行政局議員。鄭、陸、黃三人均是經濟研究員出身。他們從研究經濟進而參與政治。這要拜中國政府自七十年代後期起實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和決定於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之賜。一九九四年，鄭海泉與陸觀豪被委任為恒生銀行董事。一九九五年以後，鄭海泉、陸觀豪、黃健群三人在銀行的職位一再高升。鄭海泉是匯豐控股集團總經理兼匯豐銀行財務主管。陸觀豪是恒生銀行副行政總裁，掌管財資處、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技術支援處、稽核處、財務監理處。黃健群為總經理，掌管人事處、策劃處。他又是恒指服務有限公司的主席。一九九八年三月，鄭海泉被委任為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第八節：辦公室政治及名譽與地位

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我收到利總經理簽署的信說：「閣下服務本行以來

盡忠竭智，建樹良多。茲經銓衡考績，決定由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起，擢升閣下為高級經理，藉增倚毗並資策勵，尚希此後踴躍有加，本行前途實深利賴，謹函奉達順致賀意，統祈察照為荷。」根據當時銀行的人事編制，高級經理是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後來稱為助理總經理）以下的最高級職位。高級經理以下的職級，依次為經理、副理、襄理、主任、副主任、高級辦事員、辦事員、助理員、練習生。一九六二年入行時，我的職級為高級辦事員。我任高級經理六年，至一九八四年退職。換言之，我一共在恒生服務了二十二年。在這二十二年裏，我不敢說對恒生有什麼功勞。但是付出了很多苦勞卻是肯定的。

香港是一個極度功利化的商業社會，沒有免費午餐供應。大機構職員眾多，人際關係複雜，是社會的縮影。大機構內人人為自身利益分秒必爭，出盡手段向上爬。於是出現了「辦公室政治」這一名堂。辦公室政治就是運用周旋、妥協、讓步、商討、祈求、爭取等手段，以求保住職位並升級加薪，以求維持既得利益兼爭取更多利益。在恒生銀行內，最需要在辦公室內運用政治手段的是各個「理」字級人員。他們要爭取上級的賞識和信任，要與同級人員競爭和合作，要領導下屬和獲得下屬的支持。恒生辦公室政治的內涵，是如何活學活用何董事長的關於「如何應付人」及「見景」的教誨。無論你付出了幾多苦勞，無論你的學識如何高深，無論你辦事如何能幹，如果沒有玩弄辦公室政治的本領，你在恒生的前途是有限的。我個性耿直，嫉惡如仇，不屑對人呵護奉承，不肯出賣自尊求人施捨，不善於投機取巧。這些因素令到我在恒生的辦公室政治鬥爭中吃虧不少。在勢利的同事心目中，我是一個不懂人情世故和「不識撈」的人。當然，恒生同事中不乏為人正直和富同情心的人。他們為我做人的「不夠現實」而感到可惜。

工作壓力與辦公室政治令到我的六年高級經理生涯十分難過。因為心力交瘁，一九八三年，我突然感覺不適，經醫生診斷是心絞痛，要入院留醫。心絞痛是冠心病的一種，主要由冠狀動脈硬化引起。治療的方法包括長期服用擴張冠狀血管和改善心肌缺血的藥物，注意飲食，以免血中膽固醇增高，避免過度精神緊張，要有適量的運動和休息。出院後，我領悟到一個人要向上爬，要追逐名利，是要付出重大代價的，結果在醫生勸告下，我於一九八四年四月辭去恒生職務，並於同年九月離開香港到生活比較簡樸、環境比較清靜的加拿大定居，韜光養晦。

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每年頒發英帝國勳章及爵士勳銜給對帝國有功的臣民，包括香港殖民地的華人。分兩次頒發。第一次是在元旦日，第二次是在她的官式生日。官式生日定於六月中。英帝國勳章一般分為「英帝國司令勳章」（CBE - Command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英帝國官佐勳章」（OBE - Offic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和「英帝國員佐勳章」（MBE - Memb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三種。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多倫多士嘉堡市寓所接到英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 R. E. Holloway 先生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在

英女皇生日授勳名單中榜上有名，獲贈 MBE 勳章。香港政府從恒生查到我在加拿大的地址和電話號碼，轉告英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翌日，我又收到他的信，信中轉達香港總督尤德士（Sir Edward Youde, GCMG, MBE）給我的賀電，並詢問我喜歡到倫敦、渥太華，抑或香港領取勳章。我選擇了香港，因為我想順便探望在港的親友。

擔任香港政府統計諮詢委員會委員多年，期間曾對香港的統計及經濟事務作出貢獻，是我獲頒授 MBE 的原因。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是我在香港領取勳章的日子。當天到總督府領勳章及獎章者共七十九人。其中十二人獲英帝國勳章，六十二人獲較低層次的英帝國及香港政府獎章。獲英帝國勳章的十二人中有兩人獲 CBE，六人獲 OBE，四人獲 MBE。授勳儀式由總督尤德爵士主持。

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許多華人都認為獲帝國勳章是一種殊榮。此與傳統中國人的封建思想有關。但是亦有人不希望這英國皇家的恩賜。他們視勳章為英國統治者懷柔香港的手法。他們對獲贈勳章者沒有好感，視獲贈勳章者為英國殖民主義者的走狗。「荷蘭水蓋」這一故事由此而生。

香港開埠初期，市民飲用的汽水多數來自荷蘭。盛汽水的玻璃瓶有一個金屬蓋。人們飲用汽水後將玻璃瓶交回零售商再用或留作自用。至於形狀有點像勳章的圓形金屬蓋則不可再用，將之扔掉便算。因而有強烈民族自尊感的華人喻 MBE、OBE、CBE 為「荷蘭水蓋」，是沒有價值的東西。我除有強烈的民族自尊感之外，還有一個解不開的鴉片戰爭情意結。因為獲得 MBE，我不禁聯想到以下一個與鴉片戰爭、中共趕走英國人和尤德爵士有關的故事。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以武力迫使中國割讓香港。以香港為基地，英國政府及商人進行對華貿易，獲取了無可估計的政治與經濟利益。「炮艦政策」是英國人獲取和維持這些利益的保證。英國軍艦除以香港作為基地之外，還可以在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中國沿海通商口岸停泊，又可以在中國大陸沿海以及長江、珠江游戈，向中國耀武揚威。由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國內發生多次動亂，每次動亂都或多或少地影響到英國在中國及香港的利益。在此情況下，「炮艦政策」往往大派用場。以現代軍事觀點來看，炮艦政策當然不限於炮艦，應該包括陸、海、空三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中國內戰爆發，初時英國以隔岸觀火和保持中立態度來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鬥爭。到一九四九年，中共人民解放軍已在遼瀋、平津、淮海諸戰役中大獲全勝，迅速南下，直指廣東。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軍強渡長江。在進行解放南京和控制長江下流的江陰要塞之際，英國駐華艦隊的「紫水晶」號軍艦（HMS Amethyst）在南京江面巡邏，替國民軍隊助威。顯然，英國人希望國民黨能屹立不倒。因為只有如此，英國的在華利益才可保持。

解放軍並不怕英國的干預，一方面和「紫水晶」號進行炮戰，一方面封鎖長江，不讓英艦逃逸。英國駐南京大使館一位年青外交官獲得封鎖長江的情報，馬上通知「紫水晶」號在黑夜裏冒險突圍，駛離長江回到香港海軍基地。「紫

水晶事件」(The Amethyst Affair) 標誌着英國對華炮艦政策的終結。從此以後，英國以武力威脅中國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通知「紫水晶」號突圍的青年外交官名叫 Edward Youde—愛德華·尤德。因為營救英艦有功，英女皇給他一個 MBE 勳章。以後他任外交部都扶搖直上，由三等秘書(Third Secretary) 升至大使(Ambassador)。

一九八三年，尤德被委任為第二十六任香港總督，獲 GCMG 爵士勳銜。一九八二至八四年間，中、英兩國政府進行有關香港前途的談判。尤德是英方代表團成員之一，風塵僕僕於北京、香港、倫敦之間，為中英協議的達成出了很多力。一九八六年他在北京公幹時心臟病發去世，聞者惜之。當時我適在香港，聞訊後前往總督府，在弔唁冊上簽名，以示對他的尊敬和懷念，因為他曾親手將一枚 MBE 勳章掛在我胸前。

恒生銀行的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獲英帝國勳章者大不乏人。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恒生邀請了多位知名人士加入董事會。副董事長郭贊是立法局議員，入恒生前是法國東方匯理銀行買辦。他獲 OBE 及 CBE。董事關祖堯律師是行政、立法局議員，獲 OBE、CBE 及爵士銜。董事鄧肇堅為九龍巴士有限公司董事經理，以做慈善事業出名，獲 MBE、OBE、CBE 及爵士銜。董事梁昌是著名澳門金商。二次大戰期間他曾替在中國內地活動的英軍服務團做情報工作，因而獲 CBE。董事劉鎮國是香港油蔴地小輪有限公司總經理，獲 OBE。董事阮達祖是建築師，獲 MBE。由六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中期，郭贊、關祖堯、鄧肇堅先後去世。

踏入七十年代，恒生已成為全港第二大銀行。在何善衡領導下，恒生不但業務發展迅速，而且為香港市民提供了多元化的金融、經濟、教育服務。因為對社會有貢獻，董事長何善衡獲 MBE。由於恒生在香港銀行界有獨特代表性，總經理利國偉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獲 OBE。

踏入八十年代，恒生銀行董事們獲得更多勳章。七十年代應邀參加董事會的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獲 CBE 及爵士銜。八十年代中期應邀加入董事會的工業家李鵬飛是立法局議員，獲 OBE 及 CBE。何善衡連獲 OBE 及 CBE。董事何添獲 OBE。利國偉被委任為行政局議員，獲 CBE。包玉剛於八十年代末期去世。踏入九十年代，兩位新進董事也獲勳章。董事兼副行政總裁林李翹如於一九九四年元旦獲 OBE。林李翹如是恒生創辦人林炳炎媳婦，加入恒生前，在關祖堯律師事務所任律師。一九九五年初，匯豐控股集團總經理兼匯豐銀行財務主管鄭海泉被邀請加入恒生董事會。匯豐銀行經濟研究部出身的鄭海泉先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繼而被委任為行政局議員。他也於一九九四年元旦獲 OBE。

除了獲得英帝國勳章之外，好幾位年青時讀書很少，中年後事業大有所成的恒生董事也獲得香港及外地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自從八十年代開始，對在香港發達的商人來說，大學博士銜頭比英帝國勳章更具吸引力。以下的統計相當有趣：何善衡獲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香港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及中山

大學名譽博士銜。鄧肇堅獲香港大學榮譽法學博士銜。包玉剛獲香港大學榮譽博士銜。何添獲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利國偉獲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理工大學及城市大學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及清華大學名譽博士銜。梁銓琚獲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及清華大學名譽博士銜。八十年代中期應邀參加董事會的新世界發展集團主席鄭裕彤獲中文大學榮譽工商管理博士及多倫多大學榮譽法學博士銜。

恒生銀行董事會的成員，出身與背景不盡相同。但他們在商場上和在他們的專業範疇內，都有出色的表現。他們可以說是一個具體而微的香港創業者群。創業者又稱企業家(entrepreneur)。企業家敢於承擔風險，利用市場的供求規律，從事工商業活動，製造價值，製造財富。這是香港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

非董事會成員的恒生打工仔，曾在每年元旦日或英女皇壽辰日到總督府領取勳章的，除了我之外還有吳卓怡和李溥銘。他們比我早幾年獲獎。吳卓怡曾在輔助警察隊服務多年，由警員升至警司。他獲殖民地警察勳章(Colonial Police Medal, 簡稱 CPM)。李溥銘曾在輔助醫療隊服務多年。他獲英帝國獎章(British Empire Medal, 簡稱 BEM)。吳卓怡是我英皇書院校友。李溥銘是廣州嶺南大學學士，他是恒生銀最早期職員之一。

我領取 MBE 時已離開恒生。由於再沒有在商場營營役役，名譽與地位對我並不十分重要。我已視富貴如浮雲。事實上，當我為統計諮詢委員會服務的時候，我根本沒有想到會領取英帝國勳章這一回事。我只是竭盡所能為委員會做點工作。由於統計諮詢委員的工作主要是向委員會提供經濟性和技術性的意見，我在委員會議席上可憑良心與專業知識暢所欲言。行政、立法局議員或某些諮詢委員會委員則不同。他們發表意見時往往有政治考慮。對於政府不是之處，他們不敢坦率直言，只可以小罵，小罵之後轉為大幫忙，或者採取模稜兩可態度，說了等於不說。言不由衷對我來說的確是一件苦事。我有幸能心安理得地為港的統計事業作出貢獻。這是值得安慰和引以為榮的。

第九節：香港資本家與權勢，恆生銀行改弦易轍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的英國殖民地地位快將不保，有財有勢的個人和工商機構紛紛設法改變他們一向的拒共立場，由親英轉為親中，被傳媒譏為「轉軚」。

奉行資本主義是香港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資本主義在西方興起時，大商家、大廠家、大企業家是資產階級的核心。他們挺身而出把封建勢力推翻，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以保障他們的利益。香港的資本主義有別於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以買辦、舊式商人和四十年代以後從中國大陸南下的企業家組成的香港資產階級怕談政治，只顧在商言商。因為沒有建立自己的政權，他們要依附權勢來保障自己的利益。

由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香港的權勢中心是殖民地政府。殖

殖民地政府把英國崇尚自由與法治的精神帶到香港來，但不賦與香港人民主權利。殖民地政府執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經濟政策，使資本家發大財。資本家發財立品，大辦公益事業使社會安定。有幸被委任為立法、行政局議員的資本家，在為民請命之餘又替政府出謀獻策以維護官方利益。於是香港出現了一個「官商互惠」的局面。這是香港資產階級保障本身利益的最佳辦法，也是他們獲贈MBE、OBE、CBE爵士、勳爵等英帝國勳銜的因由。

七十年代後期，英國政府開始透過非正式途徑試探中國對香港前途的意向，因為新界租約將於一九九七年期滿。沒有新界，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就很難活下去。一九七九年三月，當時任港督的麥理浩訪問北京，正式向中國領導人提出香港前途問題。他從北京帶回鄧小平的口訊：「請投資者放心！」

一九八二年九月，當時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會晤鄧小平後不久，中英兩國政府即展開有關香港前途的談判。一九八四年六月，談判已接近尾聲，兩國代表開始起草有關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到時香港一向奉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將維持不變，直至二零四七年為止。

代表資產階級的立法、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對中國政府的承諾不放心。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行政局議員鍾士元、鄧蓮如和利國偉等以「有責任將香港人對前途的意見向中國當局反映」為藉口，前往北京謁見鄧小平，陳述香港人對前途的憂慮。他們儼然以香港人的代表自居。鄧小平對他們說：他們只是代表自己，不是代表全體香港人。鄧小平又責怪他們不了解中國政府的政策，對中國政府沒有信心。六月二十三日晚上，中國領導人接見香港行政局游說團的情形在電視熒光幕出現。我看到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三人遭鄧小平斥責後面面相覷。他們當時的窘迫情況，在我的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我為他們難過。

行政局北京游說團鍛羽而歸，給予香港資產階級一個啓示：他們的政治權力基礎是脆弱的，港英政府作為香港權勢中心的地位已開始動搖；他們要依附新權勢才能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於是「識時務者為俊傑」一語在香港商場流行起來。大商家、大廠家、大企業家漸漸從親近英國轉而親近中國。

事實上，早於五十年代已有香港商人向中共靠攏。他們搶購戰略物資運入內地。此舉有兩個意義。其一是他們做生意賺大錢。其二是他們不自覺地幫助「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和幫助「人民政府」進行經濟建設。「人民政府」稱譽這些商人為「愛國者」。對抗美援朝及中國經建有特殊貢獻的商人，後來成為「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除了獲得榮譽之外，他們又獲得一些大陸產品在香港銷售的專利權，財源廣進。至此，他們已不希罕一般香港有錢佬時時想獲得的英帝國勳章，也不介意傳媒謔稱他們為「紅色肥貓」。

踏入八十年代，「紅色肥貓」愈來愈多。不過此時「紅色肥貓」這個不雅稱號已為「愛國愛港商人」所取代。除了捐獻重金以支持大陸的教育、衛生、社會福

利事業之外，「愛國愛港商人」又競相在國內發展生意，包括開辦工廠，生產內銷、外銷貨品和投資於大陸各地的基礎建設工程。不少香港大商家、大廠家、大企業家之所以陸遂被委任為政協委員、港事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委員會委員，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是有原因的。

由於形勢比人強，一些前任或現任立法、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和已退休的港英政府高官也不避「轉軌」之議，由向港英政府出謀獻策而轉向中國政府出謀獻策。在香港回歸祖國之際，做一個親近新權勢中心的人，似乎比做夕陽帝國的孤臣孽子更為划算。

香港資本家之中，恒生領導人其實很有資格做「愛國愛港商人」。何善衡和他的早期生意夥伴如林炳炎、梁植偉、盛春霖、梁錫琚等是地道的中國人，在中國內發蹟，熱愛家鄉，熱愛中華文化傳統。何添是何善衡的最早期夥記，是恒生的開國功臣。何添的同父異母弟弟何賢也曾在恒生打工。後來他離開恒生在澳門發展，成為當地金融界頭頭和商會主席。他是最早期與中共有來往的港澳商人之一，被中共委任為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對澳門的政治、經濟事務有很大影響力，是人民政府與澳葡政府之間的橋樑。隨着恒生在香港金融界地位日益重要，恒生的社會服務深入民間，並為香港華人增光，加上與何賢的關係，何善衡等之被中共列為統戰對象誰人敢說不宜？可是由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政治、經濟情況動盪，加上他們的保守性格，何善衡等不敢戴「愛國愛港商人」的帽子，只敢戴「愛港商人」的帽子，寧願親近港英，不寧願親近中共，最低限度表面上如此。

何善衡、梁錫琚、何添、利國偉等之公開親近中共有一個頗長的過程。他們是比較遲「轉軌」的香港資本家，落後於其他知名富豪遠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何善衡等像許多香港有錢佬般對新中國政權沒有信心，紛紛作「狡兔三窟」之計。籌組大昌貿易行向海外發展，以分散投資風險，是四十年代後期至六十年代後期何善衡等做生意的策略。七十年代末期以前，恒生銀行與大昌貿易行的領導人對在大陸投資不感興趣，對新華社香港分社及其他中共機構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他們要依附港英政府和匯豐銀行。港英政府是香港權勢中心。匯豐是恒生的最大股東和靠山。利國偉於六十年代末期晉身立法局後，恒生對英國人的依賴和信任更上一層樓。

依附英國人之餘，何善衡等又極力與美國人打交道。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是美國在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維護者。美國商人在香港有很大投資。美國是香港製品的最大出口市場。恒生銀行和大昌貿易行與美國的金融、工商機構有許多生意來往。為了使恒生和大昌的美國生意有保障和發展，何善衡等不但與美國金融、工商界保持友好關係，也與美國領事館保持友好關係。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高級官員，有不少人是何善衡、利國偉等的好朋友。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每年夏季學校放暑假的時候，座落港島南部赤柱半島的何善衡別墅都有盛大園遊會。何善衡、梁錫琚、何添、利國偉及他們的夫人是主人。美國總領事、各領事、副領事及他們的家眷是客人。業務與美國有關係的恒生、大昌高

級職員應徵參加招待嘉賓，我是招待員之一。

五十年代期間，恒生、大昌與美國總領事館的關係一度顯得非常尷尬。這是由於市面出現「大昌行協助中共組織華南艦隊」的傳聞所引起。當時美國正實行對華禁運。凡是以戰略物資供應中共的人，都會被列入黑名單。以後他們不能做美國生意，在美國的資產要被凍結。傳聞的起因是大昌行參與當時在香港發展蓬勃的拆船業。港商拆船之目的，是將舊船拆卸，當廢鐵售與煉鋼廠作為煉製鋼材的原料。這是一門本少利大的生意。大昌行一共拆了接近三十艘舊船，其中有四艘是美國海軍的退役輕型航空母艦。該四艘空母是由美國政府以公開投標方式售給大昌行的。美國政府在波士頓海軍基地（Boston Naval Base）舉行公開投票，邀請國際買家參加。紐約大昌行代表香港大昌行投標，結果投得四艘退役航空母艦。香港大昌行於是聘用一間荷蘭海洋拖船公司將該四艘軍艦拖來遠東以備拆卸。一艘在日本神戶拆卸，三艘在香港拆卸。不知道是否有人存心與何善衡等過不去，或是由於其他原因，「大昌行協助中共組織華南艦隊」的傳聞就因此而在市面流行起來。何善衡、梁銑鋸、何添、利國偉等要幾經向美國政府解釋，才把誤會消除。以上的奇情故事，與恒生、大昌極力與美國領事館搞好關係，未必無因。

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何善衡、梁銑鋸、何添、利國偉等領導的恒生銀行和大昌貿易行始終保持一個「親英、友美、疏中」的態度。至七十年代，在「親英、友美」之餘，則對中國「欲拒還迎」。踏入八十年代，由於中國經濟改革與開放，以及香港回歸祖國這一件事已上了議事日程，何善衡等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和恒生與大昌的對華業務政策。

我在恒生打工時，對善伯的「見景」理論有深刻印象。在香港回歸祖國的過程中，「見景」理論甚有作用。何、梁、何、利不但只戴「愛港商人」這頂帽子，還戴上「愛國商人」這頂帽子，成為「愛國愛港」商人。他們的轉移有其道理。他們都是傳統中國人，有民族大義感和愛國心是應該的。他們是商人，唯利是圖也符合邏輯。隨着中、港之間的經濟關係日形密切，香港廠商與國際企業家紛紛前往一般人認為甚有潛力的中國大陸市場做生意，加以與母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不大符合匯豐銀行集團各成員分工合作的原則，恒生掌舵人改變銀行的航道勢所必然。這樣一來，恒生銀行以及何、梁、何、利等在香港的既得利益有很大機會可以保存。何、梁、何、利實際上為恒生及自己個人做了多少改善對華關係功夫，我不知其詳。但從我記憶所及的以下幾件事情可見端倪。

一九七九年，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率領一批大陸的財經專家訪港，獲利國偉及其高級同事熱烈招待。這是恒生公開表示「愛國」之始。許滌新後來被李嘉誠聘任為汕頭大學首任校長。許滌新考察團訪港之後，陸續有財經、工商、貿易、科技考察團由大陸前來香港取經，恒生銀行是取經重點之一。恒生的高級職員多次與這些考察團舉行座談會，向他們介紹香港的財經情況和恒生經營銀行的經驗。在向他們講解恒生指數和香港經濟的概況時，我在二次大戰時當繙譯官學到的普通話大派用場。招待專家訪問團之外，恒生又替人民銀行培

訓職員。人民銀行派人來恒生參加恒生的職員訓練班，並到銀行各部門學習銀行實務。

七十年代末期王匡當社長時，新華社香港分社已有與恒生接觸。接觸是互相利用的。在新華社方面，接觸是基於要了解香港的金融經濟情況並對何、梁、何、利等進行統戰。在恒生方面，接觸是基於要了解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意向，以便釐訂業務政策。恒生博愛堂從此多了一批神秘貴賓。

繼王匡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對香港資本家的統戰更為積極。此時恒生與新華社的關係又進一步。許家屯與利國偉及一些香港政界、商界知名人士不時在恒生博愛堂聚會，藉以聯絡感情和交換有關香港與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意見。爲了加強掌握香港及國際經濟信息，新華社香港分社成立了一個經濟情報機構，名爲東南經濟信息中心。許家屯是該中心的董事長，但不公開。「中心」的日常運作由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楊振漢負責。楊振漢乃係一位高級經濟幹部，從國內調來香港工作。楊振漢的哥哥楊振寧是著名華裔美國科學家，曾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利國偉與楊振寧的關係很好，因爲利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楊是中大特聘的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通過楊、利二人的安排，東南經濟信息中心的研究員可向恒生銀行經濟研究部取經。

到周南取代許家屯爲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時候，何、梁、何、利等與中國的關係再進一步。因爲對中國政府的友善態度和在大陸作種種有利民生、教育及經濟建設的捐輸，他們先後獲得中山大學和清華大學名譽博士的榮銜。因爲對香港金融業有貢獻和對香港經濟有認識，利國偉被委爲港事顧問。

一九九一年三月，恒生銀行的總行遷入座落德輔道中八十三號的第三座總行大廈辦公。這座大廈的地盤面積爲二千零九十八平方米或二萬二千五百八十平方呎。大廈上蓋自德輔中地面起計，高達一百三十六米或四百四十七呎。全座大廈有廿七層，另三層地庫，總實用面積達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平方米或三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平方呎。這座大廈比在一九六二年落成的第二座總行大廈更大、更高、建築設備更新穎。這是恒生進入另一發展階段的標誌。我於一九六二年入恒生打工，至一九八四年移居加拿大。八四年以後，許多恒生老同事相繼退休，部分也像我一樣移居海外。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恒生的人事組織、工作制度、業務政策與方針，均起了不同程度的變化。

到一九九四年，恒生銀行的四位長者均已屆高齡：何善衡九十四歲、梁銓珪九十一歲、何添八十四歲、利國偉七十六歲。他們功成身退，讓較年青的接班人在新政治、經濟環境下爲恒生開創一個新局面是時候了。九十年代以前，恒生紮根香港，眼看海外。踏入九十年代，恒生要順應香港和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新潮流。恒生要紮根香港面向中國。要落實這個政策，恒生不得不進一步親近中國，多做一些對大陸有利的事。在這方面，四位恒生老前輩爲他們的後輩樹立一個榜樣。他們聯手建立一個以促進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爲目的的基金，名爲何梁何利基金。關於這個基金，恒生銀行出版的《恒園》雙月刊有以下報導：

何梁何利基金金額達港幣四億元，由何善衡、梁銓珪、何添、利國偉每人捐

出港幣一億元構成。基金每年頒授獎金予國內有傑出成就和貢獻的科學技術工作者。基金設數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天文學獎、氣象學獎、地質學獎、生物學獎、生理學獎、醫學獎、技術科學獎，每年評獎一次。各獎項中，對達到國際領先學術水平的科技人員，授予何梁何利基金優秀獎，最多十名，各獎港幣一百萬元；對特定科學領域有傑出貢獻的，授予何梁何利基金獎，最多五十名，各獎港幣十萬元。評獎和授獎工作由包括國內科學技術權威和國際知名學者共十六人組成評選委員會負責。最早獲得何梁何利基金優秀獎的中國科學家為錢學森教授、黃汲清教授、王淦昌博士和王大珩先生。錢教授在空氣動力學、航空工程以至火箭及導彈技術發展均有傑出之貢獻。黃教授為中國地質學之先驅，他提出的理論使中國的探油技術取得重大突破。王博士為中國核子物理學發展之先驅，曾長期從事核武器之研製工作，對中國的原子彈及核子彈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王先生為中國的光學工程、光學精密機械、空間光學、激光及計量科學作出了重大貢獻。

基金依據國際慣例，採取信託管理制，信託委員會委員包括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惠永正（主席）、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韋鈺、國際知名學者楊振寧、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周振興（副主席）、恒生銀行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歐肇基五人。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三人，則為基金的顧問。

何梁何利基金是迄今為止海外華人為中國科技界捐獻的最大一筆基金，也是目前全國同類基金中之最大者。何梁何利基金將有利於在國內創造一種尊重科學、尊重教育和尊重人材的社會風氣。中國政府認為這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四日基金在北京舉行發布典禮時，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代表國務院、國家主席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向四位捐款人表示衷心感謝。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二日，基金舉行第一屆頒獎典禮。李鵬親臨主持頒獎。恒生銀行出版的《恒園》雙月刊第二八一期和第二八五期報導了何梁何利基金發布典禮和頒獎的消息，並印出中國政府官員與捐款人、家屬代表及有關人士的合照。其中一幅合照顯示了李鵬總理和利國偉董事長笑容可掬地互相握手。此一情景與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鄧小平接見鍾士元、鄧蓮如和利國偉時的冷酷表情成強烈對比！

由於形勢比人強，恒生不得不面向中國、注重香港及中國發展，策略性出售或結束海外業務。正如許多香港資本家一樣，恒生的領導人也改弦易轍。將行徽的形象修改，是恒生改弦易轍的一個象徵。行徽是銀行的一個圖案標誌，表現出恒生的傳統與特性。原有行徽設計於一九五四年。行徽是圓形，中心有一枚名為「方足布」的中國古錢。春秋戰國時代，中國以「刀幣」和「布幣」作為交易媒介。「方足布」是「布幣」之一。行徽的周圍是一個齒輪。古錢與齒輪之間則分別有中文「恒生」二字和英文「HANG SENG BANK LIMITED」字樣。據恒生老同事稱，古錢象徵恒生是一間理財機構，齒輪象徵做生意貨如輪轉。其次，齒輪又代表時代的巨輪，象徵不斷的進步，富有恒常成長的意義。行徽的背景

是黑色，圖案與文字是金色。這兩種顏色的配合，給人一個高貴穩重的感覺。新行徽於一九九六年面世。行徽的圖案佈局仍以古錢為中心，但齒輪為圓環所代替，而原行徽的文字已不復見。新行徽的顏色配搭，則以鮮紅代替黑色，銀灰代替金色。據銀行的新領導人稱：新行徽是恒生以新面貌迎接新紀元的標誌。我已離開恒生十餘年，對此不敢置評，但有一個感想：恒生是一間大企業。據《辭海》一書，凡以營利為目的而經營之事業謂之企業。既然營利是企業之目的，其他一切無非是達致這目的之手段而已。我對恒生新行徽、新人事、新作風的看法也是一樣。世界上的事物都在變動中。恒生將不再是一間我一向所認識的充滿人情味和傳奇性的銀行。我對此十分懷念，因為我在恒生度過了 my 黃金歲月。

第十節：「看不見的手」與家長式企業的式微

香港是一個極度商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個人不斷追求財富，企業不斷追求盈利。香港人稱進入社會做事為「搵錢」。窮人固然要搵錢，富人有錢不嫌多，要搵更多錢。銀行是以錢搵錢的企業，與社會經濟及人民財富息息相關。在恒生銀行工作了廿餘年，我不但見證了香港經濟的發展，也體會到恒生領導人如何生動地體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所謂「看不見的手」的理論。

一位名叫阿當斯密（Adam Smith 1723 - 1790）的英國經濟學家寫了一本書，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該書的中文譯名為《原富》或《國富論》。根據阿當斯的理論：

人的理性是專為自己打算，受自我利益驅使的。每當個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時候，不知不覺中都對社會作了貢獻。各人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考慮的不是社會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無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他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程度上促進那些利益。由於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於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於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許多研究經濟的人都涉獵過《國富論》。這本書是早期西方資本主義的經典著作。

何善衡和他的幾位恒生老同志雖然沒有在大學唸過經濟學，但他們深諳「看不見的手」的理論的奧秘。恒生是一間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做生意，首要「考

慮的不是社會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商業銀行是一間以錢生錢的牟利機構。客戶存款是銀行「所能支配的資本」。將大部份客戶存款用作放款及投資，從而賺取利息和資本增值收益，是銀行「為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的基本辦法。所有銀行都會這樣做，恒生自然沒有例外。但是除了放款和投資之外，恒生又動用不少「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來推行何善衡等制訂的「寓宣傳於教育」及「寓宣傳於服務」政策。在「寓宣傳於教育」方面：恒生舉辦了「初級銀行業務進修班」；設立了「教育輔導組」；資助香港中文大學建校；在工業展覽會及其他場合舉行甚有教育意義的古錢和財經資料展覽；創辦「恒生商學書院」。在「寓宣傳於服務」方面：恒生調撥甚為可觀的人力和物力來訓練行員，以增加他們的銀行實務知識和與改善他們的對客態度；編纂「恒生指數」和「恒生消費物價指數」；以至成立專為編纂各種財經指數而設的「恒指服務有限公司」。此外，銀行的經濟研究部又出版各種財經刊物，免費供香港內外財經界、學術界及有關人士參考。

很少銀行會像恒生這般熱心和落力推行「寓宣傳於教育」和「寓宣傳於服務」政策。部分恒生同事對此也不大明白。何善衡向他們作如此解釋：推行這兩個政策是為恒生的長遠利益「播種」。這兩個政策做得好，可為恒生帶來更佳的社會形象和商譽。更佳社會形象和商譽可能吸引更多前來存款或請求貸款的客人。更多存款和更多放款可能使恒生賺更多錢，恒生股東得到更多股息和紅股。從放款及投資得到的利益是可以衡量的，是有形的。更佳社會形象與商譽可能帶來的利益是無可估計的，是無形的。因為追求有形利益，恒生間接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追求無形利益，恒生間接促進了社會教育事業和財經研究事業的發展。

恒生銀行的最高權力機構為董事會。在其芸芸董事之中，以個人名義持有恒生股份最多者，依次為何善衡、梁鍊琚、何添、利國偉四人。他們都是恒生的大股東。在得到恒生最大股東——匯豐銀行——的首肯下，他們是恒生業務的決策人。因為善於運用銀行的「所能支配的資本」，何善衡等使恒生賺大錢。恒生賺大錢增加了股東的財富。除了持大量恒生股份之外，他們也持有許多其他公司的股份，因為他們也有自己的生意。中國人素有「發財立品」的思想。何、梁、何、利四人也不例外。基此，除了使恒生為社會做好事之外，他們也運用自己的資本為社會做好事。理由很簡單，為社會做好事可以有名譽和地位；有了名譽和地位之後，受人尊敬和信任，做起生意來更為方便。因而「發財立品」的真正意義是在於「受自我利益驅使」。

現代商人把「發財立品」的涵義擴大為「取諸社會，用於社會」。其實兩種說法沒有很大分別。經商之目的在於發財，在於取諸社會。這是無庸置疑的。至於發財之後會否立品，取諸社會之後，會否用於社會，則是另一回事了。聰明和目光遠大的商人成功後立品回饋社會。何善衡、梁鍊琚、何添、利國偉等也沒有例外。結果他們的生意愈做愈大，對社會的貢獻愈來愈多。他們為英國殖民地時代的香港做了許多的事。香港快要回歸中國之際，他們又為中國做了許多好

事。何善衡、利國偉、何添三人獲英女皇頒贈勳銜。何添、利國偉二人獲港英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何善衡、利國偉、何添、梁銑琚四人得到香港及中國各大學的名譽博士銜頭。利國偉又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頒贈大紫荊勳章。這些榮耀都是「看不見的手」效應的反映。

舊式中國商店老闆在僱員面前有無上權威，僱員不但要服從老闆的命令，還要聽老闆的教誨。老闆視僱員如子姪，僱員視老闆如家長。一九三三年，林炳炎、何善衡、梁植偉和盛春霖創立恒生銀號。他們儼然是銀號僱員們的家長。論資排輩，林炳炎是大家長。一九四六年，林、何、梁、盛等除經營恒生銀行外，又創立了大昌貿易行，目的在於分散投資並進一步發展他們的事業。在此方面他們得到梁銑琚加盟。一九四九年林炳炎去世，何善衡成為恒生、大昌集團的大家長。

踏入五十年代，恒生與大昌成為註冊有限公司，向現代化企業進軍。何善衡同時任恒生銀行和大昌貿易行的董事長，梁植偉為恒生銀行副董事長，梁銑琚為大昌貿易行副董事長兼總經理。他同時是恒生銀行的董事。恒生銀行總經理之職由何添擔任。他是恒生的最早期僱員，是恒生的開國功臣之一。一九四六年來到恒生、大昌集團任職的利國偉於恒生成為匯豐銀行的附屬公司不久之後，繼何添為恒生董事兼總經理。何添與盛春霖，繼續為恒生及大昌的董事。一九八三年，何善衡因年邁辭去恒生董事長之職，利國偉繼任董事長，善伯則應邀任名譽董事長。

梁植偉及盛春霖先後於七十年代中及八十年代初去世。以後恒生、恒昌集團的領導人為何善衡，梁銑琚、何添和利國偉。他們四人是恒昌企業的家長。論資排輩，何善衡是家長中的家長。

何、梁、何、利領導下的恒生銀行與大昌貿易行業務一日千里，使香港華人企業大放光彩。恒生的對客服務態度與方式使原來頗為保守的香港銀行業移風易俗。在零售銀行業務方面，恒生走在其他同業前頭。按客戶存款計，恒生是全港第二大銀行，地位僅次於匯豐。以經營米糧、食油、雜貨起家的大昌，業務日趨多元化。大昌經營的汽車進口、分銷、代理、維修業務冠於全港。到八十年代，論規模，大昌幾乎與外商大洋行看齊。不少人說大昌是「華人的怡和」，是「華人的太古」。

恒生、大昌的崛起，使銀行同業與貿易行同業為之驚愕。這兩間企業的成功令到同業們羨慕，甚至嫉妒。一九六五年，由於銀行體系不健全，香港發生擠提風潮，恒生避不過池魚之殃，終致控制股權落入匯豐手中。儘管匯豐承諾「河水不犯井水」，不插手恒生內政，讓恒生在「一行兩制」下實行「高度自治」，但目睹大半自己打下來的江山落在外人手裏，何、梁、何、利等能不黯然？

隨著何善衡、梁銑琚等年事日高，恒昌企業旗下的大昌貿易行漸漸成為香港及中國財團覬覦收購的對象。經過與香港六大富豪之間的交易，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背景的中信泰富，卒於一九九一年十月成功收購恒昌企業的全部股份。何善衡、梁銑琚、何添，及利國偉從此不再是恒昌的家長。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鍾伯以九十一高齡去世。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四日，善伯以九十七高齡仙遊，積閱享壽一百歲。較早時他已宣布定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卅一日正式退休，不再任恒生銀行名譽董事長。怎料他等不到這一天的來臨便與世長辭。

一九九六年三月，利國偉辭退董事長兼行政總裁的職務。他只做非執行董事長。行政總裁之職則由副董事長歐筆基兼。受委為非執行董事長後，利先生仍主持銀行的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一九九七年十月，匯豐任命當時已是恒生常務董事之一的艾爾敦（David Eldon）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卅一日繼利國偉為非執行董事長。利先生定於當天正式退休。但鑒於他曾為恒生服務逾半個世紀，功績卓越，他退休後即被董事會邀請繼何善衡為名譽董事長。一九九八年三月，歐筆基辭去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之職，其空缺由當時已是董事之一的鄭海泉填補。艾爾敦和鄭海泉都是匯豐派來掌管恒生事務的人。這樣的安排使恒生至今仍擺脫不了寄人籬下的形象，令愛護恒生者惋歎不已。

到如今，恒生的四位長者之中，何善衡與梁球鋸已去世，何添及利國偉因年邁而對恒生的事務意興闌珊或力不從心。今後恐怕再沒有人以家長身份來領導這間富傳奇性的銀行。近年恒生的高層人事變遷，象徵家長式企業的式微。

第五章：吾愛吾國愛何國

第一節：國籍的煩惱

從種族、血緣的層次來看，絕大多數在香港居留的人是中國人，包括在香港出生和不在香港出生的。但是自從一八四二年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之後，他們便要為他們的國籍問題而煩惱。初時，煩惱並不十分顯著，因為他們在國籍選擇方面有頗大的活動空間。

根據滿清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的國籍法，凡是有中國血統之人都是中國公民。這兩個政府均稱在香港及外國居留的中國人為華僑，而華僑是可有雙重國籍的。另一方面，根據英國政府的國籍法，凡是在英國本土或屬土出生的人，不論種族、血統，都算是英國公民。不在英國本土或屬土出生的人，若辦好了歸化或移民手續，也可以做英國公民。基於上述原因，在香港居留的中國人，有條件的話，可以同時做中、英兩國的公民，和可以選擇只做英國或中國的公民。

根據香港政府法例，一個人在香港出生之後，其家長應替他辦理出生登記，並領取出生證明書。出生證明書俗稱出世紙，是香港居民取得英國國籍的憑證。出世紙持有人可領取英國護照，以便往外地旅行。他是英國公民，可以在英國本土及屬土永久居留。辦好了歸化手續的人也是英國公民，同樣有領取英國護照和在英國本土及屬土永久居留的權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大部分香港居民認同中國。他們之中，只有少數會經常到外國旅行。由於語言、文化隔閡，他們也不大喜歡在英國定居。鑒於持有出世紙便算入了英籍，而英國與外國開戰時英籍人士要服兵役，許多華人家長沒有向政府登記子女的出生。中國人為什麼要替英國打仗？同一道理，除非有必要，申請歸化英籍者也不多。在那個時候，英國護照對在香港居留的中國人沒有多大吸引力。他們不熱衷於做英國公民。

第二次大戰結束和中共解放大陸後，香港華人的國籍問題嚴重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承認華僑有雙重國籍，又不認香港華人為華僑。隨着中國政治動盪，大陸人民紛紛來港避難。香港政治相對地穩定，經濟發達，市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不少香港華人希望取英國護照，做個英國公民。他們不一定愛英國，但肯定愛英國護照給予他們的便利。憑英國護照，他們可隨時外出旅遊、留學、考察、經商，必要時可以在英國定居。

在香港出生兼持有出世紙者，順理成章是英籍人。憑出世紙他可以領取英國護照。於是出世紙成為甚有價值的東西。許多出生時只有登記而沒有領取出世紙，或領取出世紙之後遺失了的人，都辦理出世紙補領手續。補領出世紙的申請人須找證人來證明他的確在香港出生。一般華人家長在子女出生滿一個月後設宴招待親友，以示慶祝。這種宴會稱為彌月宴。曾參加申請人彌月宴的長輩是理想的證人。這位證人不能是申請人的親戚，只能是申請人父母的朋友。他的身家要清白，無犯罪紀錄，有正常職業。

不在香港出生或出生時沒有向政府登記的人，如要取得英國護照，先要辦

理入籍手續，再憑入籍證明書申請護照。入籍手續相當繁複、嚴格，要找有地位紳士名流作擔保人。

一些不在香港出生及背景有問題的人爲了急需，沒有耐煩辦理入籍手續。他們購買別人用不着的出世紙，冒原持有人的姓名申請護照。冒名者的年歲當然要與原持有人相近。此種不法行爲有時可以過關。不過一旦露出破綻，申請人的資格即被取消。他會被檢控。定罪後，輕則罰款，重則入獄。

一九四九年以後，很多中國人由大陸來到香港定居。他們加入了非本地出生香港人的行列。非本地出生的香港人和在香港出生而不持有出世紙的香港人，只能被稱爲香港居民。法理上，他們是沒有國籍的。這些人不是英國公民。他們又不肯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或中華民國公民。他們到外國旅行時沒有護照，只持香港政府發給的身份證明書(Certificate of Identity, 簡稱 C. I.)。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視所有在香港及澳門居留的華人以爲港澳同胞，這些人進入大陸時要持「港澳同胞回鄉證」。由於英國與中華民國沒有外交關係，香港人前往台灣旅行不能憑香港政府簽發的證件入境。他們要往台灣駐香港的機構申請入台許可證。

一九五二年，我要往新加坡探望在當地經商的文光二哥。憑出世紙我領取了英國護照。護照是在香港簽發的，有效期爲十年。護照註明我的身份爲：「英籍：聯合王國及殖民地公民」(British Subject: Citiz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lonies)。憑這護照，我往英聯邦國家及地區旅行不用簽證，可以在英國本土作永久居留。

一九六二年開始，香港英籍華人的居英權突然被取消了。換言之，當我第一本護照期滿，更換第二本護照之後，我就不能在英國定居。事情的起因原來如此：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殖民地相繼獨立。由於一些殖民地獨立後，人民的生活反不如前，當地英籍公民紛紛移居英國。六十年代初期大量西印度人和英籍東非人湧入英國，引起英國本土居民不滿。於是從一九六二年開始，英國政府不再讓來自英國屬土的非英裔公民有居英權。來自香港的英籍華人當然沒有例外。英政府此舉，顯然有種族歧視成份在內。從此我變成一個有名無實的英國公民，通俗地說是個二等公民。

有些香港華人喜愛英國生活方式，仰慕英國文化，在事業方面與英國有密切聯繫，但都不甘心做二等英國公民。因此，他們索性移民英國，在英國住滿了若干時日，正正式式地做個英國公民。他們拿的是在英國簽發的護照。有民族自尊感的香港華人認爲這是崇洋媚外的表現。但是現實的香港華人則覺得有個「一等英國公民」的身份在香港做事總是有好處，因爲香港是英國殖民地。

持「二等英國公民」護照或不註明國籍的身份證明書出外旅行的香港華人，除了受外國人歧視之外又不時出洋相。我的一九七八年歐遊經驗是一個例證。是年我參加一個香港旅行團前往歐洲遊覽。路經奧國 Innsbruck 市時，我們與多個來自不同國家的旅行團在一間劇院欣賞奧地利土風舞。開場前，舞蹈團團長請觀眾自我介紹來自何國，好讓舞蹈團樂隊演奏該國的國歌，以表歡

迎。正當各國遊客紛紛站起來顯示身份之際，香港旅行團團員不知所措。我們不好意思請樂隊演奏「天佑女王」，也不願聽「義勇軍進行曲」或「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於是有人自我挖苦，建議用「小李飛刀」作為我們的「國歌」。「小李飛刀」為當年一齣香港電視劇的主題曲，家喻戶曉。第一個唱「小李飛刀」的是著名歌星羅文。這一滑稽建議當然不獲全體團友通過。結果樂隊沒有為香港遊客演奏國歌。此情此景令到在場各國遊客均向我們投以詫異目光，而我們則羞慚到無地自容。

一九七九年，中國領導人向到北京訪問的香港總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表示，中國將要收回香港。麥理浩是第二十五任港督。陪他一齊訪問北京的還有當時的首席行政局議員簡悅強。麥理浩和簡悅強北京之行結束後，英國政府即開始逐步減輕對香港居民的承諾，因為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已時日無多。簡悅強先知先覺，從北京回港後不久即辭去行政局及一切與港英政府有關的職務。但是一般香港居民仍在五里霧中。從一九六二年起，由於居英權被取消，香港華人的二等英國公民身份進一步被確認。是年英國政府修訂國籍法，把香港華人列為「英國屬土公民」（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y Citizen，簡稱BDTC）。持BDTC護照到各國旅行仍可獲駐當地英國領事保護，往英國旅行不用簽證，但沒有居英權。

有關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於一九八四年發表後，BDTC護照的有效期止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因為是年七月一日開始，香港不再是英國屬土。為了方便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在香港出生的人往外地旅行，英國政府創造了另一種英國二等公民護照，名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簡稱BNO護照）。這種護照的持有人一樣沒有居英權。到了這個地步，香港華人的國籍選擇已走到十字路口。他們要各自按着本身的文化認同、政治傾向、經濟條件，和價值觀去為個人的國籍定位。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以後，他們不可以繼續做二等英國公民或無國籍人。若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公民便要做其他國家的公民，甚或中華民國的公民，儘管北京政府認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在此情形下，香港華人何去何從，甚費思量。

第二節：親人回祖國參加革命

自入學讀書以來，我就認識到我的根源在中國。而我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則是一塊背負民族恥辱之地。我少年時的香港社會，站在上層的是白種高加索人，即所謂西人。其中地位最高的，是統治香港的英國人。以次為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及歐洲諸國的僑民。日本人雖然是黃種人，但由於日本是一個強國，日僑在香港的社會地位與一般西人相等。黃種的中國人是香港土人。他們的社會地位低微，有時還不如來自印度、南洋、非洲等地有色人種。由於祖國不爭氣，香港華人沒有政治本錢來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補救辦法為拚命賺錢，發財後立品，做個「高等華人」。不過能做「高等華人」者少之又少。五十年代

以前，中國人不准在港島山頂區居住，「高等華人」也沒有例外。山頂是西人住宅區。基於上述原因，我一直渴望中國有朝一日強盛起來，到時香港不再是英國殖民地，香港華人堂堂正正地做中國公民，而不做二等英國公民。

四、五十年代的香港，有我這樣思想的青年人甚多，包括與我同輩的親人在內。其中與我關係最密切，並且以實際行動來表示他們的愛國熱忱的，為我的四弟子光、六弟元光、表弟梁乃熙、我妻子陳永堅的二姊梓橋、三姊淑凌、五哥葆光、六哥作溥。我雖然也很愛國，但思想不及他們前進。他們先後回到中國參加革命。我則思前想後，猶豫不決，始終留在香港，孤芳自賞。我與陳永堅在一九五六年結婚。關於她兩個姊姊和兩個哥哥的事，初時只知一二，直至一九七三年才有較多認識，因為在此以前我沒有見過他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數年，關家四兄弟之中有二人離開溫暖的家跑到內地為祖國服務。與此同時，陳家十二兄弟姊妹之中亦有四人走同樣道路。這絕不是巧合，因為在當時環境下，關、陳兩家的情形也在許多香港華人家庭內發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人們對它的政治、經濟發展滿懷信心，以為從此中國人民有好日子過。不料隨後的二、三十年，大陸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全國性群眾運動，令到人民不知所措。搞這些運動的原意是好的，但在實踐時違反了人性和客觀的自然與社會規律，好心做壞事。全國人民都不會忘記「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資本家改造」、「知識分子大鳴大放」、「反右傾」、「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帶來的衝擊、破壞與恐懼。

大陸的動亂不但使愛國的香港同胞沮喪，也令到我的國內親人飽受精神與肉體折磨。在五十年和六十年代，中國與西方國家交惡，從香港進入大陸的旅客都可能有「美帝」或「英帝」特務的嫌疑。香港居民多數有親友在內地，我亦不例外。在此情形下，我很難與國內親人真實地互通消息。偶爾有書信來往，亦只敢談談家庭瑣事，有關個人的工作與國家大事則三緘其口。與此同時，為了減少麻煩，我與他們的會面可免則免。在這二十年內我只到過廣州兩三次，每次進出國門都戰戰兢兢，唯恐得罪公安及海關人員。在內地的言談舉止也極端謹慎，以免惹禍或連累親人。至於四弟、六弟等能否來港與我相聚？則是一個多餘的問題，因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們根本沒有機會離開大陸。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我很難與大陸親人互訴心曲，因而對他們的工作與生活，印象模糊。此一令我不安的現象隨着文化大革命逐步收斂而日漸消失。一九七三年，我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機會回國觀光兼探親，在廣州及北京一共逗留了個多星期。到了這個時候，我才有較開朗的心情和較充裕的時間，與子光、元光、梓橋、淑凌、葆光、作溥等相聚，從而較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狀況。是時乃熙已離開中國，經香港往愛爾蘭及英國留學。由於香港與西方各國的郵、電、交通暢通無阻，有關他的情況我知道很多。踏入八十年代及以後的歲月，香港、中國和世界各地的聯繫更為密切，我對上述七位愛國親人的了解更進一步。他們的辛酸往事發人深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一兩個月，和成立後約一年的光景，是上述親人相

繼投入社會主義革命熔爐的時刻。一九四九年八月，廣州解放前夕，陳梓橋與陳淑凌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文科，陳作溥在廣州嶺南大學讀農科。他們加入愛國學生行列，冒着被國民黨軍警逮捕的風險，四處散發傳單和張貼海報，號召廣州市民迎接解放軍入城。由於思想特別前進，廣州解放前幾個月梓橋已加入共產黨。她打算為中國的革命事業獻身。廣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後，淑凌繼續她的學業，在中山大學畢業後留在廣州從事文化工作。作溥在嶺南大學讀完農科後返回香港，在政府農林處任職。因為不甘英籍上司的頤指氣使，他在香港工作了一個短時期便回流廣州，在嶺南大學農學院任職。

一九四九年九月，通過中共在香港的兩個外圍組織——中華音樂學院與虹虹歌詠團，子光和元光分別入了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共青團）。之後，子光即往廣州參加成立廣東省文化局的籌備工作。元光則跑到廣東、江西、湖南邊境游擊區加入華南文工團。通過各類文藝活動，該團到華南各地宣傳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

一九五零年，梁乃熙畢業於香港皇仁書院，但沒有投考香港大學。一如當時許多「番書仔」，他投向祖國懷抱，到廣州嶺南大學深造。

陳葆光在三十年代後期畢業於香港官立漢文師範學院。但他沒有當教師而轉學中醫。大陸解放後，人民政府致力發展中國傳統醫學。出於民族感情，他於一九五零年回歸祖國，為人民政府的醫療事業服務。

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政府進行土地改革，將地主擁有的土地分給佔全國人口最大比重的佃農，希望他們能提高工作積極性，增加生產，從而改善生活和促進國家經濟發展。鑒於解放戰爭結束後才參加工作的幹部沒有打過仗，黨領導當局要求他們人人參加土改，接受另種嚴峻考驗。換言之，沒有過「戰爭關」的人要過「土改關」。關子光、關元光、梁乃熙、陳梓橋、陳淑凌、陳作溥、陳葆光等都沒有經過戰爭考驗。於是在「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載難逢」的口號指引下，他們與無數相同背景的幹部暫時放棄正常工作，下鄉與農民同甘共苦。

土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也是中共極「左」路線的開端。「左」的表示之一為把複雜的社會現象和生活現象簡單化，例如「貧下中農是最革命的」、「愈窮愈革命」、「沒有文化是最光榮的」等。在這條路線的影響和支持下，幹部們好大喜功，報喜不報憂，弄虛作假，以迎合上級的旨意。他們沒有勇氣承認錯誤，一錯就錯到底。在執行任務時，他們寧「左」勿「右」，因為「左」是態度問題，「右」是立場問題。謬誤的理論加上「愈左愈好」的浮誇作風在中國大陸流行了廿多年，期間引發了一次又一次像土改般災難性的群眾運動。我的愛國親人都受這些運動影響。

在我的愛國親人中，最早告別中國大陸式災難性群眾運動的是梁乃熙。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在中共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口號感召下，他與二十多位嶺南同學投筆從戎。他們參加解放軍以支援在朝鮮作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一九五二年初韓戰後期，中共開始建設現代化空軍。乃熙被派任新創的空軍幹部學校受訓（當時解放軍空軍司令劉亞樓的兒子也是空軍幹部學

校的學員)，於一九五三年七月畢業，為該校首屆畢業生。隨後他在空軍總部工作，完成各種任務。

一九五五年，乃熙退伍回廣州繼續讀書，在華南農學院植物保護系學習。華南農學院的前身是嶺南大學農學院。一九五七年，因為父親在香港病逝，乃熙回家奔喪。之後在母親極力懇求下，乃熙不返回內地，條件是母親資助他到外國留學。

一九六零年，乃熙到愛爾蘭國立大學進修，後來在英格蘭的布拉德福大學（Bradford University）考取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他在英國著名的利華化工廠（Unilever）任研究員多年，專門研究生物化學。英國的科學及醫學雜誌不時刊登他的論文。他是英國皇家化學會的會員，也是國際生物化學及醫學會的會員。好學不倦的梁乃熙又在七十年代後期研究針灸學，把中國傳統針灸治療與西方藥物麻醉這兩門科學融會貫通。他的現代針灸學研究成果得到中國及西方醫學界確認。持有英國註冊針灸師執照的梁乃熙博士在八十年代多次到中國講學，協助培養新一代的中國針灸人才。一九八六年自福建大學講課完畢後，他到廣州住了兩星期，趁機會參加抗美援朝號召學生參軍三十五週年紀念大會。廣州軍區某處負責人約見他作友好談話，嘉許他對解放軍及國家的貢獻。我的表弟梁乃熙博士不愧為一名「身在異邦，心懷祖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他既愛科學又愛祖國，不用說更愛真理。

深入廣東省民心的粵劇，多以古代帝皇將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為劇本，封建色彩濃厚。於是通過改良粵劇以改造廣東人的思想，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便成為廣東省文化局的一項重要任務。因為是廣東人，參加土改完畢返回文化局述職的關子光很自然地被委以改良粵劇的重任。從此他放棄正統西洋音樂的研究，而與廣東舞台劇及戲曲結不解緣。當時許多在香港演戲的大老倌都成為文化局的爭取對象，因為他們若能回歸祖國，將有助於粵劇的改良。一九五四年，在廣東省委和港澳工委的策劃與安排下，子光受命到香港游說馬師曾和紅線女，請他們返內地為人民政府服務。這兩位粵劇紅伶向中共靠攏，為粵劇史上的一件大事，哄動了廣州、香港、澳門演藝界，三地的粵劇愛好者，莫不以此為話題。

四弟在文化局工作表現積極，頗受上級賞識，步步高升，至副處長級。他的妻子李艷霜是廣東省粵劇團的一位主要演員，與紅線女、羅品超等齊名。人民公社大躍進等運動，隨土改之後，繼續貽害中國大陸，造成全國性大飢荒，死人無數。當時二哥與我不停自新加坡及香港以郵包方式寄運糧食接濟在廣州的四弟一家和在南寧的六弟。二哥主要負責寄奶粉給兩個姪兒。他們長大後，李艷霜常常對他們說：「你們是吃二伯父寄來的奶粉養活的。」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時，子光夫婦下放農村接受改造。他們被迫遺下兩個幼子，到貧瘠的英德縣種茶。在英德茶場，他們日以繼夜進行艱苦的體力勞動。在廣州市，念東及念豐失去父母愛，由一個不大可靠的傭人照料。

大陸解放初期，中共要培養很多青年知識分子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生力

軍。六弟元光在南華文工團服務了一段時期後，於一九五六年，以「幹部調派學生」資格考進北京大學。他先修俄文，繼而入中文系就讀，至一九六一年畢業。一九六二年，六弟被分配到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局戲劇研究室工作。在香港的時候，他的學校成績不佳，也沒有心機讀英文。他回國後再有機會讀書，且能在全國有名的北京大學深造，香港及海外親友聞之都替他高興。母親、二哥和我尤感欣慰。我們兄弟四人之中，只有元光完成大學教育。

元光讀書雖多，但不大明理。他是個書呆子，是一個極端理想主義者。因而在無法無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到處碰壁，受嚴重創傷。文革長達十年，由一九六六至七六年，期間全國各地的機關、學校、工廠、礦場、農村都開批判會和鬥爭會，人們到處可以看見大字報，看到手舉小紅書的學生的狂熱奔走、串聯、呼號，看到各官方與民間組織互相抗爭、辯論，以至武鬥，看到無數善良的人遭受冤屈、打擊、迫害，甚至殘殺。文革不僅使中國政治混亂，經濟崩潰，而且使人民的權利和個人尊嚴盡失。

廣西是文革重災區之一。為人憨直的關元光抱着一股熱情參加當地的文革運動。他屢受人唆擺，被鬥爭的幕後主持人利用做「過河卒子」仍懵然無知。結果愛國愛黨的文化局研究員關元光成爲一個惹是生非的人，到處受人責罵、凌辱、追打，私人財物損失殆盡，性命幾乎不保。他曾從南寧逃到廣州，在四哥家避難。但由於廣州也很亂，他不能久留。不料一回到南寧即被人再度鬥爭，關進「牛棚」。所謂「牛棚」即是監牢。文革時被關進「牛棚」的人有大部份是無辜的。他們是一群代罪羔羊。元光的「文革罪狀」至七十年代末期才獲平反，是時他已五十歲，不再是精力充沛的青年了。

參加土改工作完成後，葆光五哥被調往海南島海口市的一間衛生院當院長。當時海南島是一個尚待開發的地區，經濟落後，人民生活困苦，住慣大城市的人多數不願前往工作。但是五哥身不由己，因為既然肯捨棄在香港的舒適生活而回國服務，他就有服從組織命令的義務。在海南島，他與一名土生的女護士結婚。由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末期，陳葆光夫婦先後在海口和廣州生下五女一男。文化大革命時期，五哥在廣州中醫學院工作，目睹文革慘況，他的愛國熱情大減。他的海外關係和知識分子身份受到歧視。他的三個較年長女兒沒有書讀，要做紅衛兵，與自各地前來廣州串聯的紅衛兵到處亂闖。當她們發覺文革沒有給她們帶來好運，反而使她們成爲失落的一代的時候，她們決定離棄祖國。正如許多失望的青年人一樣，她們冒險從廣州步行至深圳，再從深圳泅水橫渡蛇口與元朗之間的后海灣登陸香港新界。當時香港軍警對由大陸偷渡來港的人防不勝防，結果陳氏三姊妹成功與在港的親人會面。在香港住了一個時期，她們到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請求協助，以難民身份移民美國。七十年代後期，葆光的大女兒首先與她的未婚夫到紐約定居。她的未婚夫也曾是紅衛兵。他們結婚後，即申請留港的兩個妹妹到紐約團聚。其他陳葆光家的成員亦相繼以家人團聚方式移居美國。至八十年代中期，五哥及其家人都已成爲美國公民。

六哥作溥在土改時深入農村。爲了表示他是一個擁護國家政策和願與農民同甘共苦的知識分子，他與一名貧農的女兒結婚。文革時，他在廣州教書，學生大部分做了紅衛兵。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是要清算的。他的學生視他爲清算對象。文革平息後，陳作溥得到平反，恢復工作，在華南農學院蠶桑系任教。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農學院有機會與海外農業研究機構交往。八十年代初期，作溥被派往日本參加聯合國農業會議，與各國的專家交流經驗。後來他又在廣州接待來訪的外國農業研究員，向他們介紹中國的蠶桑業。有機會發展所長，對他來說是一件好事。但久經革命考驗的陳作溥對事業前途已失去信心。當時許多大學教授與講師都有同樣心情。由於薪金微薄不足養廉，他們競相棄學從商。共產黨與人民政府要人民向前看，看美好的將來。但是在一些無良幹部帶頭下，「向前看」變爲「向錢看」。八十年代流行於中國高級知識分子之間的口頭禪是「下海」。「下海」即棄學從商之意，與「向錢看」有相同意義。陳作溥「下海」不成功，因爲他沒有做生意的頭腦，結果還是繼續做一名窮教授，直至退休。

三姊淑凌自幼好學，尤擅長繪畫。廣州解放後初期，她爲人民政府做了不少與美術有關的宣傳工作。後來她與在中山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的何領輝結婚。何領輝也來自香港。因爲是個專業人才，他畢業後即被國務院鐵道部聘任爲工程師。三姊與三姊夫舉家由廣州遷往北京定居後，夫妻即聚少離多。爲了工作需要，何領輝經常出差，到全國各地的鐵道視察，並執行修橋整路的任務。留在北京的陳淑凌，除了主持家務和教育兒女外，還不時替市內機關、學校、工廠繪宣傳畫。大躍進期間，她表現積極，與廣大北京市民參與十三陵水庫的建築。爲了表示與人民共同勞動以建設社會主義，當時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在水庫建築工地上亮相。解放初期投奔祖國的香港知識分子，有人搞政治，有人搞文化藝術，有人搞專業，有人搞技術。文革期間，搞政治及搞藝術的最倒霉，甚難逃脫被批鬥的命運。搞專業與技術的則較爲幸運，因爲這類人才在經濟落後的中國爲數不多，他們受到傷害將會影響國家的建設。因爲這緣故，儘管文革期間因有海外關係而受到歧視，以致子女不能讀大學，陳淑凌、何領輝一家在國內的生活還是比較我的其他回國親人爲安定與豐裕。

一早就參加革命的陳梓橋只知爲黨國盡忠，毫不爲自己打算。廣州解放後，她一直從事文教工作，希望通過教育改造中國人民的思想，使社會主義建設得以成功。因爲忘我地工作，她到了很大年紀才論婚嫁。黨組織配給他一解放軍老幹部做丈夫。這位姓孫的二姊夫隨第四野戰軍從東北南下解放廣州。「老孫」是貧農出身，沒有入過學校讀書。在五六十年的中國，因爲革命需要，大學畢業生與目不識丁的貧下中農結婚是很平常的事。文化大革命從改造人民思想發展到黨內派系鬥爭。在廣州任文教局副處長的陳梓橋不免被捲入漩渦。在黨紀幾乎全廢的當時，幹部職級愈高受人批鬥機會愈多。副處長的職級不算低。說到副處長職級，不禁又記起關子光在文化局的職級，因爲他與陳梓橋同是副處長。在當時中國的官場，似乎肯任勞任怨又能幹的人多數在一個機

關內當副手。坐正的則多數是較懂人情世故、了解當前政治風向和與上級關係搞得較好的人。出身成份也很重要。成份好的較能取得組織信任，成份差的則相反。梓橋與子光雖然經已入黨，但由於有海外關係和是知識分子出身，他們只可做單位的副領導人而非正領導人。由於愛國心切而返內地參加革命，他們對此不公平待遇毫無怨言。文革過去後，為黨為國出了不少力和歷盡艱苦的二姊與二姊夫均已年邁、體弱、多病。「老孫」於七十年代後期離開人間。陳梓橋則於八十年代初期去世。二姊彌留之際，永堅曾到廣州慰問她，她說了一句話：「我走的道路可能走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但在陳梓橋副處長的追悼會中，文教局代表致詞說：「梓橋同志是一位忠實的共產黨員，為黨為國貢獻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七十年代末期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口號之後，中共以改革、開放政策治國。中國的經濟有轉機，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人民的思想與行動也獲較多自由，儘管與外國人士的理想還有一大段距離。在此情形下，許多原是香港居民或海外華僑的大陸人獲准出國。我的弟婦李艷霜原是香港居民，她於一九八零年獲准回港定居。一九八六年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之後，她申請子光回港。子光是艷霜的配偶，在香港出生。他回港定居沒有問題。子光與艷霜生的兩個兒子在廣州出世，不是原香港居民，因而不能來港與雙親團聚。這是一件憾事。更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元光也不能回港定居。他的香港出生證明書多年前被父親不慎撕毀了。由於拿不出其他證件，他的回港申請不獲批准。元光於七十年代後期結婚，妻子是南寧人，生有一女。基於上述情況，子光的兩個兒子、元光、元光的妻子和元光的女兒這五個我的親人，只可用雙程通行證來香港旅行，或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出國。根據中共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參加革命的幹部滿六十歲可申請免役，謂之「離休」，人民政府成立後參加黨或政府工作的幹部滿六十歲便要退休，謂之「退休」。「離休」或「退休」可領取長俸。「離休」長俸比「退休」長俸為優。「離休」幹部每月領取之長俸為月薪的百分之一百一十。「退休」幹部每月領取之長俸為月薪的百分之一百而已。子光和元光都是「離休」幹部。

因為熱愛祖國和不甘心做英國殖民地的順民，我的同輩親人相繼回國參加革命，流了不少血汗，肉體與精神受盡千辛萬苦。他們到底為祖國做了些什麼？有沒有因此感到滿意或驕傲？有沒有因此而覺得沮喪和後悔？

第三節：難忘的祖國之旅

百多年來，中國曾面臨許多苦難，有外來的，也有內在的。每當中國遇上外來的苦難，很多香港華人不假思索地回去共赴國難。每當內在苦難平息，國家露出曙光的時候，很多香港華人又回去獻身建設祖國。我曾在四十年代返內地參加抗日救國。抗戰勝利和中共革命成功的時候，我的弟弟和表弟，以及我妻永堅的姊姊與哥哥，相繼加入香港愛國華人的隊伍，回到大陸為人民服務。六十年代以後，香港華人的回歸熱潮冷卻下來。原因是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中

國的內在苦難頻頻出現，至文化大革命達到高峰，令到香港華人「談共色變」，視返回祖國為畏途，中共對港人的「統戰」計劃幾乎前功盡棄。

至一九七一年，進行了五年的文革有所收斂。是年九月十三日，號稱「毛主席接班人」和「偉大的副統帥」的林彪武裝政變失敗，乘坐空軍的三叉戟運輸機倉惶逃離北京，飛出國境後，不久該機即墜毀，林彪夫婦及機員全部死亡。「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周恩來受命主持中央的政府工作，使苦難的中國暫時得以休養生息。周總理設法恢復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又恢復了一批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高級幹部的名譽，並使他們能陸續出來工作。與此同時，他又設法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不讓中國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他的乒乓外交，導致中國於一九七二年重返聯合國。同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令到包括我在內的許多香港華人再度對祖國有所盼望。中共當局重新爭取香港民心，是時候了。

六十年代後期，恒生銀行展開資料研究工作，身為資料室負責人的我，為了向外界取經，需要與多個不同背景的財經、工商、新聞、政府機構聯絡，拜它們的專家為老師。在芸芸老師之中有一位黃先生，他與我談得很投契，因為對於許多事物，我們的看法十分接近，我們很快便成為好朋友。我們不但關心香港、中國及國際的政治、經濟情況，也關心到彼此的愛好、志趣、理想、家庭環境與社會關係。

七十年代初，文革動亂暫告平息，關心祖國前途與國內親人近況的香港同胞都想返內地一行，以了解真相。我和母親及永堅均有此需要。知道我們的意圖後，黃先生自動請纓，願為我們安排一個有意義的祖國之旅，因為他說他與國內有關方面聯繫密切。他說這次旅行不但有助於我對國家及親人近況的了解，也有助於我的事業發展。他又說我不用為行程及費用操心，他可代辦一切。於是我趁着放恒生銀行給我的每年度休假之便，於一九七三年八月在黃先生的帶領下，回國作為期兩星期的探親觀光旅行。與我同行的，除母親及永堅外，還有我的女兒慧瑜和慧琳，當時她們分別是九歲及八歲。

在黃先生策劃及陪同下，我們一家五口由香港乘船至澳門，從澳門乘汽車往廣州，從廣州乘飛機到北京，然後循原路線返港。廣州和北京都有我們的親人，久別重逢是值得欣慰之事。欣賞兩地的歷史文物，名勝古蹟，以及看到解放二十餘年以來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面貌更是此行的一大收穫。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前，從香港往大陸旅行的人要辦理麻煩手續，進、出國門時戰戰兢兢，唯恐得罪邊境的公安和海關人員。但是我家此行沒有這些心理壓力，因為黃先生幫助我們順利過關。我們受到公安和海關人員的禮貌待遇，在旅行證件上戳印時滿面笑容，行李不用檢查。從澳門進入中國境後，我們前往廣州的交通工具不是一般旅客乘坐的長途巴士，而是一部專用七座位小巴，即國內俗稱的「麵包車」。黃先生與小巴司機一路護送我家經中山、順德、番禺三縣而至廣州市。

中山縣的翠亨村是我們的第一個旅遊點。這裏的孫中山先生故居是許多

遊客嚮往的地方。中山故居是一座古舊的兩層建築物，外牆是紅泥土色，室內陳設中山先生用過的傢俬和文具。屋前有一個庭院，院內植有一棵大樹叫酸豆樹，是孫中山十七歲時親手栽種的。據故居的看守人說，這棵樹曾經給颱風刮倒，躺在院子牆垣邊，幾經護理，居然頑強復活，生機勃發。離故居不遠，有「孫中山故居陳列館」，裏面擺設了不少與中山先生有關的文物。中山先生故居的教我神往，是因從讀小學開始，我一直景仰這位中國近代史上的偉人。由中山至廣州的公路，經過河道縱橫的珠江三角洲，到處是青青綠綠的四野，景色怡人。美中不足的是當時的公路建設落後，沿途很少跨河橋樑，我們的小巴及行走公路的車輛往往要由渡船運載過河才能繼續前進。

二次大戰結束時，我從內地經廣州返回香港老家。當時廣州是一個飽受戰火洗禮的城市，百廢待舉。二十多年後舊地重遊，五羊城給我的破舊印象沒有多大改變，除了幾座新建的蘇俄式大廈之外，其餘的樓房破舊如故，城市基礎建設乏善可陳。我們入住前身是「愛群酒店」的「人民大廈」。這是當時全市最高級的旅館之一，專為招待外賓而設。港澳同胞及海外華僑通常入住「華僑大廈」。我家破格成為「人民大廈」住客，要拜黃先生之賜。當時全國各大城市都有這一規例：本地人不得入住專為外國人及華僑而設的旅館，也不能在為外國人及華僑而設的「友誼商場」內購物，有外國人或華僑帶領者則屬例外。解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國，「例外」的事情甚多。因為「例外」的緣故，和在黃先生安排下，四弟子光及其家人，六弟元光，永堅的五哥、六哥及其家人，都能進入「人民大廈」與我見面，並在大廈餐廳品嘗他們難得的美食，吃飽之後，還跟我到「友誼商店」購買他們難得的食物與日用品。永堅的二姊和二姊夫因工作關係沒有來「人民大廈」與我家會面，我們後來到河南他們居住的地方探望他們。除了子光和元光，其他親人都是第一次與我見面。永堅與她的二姊、五哥和六哥，也分別了二十年才重逢。與廣州親人互訴心曲既興奮又感慨。聽過他們的辛酸故事和看到他們的窮困生活之後，我沒有心情去和他們玩耍，只是匆匆忙忙地在中共革命烈士陵園、海珠廣場、長堤、中山紀念堂、俗稱「五層樓」的廣州博物館、河南的海珠公園等遊人常到的地方拍照留念。在「人民大廈」住了兩晚之後，我們翌日乘飛機往北京——此次回國旅行的主要目的地。

我們從未到過北京。到祖國的首都遊覽是人生一件樂事。要多謝黃先生為我們安排交通食宿，並作我們的導遊。七十年代初期，中國的民航事業正在萌芽，飛機客位的供應極為有限，只有黨、政、軍大員和受政府招待的外賓才可乘坐飛機。我家有幸入外賓之列。廣州——北京航線用蘇聯製造的伊留申型客機和英國製造的三叉戟式客機。後者為中國解放後第一批向資本主義國家購買的飛機。論性能，機上設備及乘客舒適程度，社會主義國家製造的民航機不如資本主義國家製造的。由廣州飛北京時，我們坐三叉戟機，回程坐伊留申機。我們第一次飛越大江南北，從高空俯瞰祖國大地，興奮莫名。

飛抵北京時，機場的景像給我一個驚喜。三叉戟機降落後由跑道行至停機坪時，一隊穿紅着綠和手揮小國旗的小學生載歌載舞前來歡迎我們。殊不知我

們會錯了意，這些小學生歡迎的不是我家，而是同機的另一批乘客。他們是來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乒乓球隊，前來參加中國主辦的「亞、非、拉國際乒乓球比賽」。不過我們一家五口仍是受歡迎的人物。在機場大廈出口，兩部「上海」牌四門轎車正等着我們，黃先生乘在第一部帶路，我家乘坐第二部後隨。在當時的中國，有資格坐轎車的都是特殊人物。兩部轎車出機場後沿公路直駛至市中心的北京飯店。這是我們下榻之處。

北京飯店位於長安街北邊，離天安門城樓及繁盛的王府井大街不遠，是當時最高貴的外賓招待所之一。飯店分新舊兩翼。樓高十數層的新翼尚在建築中，我們入住舊翼。樓高七層的舊翼是蘇聯式大廈。我們一家住六樓的一個大套房，內有睡房、浴廁和小型會客廳。樓底高和樓面面積寬敞是蘇聯式大廈的特徵。從我們住的客房窗口遠眺，可見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中國革命及歷史博物館。黃先生不住北京飯店，但每天早上就坐一部專用七座位小巴來找我們，送我們到各處遊覽。雖然現代化設備不能與香港的五星級酒店相比，北京飯店的居住環境，以及各種服務堪稱一流。餐廳的膳食異常豐富，早、午、晚餐供應中、西及南、北名菜，務求適合來自各地貴賓的口味。我們在北京過着人上人的生活，眼見國內同胞住簡陋居所，穿破舊和款式單調的衣服，食用粗茶淡飯，內心實在過不去。

黃先生很懂得港澳同胞渴望見到國內親人的心理。往北京各處遊覽之前，他先送我們到崇文區探望永堅的三姊淑凌和三姊夫何領輝。三姊夫正在出差，與我們緣慳一面。但淑凌與我家則有許多時間相聚。她跟隨我們到各處遊覽。北京的名勝古蹟甚多，我們不能一一遊遍，只能作重點選擇，結果去了長城、十三陵、故宮、天壇及頤和園。以下幾篇簡單扼要的遊記，乃係根據我個人親歷其境的觀察以及黃先生和當地導遊的講解寫成。

萬里長城是世界奇景之一，也是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象徵。中國人都以一睹長城風采為榮。從北京市中心驅車向西北行五十餘公里便可望見長城。到長城的公路經過不少要隘，其中最重要的是居庸關。位於一個長狹山谷中之居庸關地勢險峻，兩旁是崇山峻嶺，是古時中國防禦外敵入侵的一個戰略據點。居庸關中央有一座以白石築成的高台，名曰「雲台」。相傳是北宋時期女元帥穆桂英的點將台。她曾在此處率領北宋楊家將對抗金兵。七十年代初期，中國拍製的電影《楊門女將》瘋魔了香港娛樂界，製造了無數穆桂英迷，我母親是其中之一。我們一家五口踏上雲台拍照留念。這是母親一生中一個很開心的剎那。雲台底下有一個拱道，四週都有大理石雕圖案，雲台頂上四週的欄杆也是大理石製成的，亦刻有花紋。據說這些都是元朝的雕刻。從居庸關再前行十餘公里，我們到另一要隘，名八達嶺。由居庸關至八達嶺這一段路程要爬山越嶺。我們在此攀登長城。放眼遠眺，長城好像一條巨龍，由東而西在山脈上蜿蜒前進。長城以北的地方，即古人所說的塞外。古人又說：「不到長城非好漢」。至此，我們做「好漢」的心願實現了。

遊罷長城，我們續遊十三陵。明朝的十六個皇帝之中，有十三人埋葬於此，

是以得名。十三陵是十三個皇帝的陵墓，分佈於北京市西北群山之間，離市區約五十公里，原來被一條長四十公里的城牆所包圍，但已倒塌多時。通往十三陵的大道，兩旁有二十四隻石獸和十二個石人像，分左右排列，次序爲：兩對獅，兩對像鹿的古獸，兩對駱駝，兩對大象，兩對麒麟，兩對馬，兩對武將，兩對文官，和兩對另種服式的文官。石獸和石人像，似乎是十三陵的守護神。大道以東不遠的十三陵水庫，是無數北京人民勞動的成果，淑凌三姊曾在此流下不少汗。十三個皇帝陵墓之中，唯一已被發掘並讓遊客參觀的是定陵。定陵是明朝第十三個皇帝神宗萬歷的陵墓。皇帝被埋葬在一個深入地下二十七公呎的地下宮殿內。其他十二個皇帝都有地下宮殿，但裏面如何陳設不得而知，因爲尚未發掘，不過相信是大同小異。萬歷皇帝的地下宮殿總面積一千一百餘平方公尺，有五個廳堂：前廳、中廳、後廳，和後廳兩旁的側廳。五個廳堂連結一起成丁字形。每個廳堂的進口有巨型大理石門。廳堂的地面鋪滿被稱爲「金磚」的特製四方形磚塊，共五萬塊。前廳是進入宮殿的門廊。中廳是祭祀廳，陳設着三張大理石御座，皇帝坐中座，左右兩座是皇后的。後廳是五個廳中最大的，裏面放置着萬歷皇帝及兩個皇后的棺槨。棺槨放置着在大理石平台上。兩個側廳各有一個用以放置棺槨的大理石平台，但台上無一物。地下宮殿裏面溫度甚低，看守人員要穿着厚外衣，遊客進入也要臨時加衣。宮殿內雖已裝有電燈照明，但遊客們均有進入鬼域的感覺。神宗的地下宮殿建築需時六年，徵用了三萬名民工，建築費達白銀八百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土地稅收兩年。

從民間傳奇小說、粵劇、京劇、電影、電視片集等，香港人早已對舊中國皇帝住的紫禁城心焉嚮往。我們懷着讀歷史的心情去遊覽這一個在解放後改名爲故宮博物館的明清兩代皇朝所在地。明清兩代，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而紫禁城則是政治中心的中心。古北京城分爲四部分：南部是外城，北部是內城，在內城就裏面有皇城，紫禁城則在皇城之中。這些城都有城牆包圍着，進城時要通過許多城門。隨着北京的城市發展，外城的城牆和城門已被拆卸。但內城、皇城和紫禁城的城牆與城門大部分仍得以保存。進入內城的城門叫做前門。進入皇城的城門叫做天安門。天安門背後有端門。端門背後有午門。午門是紫禁城的正門。紫禁城的後門——北面出口——是崇文門。崇文門後面是地安門。地安門是皇城的北面出口。所有上述各個城門都排列在一條從南到北的軸線之上。這條軸線稱子午線。子午線把北京城分爲東西兩部份。紫禁城內各建築物的佈局均以此線爲依歸。

紫禁城的城牆高十公尺，東、西的長度爲七百六十公尺，南北的長度爲九百六十公尺。城的面積爲七十二萬平方公尺。在這七十二萬平方公尺的範圍內一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座建築物，象徵皇朝的統治長長久久。紫禁城分外廷和內廷。皇帝在外廷上朝聽政，與大臣商討國家大事，頒佈命令，和接見外國使節。在外廷後面的內廷是皇帝、皇后及皇室人員居住的地方。

外廷的主要建築物是太和殿。進入午門，走過了由五條小橋組成的金水橋之後是太和門。進入太和門之後是一個廣場。太和殿在廣場北端。太和殿樓高

三十餘公尺，是明、清時期全北京最高的建築物。當時法例規定，其他建築物不得高於太和殿。太和殿內有御座，皇帝坐在御座上發號施令統治國家。太和殿後面是中和殿。皇帝往太和殿上朝前在此歇息。保和殿在中和殿後面。每年除夕，皇帝在此大宴群臣和前來朝貢的諸侯。清朝的最高級科舉考試，即所謂殿試或廷試，也在此舉行。成績最佳的第一、二、三名考生，被皇帝點名為狀元、榜眼和探花。

太和殿廣場之外，太和門的兩側，也有一些重要建築物，東有文華殿，西有武英殿。明朝的儲君俱在文華殿讀書。在清朝，皇帝於每年春秋二季在此聆聽文人講學。武英殿是皇后接見民間婦女之處。明末流寇李自成造反，自稱闖王，攻入北京後在此加冕。清朝的著名文獻《四庫全書》在武英殿編撰，出版後藏於文華殿後面的文淵閣。文淵閣是清朝皇家的圖書館。

內廷的進口是乾清門。踏入乾清門後可見一個庭院。庭院的北面是皇帝的寢室，名乾清宮。乾清宮後面有一座小宮殿。皇室的較小型活動，例如皇后的生日慶典，多數在此舉行。小宮殿之後是皇后的寢宮，名坤寧宮。一如太和殿、中和殿及保和殿，乾清宮、坤寧宮和兩宮之間的小殿，也按子午線南北排列。這三座內廷主要建築物的東、西兩側各有六座供皇太后、皇妃、宮女、太監等居住的宮殿。內廷的這一個建築物組合被歷史家稱為「三宮六苑」。

三座內廷主要建築物的西南方有養心殿。晚清的三位皇太后曾在此「垂簾聽政」。清朝第七位皇帝咸豐的皇后鈕祜祿氏無出。初以秀女入宮的那拉氏生一皇子，亦是咸豐的獨子。生子後那拉氏獲封貴妃。咸豐去世後，皇后及貴妃分別成為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慈禧的兒子繼位成為同治皇帝。同治登基時年幼無知，慈禧發動宮廷政變，罷免了攝政大臣，由她和慈安共同攝政。慈禧秉性機敏，銳於任事，攝政實權操在她手中。同治早年去世，無後。慈禧乃以醇親王之子，同治的堂弟繼承皇位，是為光緒皇帝。光緒登基時也是年幼無知，慈禧與慈安繼續攝政，慈禧是主角，慈安是配角。養心殿內的東暖閣是皇太后垂簾聽政的地方。慈禧與慈安坐在皇帝同治與光緒後面發號施令處理國家大事。在皇帝御座與太后御座之間掛有一張簾幕。這是垂簾聽政的來由。光緒的寡婦隆裕太后，亦在同一地點以同一方式替清朝末代皇帝宣統（溥儀）處理國家大事。所有紫禁城內宮殿的屋頂，都蓋以黃色琉璃瓦。

位於北京市南區的天壇，是明清皇帝拜祭上天和為全國農業豐收而祈禱的地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為一個面積達二百七十公頃的大公園。由明成祖於公元一千四百二十年興建的天壇是全中國最大的廟宇群。廟宇集中於天壇的北部和南部。南北兩部由一條高於地面二點五公尺，長三百六十公尺的通道連接，名為神道。在北部的祈年殿是天壇的主要建築物，為中國獨特傳統建築的代表作。祈年殿建在一個圓形的石台階上。石台階有三層，每層的欄桿都用大理石製成。殿的本身也是圓形，高三十八公尺，直徑三十公尺，有三層圓錐形屋頂，蓋以藍色琉璃瓦，頂尖是一個金色圓頭。殿的建築結構不以鐵釘和水泥連接，而是木製的離離榫連接。支撐建築物的巨型木柱有二十八根，象徵

二十八個星座。柱的托架也是木製的。

在神道南端也有一座圓形建築物，名為皇穹宇，較祈年殿矮、小，樓高十九點五公尺，直徑十五點六公尺。皇穹宇只有一層蓋以藍色琉璃瓦的圓錐形屋頂，頂上亦有一個金色圓頭。這座建築物的周圍有一圓形牆壁，名為回聲壁，是根據聲學原理建成的。我們在回聲壁的一點低聲說話，站在這點對方的人可以清楚聽到。進入回聲壁南面入口的石階上面鑲有三塊石頭，名回聲石。在第一塊石頭上拍掌一次有一個回聲；在第二塊石頭上拍掌一次有兩個回聲；在第三塊石頭上拍掌一次則有三個回聲。回聲次數不同是由於三塊石頭與回聲壁的距離不同。此與聲波由回聲壁折返的路程不同有關。

在北京市西北郊外的頤和園築於萬壽山麓，南園是昆明湖，面積達二百九十公頃，其中四分之三是水。這個風景優美，裡面建有華麗宮殿、亭台樓閣、長廊及長橋的頤和園，是慈禧太后及光緒皇帝避暑聽政的地方。西方人稱之為清廷的夏宮。一九四九年以後，頤和園開放供人民遊覽。頤和園原名清漪園。一八六零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到清廷的皇家花園縱火搶掠，清漪園的建築物，除了一個銅鑄成的亭和一艘以石頭製成的畫舫，均被燒毀。一八八五年，清廷授命醇親王建設海軍。為了討好慈禧，他將開辦水師學堂的經費用以修建清漪園，修建後改名頤和園，修理工程浩大，為期十年，至一八九五年才告完竣。

頤和園的正門在東邊。進入東宮門庭院後即到仁壽殿。慈禧和光緒在此聽政。仁壽殿正門向東。庭院的北邊與南邊各有幾個廳堂。大臣們在這些廳堂內等候謁見太后及皇帝。仁壽殿後面有三個庭院，太后、皇帝及皇后的寢宮均建立於這些庭院內。慈禧的寢宮名樂壽堂，面向昆明湖，背向萬壽山。樂壽堂以東是一間劇院，以西是著名的長廊。樂壽堂以南，有一條曲折小徑通至光緒的寢宮。皇后的寢宮，則位於光緒寢宮的後面。光緒寢宮的建築古怪，只有正門，沒有後門，正廳兩旁的側廳被磚牆擋着。維新變法失敗後，光緒被慈禧幽禁於此。長廊長達七百餘公尺，沿途經過四個八角亭。長廊和八角亭的天花、內牆均漆有杭州西湖的景色，包括水、人物、花草、鳥獸等。遊人走過長廊，有如進入藝術畫廊。

浩瀚的昆明湖有兩條美麗的橋。一條是十七拱橋，長一百五十公尺。十七拱橋將湖東南部的小島與湖的東岸連接起來，好像一條橫跨水面的天虹。昆明湖的西部有一條長堤，好像西湖的蘇堤。這條長堤經過六條橋。其中之一是玉帶橋。該橋有一個又高又圓的拱，遠望之如玉帶，是以得名。

萬壽山的南山坡俯瞰長廊及昆明湖。湖的北岸有一座宏偉的牌坊。由此向北的上山路徑，經過不少華麗的殿堂，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排雲殿，佛香閣和寶雲閣。慈禧常在排雲殿慶祝她的生日。殿內陳列了許多公卿大臣送給她的禮物，大部份是她七十歲生辰時收到的。佛香閣位於各殿堂中央，有三層樓，底座是一塊大石，遊客可從遠處望見高踞山坡上的佛香閣。寶雲閣在佛香閣以西，內有一個外表好像木造，但其實是用銅鑄成的亭，所用的銅重達二十二萬二千公斤。這座銅亭與位於昆明湖西岸邊的石製畫舫，是英法聯軍火燒清漪園後，

僅存的建築物。

遊罷北京的主要名勝古蹟後，我們到天安門廣場觀光。天安門廣場是遊客必到之地，因為它與中國的近代史有密切關係。廣場面積達五十公頃，東西長五百公尺，南北長八百八十公尺。廣場南北兩端各有一座古城樓，前門城樓在南，天安門城樓在北。廣場的東西兩端有兩座五十年代興建的大廈，中國革命及歷史博物館在東，人民大會堂在西。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說話感動了千千萬萬熱愛祖國的香港華人。人民大會堂是全國政治活動中心。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會議在此舉行。大會堂裡面的大宴會廳和多個以省為名的客廳，則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招待國內、外重要人物的地方。在革命及歷史博物館內陳列的展覽品，是中國革命與歷史發展的寫照。中外重要的藝術品展覽也經常在此舉行。我們很想進入這兩座大廈參觀。可惜黃先生未能為我們作出安排。但是我們沒有錯過走近矗立於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向已去世的人民英雄致敬。

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根據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而興建的，時維一九四九年九月卅日。建築工程於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開始，至一九五八年四月完工，於同年五月一日揭幕。紀念碑的碑身是一條重六十噸、高十四點七公尺的方形花崗石柱，站在一個雙層石台階上，台階四週有大理石欄杆。石碑的正面向北，面向天安門，上面刻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石碑的後面向南，面對前門，上面刻有下列字句：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紀念碑的基座四週刻有八幅大理石浮雕畫，記載了一八四零年以來的歷史性大事。第一幅名為「焚燒鴉片」（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開始）。第二幅名為「廣西金田起義」（一八五一年洪秀全領導農民革命，建立太平天國）。第三幅名為「湖北武昌起義」（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建立中華民國）。第四幅名為「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中國知識分子發起以科學與民主為號召的新文化運動）。第五幅名為「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情緒激昂）。第六幅名為「江西南昌起義」（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寧岡縣井崗山建立第一個軍事根據地，開始與國民黨進行武裝鬥爭）。第七幅名為「游擊隊抗日」（一九三七至四五年中共與日軍戰鬥）。第八幅名為「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一九四九年中共戰勝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上述的碑文與浮雕激發了許多中國人的愛國心。這是我的中國情意結所在。

六十年代後期，中國運動員開始向世界體壇進軍。乒乓球員容國團、莊則

棟等在國際比賽中屢獲冠軍，有「小老虎」之稱的莊則棟更成為愛好體育的香港青年的偶像。一九七三年八月，亞非拉國際乒乓球比賽在北京舉行，開幕禮由周恩來總理主持。事有湊巧，這個時候我家正在北京旅遊，何不趁機會到比賽所在地的工人體育館欣賞中國健兒的球藝和一睹周總理的風采？黃先生很有辦法，他弄到六張難得的球賽開幕禮入場券，與我家到體育館觀看球賽開幕禮。工人體育館是北京市新建設之一，建築宏偉，設備完善，場地寬敞，可舉行多種體育文娛活動，看台可容納觀眾萬多人。我們坐預定給外賓坐的特等位，面對主席台。周總理在主席台致開幕詞，坐在他兩旁的有多位黨、政、軍的重要人物，包括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各國選手在軍樂聲中持着國旗列隊進場。舉手宣誓要遵守比賽規則和發揚「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精神後，他們隨即退場。正式比賽由翌日開始。接着進場的是千多名中、小學的學生。他們表演團體操及歌舞以娛嘉賓，整個場館為歡樂氣氛所籠罩。有幸參加這個盛會，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因為中國乒乓球隊的優越表現，以及後來中國運動員在羽毛球、排球、體操、游泳、田徑等方面的成就，中國不再蒙「東亞病夫」之差。

這次回國旅行，並不是探親遊覽那麼簡單。黃先生熱誠為我服務，原來大有文章。我們定於八月廿八日離開北京。八月廿七日早上，趁着家人約淑凌三姊一同逛街和購買紀念品，黃先生帶我到北京飯店的一個房間，介紹我認識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的一位處長（名字記不起）。經過寒暄及在香港、中國的政治、經濟問題上交換意見後，這位處長對我說：林彪事件結束，中國要恢復建設，歡迎像我一般有良好的英文根柢，財經知識，和有與西方人工作經驗的香港同胞回大陸，或留在香港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番話不但給我很大鼓勵，而且令我感到飄飄然。

我的北京假期於八月廿八日完結。翌日，黃先生將陪同我家飛廣州，然後取道澳門返回香港。廿八日晚上，淑凌三姊在前門附近的前門飯店給我們餞行，請我們品嚐馳名的北京烤鴨。餐罷回北京飯店途中，看見天安門廣場以西的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門前車水馬龍。當天不是節日，為何有此景象？這個謎於廿九日晨早揭曉。我們乘坐廿九日第一班機從北京飛廣州，在機場候機室聽到電台新聞報告說：「一九七三年八月廿四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至廿八日勝利閉幕。」到廣州後，我們看見街道上人群打鑼打鼓巡行，燃放爆竹報喜。由於趕着回香港上班，當時我没有注意這件事的重要性。事隔一年，我才理解到「十大」閉幕，即是第二次文革的開始。江青一夥以「批林、批孔、批周公」為藉口，企圖鬥垮中國人民敬愛的總理周恩來。

不知道是否由於第二次文革打亂了中共對香港的統戰計劃，還是由於其他原因，黃先生於一九七四年開始日漸與我疏遠，至七五年不知所踪。「四人幫」倒行逆施的行為引起全國人民抗議。他們的反黨奪權陰謀受到中共中央注意。結果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於一九七六年十月被逮捕，第二次文革告終。從第一次文革爆發至第二次文革告終，歷時凡十年之久，即由一九六

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這是一場震撼中華大地的人為災難。否定文革的工作要幾經曲折地進行，至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才落實。此時中共在香港的統戰策略似乎有所改變。他們不再口口聲聲向港人曉以民族大義，而採取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軟推銷」(soft selling) 手法來誘導港人認同社會主義祖國。一個容易被港人接受的「軟推銷」型式是舉辦旅行團，邀請港人到大陸旅遊，讓他們欣賞祖國河山的美麗風景和重溫中國的歷史文化，並看看文革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共駐港的金融、貿易、航運、旅遊、新聞、文化、教育、勞工機構均熱衷於此種「軟推銷」工作，對象為他們的客戶、同業和香港朋友。

一九七七年以前，恒生銀行的老闆們堅持在商言商，不談政治。他們認為恒生職員不宜與左派人士及機構來往或到大陸旅行，除非有特殊業務需要（例如我的資料研究工作取經）。人事處執行老闆們的政策，如發現職員違背老闆們的旨意，則紀錄在案，作為該員日後升遷的考慮。因為這緣故，職員多數不敢往大陸旅遊。即使一定要去，也是暗中進行。文革完全收斂後，情況不同了，原因是老闆們對中國的觀感已有所改變，人事處不再斤斤計較職員們有沒有到大陸旅遊。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於一九七七年五月舉辦一個中國旅行團，歡迎非中資銀行職員參加。我和幾位恒生同事都報了名。同事們都有太太隨行。但永堅因家務羈身不克與我一同參加。此次恒生職員可名正言順地到大陸遊覽，不像以前般偷偷摸摸。我們旅行團的編號為「港中旅第四十七團」，簡稱四十七團，團員多數為較高級的銀行職員。帶領四十七團遊中國的是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副理宮玉龍。他的任務是沿途照顧團友，替團友安排交通、食宿、參觀、訪問事宜。出發前一天，四十七團全體團友在中國銀行開會，由宮副理講解旅行須知。接着他推舉我為團長。在各人極力贊成下，我不好意思婉辭。其實宮玉龍最有資格當團長，因為他對中國的情況最為熟悉。他只肯做副團長，做四十七團的總幹事。這顯然是中國銀行當局的刻意安排。他們要給予香港人更多面子。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女團友非常熱心，她自願替我們寫參觀訪問筆記，使我們日後不會忘記這一次有意義的祖國之旅。

中國東北地區天然資源豐富，工農業發達，重工業尤然。香港同胞到東北一遊，可望對祖國的經濟建設有所認識。四十七團在中國的活動日程乃根據此概念而定。我們於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七日從香港乘火車赴廣州；十八日從廣州乘飛機抵瀋陽活動四天，其中一天在瀋陽附近的撫順渡過；廿二日乘火車抵長春活動一天半；廿四日乘火車抵吉林活動兩天；廿六日由吉林乘火車抵大連活動兩天；卅日乘飛機抵北京活動五天；六月四日乘飛機赴廣州；六月五日乘火車返港。

四十七團在東北和北京參觀，訪問了幾十個工、礦、農企業及基礎設施。我對其中十二個有深刻印象。

瀋陽重型機械廠有多年歷史，初為修配廠，設備簡陋，生產不前，一九四九年時只有工人二十八名。人民政府接手經營後，該廠有很大發展，至一九七七

年已成爲一間擁有煉鋼、軋鋼、加工等車間和僱用一萬六千工人的現代化工廠。該廠的產品包括用以粉碎礦物的設備，煉鋼用的水壓機，和製造水泥的設備。全廠佔地八十萬平方公尺。

瀋陽東陵區五三人民公社成立於一九五三年，有十七個生產大隊和八十多個生產隊。公社有人口三萬六千，其中有勞動力者達一萬六千多人，耕地共四萬六千畝。經過多年發展生產，農民收入大增。至一九七七年，他們已購買了許多現代化農具和運輸車輛，包括六十多台大型拖拉機、一百六十多台小型手推拖拉機、四十多部汽車。公社又有三百多個電動抽水機用以灌溉農田。公社的主要生產爲菜和糧。菜的生產不斷提高。一九五六年，每畝地年產六千斤。至一九七六年，每畝地年產一萬一千斤。糧的生產亦相應提高。一九五六年，每畝地年產三百斤。至一九七六年，每畝地年產八百斤。文革前，公社養豬三千頭、牛五十頭。一九七六年，公社有豬二萬多隻、牛三百頭。以前沒有養雞，現在年產雞肉三百多噸。五三人民公社是瀋陽市的副食品供應基地，每年上繳二億多斤食物，包括蔬菜、豬肉、雞肉、雞蛋和水果。

撫順西露天煤礦是中國最早期和最具規模的煤礦之一。抗戰時期煤礦曾受日本人破壞，一九四九年恢復生產，一九五六年進行技術改革，一九七六年的產量爲一九四九年的五倍。露天煤礦的礦場範圍甚廣，長六點六公里，闊二公里。礦場的深度達二百六十公尺。煤層平均在八十公尺下，最厚的有一百二十公尺，最薄的有四十公尺。煤礦有職工一萬六千人，產品有兩種，其一爲燃料用煤，其二爲油母頁岩，油母頁岩可提煉爲石油。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是第一個五年計劃重點建設之一，一九五三年興建，一九五六年開始生產。原來設計只生產一個品種：解放牌載重汽車，年產三萬部。一九五八年該廠開始增加產品品種，包括東風牌小型汽車，紅旗牌高級轎車和解放牌越野汽車。文革後，解放牌載重汽車的產量大增，由原來一年生產三萬部增至一年生產六萬部。第一汽車廠佔地一百五十萬平方公尺，其中廠房面積佔七十多萬平方公尺。汽車廠有二十二個生產單位，包括發動機製配單位、汽車底盤製造單位和汽車裝配單位。汽車廠有兩萬工人從事汽車生產，另外二萬人從事輔助生產。

吉林豐滿水力發電廠位於東北松花江上，離吉林市二十四公里。吉林市在松花江畔，三面臨江，故有江城之稱，到松花江畔漫步是一個難忘的回憶。抗戰時期，「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是一首流行的愛國歌曲，親眼看到這條江的時候，能不爲之慨然？豐滿水力發電廠是日本人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興建的，施工人數需要三萬勞工，都是中國人。他們的工作及生活都十分艱苦，有餓死的、凍死的、被日本人打死的，也有病重被活埋的。死者大部份埋葬於松花江下游一處名叫「萬人坑」的地方，因爲埋在那裏有一萬人左右。現在該處設有紀念碑。水電廠計劃建八台水機組。由於工人時常反抗，工程進度緩慢，至一九四三年才建成第一台水力發電機組。日本投降，國民黨接收水電廠後未有全力興建。一九四八年三月吉林被解放時水電廠只有兩台水機組，大壩及廠房完成了

百分之八十左右。一九五三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蘇聯答應幫助安裝六台水機組。但裝了五台之後，蘇聯毀約，結果第六台由中國自己製造和安裝。一九六零年，水電廠的擴建工程完成，還將日本人留下來的兩台半自動水機組改為全自動。大壩的建築也完成。這條長一公里、高九十一公尺的大壩將松花江上游的天然河道截斷，造成一個大人工湖，面積有五百五十平方公里，容量為一百億立方公尺。人工湖有防洪作用，又可用來養魚。豐滿水電廠的總發電量原定計劃是每小時五十萬千瓦，經過改造，現在是六十萬千瓦。

鞍山鋼鐵公司簡稱鞍鋼，是全國最大的鋼鐵企業。鞍鋼的所在地是瀋陽西南的鞍山市。鞍鋼有八十多個工場，二十萬職工，佔鞍山總人口五分之一。鞍鋼有多年歷史。解放前鋼產控制在日本人手裏。解放後中國人自己經營鞍鋼。因缺乏經驗和技術，有很多問題待解決。一九五三年中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承諾提供技術和設備來協助擴建鞍鋼。但是數年後，蘇聯毀約，撤走專家。一九五八年鋼鐵公司職工展開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將過程及成果寫在一份報告內。一九六零年中共主席毛澤東批示了這份報告，名之為《鞍鋼憲法》。文革期間，鞍鋼生產受到影響。文革後，生產不但恢復，而且迅速發展。鞍鋼有三個主要工廠。煉鋼廠用煤炭火加高熱把鐵礦煉成鋼水。軋鐵廠製造工字鐵作火車路軌。無縫鋼管廠製造各種口徑和長度的無縫鋼管。

大連海港是旅大市的一個重要部份。旅大市由旅順和大連兩市合併而成，是中國東北的國防前哨，曾經是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戰場。大連港有七個裝卸區，十三個碼頭，可同時停泊五千到五萬噸的船隻五十至六十艘。新建的油港可同時停泊五萬及十萬噸的運油船各一艘。大連港與一百二十個國家有貿易來往，每年有四十多個國家的船隻進出大連港，海員來自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經不斷技術革新，大連港的吞吐量年有遞增，一九七六年的吞吐量為解放前的二十二倍。

大連機車製造廠建於一九零一年。當時大連被沙皇軍隊佔領，俄國人在此建機車修理廠。日俄戰爭俄國戰敗，修理廠由日本人接管。在日、俄管治下，該廠生產落後，主要的生產技術先由俄國人掌握，後由日本人掌握，中國人只做雜工。日本人投降時說：他們走後這個廠會成為一片荒地。一九四九年以後，該廠自力更生，進行了三次革新。至一九五四年，大連機車廠已由一間修理蒸汽機車的工廠變為一間製造蒸汽機車的工廠。一九五八年，中國與蘇聯簽訂合約，由蘇聯供給技術和設備來製造內燃機車。一九六零年，蘇聯撤退專家和資料，供應的機械設備只給了一部份。工人們感到很氣憤，堅決要自造內燃機車。結果在上專學院、大學教授等幫助下，成功生產二千匹馬力的內燃機。文革以後，該廠再進行技術革新，試製四千匹馬力的內燃機成功。一九七四年，該廠停止製造二千匹馬力機車，大量生產四千匹馬力機車，年產量為一百五十至二百台。

北京地下鐵路於一九六五年七月開始建設，六九年十月建成通車，全長二十四公里，從北京火車站起到西郊區蘋果園車站共十七站。每個車站的內牆都

是用不同顏色、品種的天然大理石和人造水磨石砌成。地下鐵路所用的車輛是長春造的電動機車。地下鐵路的列車最高時速八十公里，每節車廂長十九公尺，載客一百八十人，一般是四節車掛在一起。北京地下鐵路全部是自己設計，自己施工的。由於經驗少，鐵路的運作不免有困難，例如有些設備常常發生故障，自動化程度不夠，噪音大等等。四十七團試乘地下鐵，所走的路程是從軍事博物館至北京火車站，沿途經九個車站，全程長約十六公里。一九七三年，我第一次訪問北京，也曾與家人及黃先生做北京地下鐵路的乘客。

北京石油化工總廠的建設有一個特殊背景。中國原油蘊藏豐富，但至六十年代仍未能發展自己的採油、煉油工業，遠遠落後於許多國家。六十年代，大陸發生嚴重自然災害，蘇聯斷絕對中國的石油供應，文革正在進行中，國民經濟發展幾乎停頓。幸而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下，加以有國防戰略需要，中國在東北開發了大慶油田。至一九六八年，中國的原油生產已較為充足。此一形勢導致北京石油化工總廠的興建。開始生產時，石油化工總廠每年只能加工原油二百五十萬噸。至一九七六年，每年可以加工七百萬噸。經過加工的原油可以生產汽油、煤油、柴油、航空汽油、燒鐵用的煤油等。化工總廠又可以生產人造橡膠、合成塑膠、化學肥料。化工總廠設有四個服務工廠：動力廠（水、電、氣），大修廠（設備）、機修廠和試驗工廠。又有研究院和設計院。這個石油化工綜合企業的設備大部分是自己設計和安裝的。一九七三至七四年，化工總廠開始引進外國技術。引用外國設備的原則是：「一用、二批、三改、四創」。

北京市地下防空工事。一九六九年三月，蘇聯軍隊入侵中國北方的珍寶島被中國軍隊擊退。這件事喚醒中國人民要作好防空準備。北京市地下防空工事就在這環境下興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為當時一個流行全國的口號。防空工事有三層地道網，第一層深入地下四公尺，第二層八公尺，第三層十二公尺。地道網四通八達，可通至北京各地區、各地鐵站，及南郊山區。四十七團參觀了大柵欄區的地下防空工事。防空工事的地面進口是一間服裝店。不熟悉北京街道及店舖外形的人很容易被這巧妙的設計瞞過。我們進入服裝店後走下地道，經過職工食堂、商店、醫院、倉庫，還參觀了防空指揮所。據指揮所負責人稱：如有敵機空襲，大柵欄地區數萬居民，只需五、六分鐘便可全部進入地道。他又說：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影響到北京。當時有一些地面建築物倒塌，但防空地道無損。這樣看來，地道既有防空作用，又有防地震作用。

總結四十七團的參觀、訪問，我發覺國內各工、礦、農企業及基建設施負責人向我們介紹他們單位的沿革、發展和運作時非常激動。「自力更生」、「獨立自主」、「艱苦奮鬥」、「外國人做到我們也做得到」是他們的口頭禪。受過抗美援朝、蘇聯背信棄義和十年文革的困擾，中國人有此激情是可以理解的。四十七團團友大部份對工、礦、農業及基建外行，很難印證負責人所講的故事和所提供的統計數字是否可靠。儘管如此，我認為四十七團此行仍是大有收穫。我們懷着「百聞不如一見」的心情到祖國旅行。這心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雖然未能深入研究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成果，但觀察一下新中國經建的面貌，再和舊中

國的一窮二白情況相比，我們覺得祖國的經濟在發展中。

一九七三年八月和一九七七年五月的祖國之旅，可謂極不平凡，因為當時我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戰對象。四十年代以來，中共在香港做了不少秘密或公開的統戰工作，爭取了許多知識份子和工商界人士為祖國作出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文中的以下一段話語，值得我們深思：

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將繼續鞏固和發展。

第四節：啊，加拿大！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擅長流浪的民族之一。千百年以來，黃皮膚、黑頭髮的炎黃子孫一直在尋找安居樂業的地方。他們從黃河流域找到長江流域，從長江流域找到珠江流域。又從中原找到海濱，從國內找到國外。中國近代史更顯示：逃避天災人禍是中國人的宿命。是以我的祖先由江西逃到廣東，由廣東北部的南雄逃到南部的南海九江。而我的上一代則由九江逃到香港。

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香港的中國人掀起了幾次移民外國的風潮。五十年代我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難民救濟部工作時，見證了過千從大陸南下的中國人以難民身份移民到美國。我是地道香港人，沒有資格以難民身份申請移民。但循其他途徑移民美國的香港人實繁有徒。當時我沒有移民的念頭，因為我家在香港，我愛我的家。

一九六七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禍延香港。文化大革命不但給中國帶來災難性的破壞，而且令到香港人擔心香港是否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一九六八年，一位名叫 Richard Hughes 的澳洲駐中國及香港記者寫了一本書來形容香港，書名是：《香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Hong Kong: 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該書的字裏行間蘊含着一種恐共情意結，暗示香港的繁榮安定來日無多。許多人讀了這本書之後，都有「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的感覺。我亦有同感。眼見千千萬萬香港人湧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加拿大駐港專員公署、澳洲駐港專員公署，排隊領取移民申請表格，我對香港前途悲觀，開始思索另找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一九八二年，中、英兩國政府終於展開解決香港問題的談判。英方代表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擊之力。看情形，大英帝國已日落西山，沒有能力攬着香港這塊殖民地不放了。經過了二十二次談判之後，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趙紫陽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訂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聲明規定：「英國對香港的主權和治權維持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香港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

別行政區。香港的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以後，維持五十年不變，中國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亦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除外交和國防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立法機關，將由當地人組成，享有高度自治權。」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的一年，正是我從恒生銀行退休繼而移民加拿大的一年。當時親友們對我的告別香港有不同反應。思想保守的認為我在一個不同文化的地方定居會有失落感，不易融入當地社會。怕共產黨又沒有條件移民的人對我羨慕不已。有人覺得香港永遠是一塊有驚無險的福地，我留在香港仍有發展事業和賺大錢的機會。我對他們的說話都無動於中。但是我對一些人的說話十分感動。他們說，在香港快要回歸祖國之際，我不應該做一個逃兵，應該留在香港發揮所長，為香港及祖國做些有益之事。發表這些言論的人，多數有國家民族思想和使命感。

我的「有國家民族思想和使命感」朋友之中，有幾位值得一提，因為他們都與中共有關係。他們是：宮玉龍、黃文放和譚志遠。宮玉龍是山東人。他與我的交情是在一九七七年，我們一同到東北及北京旅行時建立的。當時他是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的一位副理。旅行回來後不久，他被調往華僑商業銀行工作，以董事兼總經理名義主持該行的業務。華僑商業是香港中資銀行集團成員之一。我移民後與他失去聯絡。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黃文放以新華社香港分社採訪主任名義到恒生銀行打探金融行情和採訪財經新聞。除訪問利國偉等銀行高層人士外，他還經常訪問我，因為我是資料研究部負責人。新華社需要準確和及時的財經資料來釐訂他們的香港政策。移民加拿大後，我從多倫多的華文報章中知道黃文放已升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副秘書兼台灣事務部部長。他是一個台灣問題專家。一九九二年從分社退休後，他不時在報章發表政治評論文章。譚志遠與我有深厚淵源。他與黃文放都是廣東人。他是我五十多年前在英皇書院讀書時的同班學友，當時名叫譚廷光。譚廷光的哥哥譚幹與黃文放是老同事，曾任黃文放的上司。譚幹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主要負責外事工作，位至副總編輯。不知道是否由於兄長的關係，譚志遠於二次大戰結束後一直在中共駐香港的商業機構做事。他對這些機構的業務發展有大貢獻。譚志遠和譚幹先後於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六年去世。

我是以健康理由提早一年退休的。一九八三年我患冠心病入院留醫。出院後醫生勸我不要再操勞，不要精神緊張，要多休息和過平淡生活。香港人煙稠密，空氣污濁，居住環境侷促，生活節奏迫人，不是退休人士的理想居住地方。中英聯合聲明向港人作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繁穩定的基礎。倘若中國政府能切實執行此政策，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會是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們的下一代安居樂業的地方。中國有一句「聽其言，觀其行」的成語。這成語常常被中國政府發言人引用。香港人聽中國政府的「言」，又要觀中國政府的「行」。一九四九年以來，為了政治需要，中國政府往往講一套，做一套，結果人民受到一場又一場的浩劫。在此情形下，很難想像香港

特別行政區將會是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們的下一代安居樂業的地方，因為中國政府的「政治需要」是隨時可以發生的。我的「有國家民族思想和使命感」朋友雖然力圖影響我的移民意願，我還是告別香港。他們對我的抉擇表示遺憾，但認為有朝一日我將會後悔，因為他們相信我也是一個有國家民族思想和使命感的人。

一九八四年，我以退休人士身份攜同妻子陳永堅及兩個未足二十一歲的女兒慧瑜和慧琳移民加拿大。我們於九月六日由香港乘飛機抵達溫哥華報到，隨即前往多倫多定居，成為永久居民。永久居民簡稱移民。移民在四年內居住足夠三年的時間，便可申請入籍，成為公民。在八四至八七年間，我們的兩個女兒在加拿大已居住足夠三十六個月。她們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成為公民。在八五至八八年間，我和永堅數度回港小住，因此我們要等到一九九二年才符合「四年居住足夠三年」的規定申請入籍成為公民。

《英屬北美洲法》(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以及《加拿大多元文化法》(The 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Act)，是我們認同加拿大，並願意做加拿大公民的基礎。

一八六七年，英國國會通過《英屬北美洲法》，讓當時在加拿大東部的四個省份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實行議會制的聯邦。至一九四九年，這個聯邦有十個省份和兩個地區。《英屬北美洲法》規定了聯邦政府和省及地區政府的權力和責任，是加拿大的原始憲法。

一九八二年四月，聯邦政府修改憲法，使《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成為憲法的一部份。憲章保證了公民的四項基本自由：(一)良心與宗教的自由；(二)思想、信仰、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三)和平集會的自由；(四)結社的自由。憲法賦予公民下列權利：(一)有權去投票；(二)有權去做候選人；(三)有權居留或出入加拿大；(四)有權在任何一省工作或居住；(五)有權接受少數民族語言教育；(六)可擁有加拿大護照；(七)可申請加拿大政府補助金、獎學金和工作；(八)加拿大公民人人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人人有權享受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由於加拿大人在種族、民族、膚色、宗教、信仰、語言、風俗習慣上有許多差異，聯邦政府於一九八八年通過了《加拿大多元文化法》，以保障所有加拿大人都能夠在加國的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生活中得到平等待遇。

加拿大是個崇尚人道主義的國家，救濟貧窮落後與政治不安地區的難民，以及協助這些地區發展經濟，是加國政府的一貫外交政策。在國際社會中，加拿大素負和平使者的盛名，因而絕少，甚至沒有敵人。加拿大護照持有人到世界各地旅遊，往往受當地政府與人民歡迎和尊敬。

絕大部份加拿大人過樸素生活，服裝隨便，個個精打細算。除了崇尚自由、民主、法治之外，他們又尊重人權、珍惜、愛護、重視每個人的生命。一個小孩子患上不治之症，父母親四處求助時，往往得到社區的強烈正面反應。有人失蹤，

附近居民落力協助警方展開搜索、尋覓。據我十多年來的耳聞目睹，有種種跡象顯示，加拿大是充滿愛心和人情味的國家。

聯合國每年發表人類發展報告，以衡量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生活環境。評分項目包括：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 GNP）、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 GDP）、電視機數目、報紙銷量、入讀專上學院人數、整體入學率、入學年數中位數字、新生嬰兒死亡率、醫院／病人比例、人均壽數等。這些項目是計算人類發展指數的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最近五年發表的人類發展報告顯示，在一百七十多個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中，加拿大的人類發展指數一直排名榜首。

從香港飛溫哥華時，我欣賞加拿大是一個山明水秀、風景優美的國土。從溫哥華飛越三個時區，在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降落時，我發覺加拿大是一個幅員廣大和能夠給予居民很多空間的地方。加拿大的城市不是「石屎森林」，到處有花草樹木、空氣新鮮。住宅區多的是前後有花坪或庭院的獨立屋（house）、半獨立屋（semi-detached house），或相連的鎮屋（town house）。點輟其間的是一些多層住宅大廈。差不多所有房屋都有電燈照明、冷熱自來水和暖氣設備。較高級的多層住宅大廈更有空氣調節設備，保證室內四季如春。這些大廈多數有花園及各種室內、外康樂設施，如露天及室內泳池、網球場、桌球室、乒乓球室、健身室、宴會廳等。加拿大的廣闊空間和美麗及舒適的居住環境，是一般香港人夢寐以求的。身家不大豐厚的香港人定居加拿大後都可以有這些享受。

加拿大是窮人的天堂，政府向每位在加拿大居住的公民提供多種福利，包括失業救濟金、兒童福利金（俗稱牛奶金）、低收入家庭援助金、醫療保險等。政府保證每一位暫時沒有工作機會，或失去工作能力的成人、小童及老年人，每月都能從政府機構提取福利，解決基本的生活。

《舊約聖經》記載了上帝引領在埃及受奴役的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到迦南（Canaan）的故事。迦南是上帝給以色列人的應許地（The Promised Land）。從此以後，以色列人不再做奴隸，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對來自貧窮落後地區或極權國家的移民來說，加拿大有點像上帝的應許地。

一九八四年移居加拿大後，我「無官一身輕」，不再受緊張的香港式生活和爾虞我詐的商場政治困擾。在新環境下我過着健康的生活，心情開朗。我沒有一般老弱移民要面對的語言、文化和體能困難，又沒有青年香港移民因在加國鬱鬱不得志而要回流搏命搵錢的情意結。更沒有要維持加、港兩頭住家做「太空人」的需要。許多香港移民多年前把香港居屋賣掉。近年香港屋價狂飆，他們若等到現在才賣掉香港居屋，所得的錢可能比以前所得的多數倍。於是後悔不已。我不會有此庸人自擾的思想，因為過去的事是不可追回的。個人財富的增加或減少不過是數字遊戲。

不用營營役役而且過着高質素生活，對一些退休香港移民來說仍是美中不足，因為他們眷戀中國文化。我初到多倫多時可堪閱讀的中文書報甚少。電

視台的中文節目製作水準甚差，內容空泛。中餐館供應的菜餚搬到香港只屬三流。此一情況隨着來自香港、台灣、大陸及東南亞華裔移民日多而改觀。到八十年代後期，多倫多已有許多正宗粵、京、滬、川菜館，和港式、台灣式、南洋式餐室，舊式中菜及雜碎餐館漸被淘汰。在較多華人聚居的士嘉堡市及麥咸市，中式超級市場和中式露天及有蓋商場與西式超市及商場分庭抗禮。多倫多出版的《明報》、《星島日報》、《世界日報》的新聞內容及專業水準接近中、港、台報紙。電視台的中文節目大有改進，除加拿大新聞外，還播送由人造衛星傳來的當天中、港、台新聞。中、港、台最近出版的書籍，在不少書店中有售。從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前來加國定居的藝術家、音樂家、舞蹈家、作家和新聞工作者日多。他們的創作和表演大大豐富了華裔移民的精神生活，並受到其他族裔加拿大人的欣賞。全北美洲最大的中華文化中心正在多倫多士嘉堡市興建。繼英文和法文，中文已成為加拿大第三種最被廣泛使用的文字。中國人的習俗在加拿大受到尊重。非華裔加拿大人與華裔加拿大人一同慶祝中國的傳統節日。農曆新年與端午節龍舟競渡已成為多倫多一年一度的盛事。一九九七年歲次丁丑，加拿大郵政局發行牛年紀念郵票。以後十一個年頭，將順着中國十二生肖的次序，繼續發行虎年、兔年、龍年、蛇年、馬年、羊年、猴年、雞年、狗年、豬年和鼠年紀念郵票。中華文化深入加拿大民心，是華裔加拿大人引以為榮的。

自讀書識字以來，我的內心被四首國歌所縈繞着。第一首是中華民國國歌，第二首是英國國歌，第三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第四首是加拿大國歌。二十至三十年代的香港，除了實行殖民地教育政策的英文書院之外，還有在中華民國教育部立案的中文學校。小學時期，我在一間中文學校就讀，每逢星期一清早上課前，全體師生合唱「三民主義……」，我們唱得很起勁，因為我們熱愛祖國。中學時期，我在英文書院就讀，校方訓令學生尊重英國國歌，聽到奏出「天佑我皇……」歌曲時要肅立致敬。但是我們多數陽奉陰違，因為我們憎恨英帝國主義侵佔香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很少香港華人在公眾場合合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怕事的人不敢唱，不認同共產黨的不肯唱。但是愛國學校的校園和愛國工會的會所，則不時播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歌聲。移民加拿大後，我常常在公眾場合聽樂隊演奏或群眾合唱「啊，加拿大……」。入籍時，我懷着興奮的心情唱加拿大國歌，因為我欣賞加拿大人民崇尚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精神，和加拿大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

National Anthem

O CANADA

O Canada,

Our home and native land.

True patriot love, in all thy sons command,

With glowing hearts, we see thee rise,

the True North strong and free,

國歌

啊，加拿大

啊，加拿大，

我們的家鄉和祖國。

你所有的子民，對你以真誠的忠愛。

懷着歡心，我們看見你，

堅強和自由地屹立在北方。

From far and wide, O Canada,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
 God keep our land,
 glorious and free.
 O Canada,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
 O Canada,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

啊，加拿大，
 我們由遠方來保衛你。
 天主保佑我們的國土，
 光榮和自由。
 啊，加拿大，我們保衛你。
 啊，加拿大，我們保衛你。

第五節：加拿大華僑抑或華裔加拿大人？

十九世紀開始，無數中國人因國內生活困苦或政治動亂而離鄉別井到海外謀生。他們被稱為「華僑」。「華僑」概念是國民黨在反清運動時爲了爭取海外華人支持而塑造出來的。當時在海外謀生的華人數做苦工，受不平等對待，因此希望祖國盡快強大起來，讓他們吐一口氣，甚而重返故鄉安居樂業。華僑的「僑」字代表僑居之意，意即他們在海外只屬過客，將來總會落葉歸根。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由於中國發生內戰，許多早期移居海外的華人放棄了落葉歸根的念頭。二十世紀後期，不少原居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到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地。這些地方經濟發達，政治穩定，更重要的是有較多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成爲當地永久居民及公民後，他們不再被中國政府視爲華僑。他們分別是華裔美國人、華裔加拿大人、華裔澳洲人。華裔原本是對自己血統淵源的一種純粹客觀描述，不囿於任何政治框框。但是成爲華裔美國人、華裔加拿大人、華裔澳洲人之後，這些人就應該有意識地認同他們移居的國家，把握一切作爲當地公民的權利，並負起作爲當地公民的義務。

不少做了加拿大公民的香港人在心態上仍身份不明，有華裔的意識，也有華僑的意識。這是一件非常諷刺的事。他們在加國沒有「主人翁」心態，只有「過客」心態。說到這裏，不能不一談香港移民的獨特性。他們有中華文化傳統，更能融會貫通西方資本主義的企業精神，在近幾十年把香港建設成爲世界矚目的工商業、金融和航運中心。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計算可入發達國家之列。香港居民的人均收入比較先進國家的相差不遠。與其他地方來到加拿大的移民比較，香港移民的知識水準相對地高，帶來的資金也相對地多。顯然，大部份香港移民不是爲了生活無着而來到加拿大。他們是多數爲了政治理由而來。這些華裔加拿大人的香港工作經驗多，加拿大工作經驗少。在香港他們能發揮所長，在加拿大他們無用武之地。因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設想一天未絕望，他們便一天抱着「一腳踏兩船」的幻想。

對一向享受低稅率的香港人來說，加拿大是一個「苛稅猛於虎」的國度。加拿大稅制特色之一是所有居民都要向稅局報告個人財政狀況。居民要在每年的入息稅呈報表內填寫工資淨收入、生意淨收入、利息淨收入、投資資本增值淨收入。年內所收到的失業金、公援金、老人金等要呈報。海外的收入也要呈報。稅務特色之二爲稅率是遞增的，入息愈多稅率愈高。遞增率不但遠高於香港，而且高於許多其他地方。在此情形下，加拿大人普遍有「爲何賣力工作？」的

心理，導致人民做事沒有衝勁，社會沒有活力。事事分秒必爭的香港人覺得加拿大人沒有工作效率，加拿大工商業暮氣沉沉。

加拿大地廣人稀，天然資源豐富，早期開發主要來自歐洲的法裔和英裔移民。在開發競爭中，英國人打敗了法國人，使加拿大成為英屬地。佔人口大多數的英裔移民奠定了加拿大社會的各種制度，掌握了加拿大的政治、經濟命脈。從其他地方來到加拿大的移民都被認為是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中，膚色不是白色的被認為「能見的少數民族」(visible minorities)。華裔移民屬「能見的少數民族」。英裔移民多信奉基督教。他們的文化成為加拿大的主流文化。「白種盎格魯撒克遜基督徒」的英文全文是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簡稱 WASP。WASP 的中文直譯是「黃蜂」。在少數民族中，「黃蜂」是特權階級。部份以「主流」自居的英裔加拿大人亦有此想法。

踏入七十年代，加拿大的人口結構和社會面貌開始變化。主要原因是英裔和法裔加拿大人的生育率持續下降和人口老化。據一九九七年的統計，六十五歲及以上的老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二。如沒有較年青，有較大勞動力，有較多學識和財富的移民來補充，加拿大這個國家將會衰亡。目前有上述條件的移民主要來自亞洲，其中大部分來自香港。因而加拿大華人社會的人口結構也起了變化。從前，台山話是華人社區的主要語言。現在，廣州話是華人社區的主要語言。今時今日，華裔加拿大人不再是胼手胝足和受白人輕視的華工和洗衣工人。他們不再蟄伏於又殘又舊的舊市中心唐人街。他們在舊市中心以外地區建立新華埠。在大多倫多以東的士嘉堡 (Scarborough)，士嘉堡以北的萬錦 (Markham)，萬錦以西的烈治文山 (Richmond Hill)，新建的獨立屋、鎮屋、多層共管住宅大廈 (condominium)、露天商場 (plaza) 和有蓋商場 (mall) 如雨後春筍。這些物業的買家大部份為華裔加拿大人。在上述各城市的幾個公眾場所中，「能見的少數民族」這個稱號落在白種人頭上。在上述各城市的街道中，駕駛名貴汽車者十之八九為黃皮膚黑頭髮的人。

鑒於華裔移民愈來愈多，和他們的經濟力量日漸壯大，一些短視和心胸狹窄的「黃蜂」心裏不舒服。他們不但妒忌華人的財富，而且認為新華裔移民分薄了他們的福利，於是有「美好舊日子」(the good old days) 不再來之感。他們不相信華裔移民的錢絕大部份是從原居地帶來的。他們不明白華裔移民致富之道為在原居地克勤克儉和作明智的投資。他們更不知道華裔移民初到時還未有資格領取全面福利，因面子問題不去拿福利，或因有錢而不在乎福利。

九十年代初期，香港房地產市價大漲。高級住宅每平方呎值港幣一萬元，普通住宅每平方呎也達六、七千元。以最保守的每平方呎市值六千元計，一個面積五百平方呎的住宅單位市值高達三百萬元 (500X6000)。倘若這個單位的戶主移民加拿大，把單位賣掉，所得的錢等於加幣五十二萬六千多元。不計其他資產，光是這五十多萬元已足夠他在加拿大買一間頗舒適的獨立屋或一個相當豪華的多層住宅大廈單位，另外還有錢買一架中等汽車而有餘。有如此資產淨值 (net worth) 的人在加拿大並不多見。白種舊移民對於香港新移民這筆

財產羨慕不已。

七十年代以來，香港出現了數名世界級富豪。他們的主力生意在香港，但他的投資範圍廣及世界各地。以加拿大為例，香港富豪在溫哥華、多倫多等大城市購買整間酒店、整座商業大廈、整座多層住宅大廈、整座商場、若干大公司的控股權，和興建地產物業的消息時有所聞。此外，他們又捐錢給慈善及教育機構。他們的下一代已持有加拿大護照。政府歡迎他們做加拿大公民。因為這緣故，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大大增加了整體華裔加拿大人的財富。

其實華裔加拿大人不是個個富有。很多華裔加拿大人正與其他加拿大人一同忍受經濟衰退之苦。根據報紙的報導，不少華裔加拿大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是在貧窮線之下。

一些有偏見的白種加拿大人從另一角度來看華裔移民。他們認為華人多數不歡喜融入主流社會，對政治冷感，不關心社區事務，在公眾場所常有「嘈、亂、髒」陋習，不顧公德，不守秩序。以上批評有其可信之處，但亦有「一竹篙打盡一船人」之嫌，因為不是所有華人都如此。

加拿大政府抽重稅是由於開支太大，入不敷出。支付社會福利太多，政府官僚主義風氣太重，冗員過多，公務員辦事效率太低，積重難返，國債太多等因素，是入不敷支的主要原因。工會勢力太大，養懶了工人，鬥垮了資本家，工商業倒閉，失業率高企這一惡性循環更使加國的經濟走入深淵。在此情形下，香港移民在加拿大做生意或投資大部份以失敗收場，血本無歸的事例歷歷可數。

香港移民並非人人腰纏萬貫，他們在加拿大要出賣勞力和腦力以求生活。由於缺乏加拿大工作經驗和加國經濟不景，他們很難找到合適工作，迫得學非所用，委曲求全。他們工作得不痛快，還要時時擔心被老闆開除。因有特殊技能和學識，或因有特殊際遇而得到有前途及好待遇職業者不是沒有。能抱樂觀精神、咬緊牙關、克服困難而獲致成功的創業者亦有其人。可惜這兩類人為數甚少。積蓄少、沒有賺錢能力、不能離開中國文化、不易融入主流社會的退休移民更為失落。在加拿大這個「異鄉」渡過不愉快的晚年是一件可悲的事。香港移民稱加拿大為「艱難大」未必無因。

鑒於青年人失業，中年人做生意不順利，老年人不適應新環境，不少香港移民，尤其是八十年代後期才報到的，認為加拿大只是一個可以「安居」，而不可以「樂業」的地方。他們移民加國是無奈的。一伺領到加拿大護照便回流香港。他們視加拿大護照為他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及中國做事的「政治保險單」。於是「四年內居住足三年」才能申請入籍的時間被謔稱為「坐移民監」。

坐完「移民監」便返港繼續賺錢的人往往自己先行，留下家人在加拿大。除非在香港有大發展，全家一齊回流的機會不多。在此情形下，他們唯有每隔一段時期便回來與家人作短暫團聚，之後又返港搏殺。因為經常穿梭加、港兩地，他們被謔稱為「太空人」。此一現象製造了不少香港移民的辛酸故事。例如：先生在香港有艷遇或太太在加拿大移情別戀，從而導致家庭破碎。又例如：千辛萬苦把年邁雙親帶來加拿大之後又丟下他們，讓他們在「異邦」過着差不多又

聾、又啞、又盲、又跛(不會聽、說英語,不會閱讀英文、不會駕駛汽車)的生活。

另一類「太空人」為在加港兩地都有產業的富有移民。他們既要享受加國的自由民主與優美居住環境,又捨不得繁華與富刺激性的香港生活。他們的行動有如候鳥:在冬季離開冰天雪地的加拿大飛到氣候較溫和的香港避寒,在夏季告別香港的又濕又熱天氣飛回風和日麗的加拿大避暑。鑒於凡是在加拿大定居的人,不論是公民與否,都要納很重入息稅,而入息範圍是全球性的,不少此類「太空人」索性賣掉在加國的產業並結束在加國的投資,繼而舉家遷回香港。此舉使他們不再用納加拿大稅,只納香港稅。由於香港的稅制較加國稅制為寬鬆而香港稅率又遠較加國稅率為低,在香港的繁榮與安定還能維持的大前提下,他們此舉是划算的。

因為捨不得在香港的事業,有些香港移民在進入加拿大國境,向移民部報到,並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後即急不及待返回原居地,或在加國居住了很短時期便回流。此舉很難使他們在三、四年內取得入籍資格,而做加國公民。迴避可能在香港發生的政治不安,乃係他們移民的初衷。他們心情矛盾,既要有政治保險,又不想坐「移民監」。為了兩全其美,他們設法走法律漏洞。直至執筆時為止,離開加拿大國境的人不用向移民部登記,持加拿大護照或加拿大永久居民證件的人進出加、美兩國邊境也毋須登記。上述加拿大永久居民返回香港居住了一個時期後,經美國返加拿大時,加境移民官員只以為這位永久居民剛在美國旅遊完畢返回加拿大住家。以此方法虛報入籍法定積累居住時間的人被謔稱為「潛水人」。他們以瞞天過海方法「潛入」加拿大。

八十年代,我家所在的士嘉堡從一個沉悶的單元文化社會蛻變為一個熱鬧的多元城市。在蛻變期間,士嘉堡的社區產生了不少矛盾衝擊。而大量華裔移民的湧入更擴大了衝擊面及使矛盾更趨尖銳化。一九八四年,士嘉堡市西北的愛靜閣區(Agincourt)發生了排華風波。白種居民四處派發「仇恨傳單」(hate literature)。就在這關鍵時刻,一群有正義感的華裔居民組織了士嘉堡華人聯會(Federation of Chinese Canadians in Scarborough -- 簡稱 FCCS),擔當社會良心角色,以緩衝種族緊張,提倡族裔和諧保障華裔權益,以及推動加華社區進入主流社會為己任。通過聯會的努力,排華風波終告平息。

士嘉堡華人聯會成立於一九八四年夏季,是一個不分黨派、宗教之非牟利的政府註冊團體,其主要宗旨如下:

(一)爭取及推廣士嘉堡所有居民之平等和人權。

(二)鼓勵士嘉堡華人參與該市之社交、文化、經濟及政治活動,以求同化加拿大社會。

(三)協助士嘉堡華人保存並分享其文化傳統。

(四)增進士嘉堡居民及團體之間在文化與種族關係上的和諧、瞭解和互助。

(五)促進士嘉堡華人團體及居民之合作與溝通。

一般退休香港移民，由於年紀老邁和不懂英文，通常靠在家中看中文電視、電視錄影帶和報紙，約朋友到茶樓飲茶、搓麻將，以及逛超級市場或大型戶內商場來消磨時間。我的個性與背景與他們不同。雖然已經退休，我還想做些有意義之事，以免渾渾噩噩過此一生。藉着一個偶然機會，我參加了華人聯會，任董事及秘書之職凡兩年，即由一九八八至一九九零年。

一九八八年九月，士嘉堡華人聯會公演話劇以籌募經費。話劇選自李援華戲劇集獨幕劇《之子于歸》。為了通俗，聯會將之改名為《選婿》。《選婿》一劇以喜劇形式演出，是對舊中國的不合理封建婚姻制度的諷刺與批評。這齣話劇定於九月二十日在愛靜閣中學禮堂演出。愛靜閣中學位於士嘉堡市的米特蘭道（Midland Ave.）。話劇的排演在聖公會諸聖堂舉行。諸聖堂原址在堅尼地路（Kennedy Ave.），一九九六年遷至萬錦市的丹尼遜街（Denison St.）。聯會借用諸聖堂排演話劇的原因是與諸聖堂關係良好。諸聖堂主任牧師馮家亮是聯會首屆會董之一。身兼聯會會董及話劇統籌的馮嘉慈小姐是諸聖堂資深教友。她選中了教友關慧瑜小姐擔任「選婿」的女主角。關慧瑜是我的長女。馮小姐通過慧瑜請我將話劇的中文故事譯成英文。這是我參加華人聯會的來由。

一九八九年，士嘉堡華人聯會的首屆會長吳鴻瑞先生請我多做一件對華人有益的事。吳先生是多倫多華人社區的一名活躍份子，為多個社團做義工。因工作太忙，他不能兼顧多倫多華人耆老家居服務協會（Toronto Chinese Seniors Home Support Services Association——簡稱 TCSHSSA）董事的職務。於是他推薦我填補空缺。由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我在協會任董事兼財政委員會主席之職。家居服務協會也是一個不牟利機構，服務目標為：（一）向耆老提供高質素的家居服務，讓耆老愉快地安享獨立的生活。（二）鼓勵耆老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分享有意義的團體生活。（三）發展多元化的家居服務，確保耆老身心康泰。（四）喚起社區人士關注耆老對家居服務的需求。（五）關注政府及各撥款機構對耆老服務的政策發展，並倡導改善方案。一九九三年，協會改組，並把會名簡化為華人耆老服務協會（Chinese Seniors Support Services Association - CSSSA）。

在士嘉堡華人聯會任職董事及秘書期間，我參與了該會的多項活動，其中較為重要的有：（一）與士嘉堡多元文化及種族關係委員會大力倡導種族和諧、均等就業及英語為第二語言課程（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 ESL）。（二）聯同華人諮詢服務處及各社區團體舉辦聯邦、省、市政府的候選人公聽會，以提高華人的政治意識。（三）參與士嘉堡教育局之政策諮詢委員會以發展及實行多元文化及種族關係政策。（四）與全加華人協進會及其他華人團體倡導人權，並要求政府為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二三年華人人頭稅及一九二三年至一九四七年排華法案的受害者作出補償。（五）協助華裔學生家長向士嘉堡教育局要求開辦祖裔語言課程，並對課程的大綱作出建議。（六）開辦一名為「參與八九」之社區計劃，藉以促進華裔加入融入加拿大主流生活。除了以上的嚴肅項目之外，華人聯會又舉辦週年餐舞會、夏日旅行、聖誕節天才表演及週六晚會等康樂活動。

一年一度的大多倫多公益金籌款百萬行也是聯會會員熱心參與的社區活動。

一九八九年五月及六月，中國北京爆發了由學生帶動的愛國民主運動，引起了幾千萬海外華人的關注，多倫多華人的反應尤為強烈。我們從電視熒光幕看到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百萬北京市民上街遊行，解放軍出動坦克車來鎮壓群眾的動人、緊張、悲慘鏡頭之後，無不感到不安和激憤。六月四日，多個華人團體聯合起來聲援中國的民主運動，三萬多人結隊走到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門前示威。不少非華裔人士也加入了遊行隊伍。六月五日晚上，市政府大樓面前的彌敦菲臘廣場又有一個數千人參加的燭光晚會，以悼念民運的死難者。六月四日以後的幾個禮拜天，大多倫多各華人教堂為中國的和平、民主及「六四」犧牲者祈禱。

一九八九年六月的時候，我已六十多歲。當時與我年紀相近的華裔移民，大部分只想過平淡生活，與世無爭，對政治及時事不大關心。想不到因為參加了士嘉堡華人聯會，上了年紀的我還要與政治結緣。因為是聯會的秘書，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國軍隊鎮壓學生民主運動的消息傳到多倫多後，承會長岑蘭君的委託及出於良知，我責無旁貸地打電話給各個會員，通知他們到多倫多市中心集合，聯同其他華人團體遊行示威，以表示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同情與支持。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參與政治活動。回憶一九八四年移民前，我在香港絕對沒有此膽量。原因是當時港英政府還在執行五十年代初期訂立的《公共秩序法例》和《社團登記法例》，以防市民有政治性活動。以下幾個事例，至今記憶猶新：一九六七年，一間位於九龍的人造花工廠發生勞資糾紛，工人上街遊行示威。一九七零年，十七個學生團體發起中文合法化運動，遊行到政府機關門前請願。一九七一年，香港愛國青年舉行保衛釣魚台示威，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一九七三年，英籍總警司葛柏嚴重貪污，被調查時潛逃返英國祖家，大專學生集會遊行，提出「反貪污，捉葛柏」口號。上述遊行示威都受到港英政府干預與鎮壓。在加拿大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乃係公民的民主權利，除非出現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政府無權干涉這些活動。撫今追昔，我慶幸能夠在一個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國家居留。

參與大多倫多華人聲援中國民主運動遊行時，我發覺集會時發言最多和最激昂的，走在遊行隊伍前列的，喊口號喊得最起勁的，多數同時是敢於為加國華人爭取平等和捍衛人權的人。他們很面善，我從電視熒光幕不時看到他們。他們的名字也常常見報。這些人大部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baby boom）時期出生的。其中有六、七十年代從香港來到加拿大讀書，讀完書留在加拿大做事與生活的人；也有土生土長的華裔加拿大人。前者不喜歡回香港做殖民地順民。他們對中華文化有深厚感情，但更愛加拿大的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後者的祖父輩是人頭稅及排華法案的受害者。他的文化水平遠比祖父輩高，因而能夠走出唐人街，在主流社會中與白種加拿大人抗衡。我稱上述兩種人為華裔加拿大人的民主鬥士。民主鬥士的核心為全加華人協進會（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簡稱平權會。平權會有二十多個機構

會員(Member Organizations), 上嘉堡華人聯會是其中之一。關於平權會的來龍去脈, 我的姪兒關卓中所知甚詳。

關卓中是我哥哥文光的長子, 他於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三十日在香港出生, 一歲大便隨雙親移居新加坡。在新加坡完成小學教育後與雙親及在新加坡出生的妹妹慧中返香港居住。卓中在聖若瑟書院讀初中, 繼而因全家移居日本關係, 在東京的國際學校讀高中。高中畢業後他到美國讀大學, 大學畢業並在美國做了一年事後他移民加拿大, 成為加國公民。一九七八年, 卓中從多倫多寄了幾份《亞裔加拿大人》(Asianadian) 英文雜誌給我。他是該刊物編輯之一。「替在加拿大的亞洲人找尋新尊嚴與自豪」(To find new dignity and pride in being Asian in Canada) 為出版該刊物之目的。在收到此刊物之前, 我一直以為卓中是一個受雙親寵壞、不懂世事的孩子。想不到長大後的卓中是一個維護正義和有使命感的人。

七十年代開始, 加拿大的大學愈來愈多亞裔學生, 尤其是華裔學生。「望子成龍」是一般華人家長的心願。加拿大華人家長與香港華人家長都是一樣。加拿大大學對若干專科、例如醫科、牙醫及藥劑, 通常只收本地學生。來自外國的學生, 即所謂「簽證學生」(Visa Student), 只可讀普通科。由於華人都是黃皮膚、黑頭髮, 誰是本地學生, 誰是簽證學生, 實在不容易分辨出來。

多倫多的CTV電視台有一個資訊性和教育性的節目, 名為W5。W5是「何人」(Who)、「何事」(What)、「何處」(Where)、「何時」(When)、「何故」(Why)的縮寫。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W5節目的專題為「校園大平賣」(Campus Give-away)。出現於熒光幕上的節目主持人指稱:「外國學生霸佔了大學的學位, 令本地學生得不到教育機會。」熒光幕接着出現許多華人面孔。她便說:他們就是霸佔學位的外國學生。其實這些黃面學生之中, 大部分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 早已在加國落地生根。節目主持人如此混淆視聽, 把非白種本地學生與外國學生混為一談, 隱含濃厚種族歧視意識, 電視觀眾可能因此對有色人種、特別是中國人, 心懷敵意。

多倫多華人看了「校園大平賣」之後異常反感。他們要爭回一個公道。一九八零年一月, 二千多名華人結隊從多倫多大學校園走到CTV電視台總部抗議。此舉獲得愛明頓、卡加利、溫哥華等城市華裔居民的響應, 旋即升級為全國性行動。在重重壓力之下, CTV終於承認錯誤, 並公開向加國華人道歉。我的姪兒卓中參與了整個抗議過程。抗議行動的勝利導致了全加華人協進會的成立。首屆會長王裕佳醫生日後成為多倫多最有影響力的市民之一。

全加華人協進會成立的宗旨為對抗種族歧視, 為華人爭取平等權益和捍衛人權。今後華裔加拿大人將以「主人翁」身份在加國生活和發展他們的事業。目前, 許多有尊嚴的華裔加拿大人正在聯邦、省、市政府服務, 向聯邦、省、市議會的選舉進軍, 努力為社會公益及愛老、敬老事業工作, 展開族裔和諧運動, 發揚及保存中華文化的優點, 以及為中華祖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和祖國人民的幸福而作出盡可能的貢獻。

第六節：香港回歸祖國，移民回流與回港探親

中國在一八四零至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中失敗，把香港割讓給英國。在中國近代史中，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國恥。收回香港，滿雪國恥，中國政府義不容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和領導人曾以三個不同方式，向中國人民、聯合國及英國宣示收回香港主權與治權的決心。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決定興建「中國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的最後一句說：「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那時起，為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碑的基座四週刻有八幅大理石浮雕畫，第一幅的標題為「焚燒鴉片」。

一九七二年三月八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在致聯合國非殖化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Colonialism）主席的信中，重申中國對香港和澳門的立場，認為香港和澳門都是中國領土一部份，解決港澳問題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的事，根本不屬於通常所謂「殖民地」範疇。同年十一月八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在殖民地名單中刪除香港和澳門兩個地方。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談論香港前途問題。鄧小平對她說：「……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國政府是晚清，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我們已經等待了三十三年，我們是在中國人民充份信賴的基礎上才能如此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後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沒有別的選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香港人曾對祖國政治經濟局面的變幻莫測發生恐懼，掀起了三個移民潮。第一個起源於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第二個的起因是一九八四年英國正式宣布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把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歸還中國。第三個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政府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的民主運動，導致許多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一國兩制」承諾失去信心。

香港是中國領土一部分是無可置疑的。中國政府從英國人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是合情、合法、合理的。這個事實不會因某些人的愛惡而改變。但是不少香港人都對此有戒心，要在做中國公民與做外國公民之間作痛苦的抉擇。目前在加拿大的香港移民有數十萬人。他們大部份已成為加國公民，小部份正在申請入籍中。

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加拿大經濟停滯不前，工商業衰落，人民失業率高企。與此同時，政府在稅收減少和社會福利開支難於節制的情況下，財政赤字有增無已，負債累累。此情此景令到大部份香港移民在加國的生活異常困難，在加國的事業荊棘滿途。當代中國作家白樺在他的小說《苦戀》中說：「我愛祖國，祖國愛我嗎？」不少香港人為了這句話移民。到了九十年代，不少移居加拿大的香港人下意識地說出：「我愛加拿大，加拿大愛我嗎？」這句怨言。

七十年代末期開始，中國政府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發展市場經濟，歡迎香

港同胞及外國商人前往大陸投資，從而引進資金、先進科技和企業管理知識。大陸的基本建設得以加速，物資供應日漸充足，城市居民生活水準有所提高，部份人民得以先富起來。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到深圳經濟特區視察，發表肯定特區成就、堅持改革開放的講話。這位中國領導人的南巡講話，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新信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本地生產總值以接近百分之十的年率遞增。戴着外國名廠標籤，但在中國製造，或戴着中國名廠標籤而在中國製造的成衣、靴鞋、玩具、罐頭食品、家用電器等輕工業產品，幾乎塞滿了多倫多及其他北美洲大城市的百貨公司窗櫺。中國製造的火箭可以送歐美國家的人造衛星入太空。以上種種事物的發生，顯示中國經濟日益發展，對世界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大。拜中國改革開放之賜，香港的工商、金融、地產、航運事業相應蓬勃起來，大型基建紛紛上馬，各大公司及政府機構競相招聘人才，向已移民外國者招手。

基於上述情況，許多加拿大的香港移民，特別是那些並非由於喜愛加拿大生活方式而移民的人，都有「不妨回去碰一碰運氣」，甚至「不如歸去」之感。他們包括：在加國已有不錯職業，但認為回流有更好事業前途的人；不滿在加工作的現狀，希望回流能找份較好職業的人；在加國投資回報少或做生意無利可圖，希望回流東山再起的人。我的居加國親戚、朋友中，因有需要、有本事兼年青力壯而加入回流行列者大不乏人。有一種人在加國生活得不理想，但不打算回流，除非他們認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可以落實。這些人大部分是反對共產黨在中國專政，兼擁護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文化工作者，如作家、新聞從業員、藝術家等。

在一九八四至九七這十三年的主權、治權移交期內，香港雖然曾經受到若干負面的政治經濟事件衝擊，但有驚無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政權交接順利完成，社會秩序安定如常。七月一日以後，特別行政區政府仍然容許居民有言論、集會、遊行示威自由。不同政見者仍可批評中國及特區政府的政策與行為。有見及此，回流人士在香港及大陸工作的信心增加。部份人更索性賣掉在加國的產業，又將家人帶回香港，結束「太空人」生涯。由於加拿大政府的徵稅對象為居民（Resident）而非公民（Citizen），回流人士如此行事可謂一舉兩得，既可安心發展在香港和中國的事業，又不用負擔加國的重稅。

在加拿大的香港移民不是人人都能夠回流。香港生活費用之高僅次於東京而佔世界第二位。高地價、高屋價、高租金、高通脹，是多年以來的香港生活現實。回流人士如在移民的時候把在香港的房子賣掉，回流後打工或做生意的人息不夠豐厚，以致無法置業從而要付出昂貴租金，他們的生活將會捉襟見肘。更可能令到他們不暢快的，是在加拿大過慣寧靜生活之後，回到香港不適應當地的緊張生活。子女們在加國所受的教育不易與香港教育銜接，也使他們頭痛。在感到事事不如意之後，他們又要為前途傷神。滿懷希望回港，帶着失望返加者亦有其人。

回歸祖國後的香港，雖然工商各業仍有可為，但潛伏的經濟過熱與政治不

安因素，在在足以影響這塊地方的安定繁榮。目前的穩定不等於將來沒有震盪。作為香港靠山的中國，今後她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趨向尤其值得回流人士注意。「中國打一個噴嚏，香港就會傷風」的比喻不容忽視。有見及此，無怪許多回流者還未敢全心全意長期在香港或大陸生活。他們只能把握時機在短期內盡力賺錢，積聚了相當可觀財富之後即返回加拿大退休或另謀發展。他們始終持着加國護照，如發覺中、港局勢不穩即一走了之。目前留港的華裔加拿大人超過十萬，願意放棄加國國籍者相信為數甚少。

回流人士仍持有印着三粒星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者為數甚眾。為了鼓勵前香港居民回來參與建設香港和祖國，在特別安排下，回流人士進、出香港境時出示身份證便可獲得放行。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只要他們進出香港及大陸國境時不出示加國護照，他們便可以被視為香港及中國公民。回大陸旅行時，他們以港澳同胞回鄉證作為身份及旅行證件。在大陸購買機票、船票或火車票只須付出與大陸人同等的票價。香港回歸祖國之前，港澳同胞所付的票價與一般外國人所付出者看齊。在持有加國護照之餘，這些回流人士又可以申請特區護照，與香港同胞一齊享有特區給予公民的權利和福利。不過凡事有其利亦可能有其弊。他們被視為中國公民的時候，如在香港或大陸犯法，或中、港兩地發生戰爭或社會動亂時，他們將得不到加拿大駐港領事館或駐華大使館的保護。有鑒及此，謹慎的華裔加拿大人往香港和大陸旅行時，多數寧願事前取得中國外交部簽證或在入境香港時出示護照。他們表明自己的加國公民身份，以求心安理得。上述各個情況的出現，顯示加拿大的香港移民正在懷着複雜的心情回流。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子夜，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在香港灣仔海傍新建成的會議展覽中心新翼舉行香港政權交接儀式。舉行儀式的禮堂內有四支旗桿，左邊兩支，右邊兩支。儀式開始時，英國國旗和香港殖民地旗在左邊兩支旗桿上飄揚，中國國旗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則繫於右邊的兩支旗桿上，準備升起。七月一日零時前三十秒，英國國旗及香港殖民地旗下降。七月一日零時零分，中國國旗及香港特區區旗升起。就在降旗的二十多秒與升旗的四十多秒之間，一百五十五年的殖民統治正式結束，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

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一日這兩天，香港和世界各地電視台均以第一時間廣播有關香港回歸中國的節目，包括政權交接儀式現場廣播，慶祝回歸活動的精彩鏡頭，政治評論家的談話，知名人士的訪問，和香港及世界各地華人的反應等。香港及中國時間七月一日零時等於多倫多夏令時間六月三十日正午十二時。在香港及大陸的親友看回歸節目時，如要一氣呵成的話必須通宵達旦，不眠不休。在多倫多的電視觀眾比較幸運。我們可以好整以暇地觀看，毋須熬更守夜。就在看完政權交接現場廣播之後不久，我接到六弟元光從廣西南寧打來的電話向我報喜。接着我打電話給住在廣東深圳的四弟子光。他對香港回歸的感受也興奮莫名。我們三兄弟分別在三個地方同時看一個意義重大的電視節

目，真是難得可貴。此一經驗畢生難忘。可惜二哥文光已於一九八八年去世。否則他必會與弟弟們以同樣心情來見證這件歷史性大事。

七月一日以後的兩三個月內，我一連接到幾封香港及中國親友來信。他們都希望我能早日回去與他們叙舊，又建議我順便到改革開放多年的祖國一遊，即使「走馬看花」也是值得的。基於親情和民族自豪感，我卒於十一月中旬偕妻子永堅飛返香港，一方面探望親友，一方面設法到有代表性的大陸城市一遊，看看祖國的新風貌。我們於十一月十四日乘加航第七號班機離開多倫多，起飛時間為上午十時十五分，當時漫天風雪，氣溫降至攝氏零下四度。航機於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六時半抵達香港，當時香港天氣溫暖異常，氣溫高達攝氏廿六度。鑒於加、港兩地在氣候、地理環境、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相差甚遠，我們下機時恍如從一個世界走到另一個世界。

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回祖國探親時，不少人會想起詩人杜甫的以下詩句：「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我亦有此悲涼感覺。幸而在香港的老朋友們雖然鬢髮各已蒼，但「為鬼」者只是少數。有四位老友在香港生活還充滿生氣。按香港慣例他們早應退休。但他們老當益壯，一位在粵港巴士公司任副總經理，一位不時來往香港及大陸做生意，一位在女婿的律師樓做翻譯，一位在體育機構任幹事。至於我的親人，自我於一九八四年移民以來，相繼去世者已有多名。在香港去世的有我的母親鄧肇瓊，我的舅父鄧肇堅，我的二哥和二嫂，以及永堅的二哥和四哥。在大陸去世的有永堅的二姊和二姊夫。在加拿大去世的有永堅的大哥和大嫂。我的上一輩還在人間者，只有現時已九十餘歲的姨母鄧肇真。

香港回歸祖國半年後，「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樓照炒」仍是傳媒經常報導的港人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令到不少機智、有眼光、有冒險精神的港人成為富翁。他們發財、投資、投機，再發財。港島、九龍、新界各地，新建的高樓大廈林立，到處出現人潮、摩肩接踵，熙來攘往。在馬路上奔馳的各種車輛絡繹不絕，大排長龍。次末代港督衛奕信拍板的「玫瑰園」計劃逐步兌現。從九龍驅車往葵涌，走過葵青大橋到青衣島，由此走過青馬大橋到大嶼山東北，再而沿新建的高速公路至大嶼山北部的市鎮東涌，我們可以看見「玫瑰園」的花已含苞待放。這一段車程是海外華人回港探親兼觀光的一個不可放過的旅遊節目。它給予我們一個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啓示。青馬大橋是目前全球最長的雙層吊橋，上層行走汽車，下層行走電氣化列車。在這條雄偉大橋上遠眺，可看見將於九八年中啓用的赤鱗角國際機場。沿這條旅遊路線，又可看見吞吐量佔世界第一位的葵涌貨櫃碼頭，新建成的現代化高速公路系統，和新建成的現代化衛星城市。看情形，特區政府將以更多新型基建來迎接廿一世紀。

在欣賞上述令港人引以為傲的建設之餘，我又有另感想：要了解香港的現在與未來，先要了解目前港人的處境和心態。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對佔香港人口最大比重的中下階層而言，不管經濟如何繁榮，香港一直是個貧富懸殊和

不公平的社會，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可能如此。中下階層所能分享的經濟繁榮成果總是微不足道。經濟繁榮的大餅，絕大部份被佔人口最小比重的富豪們吃掉。

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中下階層在香港生活最要命的是如何解決住屋問題。他們的人息偏低，工資追不上通貨膨脹。他們負擔不起高昂的租金，又缺乏財力購買市價不斷飆升的房屋。如要改善居住環境又不用花太多錢，他們可申請入住政府興建的廉租屋。但需時等候又沒有幾多選擇地點或環境的機會。如要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美夢，他們要做長期債務人。他們向銀行借錢買樓。銀行給予他們的貸款通常是分期付款方式。借款人只需付出血價小部份便可入住他要買的樓宇，餘下的樓價由銀行墊出支付給物業發展商。借款人入住前付出的小部份樓價稱為「首期」。其餘大部分樓價則分多期按月供款還給銀行。每月供款包括本金和利息。中下階層人士多數是受薪階級，俗稱「打工仔」。打工仔要勞碌一生、節衣縮食才有錢供樓。表面上，他替僱主打工，實際上是替地產商打工。為了舒緩經濟壓力，不少打工仔企圖走捷徑發財，跟風入市炒股票。由於本錢少和經驗不足，他們往往得不償失。九七年下半年以來，香港股市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大幅下挫。因此而在股票市場失去大半生甚至一生積蓄者大不乏人。隨着香港經濟低迷，工商業不景，打工仔又要面臨失業的痛苦。由於所居住的樓宇價錢較廉，建築結構較差在所不免。狂風暴雨襲港時他們的生命財產往往受到威脅。中下階層日常生活所在的地方，尤其是他們光顧的食物店、餐室和酒家，衛生環境通常有問題。這些地方是流行性疾病的溫牀。有錢人家不會到這些地方。總括而言，中下階層生活是十分坎坷的。以上各種情況存在已久，至今沒有變化。「港人治港」並沒有給他們帶來改善生活的喜訊。

香港是個開放城市。按常理，鄰近地區發生戰爭或政治經濟危機，香港很容易被波及。百多年來，中國大陸動亂頻頻，但香港總是有驚無險，倖免於難。有幾個時期，中國愈亂，香港則愈繁榮。因此而發達的人沾沾自喜。但熟讀歷史和有民族感情者很痛心和感覺得非常矛盾。之所以如此，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三條不平等條約把香港和中國在政治上分隔起來，造成一個「河水不犯井水」的局面。香港回歸後，這個局面消失了。從此香港與中國唇齒相依，息息相關，禍福與共。因而不論貧富貴賤，不論政見，若要在香港生活和發展事業，你就要愛中國，希望中國好。特區首長董建華曾說：「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好」。有人認為這是迂腐的見解。但我覺得此言頗有哲理。由於中國不好，香港勢難獨善其身。現今香港人盼望的，是中國在經濟改革開放的同時，也來一個政治改革開放。這是中國好的標誌，是中港兩地安定繁榮所賴，也是香港人能享有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保障。

第七節：另一次難忘的祖國之旅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中旬，我和永堅回港探親並到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一遊。雖然行色匆匆，走馬看花，但我們能以觀微知著的心情去再

認識祖國。因此此行是有意義的。

離開多倫多前，我們得到香港來客提示：仍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者，如心中沒有芥蒂，又不會做特區和大陸政府認為非法之事，憑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入境香港和憑港澳同胞回鄉證入境大陸可省卻不少麻煩。若持加國護照入境香港，我們不須簽證，但在港逗留不得超過三個月，逾期要到人民入境事務處辦延期手續。若持加國護照入境大陸，事先要得到中國外交部簽證，有效期通常為三個月。換言之，每次遊大陸我們不能逗留逾三個月。如要逗留多些時間，我們要再簽證。每次簽證都要交費。香港來客的建議適合我們的身份與要求。

在香港見過大部份親友後，我們即展開祖國之遊。我們的行程為：由香港乘火車到深圳，由深圳乘飛機到北京，由北京乘飛機到上海，由上海乘飛機回深圳乘火車返港，由香港乘汽車經深圳環遊寶安、東莞兩縣的沙井、長安、太平、虎門等市鎮，然後回深圳乘火車返港。

因為超過六十五歲，我們坐火車半價。因為持有港澳同胞回鄉證，我們在國內買機票時票價與本地人看齊。如憑護照購票，我們即被視為外國人，票價貴一倍。我們乘南方航空公司的波音 757 型飛機由深圳飛北京，票價為人民幣 1400 元；乘中國民航公司的空中巴士 A340 型客機由北京飛上海，票價為人民幣 900 元；乘上海航空公司的波音 767 型客機由上海飛深圳，票價為人民幣 900 元。

從訂購機票，市區到機場交通，飛機類型，機員對乘客態度，飛行時間表準確性等角度來看，現時的中國民航事業比從前有很大進步。美中不足的是機場大樓的設備不如理想。北京首都機場的客運大樓已形落伍，面積與設計不能應付民航交通量大增的需求，到處人頭湧湧，通道阻塞，公共廁所尤為不潔，令旅客十分不舒服。一座新機場大樓正在興建中，啓用後希望能一改旅客對現時大樓的壞印象。上海虹橋機場的大樓原亦十分殘舊，經近年大裝修後，煥然一新，但現代化設施尚嫌不足，行李運載帶時好時壞，令提取行李者煩躁異常。上海正大力發展浦東新區。據悉在那裏將有一個現代化的新機場。深圳的黃田機場是三個機場中最小的，但設計先進，旅客在機場大樓候機和辦理登機及行李清關手續時沒有問題。

啓程往大陸旅行之際，我知悉十七年前與我同遊東北及北京的宮玉龍先生已不在香港華僑商業銀行做事，他現在是北京燕山大酒店的董事長。一方面希望他能代我訂酒店房間，一方面希望能與他敘舊，我打電話到北京。宮先生驚喜非常，馬上留下一個高級雙人房給我夫婦。可惜我與他緣慳一面，因為我到北京時他要出差公幹。燕山是一間四星級酒店，我的房租原是每天 100 美元，但宮董事長給我六折優待。這個酒店是香港華僑商業銀行與國內旅遊機構合資經營的，有引進現代化酒店管理方法的作用。酒店的各種制度及設施多數效法香港。與賓客有接觸的職員均要懂英文。他們的衣襟上配有刻上自己英文名字的精緻金屬牌。我依稀記得替我們策劃北京市遊覽路線的女副經理，名為

Helen。她為我們安排一部酒店接送賓客用的轎車連司機，日租為人民幣300元。燕山酒店位於北京市西北，地址為海澱路138號。北京的五星級酒店多數位於東長安街及建國門內、外大街一帶。位於東長安街與王府井大街交接灣角的北京飯店是我第一次遊北京時下榻的地方。

由於此次回國旅行時間緊湊，我們在北京沒有重遊已到過的長城、十三陵、故宮、天壇、頤和園等地。我們的興趣在於欣賞北京的市容，參觀博物館和新建成的酒店及商業大廈，逛商場和百貨公司，品嚐地道小吃，看看人群與車輛熙來攘往的情景，留意人民的衣着與神態，和我機會與北京人交談。我們在上海和深圳也有類似活動。

到位於復興門外大街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參觀，引起我這個軍事知識愛好者不少回憶。博物館陳列了各種新舊、大小武器。解放軍俘獲的國民黨軍美製P-51型戰鬥機，以及75mm、105mm、155mm榴彈炮，使我想起二次大戰時期做翻譯官的情景。館內陳列的「殲六」(F-6)、「殲七」(F-7)、「殲八」(F-8)型戰鬥機，以及橫放在館前空地上、長十多米的彈道導彈（相信是「CSS-1東風2型」中程彈道導彈（medium range ballistic missile）都是中國製造的較先進武器，顯示解放軍正在加強威力，不過在西方軍事專家眼中仍嫌落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從電視新聞報導中看見許多坦克及裝甲運兵車在北京長安街及天安門廣場一帶出現。這些戰車好像陳列在博物館內的「69式」中型坦克（medium tank），「69-2式」主戰坦克（main battle tank），和「63-2式」裝甲運兵車（armoured personnel carrier）。

天安門廣場以東的中國革命及歷史博物館分南北兩翼，北翼是革命博物館，南翼是歷史博物館。我們只參觀南翼。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歷史博物館是海外華人尋根的好地方，館內收藏的歷史文物及文獻有九千多種，分別在四個展覽廳展出。第一展覽廳展出原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國歷史學家認為原始社會起於距今幾十萬年前，止於公元前廿一世紀。第二展覽廳展出奴隸社會的發展過程，即由公元前廿一世紀至公元前476年。第三展覽廳展出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即由公元前75年至公元1840年。第四廳展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即由公元1840年至1919年。我們館內逗留了兩個多小時，但只能瀏覽而不能對每一展品作細心觀察。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是得益的。走出博物館後，我們好像上了一堂歷史大課。

走出歷史博物館後，我們橫過天安門廣場去參觀人民大會堂。途經人民英雄紀念碑時，我想登上紀念碑基座的台階，再細心看看以前見過的刻在碑座的浮雕畫和刻在碑身的文字。這些浮雕畫和文字都曾經激發我的愛國心。可惜我不能如願以償。原因是紀念碑基座石台階四週的大理石欄杆後面站着衛兵，不讓閒人登上台階。

我曾參觀過在多倫多的安大略省議會大樓和在渥太華的加拿大聯邦議會大樓。只要奉公守法，我們進入這些大樓參觀不但免費，而且受到導遊員的歡迎和招待。他們彬彬有禮，帶領遊客有秩序地進入議會大樓內的各個廳堂，邊

行邊講解與議會有關的事情，例如議會的歷史、組織、功能、議事程序等，務求滿足參觀者的求知慾。北京人民大會堂是中國政治活動中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許多其他重要的全國性會議都在此舉行，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常在此接見及設宴招待外國訪華政要和國內、外有成就的知名人士。因為這緣故，中國人民和外地來客都以到此一遊為榮。可惜大會堂管理當局給予遊客的待遇，與加拿大聯邦議會大樓及安省議會大樓的有所不同。

我們進入大會堂時要買入場券，沒有導遊員前來招待，要憑花錢買來的宣傳小冊子沿指定路線參觀。每隔一段路線和在每間廳堂裏面有警衛站崗。他們的冷酷面孔令我感到不自在。

根據宣傳小冊子，大會堂建築物十分宏偉，佔地十七萬餘平方米，分中座、南翼和北翼三部份。中座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廳和三十多個以各省、市、區為名的會議廳，此外還有迎賓廳和門廳。人大會議廳是大會堂的中心，長七十六米、闊七十米，容積超過八萬立方米，可容一萬人開會。位於北翼的宴會廳有面積七千平方米，可為五千賓客設宴。人大常委會辦公室及會議室設於南翼，是不開放的。但參觀大會堂的遊客要從南翼的側門進入。他們要由此走過一條長廊才能到達中座和北翼。長廊的兩旁只見牆壁而不見各辦公室及會客室的門窗。遊客們走過長廊時都不約而同地感到奇怪和不耐煩。

大會堂各會議廳的佈置反映了中國的政治文化。人大會議廳內有一個大主席台，台上有多个黨和國家最高級官員的座位，分數層排列。面對主席台的是一排又一排密麻麻的人大代表座位。乍看起來，人大會議廳好像一間大戲院，主席台是舞台，人大代表座位是觀眾席。在主席台上，黨主席、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等發表演說。各省各區的代表們在台下鼓掌或舉手。前者有若演員，後者有若觀眾。此一情景與民主國家議會的執政黨和反對黨議員互相辯論大相逕庭。至於各省、市、區會議廳的佈置，則大同小異。議員座位的排列，不是四方形便是圓形，主席座位後面多數有幅大壁畫。除了壁畫，以及四週牆壁上面的圖畫或圖案可表達各地的特色外，各個廳堂的面貌乏善可陳。不過最新落成的香港廳還是值得一提。該廳的門口有一幅寫有「執行一國兩制方針，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牌匾，題字者為江澤民。

參觀路線的終點是中座門廳。走出門廳是大會堂的正門，面向天安門廣場。正門前有十數級石階，再前是馬路邊。走下石階時不禁想起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此跌了一跤，又不禁想起一九八九年五月北京學生在此下跪，向人民政府訴求反貪污、反官倒，又訴求國家有民主、人民有自由。

出大會堂後，我們驅車到北海公園清靜一下。位於故宮博物院西北的北海公園歷史悠久，曾經是明、清兩代皇帝的冬宮。公園中央有一個湖，名「北海」，可泛舟。公園北部有小山，山上有一座西藏式佛塔，名「白塔」。湖的四周有亭台樓閣，古色古香。沿湖邊小徑散步，心曠神怡。不幸的是我們經過的亭台樓閣，其中不少掛有麥當奴或肯德基的中英文招牌，使這個幽雅的公園庸俗起來。

遊罷公園，我們入鬧市逛商場。北京的百貨商店原來集中於王府井大街，

但新建的大型多層商場，近年紛紛在西單大街出現。西單購物中心最具代表性。中心樓面廣闊，陳設的貨品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售貨員態度良好，媲美香港著名的百貨公司。新型購物中心出售的衣物及化妝品改善了北京市民的外表；出售的家庭電器使他們的物質生活日趨現代化。看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向老百姓鼓吹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雷鋒精神，已被消費主義所代替。

燕山酒店附近有公園，晨早從酒店窗口外望，可見數以百計的北京市民正在打太極拳和跳交誼舞，其中以長者居多。我對此種生活方式十分欣賞。酒店門前街道有多間小食店，中式和西式各佔一半。光顧中式食店的多數是上年紀的人。光顧西式食店的十之八九為青少年。酒店的早、午、晚餐多數是西餐，收費比在外面吃的貴得多。於是我們不在酒店進膳。早餐到外面的小食店吃，一天吃豆漿、燒餅，一天吃漢堡包、炸薯條。午餐在遊覽路線經過的餐館吃。在王府井大街有不少類似香港美心和大家樂的自助餐廳。為了體驗北京人的港式生活，我們到這些餐廳吃午飯。五星級酒店都有粵菜吃，粵菜餐廳的生意往往比京菜或西菜餐廳的生意為佳。這可能是香港風吹到北京的結果。一天晚上我們品嘗著名的北京餃子。餃子店的餐牌令我們目瞪口呆。北方人吃餃子以斤為單位，每人吃一兩斤事屬尋常。我們兩老胃口小，每人只要半斤，侍者及鄰座食客均報以詫異的微笑。吃完餃子我們要喝茶。想不到餃子店沒有茶供應，食客只能喝清淡的餃子湯。南方人與北方人的飲食習慣如此不同，令我耳目一新。

離開北京時已屆十一月尾。市內各大酒店及商場開始作慶祝聖誕佈置。燕山酒店大堂的聖誕樹和外牆的五彩燈色好像告訴我：因為實行改革開放，政府已不介意人民崇洋媚外了。

上海人不愧為做生意能手。虹橋機場大樓的抵滬旅客出口大堂設有一系列櫃台，作為各大酒店的駐機場辦事處，以便招徠顧客。我們步入大堂時即被幾名酒店代表包圍，各人道出所屬酒店的優點。有些酒店以設備豪華見稱，有些勝在地點適中，有些以合理租金為號召。在機場招徠顧客的酒店是比較高級的，房租以美元計。雙人房的日租由一百至二百餘美元，另加百分之十五服務費。為了搶生意，一些酒店不惜減租金或給予顧客其他優待。經過討價還價，我們選中了衡山賓館。衡山賓館為三星級酒店，客房的每日租金為 107 美元，申人民幣 902 元。酒店代表是一位小姐。她答允將租金減至人民幣 500 元。我的反建議為只淨付租金人民幣 500 元，免除服務費，還要看過客房的環境與設備，認為滿意後才作實。結果代表小姐用的士送我們到衡山路 534 號的衡山賓館讓我們視察房間。經她細心處理，這宗生意成交了。

自小學時期開始，我已對上海這個地名非常熟悉。從歷史課本中，我知道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結束後，隨着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及廣州成為通商口岸。英、法、美等國在上海擁有租界，租界的管治權不在中國人而在外國人手中。租界其實是殖民地的另一稱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駐防上海的第十九路軍起而應戰，軍長蔡廷鍇是廣東人，他的部下多數是廣東人，香港人也多數是廣東人。十九路軍英勇抗日的事

蹟在我腦海裏留下深刻印象。上海的租界沒有受到戰爭破壞，英、法、美及其他經濟發達國家的商人能夠自由自在地做生意，使上海成為繁榮的國際都市。四十年代以前，在工商業領域，香港以上海為馬首是瞻。踏入五十年代，上海繁華消失，大批上海人南下香港重新創業。他們為六、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經濟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九十年代開始，中國當局大力建設上海，以期恢復這個都市失去的工商業領導地位。消息傳出後，許多已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上海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和國際人士到上海投資，使當地經濟再度活躍起來。

為了使我們能在最短時期內看最多東西，衡山賓館請上海婦女國際旅行社外聯部替我們安排觀光程序。旅行社開出一條代表上海新舊面貌、多元化、人文景觀的旅遊路線。旅行社派出一部小巴連同導遊和司機，清早於賓館接我們，陪伴我們遊上海，每位顧客收費人民幣 480 元，但實收 336 元，因為我倆有七折耆老優待。

外灘和南京路一帶，是上海昔日風光所在，「十里洋場」之名由此起。外灘現已改名為中山東路，與中山南路、中山西路、中山北路相連，形成一條環市高速公路。外灘的建築物群是上海作為一個金融、貿易中心的象徵。但這些建築物均已超齡，不大適合現代化商業活動的要求。除了海關大樓與和平酒店仍維持以往功能外，其他大廈，例如英國領事館、日本輪船公司、法國東方匯理銀行、怡和洋行、渣打銀行、匯豐銀行的原址，不是被人民政府徵用了，便是已改作其他用途。中山東路靠近黃浦江的一邊，上面建有一條寬闊的長堤，供市民及遊客散步和欣賞四週景色。站在堤上向東望，我們看到一座高聳雲霄的電視塔。這是新上海的標誌。南京路仍是上海最熱鬧的街道，車水馬龍、人山人海。不過沿路店舖十分殘舊，有待改建或翻新。驅車環遊市區時，我們見到一幢幢新建成的高樓大廈從密麻麻的舊民居或廢墟中矗立起來，有如雨後春筍。

一九九零年以前，在黃浦江畔面對上海的浦東是一塊荒蕪之地。不過到了二千年，這裏將是新上海所在。有關當局正為浦東新區的發展進行一系列基本建設。目前，人們可驅車經過兩條大橋或兩條隧道從市區到浦東。市區已有一條由南到北的地鐵線。由西至東的地鐵線正在建築中。這條新線起於市區以西的虹橋，終點將會落在浦東。浦東新區將有三十多個萬噸級輪船的碼頭和一個現代化機場。新區分四部份：金融及貿易區、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和新高科技工業區。現時進入浦東新區的外資企業，差不多有一半在自由貿易區內運作。浦東的高大建築物多數座落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包括已建成的東方明珠電視塔、證券大廈、銀行大廈、招商大廈等。已於一九九七年八月奠基的九十四層上海環球金融中心，預計於二零零一年落成，建築高度達 460 米，到時將是世界最高的摩天大廈。

橫跨黃浦江的兩條大橋非常壯觀，在南的是南浦大橋，在北的是楊浦大橋。從飛機上作鳥瞰，可見東方明珠電視塔位於兩橋之間，形成一個正如導遊所謂「二龍爭珠」的佈局，塔是「珠」，橋是「龍」。他說：佈局的風水好，將會吸引無數商人前來投資和無數遊客前來觀光，使上海財源廣進。我們的小巴經南浦

大橋，沿浦東的公路直達東方明珠廣場。下車後，我們走一段石階到電視塔的塔座。石階有上蓋以便行人避風雨和太陽。上蓋有「東方明珠」四個大字，題字者為江澤民。

東方明珠電視塔高達 468 米，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三高的電視塔。塔的設計者富於幻想地將多個大小不一、高低錯落的球體從蔚藍的空中串聯到如茵的綠色草地上。這座電視塔由三根直徑為九米的擎天立柱、太空艙、上球體、下球體、五個小球、塔座和廣場組成，裝有兩部每秒走七米、可載五十人的升降機。太空艙離地面 350 米，內有觀光層和咖啡座。上球體比球形太空艙大，直徑 45 米，離地面 263 米，是遠眺全市景色的最佳處所。上球體的上半部是旋轉餐廳，下半部為觀光層。下球體的直徑更大，離地面 90 米，內有太空遊樂城。上球體與下球體之間的五個小球是空中旅館，有二十套客房。塔座裏面有科幻城、小吃店、紀念品銷售店。升降機入口的走廊和可作為展覽廳或叙會的大堂。「東方明珠」是外來遊客的一個觀光重點，本地人到此遊覽者亦甚多。過去二、三十年，我曾到幾個國際大城市旅行，登摩天大廈或電視高塔登到膩了。世界最高的多倫多 CN 電視塔已登過幾次。除了第一次，其餘都是為了招待到訪多城的親友。到了上海，我又做多一次傻瓜——買張五十元入場券，排隊排十幾分鐘才行到升降機入口，在人叢中擠到滿頭大汗。做傻瓜的原因是要看看祖國的現代化建設能否趕上西方。就電視塔而言，我覺得東方明珠塔比 CN 塔先進得多。

懷舊和對中國傳統園藝有興趣的人喜歡到上海舊城一遊。舊城位於上海市東南，離黃浦江不遠。豫園及豫園商城是舊城旅遊重點。我們先到商城然後進入豫園。商城的入口滿街都是小販和乞丐，前者向遊客兜售傳統中國式玩具和小吃；後者憑其殘廢四肢及身上瘡疤作出可憐相，乞求過路遊客施捨。此情此景使我遊豫園的興趣打了折扣。商城的店舖外形仿古，與豫園裏面亭台樓閣的外形混成一體。這些店舖大部份出售仿古文物，小部份為餐室。豫園建於明朝，佔地約兩公頃。由於設計巧妙，遊人覺得園的面積比實在的大得多。遊客要經過一條九曲橋才到豫園入口。九曲橋橫跨一個長方形人工湖。橋的中段有一個亭，名湖心亭。亭裏面是一間茶室，遊客到此喝茶者甚眾。八十年代中期，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訪華，路經上海時她曾到湖心亭品茗。豫園內的假石山、魚塘、花草樹木都建築和栽培得十分精緻。園內的主要建築物如三穗堂、仰山堂、魚樂榭、九獅軒、萬花樓等都是遊客流連忘返的地方。

位於上海市西南的龍華塔和龍華寺也是我們觀光的重點。龍華塔的塔身以木及磚築成，高 40 米，分七層。每層的屋簷向外翻起，簷角掛有小銅鈴。塔的富麗東方色彩吸引了許多外國遊客。龍華寺離龍華塔不遠，是一個廟宇群，圍牆內有五個神殿，主殿為大雄寶殿，兩側各有一個鐘樓和鼓樓。我們入寺參觀時適為星期天，前來參神拜佛的人甚多。每個神殿內外都烟火瀟瀟，人頭湧湧。據導遊說，春天的時候龍華寺四週公園的桃花盛開，到時遊客更眾。每逢農曆年初一，上海人口的一半會到此地遊覽和許願。他在大學考畢業試之前，亦曾

到寺祈禱。不少上海青年人是信神信佛的。想不到經過半世紀的唯物論教育，大陸人民還是如此神心。

上海歷史博物館位於虹橋路。館內陳列了千多件與上海歷史有關的展品，其中以鴉片戰爭的圖片、鴉片煙槍、鴉片運入上海的圖片、租界地圖、英國與法國警官與華籍及印籍巡捕合照的相片最令我感慨。我由此覺得上海與香港好像一對難兄難弟，同是帝國主義侵華的犧牲者，雖則後來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租界時期外國官商用過的器皿和他們的生活照片，以及從前放在匯豐銀行門口、現時放在博物館的石獅子，代表了帝國主義者昔日的光輝。有關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及上海解放的相片和文獻，少不免在此展出。孫中山、宋慶齡、魯迅、周恩來等留下在上海的文物，進一步充實了博物館的收藏。

告別上海前一天，我們不用導遊，自己去看想看的東西。到過上海的香港親友，曾極力推薦我們參觀新建成的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原在南京西路325號，即前跑馬總會大廈。一九九二年，市政府撥出市中心人民廣場一幅地興建新博物館。人民廣場的前身為跑馬場。從賓館到博物館，我們要乘地鐵列車。近賓館的衡山站位於第一期南北線的中段。列車向北行四個站便到人民廣場站。上海地鐵的票務運作仍未有像香港般電腦化。但列車車廂的結構與內部裝飾可媲美香港的，較多倫多的新穎得多。每到一個站，車廂廣播器發出聲音：「現在是XX站，出站後是XX街，附近有XX商店……，下一站是XX」。香港地鐵的同類廣播則說：「現在是XX站，下車時請小心車門和月台與車廂之間的空隙，下一站是XX。」從這兩段播音可見，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價值觀。究竟乘客的方便重要，還是他們的安全重要？則是見仁見智了。人民廣場站與「香港名店街」地下城相連。名店街內有許多店舖，包括時裝店、靴鞋店、快餐店、咖啡室。還有一個大型美食廣場，有如北美洲的Food Court。廣場內有多間供應各式各樣膳食的快餐店，讓食客品嚐中、日、韓、東南亞、歐美各地菜色。名店街的廣告、燈色、店舖招牌都極力仿效香港。不用說街內的聖誕裝飾比我在北京看到的瑰麗得多。大半個世紀以來，滬港兩地在經濟建設方面你追我趕。此舉對中國的現代化有很大作用。

從人民廣場地鐵站走出馬路面，我們看見綠草如茵和有許多花壇的人民廣場。又看見三座新型建築物。最高大的是市政府辦公大樓。大樓對面是上海博物館。一座尚未完成，外形奇特的建築物座落市府大樓的右邊。我們要進去參觀的博物館，外形也十分奇特。博物館的造形由上海建築研究院總建築師邢同和設計。這個由方體基座和巨型圓頂結合起來的建築非常壯麗，將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巧妙地融為一體。館藏珍貴文物十二萬件，包括青銅器、陶瓷器、書法、繪畫、玉器、漆器、甲骨、璽印、錢幣、少數民族工藝品等。這是一座大型的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除了展覽室外，還有圖書館、文物保護科學實驗室、書畫裝裱研究室、青銅、陶瓷修復研究室，用以接待貴賓用的專廳，具有同聲傳譯設施的多功能國際學術會議演講廳。博物館設有多媒體導覽服務系統和數碼式語音導覽系統。語音導覽能分別用英、日、法、漢等多國語種介紹博物館的文物精

品，只要按照展品編號撥號，就可以聽到你所需要的講解詞。博物館的建設，部份得力於香港人的捐獻。多個在世富商和已故富商的後人，有人出錢，有人捐出自己的珍藏。因而有好幾個展覽室及其他廳堂均以香港人為名：用以接待貴賓的專廳名為何東軒（何是著名的買辦），胡寶星中國古代青銅館（胡是著名律師），徐展堂陶瓷館（徐是著名實業家），梁鍊琚展覽廳（梁是前恒生銀行董事兼大昌貿易行董事總經理），邵逸夫繪畫館（邵是著名娛樂事業實業家），何鴻卿玉器館（何是香港實業界著名人士，為大英博物館理事），嘉道理少數民族工藝館（嘉道理為前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主席），林炳炎書畫裝裱研究室（林是恒生銀行前恒生銀號創辦人之一）。從香港人對博物館的捐獻，可見滬港兩地關係密切。

從上海飛返深圳後，我們住四弟家。飛北京前我們只在深圳歇腳，現在才開始特區之遊。我於一九七九年首次訪問深圳。事隔十八年，深圳已由一個人口只有三幾萬的小市鎮發展成為一個人口超過百萬的都市，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走向現代化的先驅。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金融、工商、貿易機構不但派人來取經，而且紛紛在此設立分行。成千上萬有才華的青年和不計其數、不計較待遇的農民，源源不絕從內地流入特區。前者追求高工資和自由天地，後者要擺脫在鄉間的貧困。踏入八十年代，香港的政治及經濟環境在蛻變中，工商業的生產成本高漲。許多廠商已視深圳經濟特區及鄰近的珠江三角洲為今後發展基地。由於中國政府涉外機構的工作程序漸簡化，工作效率有改善，和工商、貿、金融法例不斷修訂，香港和國際商人在深圳的投資意慾亦相應增加。黃田機場及鹽田貨櫃碼頭的興建，一再增加了深圳經濟特區的重要性。黃田機場現在已是全國第四大機場，僅次於北京的首都機場，上海的虹橋機場和廣州的白雲機場。鹽田貨櫃碼頭是全國第二位，僅次於上海。

近年深圳市民的生活不但大有改善，且日趨香港化。對大陸人來說，香港化、西化和現代化差不多是同義的。在特區的繁盛街道和住宅區，有不少中港合資和中外合資經營的超級市場。香港的百佳和美國的 Wal-Mart，均有在此開分店。為了與百佳競爭，特區商人開設了萬佳。後一超市的國產貨品，與前一超市的來路貨品，在質量上差不了多少。深圳 Wal-Mart 吸收了美國 Wal-Mart 的先進經營管理經驗，從進貨到售貨一系列程序，全部電腦化。深圳 Wal-Mart 出售的貨品，絕大部份在本地製造，但包裝和標籤看起來像外國貨。特區商人的另一新創意為仿效美國麥當奴的手法經營中式快餐店。深圳有十幾間麥當奴，亦有十幾間中式快餐店，其中以「豆漿大王」最馳名。「豆漿大王」與麥當奴同時出售廉價食品。從店舖裝璜、店員對客態度、店員制服的美觀、餐具的整潔等角度來看，「豆漿大王」絕不遜於麥當奴。

深圳的城市規劃比北京和上海先進。原因為深圳市差不多是在一幅空地上建築起來，街道井井有條，又直又寬。廣深高速公路和廣深鐵路把廣州和深圳連接起來。一小時多行車便可走畢公路全程。一九九八年底開始有電氣化列車行走廣深鐵路，從深圳至廣州只需時四十幾分鐘。香港往返深圳可乘火車、

汽車和水翼船。旅客過境手續比前簡單得多。深圳火車站及機場出口處的交通，以往混亂非常，現在情形已大為改觀。的士要排隊接客，不得超載，不得濫收車費。在市區，人車爭路的現象也大為減少。巴士班次有增加，舊式巴士陸續被淘汰。新式巴士多數有空調，司機座側的車費箱代替了售票員的工作，快將到下一站時有提示乘客下車的播音。

「外國牌子、中國製造」的概念在中國汽車製造業中起了大作用。行走北京、上海、深圳之的士，十之八九為在中國製造的德國 Volkswagen 廠 Santana 型小轎車。至於私家車，除了進口的德國 Mercedes-Benz 和 BMW，以及日本的 Toyota Lexus 等名貴車之外，還有在中國製造的較小型德國、法國、日本和美國車。笨重的「紅旗」牌已幾乎絕跡，但在北京時我見過中國製造的德國 Audi 牌汽車裝上「紅旗」的標誌。外國汽車廠來華投資一方面為自己賺錢，另方面為中國引進現代化的汽車製造技術。城市交通由腳踏車時代進化到汽車時代，是改革開放成功事例之一。

為了學香港，深圳興建了許多辦公大樓和高級酒店，其中有樓高六、七十層者。特區政府和物業發展商顯然太樂觀。事實上，這些大建築的利用率到如今還偏低，甚至低於盈虧平衡點。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大廈多數不符國際標準。建築材料低劣、承造商偷工減料、電話線與電梯不足、間隔不良、門窗不能密合、排水系統不夠等，都是這些大廈的共通問題。其實不只深圳，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都有此情形出現。深圳的住宅樓宇供過於求，以致售價、租金一直没有像香港飆升。四弟子光退休後先回港定居。由於香港樓價太貴，他不久便搬到深圳。因為樓價平，不少港人以特區為家，每天由深圳往香港做工，下班後返回深圳。

我在加拿大的親戚，有一家原是廣州居民。文化大革命使家人分批逃亡到香港。他們幾兄弟合力在港開辦工廠，白手興家，繼而以投資移民身份到加拿大定居。鑑於加國投資氣候未如理想，他們於九十年代初回流香港，把已關閉的工廠搬到深圳外圍的沙井鎮繼續經營。從香港到沙井要經過兩個關卡，第一個在香港與特區邊境，第二個在特區與沙井之間。沙井的地價和工資，比特區更為低廉。我親戚幾兄弟是沙井工業區的開荒牛。他們在香港接洽生意，在沙井生產貨品。幾兄弟輪流駐香港和沙井。這是八十年代後期以來香港廠商的典型運作模式。

我和永堅遊罷北京、上海、深圳後，回香港拜候親戚一家。他們派一名兄弟駕駛有香港及廣東省牌照的私家車載我夫婦環遊沙井、長安、太平、虎門等四個屬安縣和東莞縣的新發展市鎮。寶安與東莞是珠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的一部份。九十年代初以來，開發區的經濟建設速度，有趕過深圳之勢。四個市鎮中，以長安和太平最富庶，其他兩個亦步亦趨。據駕車的親戚說，這四個市鎮的農民，有許多人已不再耕田。他們把田地租給外來投資的商人，或在田地上蓋廠房和住屋，出售或租給前來設廠的商人和前來做工的工人。此舉使他們成為小富翁，有錢享受生活和做生意。目前，「萬元戶」已很普通，人們要做「十萬元

戶」以至「百萬元戶」。因為在本地招不到工人，廠家要從外地輸入勞工。勞工來自珠江三角洲以外的貧瘠地區。換言之，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不僅香港需要「外勞」，特區和開發區也需要「外勞」。

廣深高速公路和其他公路兩旁，原是農田或荒地。現在到處看到樓房。駕車親戚感慨地說：「今天工廠林立的地方，正是文革當年他們幾兄弟和其他知識青年下放勞動之處。」我們汽車駛過的公路，大部份建築得不錯。廣深高速公路有六條行車線，來三條、去三條。路線和交通標誌都劃得很清晰，道面平坦，與多倫多的四零一號公路和其他北美高速公路比較，廣深公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親戚提醒我們，近年公路治安不靖，車匪路霸經常出沒，車輛的遭破壞與旅客的被劫殺，時有所聞。

虎門位於珠江出海口。東莞市政府已着手將虎門發展為一個貨運港，以便東莞製造的商品運到香港轉口外銷。虎門是我們此行不可錯過的地方，因為在此可以緬懷林則徐抵抗英軍和焚燒鴉片的事蹟。虎門鎮的岸邊有林則徐紀念館。館前有廣場，中央有林則徐銅像。廣場側近珠江的地方有兩個乾涸了的方形池塘，據說是當年焚燒鴉片之處。林則徐命士兵將繳獲的英商鴉片倒入乾涸池塘中，然後點火將之燒成灰燼。池塘有水閘。潮漲時士兵將水閘打開，讓海水湧入池塘。潮退時海水把鴉片灰燼帶走，沖至珠江口外。紀念館在廣場盡頭處，內有許多與鴉片戰爭有關的文物。廣場的另一端，即我們進入廣場必經之處，有一個牌坊，上面有江澤民的題字。據說紀念館是他授意興建的，旨在配合香港的回歸。遊罷虎門，親戚送我們到深圳火車站，讓我們回到香港。他則駕車返沙井，繼續處理工廠的事務。與他話別時，我們感謝他沿途講解所見事物，使我們對祖國的認識增加不少。

總結此次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旅遊經驗，能親眼看見祖國的建設固然感到愜意。但有機會與在深圳居住的四弟談論當前中國的國情，更是難得可貴。四弟關子光曾在大陸生活和替中共服務多年，對國情十分了解，以下兩個「國情」特別引起我們的興趣和關注。

近年，大陸各主要城市大興土木，出現了一片建設、再建設的景象。我們對此甚為欣慰，但亦有疑慮。這些建設是否太多，有無必要，落成後能否發揮預期效益？據我們所知，五、六十年代落成的許多大型建設，至今已成為西方人所稱的「白色大象」(white elephant)，大而無當。我於七十年代後期曾到東北旅行，參觀了不少大型建設如鞍山鋼鐵廠、瀋陽重型機械廠等。這些工廠到如今已大部份入了「白色大象」之列，成為國家經濟的沉重包袱。四弟稱：現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雖然比較他們的前輩年青、更多學識、思想更開放，但仍然有「一切以我為主」和「好大喜功」的心態。加上由於狹隘民族主義心理的影響，和以往的「假、大、空」作風仍然不少，很多建設都急於求成，忽略了完善的管理制度、週詳的生產計劃和管理人材的培訓。這樣的建設項目，有如一部只着重硬件而忽略軟件的電腦，其功能的好壞不言而喻。

現時國內人民喜歡以三個「下」字做話題。毛澤東要人民「下鄉」，鄧小平

要人民「下海」，江澤民要人民「下崗」。五、六十年代，因為推行「大躍進」和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號召青年知識份子放下書本，「下鄉」向「最革命」的貧、下、中、農學習，與他們同甘共苦。七、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認為，為了加速經濟發展，要讓部份人民先富起來。他叫人民向前看。結果向前看變為「向錢看」。因為收入不如理想，許多高級知識份子不務正業，「下海」經商。九十年代，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進一步推行鄧小平的政策。在新環境下，一向為國家經濟支柱的國有企業要自負盈虧。由於故步自封，以致經營不善，許多國有企業，尤其是那些被視為「白色大象」的企業，迫得大量削減冗員，導致無數職工從崗位退下來。於是「下崗」一辭成為當今中國大陸最流行的話語。對黨和國家領導人來說，「下崗」可能是改革國企的一條處方。但對工人來說則是一個詛咒。「下崗」職工組成的失業大軍，不但引起嚴重的經濟問題，更引起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如何解決「下崗」問題，是「江核心」要面臨的嚴峻考驗，也是中國改革開放能否成功的關鍵。

一九九七年第四季，亞洲發生金融風暴，波及香港。已有十四年歷史的港元與美元聯繫匯率制度受到衝擊，導致利息高企、股市大跌、房地產價格大幅滑落。從前排隊買樓和買股票的人，現在排隊擠提資金出現問題的股票經紀行、財務公司和銀行。擠提一間傳說與一間日資百貨公司有關係的西餅店，要把預購的餅卡兌換為現成的西餅，更是匪夷所思。由於禽流感病毒襲港和香港物價高昂，外地遊客不敢前來花錢，令到旅遊收益大減。與此同時，百業蕭條、商店工廠裁員減薪等壞消息接踵而來。到了這個地步，儘管政府口口聲聲說：「回歸後政治安定」、「一國兩制沒有問題」、「特區有大量外匯儲備」、「香港經濟基礎穩固」、「聯繫匯率不變」，香港市民還是憂心忡忡。在此環境之下，我和永堅沒有心情在香港多逗留幾天。與親友握別時大家依依不捨。他們希望我倆能再來香港和再遊大陸。他們憧憬到時香港和大陸將有一個較好的景象。我們都希望有更多時日再見。但是有一位我很熟悉和尊敬的長者則和我永別了。他是前恒生銀行名譽董事長何善衡。他於九七年十二月四日去世，出殯儀式於十二月十日舉行。德高望重的善伯教誨後輩不遺餘力，我曾經是他的學生。回加前一天，即十二月十日，我到殯儀館向他的遺像三鞠躬。這是此次香港與大陸之行的尾聲。

第八節：理想國的追尋

近十餘年來，我目睹許多香港人為了政治問題或個人愛惡問題而移民加拿大。落在移民隊伍之後的，又有許多想移民但不能移民的人。與此同時，我又目睹不少加國香港移民為了經濟問題、民族感情問題或個人愛惡問題而回歸香港。落在回歸隊伍之後的，又有不少想回歸但不能回歸的人。這個變化多端的時代正在愚弄香港人，令到他們無所適從。「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和「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這兩句話語成為外流港人與回流港人的心結。他們之如此煩惱，無非是想追尋一個理想國作為安身立命的地方。

定居加拿大初期，我對該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人民生活質素十分滿意。但久而久之，發現這個楓葉國也有許多不完美之處。經濟不前，人民對事業前途悲觀；法裔公民嚷着要脫離聯邦獨立，使國家分裂；多元文化政策執行不力，各族裔之間欠缺和諧。更令我不快樂的，是很多人濫用憲法賦予他們的民主、自由權利，以致性解放、吸毒、暴力犯罪等足以敗壞社會道德，危害社會安寧，影響人民健康的問題應運而生。到如今，以加拿大作為我的理想國的概念已不恰當了。

英國的湯馬士·謨爾爵士(Sir Thomas More, 1478 - 1535)寫了一本書，敘述地球上某處有一個小島國，名為《烏托邦》(Utopia)。烏托邦的政治、經濟、法律及社會制度都是盡善盡美的。該國的公民愛好和平，生活簡樸，沒有罪惡。謨爾寫這本書的用意，在於批評當時英國的社會和法制。他認為烏托邦是理想之國，但沒有告訴讀者如何去建立一個如此完美的國家。後世乃以烏托邦一詞來形容空想主義。

在現實世界，理想國是不存在的。地球上沒有烏托邦。儘管如此，還有人鍥而不捨地去追尋他們的理想國。他們是信奉耶穌基督的人。基督徒的理想國不是有土地、有疆界的有形之國(country)，而是一個無形的國度(kingdom)。這個國度是上帝的國度，普遍稱為天國。

基督教徒認為：上帝是宇宙和世界的創造者，一切時間和空間都由祂創造和掌管。基督教徒對人生之目的，除了追尋完美之人格外，則是天國之降臨。在天的上帝具超越性，故天國亦具超越性。天國，就是上帝掌權之處。在哪裏上帝的旨意可以通行無阻，那裏就是天國。所以天國存在於任何時間，無所謂過去，無所謂現在，無所謂將來。這個國度可以建立於整個宇宙和世界之內，可以建立在任何一個國家之內，也可以建立在任何一個人的心中。

基督徒又認為：天國是一個靈性的國度。凡是受上的靈所統治，又完全遵行祂的旨意的，也就是天國降臨之所在。所以人的心靈若受上帝的靈所統治，亦即天國降臨之所在。上帝的靈的旨意，簡言之是一個「愛」字。那兒有盡心、盡性、盡意、盡力以愛上帝，然後又以愛上帝之心，照上帝的旨意愛鄰如己的人，那兒便有天國的存在。

基督徒更認為：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是唯一能夠在世界上把上帝更完美地顯示出來的人。祂是人類中唯一能以其整個心靈接納上帝之靈，順服上帝，為上帝所完全統治的人。耶穌的心思意念、言語、行為，無不合乎上帝的旨意。是以基督本人即為天國在人間的實現。耶穌基督給予人類一個永無窮盡的理想。那就是要把天國降臨到世界上來。通過基督，上帝要我們去建立一個絕對平等、真正自由的國度。也就是互相效力，互相合作，互相愛顧，各就本位，各展所長的那樣的一個國度。人人信奉基督，跟隨基督，學效基督，以基督為橋樑，我們便可以認識上帝的旨意，遵從祂的旨意。而上帝的國度就漸漸可以實現於人間了。主禱文中所說：「願父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這個意思。

我常常不滿現實，不斷在追求一種理想。上述的基督徒話語給我很大的啓示：通過信奉基督教來追尋我的理想國。我的信教過程十分漫長和曲折，有如下述。

我出生於傳統中國人家庭。中國人多數以道德代宗教。我年幼時，父母親即要我服膺孔子及其他先聖先賢的道德教化。香港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是中國的一部份。香港於一八四二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居民在認同中國文化之餘，還要受西方文化熏陶。即使香港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後，西方文化在香港的影響力相信仍會繼續下去。西方文化乃係託庇在一個偉大宗教下而孕育及發展起來的。基督教和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科學技術，是西方文化的精粹。英國人把西方文化傳入香港。香港居民讓子女多讀英文以吸收西方文化。此舉無形中令到子女們的思想受基督教影響。一九四一年我在英皇書院讀書時參加了胡興德老師領導的研經班。這是我接觸基督教教義之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佔香港。以後的三年零八個月，我與基督教的聯繫斷絕了。原因是我回到中國內地參加抗戰，在兵荒馬亂中無暇研讀《聖經》。四十年代後期至五十年代後期，一連串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發生的事使我更遠離基督：中國發生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青年對新中國滿懷希望，相應回內地參加建設祖國。在這個時期，我閱讀了許多有關帝國主義侵華、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書籍。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的無神論調及宗教就是鴉片的說法引起了我的共鳴。

六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香港經濟飛躍發展。這時期內，功利主義主宰了香港社會的意識形態。當人人以金錢掛帥，以「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作為做人之道的時候，誰有心情與你講耶穌？爲了賺錢，爲了升級加薪，我向現實低頭，跟隨大眾走功利主義的道路，把宗教信仰置諸腦後。

舉家移民前，女兒慧瑜和慧琳分別在香港聖保羅男女中學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讀書。兩校同是基督教聖公會屬下的教育機構，有《聖經》課及宗教崇拜。當時女兒仍還未入教。她們讀《聖經》是爲了考試，參加崇拜是爲了取悅校長和老師，或出於好奇心。慧瑜和慧琳先後於八二年和八三年到渥太華及多倫多讀預科，以備升讀多倫多大學。她們分別寄居於我的好友家中。我的好友都是基督徒。耳濡目染，慧瑜和慧琳都相繼地信奉了基督教。

一九八四年全家移民加拿大後，因爲不再要營營役役，我有時間去沉思做人的意義。這是我考慮應否重新接近基督的時候。考慮的動機來自一個「愛」字。舐犢情深，天下父母無不愛其子女，我與永堅何獨不然？時代演變，人類的生活習慣與思想意識也不斷在演變。在此方面，青年人的演變尤爲迅速。他們往往走在時代尖端。年長的人多數較爲保守、審慎、固執，以致落後於形勢。因爲這緣故，我夫婦與兩個女兒之間常有意見不同的地方。由於家長意識和自尊心作祟，我和永堅常常不甘心接納女兒們的見解，儘管她們的見解是對的。反過來，由於常常認爲我們的思想落伍，慧瑜和慧琳又時時忤逆我們的好意。價值觀念的不同，損害了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間的感情，這是我與永堅所不願見到

的。爲了愛護女兒，諒解她們，使代溝收窄，我們移樽就教。因爲她們是虔誠基督徒，我們跟隨她們到教堂，藉一同分享耶穌的福音而加強我們父母女兒之間的愛。

我和永堅接受聖洗禮的過程頗爲奇妙。我家初時在多倫多市東區華埠的聖約翰堂做禮拜。後來由於士嘉堡的諸聖堂離我家較近，我與永堅及慧瑜到諸聖堂崇拜，但慧琳仍留在聖約翰堂。我們間中也會參加聖約翰堂的活動，因爲我們與該堂的牧師和一些教友仍保持友好關係。聖約翰堂教友王啓元是我們的家庭醫生。王醫生和他的太太胡百璋到諸聖堂見證我與永堅的洗禮，做我們的教父和教母。王醫生夫婦與我夫婦的宗教關係頗有淵源，因爲他們是已故胡興德老師的姪婿和姪女，胡老師是我的宗教信仰啓蒙者，王醫生夫婦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基督。此一安排何其巧合，莫非是上帝的旨意？

我倆於一九八九年四月接受聖洗禮，成爲基督徒。但是我們遲遲不能體會牧師所說：憑信心去接受基督的道理。我們信心不足，還未能無懷疑地去信耶穌。一向偏重理性和相信科學的我尤然。在教會的研經班席上，我往往是發問最多的人。我常常問「爲什麼？」經過一段相當長時期，在牧師及教友們不斷向我解釋和提示之後，加以我自己的靈修，我的執着態度才有所改變。我慢慢地、謙虛地去認識和接受基督。我發覺世界上沒有看見耶穌就去信奉基督教的人不可勝數，包括偉大的政治家和科學家如孫中山、牛頓、愛因斯坦等。「除非看見了才信」的我難道比他們更偉大和更有智慧？再深想一層，我又發覺：要有一個完美的人生，我不不但要有知識，更要有宗教信仰。我需要知識來解決生活問題。宗教信仰可使我精神愉快、心靈平安，從而更樂觀地和更積極地去走我的人生路程。基督教是一種能夠使人類有堅強的信心、確定的盼望和純潔的愛心的宗教。《聖經》教導我們：只要有信心、盼望和愛心，我們就可以追尋我們的理想國。此與謨爾爵士的沒有教讀者如何去建立烏托邦大不相同。

追尋理想國，是我寫這篇回憶錄的原因之一。這本書記載了我自讀書識字以來做人、做事、認識世界、批判時代和追求理想的心路歷程。先父關濟東撰寫的《世系錄》有令子孫「考世系知始終」的意義。我的回憶錄也有同樣意義，可以說是《世系錄》續集。至於它有無時代見證和發人深思的作用，則有待讀者鑑定了。

《七十年來家國》讀後

二十世紀的中國處於一個前所未見的大轉變時代，一百年來經歷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軍閥割據、國共內戰、抗日慘勝、大陸赤化、抗美援朝、中蘇反目、文化革命、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至今日，離世紀末僅有兩三年，而幸能有政治比較穩定、經濟逐步好轉的局面。

二十世紀的香港，除了最後的三年外，全都在大英帝國的羽翼下度過。在世紀之初，沒有人會預料到香港能有今日的經濟地位。比起近鄰祖國的政治動蕩、民生凋零、香港無疑是一塊中國人能夠安居發展的樂土。英國的殖民政策並沒有帶給香港人政治民主，但卻給予他們充分的人身自由，使他們能在法治之下取得驚人的經濟成就。

香港這數十年來一直是整個中國所嚮往的地方，香港人也是全體中國人既羨且妒的同胞，香港的總總事物，是中國本土人民常掛在口邊的話題。

這話題現在就由一位生於斯、長於斯，並親身參與香港經濟發展的關士光先生，從香港各個時期、各個層面，深入淺出地、不厭求詳地娓娓道來。

關先生早歲在香港求學，對當時殖民地教育的狀況瞭如指掌；青壯時期出任軍旅的翻譯生涯，供給他豐富的抗日戰爭史料；中年以後在銀行界服務，成就卓著，耳聞目睹不少香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珍聞；晚年寄居異域，崇奉基督，但對祖國及香港仍未忘懷，故將他一生的上述經歷，如他自己所說，都扼要和有系統地記載在本書中。

讀關先生的書，真是感慨彌深。本世紀的中國人民在無數戰亂、天災、饑饉和人為的政治鬥爭中偷生苟活於華夏大地上，他們希求走出國門，尤有可說。但連頗算安居樂業的香港居民，許多人由於前途未盡明朗，托庇異族。身為中國人而不願住在中國人管轄的地方，這種情況，難道不值得所有中國人深思嗎？

關先生在成書的初稿階段，就向本人不恥下問，本人以學非所長，也只能作點文字修飾，意見補充，實在無甚貢獻。關先生對此書述作多年，數易其稿，這種審慎從事、鍥而不捨的精神，才是我們要認真學習的地方。

蘇紹興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多倫多

《七十年來家國》讀後

讀關士光先生的《七十年來家國》，猶如看一部香港歷史。因為士光兄不但寫他自己的奮鬥史，也寫他的家庭在中國在廿世紀大時代中的遭遇。我讀起來，就特別有趣味。因為士光兄是「過來人」，所以在書中有三、四十年代香港英皇書院的生活細節（甚至男生的校服），也有香港淪陷時期和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切身體驗，以及戰後香港逐步繁華的轉變。士光兄不但是金融經濟的專家，對歷史和政治也瞭如指掌，於是在生平自述之間，處處補上當時的政治經濟背景，讓讀者獲得的，不單是一個人的歷史，而是宏觀的大歷史。讀畢全書，我不但認識士光兄更多，也學懂了香港銀行的運作、香港英國殖民地的統治手法、共產中國如何由七十年代的政治掛帥轉變為八十年代的經濟改革開放，甚至加拿大新移民的生活掙扎，既親切又實學。這是本書的難得之處。

《七十年來家國》最後一章，以宗教信仰的「理想國」作為「既濟」而又「未濟」的總結，令我特別欣賞和感動。以士光兄一生的追尋、際遇和成就，卻以基督教信仰成為他人生的高峰，實在令人一再玩味。於我，既敬佩，亦欣然送上衷心的祝福。

溫偉耀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多倫多

附 錄

- 附錄一：駐華美軍總部繙譯官退伍證書(第二章第七節)
- 附錄二：美國駐港空軍聯絡處繙譯員退職證書(第三章第八節)
- 附錄三：香港銀行貸款分析表(第四章第五節)
- 附錄四：恒生指數編算簡介(第四章第六節)
- 附錄五：恒生指數走勢圖(1964 - 1979)(第四章第六節)
- 附錄六：恒生消費物價指數編算簡介(一)(第四章第六節)
- 附錄七：恒生消費物價指數簡介(二)(第六章第六節)
- 附錄八：四類香港消費物價指數之年增長率(第四章第六節)
- 附錄九：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之年增長率(第四章第六節)
- 附錄十：香港政府布政司署函 - 統計諮詢委員之委任書(第四章第六節)
- 附錄十一：香港政府統計處函 - 統計諮詢委員工作概要(第四章第六節)
- 附錄十二：恒生銀行總經理函 - 有關我的升級(第四章第八節)
- 附錄十三：香港政府布政司署函 - 有關我辭去諮委會事(第四章第八節)
- 附錄十四：英國駐多倫多領事函 - 有關我獲 MBE 勳章事(第四章第八節)

附錄一

HEADQUARTERS UNITED STATES FORCES CHINA THEATER

Chungking, China

SUBJECT: Release of Interpreting Officers from dut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in China.

TO : Interpreting Officer Kuan Shih Kuang (關士光) - FAB No. 186.

1. On the termination of your duty as an Interpreting Offic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in China the Commanding General, United States Forces in China desires to thank you for a splendid job well done.

2. Without Interpreting Officers the 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in China would have been seriously hampered. The hard work done by the Interpreting Officers has materially aided in accomplishing this mission, and has helped to cement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3. It is hoped that you will continue your good work in the future, as in the past, and help to build China into the great nation it deserves to be.

BY COMMAND OF LIEUTENANT-GENERAL WEDEMEYER:

Sylvio L. Bousquin
SYLVIO L. BOUSQUIN
Lt. Col., AGD.
Asst. Adj. General

C E R T I F I C A T E

This certifies that Interpreting Officer Kuan Shih Kuang (關士光)
FAB Number 186 has been honorably released from dut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in China on 6 October 1945.

Harry R. Smith
HARRY R. SMITH
Lt., Col., Inf.
Officer in Charge, Interpreter Affairs
China Theater

附錄二

OFFICE OF THE AIR LIAISON OFFICER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 B.C.C.

REPLY TO
ATTN OF:

18 January 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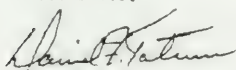
SUBJECT: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TO WHOM IT MAY CONCERN

1. Mr. Stanley S. Kwan (關士光) has worked for the U.S. Air Force in the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here in Hong Kong for the past five (5) years. It is on his own initiative that he leaves our employ in order to accept more remunerative employment.

2. During his employ Stanley Kwan displayed the many attributes to set him over and above the many other people employed in that same job. His strong points are: personal integrity, a high degree of intelligence, the ability to translate and understand highly technical material, and the initiative to formulate plans and to follow through on the job until its successful completion.

3. It was a loss to this office to see him go, and I unhesitatingly can recommend him for any assignment that requires the aforementioned attributes.



ON MEL F. TATUM

Colonel, USAF
Air Liaison Officer

附錄三

按選出用途在本港使用的貸款分析(%)

Analysis of Loans and Advances for Use in Hong Kong by Selected Usages

| 年 份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82-89 平均 |
|--------------------------------|------|------|------|------|------|------|------|------|-------------|
| 1. 進出口貿易 | 8.0 | 7.5 | 7.7 | 7.0 | 7.1 | 5.7 | 10.8 | 9.6 | 7.92 |
| 2. 製造業 | 10.5 | 10.0 | 9.6 | 9.4 | 10.3 | 9.1 | 7.4 | 7.0 | 9.16 |
| 3. 批發及零售業 | 13.0 | 14.3 | 14.8 | 14.7 | 14.3 | 13.8 | 11.4 | 9.5 | 13.22 |
| 4. 建造及物業發展業 | 26.4 | 23.0 | 22.3 | 17.6 | 13.7 | 12.0 | 11.2 | 14.6 | 17.60 |
| 5. 購置住宅樓宇 | 8.3 | 9.0 | 9.6 | 11.6 | 14.2 | 14.9 | 16.4 | 16.7 | 12.58 |
| 6. 金融企業 | 6.5 | 8.6 | 7.6 | 8.3 | 8.5 | 10.1 | 10.1 | 12.9 | 9.07 |
| 7. 股票經紀 | 1.4 | 0.8 | 0.7 | 0.9 | 1.0 | 0.8 | 0.6 | 0.5 | 0.83 |
| 8. 其他 | 25.9 | 26.8 | 27.7 | 30.5 | 30.9 | 33.6 | 32.1 | 29.0 | 29.62 |
|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 9. = (1) + (2) | 18.5 | 17.5 | 17.3 | 16.4 | 17.4 | 14.8 | 18.2 | 16.6 | 17.08 |
| 10. = (4) + (5) | 34.7 | 32.0 | 31.9 | 29.2 | 27.9 | 26.9 | 27.6 | 31.3 | 30.18 |
| 11. = (9) + (10) | 53.2 | 49.5 | 49.2 | 45.6 | 45.3 | 41.7 | 45.8 | 47.9 | 47.26 |
| 12. = (3) + (6) + (7) + (8) | 46.8 | 50.5 | 50.8 | 34.4 | 54.7 | 58.3 | 54.2 | 52.1 | 52.74 |

上表所列百分比數字，乃根據香港布政司署經濟科(Economic Services Branch, Hong Kong Government Secretariat) 1982-89年出版之《香港經濟概況》(Hong Kong Economic Background)所載統計數字編算出來。

附錄四

恒生指數編算

基本概念

恒生指數為一「拉斯貝爾」式加權價格指數 (Laspeyre's Type Price Index)，以成份股在基日之發行股數為權數。

指數的計算方法十分簡單，乃將成份股的現時總市值（各成份股的市價乘以其已發行股數）除以基日的總市值，算式如下：

$$\text{指數} = \frac{\text{現時成份股總市值}}{\text{基日成份股總市值}} \times 100$$

若成份股之股本結構或股份名單有所變動，則改用變動之日為新基日，並以新基數計算，同時用「連鎖」方法將計算得之指數溯源於原有基日，以維持指數之連貫性。

計算公式

為方便日常計算工作，指數實際上乃採用「每日連鎖方法」(Daily Chaining Method) 計算。算式為：

$$\text{今日即時指數} = \text{上日收市指數} \times \frac{\text{今日現時總市值}}{\text{上日收市總市值}^\#}$$

^\# 即據上日成份股之股本或成份股變動而作調整後之總市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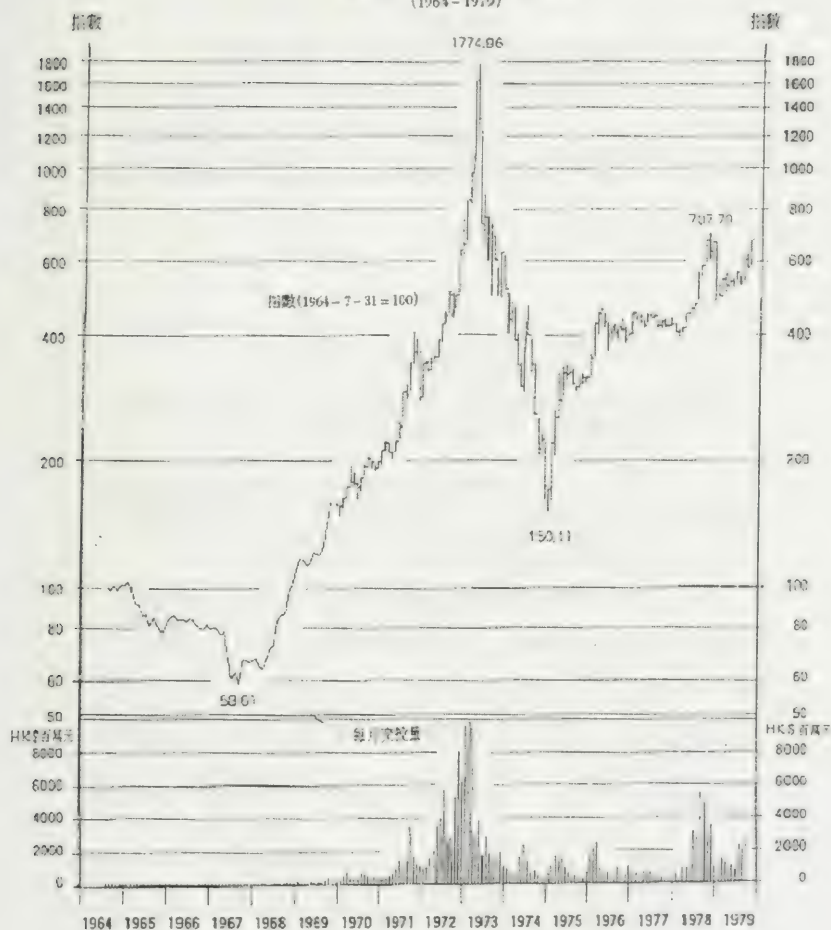
暫停買賣之成份股處理方法

當某一成份股暫停買賣時，將會被暫時剔除於其所屬分類指數的計算之外。若有成份股在交易時間內突然停牌，將取其最後做價按盤計算即時指數，直至收市後，再進行必要調整，將其暫時剔除。

資料來源：恒指服務有限公司（恒生銀行全資附屬機構）一九八八年九月出版之《恒生指數淺釋》

附錄五

恆生指數走勢圖
(1964-1979)



資料來源：一九七九年十月出版的《恆生經濟季報》

附錄六

恒生消費物價指數編算

表一

計算恒生消費物價指數的基本公式

$$\text{恒生消費物價指數} = \frac{\text{現商品或服務價格} \times \text{相對的權數}}{\text{基期內商品或服務價格} \times \text{相對的權數}}$$

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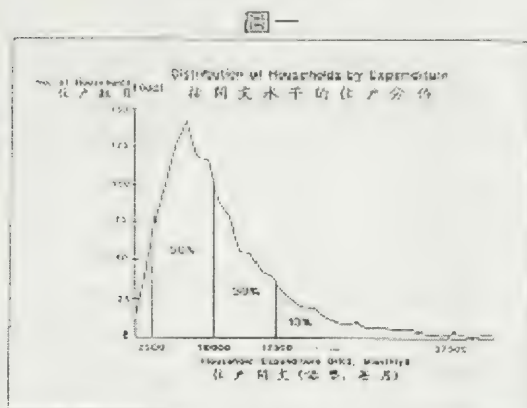
Expenditure brackets of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消費物價指數的開支範圍

| Index Series | % of households covered | 1984/85-based series Monthly household expenditure in 1984/85 | 1989/90-based series Monthly household expenditure in 1989/90 |
|---------------------------|-------------------------|--|--|
| 指數系列 | 包括住户的百分比(%) | 以一九八四至八五年度為基期的指數系列 一九八四至八五年度住户每月開支 | 以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為基期的指數系列 一九八九至九零年度住户每月開支 |
| GPI(A)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 50 | \$2,000 - \$6,499 | \$2,500 - \$9,999 |
| CPMB) 乙類消費物價指數 | 30 | \$6,500 - \$9,999 | \$10,000 - \$17,499 |
| Hang Seng CPI 恒生消費物價指數 | 10 | \$10,000 - \$24,999 | \$17,500 - \$37,49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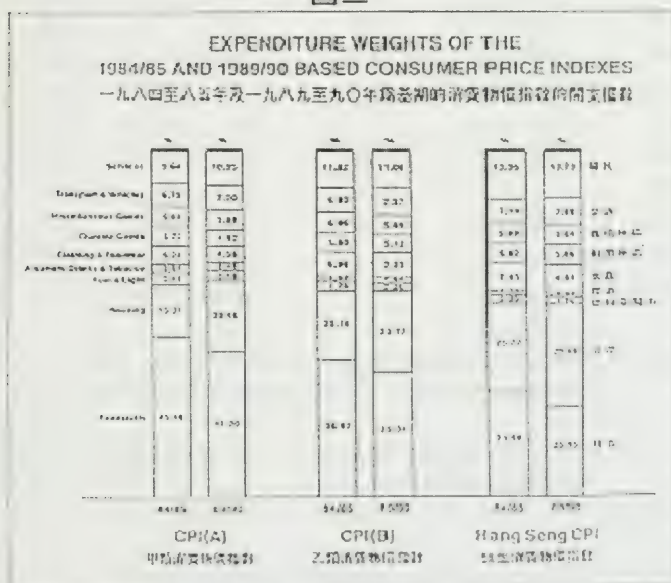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恒生銀行出版的《恒匯》雙月刊第263期（1991/6/7）

附錄七

恆生消費物價指數編纂(二)



圖二



資料來源：恆生銀行出版的《恆匯》雙月刊第 263 期(1991-6-7)

附錄八

四類香港消費物價指數之年增長率

| Year - on - year rates of increase (%) | | | | |
|--|-----------------|-----------------|---------------|-----------------------|
| 年份 (Year) | 甲類指數 CPI (A) | 乙類指數 CPI (B) | 恒生指數 HSCPI | 綜合指數 Composite CPI |
| 1977 | 5.8 | 5.5 | 5.0 | * |
| 1978 | 5.9 | 5.9 | 5.8 | * |
| 1979 | 11.6 | 11.5 | 12.4 | * |
| 1980 | 15.5 | 15.1 | 14.9 | * |
| 1981 | 15.4 | 14.8 | 14.5 | * |
| 1982 | 10.5 | 10.6 | 11.7 | 10.9 |
| 1983 | 9.9 | 9.9 | 10.3 | 10.0 |
| 1984 | 8.1 | 8.5 | 9.1 | 8.6 |
| 1985 | 3.2 | 3.5 | 4.0 | 3.5 |
| 1986 | 2.8 | 3.5 | 5.3 | 3.8 |
| 1987 | 5.5 | 5.3 | 6.4 | 5.7 |
| 1988 | 7.5 | 7.4 | 8.7 | 7.8 |
| 1989 | 10.1 | 9.7 | 11.0 | 10.3 |
| 1990 | 9.8 | 9.7 | 11.2 | 10.2 |
| 1991 | 12.0 | 11.6 | 11.1 | 11.6 |
| 1992 | 9.4 | 9.6 | 9.8 | 9.6 |
| 1993 | 8.5 | 8.7 | 9.5 | 8.8 |
| 1994 | 8.1 | 8.6 | 10.0 | 8.8 |
| 1995 # | 9.0 | 9.5 | 9.8 | 9.8 |

Note: * Started to compile the Composite CPI from 1981;
the year - on - year rate is available from 1982 onward

Refer to averages for Jan 95 to Oct 95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s for Jan 94 to Oct 94.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附錄九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之年增長率

GDP estimates, 1977 - 1995

以當時價格計算

以固定（一九九零年）價格計算

| Year | At current market prices | At constant (1990) market prices |
|--------|--------------------------|-----------------------------------|
| | HK \$ Mn | HK \$ Mn |
| 1977 | 72,724 (15.9) | 233,020(11.7) |
| 1978 | 85,206 (17.2) | 252,826(8.5) |
| 1979 | 111,754 (31.2) | 281,954(11.5) |
| 1980 | 141,796 (26.9) | 310,499(10.1) |
| 1981 | 170,750 (20.4) | 339,044(9.2) |
| 1982 | 192,488 (12.7) | 348,364(2.7) |
| 1983 | 212,673 (10.5) | 368,171(5.7) |
| 1984 | 256,493 (20.6) | 404,872(10.0) |
| 1985 | 271,655 (5.9) | 406,619(0.4) |
| 1986 | 312,561 (15.1) | 450,411(10.8) |
| 1987 | 384,488 (23.0) | 508,763(13.0) |
| 1988 | 455,022 (18.3) | 549,302(8.0) |
| 1989 | 523,861 (15.1) | 563,368(2.6) |
| 1990 | 582,549 (11.2) | 582,549(3.4) |
| 1991 | 668,512 (14.8) | 612,016(5.1) |
| 1992 | 779,335 (16.6) | 650,347(6.3) |
| 1993 * | 899,869 (15.5) | 691,932(6.4) |
| 1994 * | 1,022,658 (13.6) | 729,514(5.4) |
| 1995 # | 1,135,000 (11.0) | 766,000(5.0) |

* Provisional figures

Forecast figures

Note: Figures in brackets are percentage changes over the preceding year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附錄十



Ref: ECON 12/581/72

Colonial Secretariat
Lower Albert Road
Hong Kong

21 May 1976

Sir,

I am directed to inform you that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has been pleased to appoint you as a member of the Statistics Advisory Board for a term of two years with effect from 1st June 1976.

The terms of reference of the Statistics Advisory Board are as follows:

"To advise the Commissioner for Census and Statistics on all statistical matters referred to the Board by the Commissioner."

A notice of your appointment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I am, Sir,
Your obedient servant,

(David Stanton)
for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Mr Stanley KWAN
Manager
Hang Seng Bank Ltd
Research Department
77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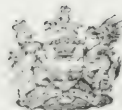
附錄十一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Kai Tak Commercial Building, 317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政府統計處

香港 · 德輔道中 · 政府大廈



Our Ref. 檔案編號: CENST/1304/4

9th June 1976

Your Ref. 來函編號:

Tel. 電話: 5-455773

Telex Address: 電傳地址: CENSTHK

Dear Mr. Kwan

May I refer to Mr. Stanton's recent letter to you, advising you of your appointment as a member of the Statistics Advisory Board for a two-year term with effect from 1st June this year.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elcome you to the Board and confirm that the next meeting will be on the 29th June.

You may like to know that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Board are:-

Unofficial

Mr. Leo Goodstadt
Prof. Ronald Hsia, Ph.D.
Mr. Elmer J.S. Tsu, J.P.
Mr. Obi Mohan
Dr. LIN Tsong-biau

Official

Commissioner for Census and
Statistics (Chairman ex officio)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or his representative
Secretary for Social Services or
his representative
Departmental Secretary,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Secretary)

The purpose of the varied membership is to ensure that this department is in contact with as wide a representation as possible of the various sections of the community.

It is our practice to send to all members of the Board everything that we produce. This will of course be the case with yourself on future productions. I am not sending you all our past productions, as I expect that you are already aware of them from your occupation. However, I now send you a copy of our latest summary of what we have done, what we do, and what we hope to do in the next two years or so. I hope this will be of interest to you.

The basic topic for discussion at this meeting will be where this department sees itself going over the next 5 years. This will be based on a draft presentation to either Executive Council or the Finance Committee of Legislative Council (it is not yet quite certain which it will be); and a copy of this draft will be sent to you before the meeting.

Yours sincerely
(B.S. Whitelegg)

Commissioner for Census and Statistics

Mr. Stanley Kwan,
Manager,
Hang Seng Bank Ltd., Research Department,
77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附錄十二

恒 生 銀 行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德 輔 道 中 七 十 七 號

第 一 頁

敬 啓 者

閣下服務本行以來盡忠竭智建樹良多茲經銓衡考績決定由
一九七八年壹月一日起擢升

閣下爲高級經理 薪增拾貳并資策勳倘希此後繼續有加本行
前途實深利賴謹函奉達順致賀意并祈

察照爲荷此致

關士光 同 事

總經理

利國偉 謹啓

九 七 八 年 壹 月 一 日

附錄十三

布政司署
香港下亞厘畢道



GOVERNMENT SECRETARIAT
LOWER ALBERT ROAD
HONG KONG

本署編號 OUR REF.: CR 12/581/72
來函編號 YOUR REF.

31st March 1984

Mr Stanley S.K. Kwan,
Hang Seng Bank Ltd,
77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I have been informed by the Commissioner for Census and Statistics that you are not available for re-appointment to the Statistics Advisory Board.

I am direct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to accept your resignation, with regret,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thank you for the many years of valuable service which you have given to the Board.

M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wishing you a long and happy retirement.

(P. Jacobs)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c.c. C for C&S

附錄十四



BRITISH CONSULATE-GENERAL
SUITE 1810, COLLEGE PARK
777 BAY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G 2G2

25 June 1985

Mr. Stanley Kwan Shih-Kuang, MBE,
Apartment 1706,
2350 Bridle Towne Circle,
Toronto, Ontario,
M1W 3E6.

Da N. hum.

In confirmation of my telephone call, I have been asked to convey the following message received by telegram from His Excellency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Sir Edward Youde, GCMG, MBE:

"Please accept my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the award to you of the MBE. I wish you well in your retirement."

I would like to repeat my own congratulations.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in Toronto as much as I have done in the last four years. I (or my successor) will be in touch again as soon as we ha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vestitures and the alternative arrangements that may be possible.

*Your sincere
Reg Holloway.*

(R. E. Holloway)
BRITISH CONSUL-GENERAL

REH/js

English Synopsis

My Home and My Country *Memoirs of an Old Hongkongan*

Stanley Shih-kuang Kwan was born into a Hong Kong famil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ankers. However, his father's and uncle's banks (*vinhao*) did not survive the financial turmoil of the 1930s.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Hong Kong in December 1941 put an end to Mr. Kwan's schooling. He was an air raid warden during the Battle of Hong Kong. After the fall of the city, he left for the Chinese Mainland to escap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he served as an army interpreter, a liais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armies. At the end of the war, he returned to Hong Kong, where he worked at various commercial jobs before taking up translation again, this ti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General. In 1962, he joined Hang Seng Bank, where he was put in charge of the newly formed research unit.

Hang Seng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among the traditional Hong Kong banks, which made the transition into modern banks (*vinhang*). Mr. Kwan's role in that transition was to build up the research unit into a major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re on the economy and finance of Hong Kong. In the process, he introduced the now world famous Hang Seng Index of the stock market and the Hang Seng Consumer Price Index. He was appoint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its Statistics Advisory Board to help formulate policies on census and statistics. He retired from the bank in 1984 after a heart attack, and immigrated to Canada.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recognized his contribution with the award of an MBE. In Toronto he has remained active in his church and in the immigrant community. He also wrote this autobiography.

Mr. Kwan tells his personal story against the epic backdrop of war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Hong Kong. He reflects on the changes in the Hong Kong financial sector and on the management style and business policy of Hang Seng Bank. He records his observations on several journeys in China and muses on his own feelings. He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ver seven decades of his sense of home and country in each of Hong Ko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anada, as well as his allegiance to the Kingdom of God. This is the story, told intelligently with many insights, of an honest, dedicated and thoughtful man who has lived through scene after major scene of the drama of Hong Kong and China, and has left his mark.

